
民国学术文库

# 民国外语教学研究



张美平◎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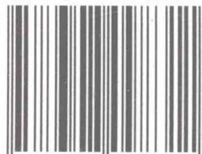


本书是研究民国时期外语教学的专著。作者讨论了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迄至1949年覆亡共38年的中国外语教学情况。本书主要按照公立学校的外语教学、教会学校的外语教学两条主线，回顾了民国时期中国外语教育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外语教育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若干中学和大学创办的原因、过程、外语教学特色、影响及其启示等。作者还简要回顾并讨论了晚清时期的外语教学以及中共领导下开展的外语教学情况。

民国是中国外语教育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其教育质量举世公认。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一时期外语教学的梳理，给转型时代的中学和大学外语教学带来一些思考与启示。

上架建议 / 民国 学术

ISBN 978-7-308-09831-1



定价：50.00元

# 民国外语教学研究

张美平◎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外语教学研究/张美平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308-09831-1

Ⅰ.①民… Ⅱ.①张… Ⅲ.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教育史－中国－1912～1949 Ⅳ.①G5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3776 号

**民国外语教学研究**
张美平 著

---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50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831-1
**定　　价** 50.00 元

---

本专著获浙江树人大学著作出版基金、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资助

#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时期的外语教学回顾** …… 1
第一节 教会学校的外语教学 …… 3
第二节 官办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 …… 13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下的外语教学** …… 31
第一节 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 …… 32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上海大学 …… 37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延安外国语学校 …… 46

**第三章 教会中学的外语教学** …… 55
第一节 教会中学外语教学概况 …… 56
第二节 “高深学问之涵养”——武昌文华中学 …… 86
第三节 “四方学子负笈来”——北京汇文中学 …… 96

**第四章 中华民国的中学外语教学** …… 103
第一节 中华民国的中学外语教学概况 …… 104
第二节 荣光永久招展——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 149
第三节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天津南开中学 …… 156

**第五章 教会大学的外语教学** …… 167
第一节 教会大学外语教学概览 …… 168
第二节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燕京大学 …… 201

第三节 “东方的哈佛”——圣约翰大学 …………………………… 215
第四节 规模宏大、修理整齐、教育良善——岭南大学 …………… 230

第六章 中华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 …………………………………… 245
第一节 中华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概况 …………………………… 247
第二节 外国语专门学校 ……………………………………………… 272
第三节 自由独立,兼容并蓄——国立北京大学 …………………… 279
第四节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国立清华大学 …………………… 291
第五节 学术重镇,人才摇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305

参考文献 ……………………………………………………………… 320

# 第一章

# 晚清时期的外语教学回顾

中国外语教学历史源远流长。许多典籍中便有一系列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四方部族交流的记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云:"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所谓大行令,即《周礼》行人之职,译官即《王制》所谓寄、译之类也。考史,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亦掌夷狄之官。"①被称为"通外国之言"的"象胥"一职早在周朝(前11世纪—前256年)就有了。但是,对于那时候人们的外语学习和以培养翻译官员为目标的外语教学活动,可惜没有可靠的史料记载。于史有征的外语教学活动,以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元大都(今北京)设立的回回国子学为最早,这是培养波斯语和"亦斯替非文字"②译员的学校。其后,则有明朝的"四夷馆",③主要从事培养专门翻译,教授边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语言文字。明末清初有四译馆、会同四译馆,专司翻译和除汉语外的各语种教学。再往后是俄罗斯文馆,这是培养俄语翻译以满足当时中俄之间交往需要的学校。我国英语教学的开始时间相对较晚,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英美传教士在我国澳门、香港等地创办的教会学校。

最早面向华人开始英文教学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夷情备采》④中提

---

① [明]林尧俞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78—679页。

② "亦斯替非文字"是一种古代伊朗人所发明的特殊的文字符号,用于政府之间财务税收、记账等实务。这种文字类似缩写符号或象形文字,需经过专业培训方能掌握。

③ 关于四夷馆的翻译教学,详见张美平:《教习译写番字,事虽轻而干系重——明代四夷馆翻译教学述略》,《中国科技翻译》,2011年第2期。

④ 魏源说:"中国人以欧罗巴为夷,皆由不通欧罗巴之语言文字,是以于麻六甲(按:今译马六甲)设书院教师,以教化中国之人。"(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仲夏,古微堂聚珍版,第6页。)

到的创办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以中国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教会学校——马六甲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这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远东地区创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除英华书院之外,还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eman)等人于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创办的一所男塾——"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①]以及由英美等国侨民出资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校(The Morrison School),等等。但是,这些教会学校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游移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其英语教学不能算作是中国外语教学的开端,至多只能算是中国外语教学开端的催化剂。然而,英华书院等学校的创办,开始了西方传教士在华人中进行外语教育活动的历史,培养了袁德辉[②]等近代中国最早的译才。

从1840年开始,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遭遇来自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被无情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漩涡中,当时的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③]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④]中国的传统教育不得不顺应时势而进行变革,其显著标志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外语教育的开启。清政府在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实力派官僚的强力推动下,开始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的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兴办学堂、培植人才。洋务派官僚自1862年起,相继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福州、广州等沿江沿海城市创办了30余所"洋务学堂",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走上民族复兴之路。

从培养目标来看,洋务学堂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科技实业学堂。其中,洋务外国语学堂是这些学堂中成立最早、影响力

---

① 相关情况可参见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 9.

② 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秘书。有关袁德辉的详细情况,参见季压西、陈伟明:《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一)——中国近代通事》,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323页。

③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页。

④ 此语典出李鸿章。他曾到英法军舰上参观过,对方"火炮之精纯,子药之精巧,器械之精明,队伍之雄整"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874年呈奏的《筹议海防折》中,他阐述了对时局变迁的见解:"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構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光绪乙巳四月金陵付梓,戊申五月印行。)

最大的学堂。创办于同治元年(1862)的京师同文馆是我国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外国语学堂,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教育的启动,也是中国正规英语教育的肇始。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创办了约7所外国语学堂,即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新疆俄文馆(1887)、台湾西学馆(1887)、珲春俄文书院(1888)、湖北自强学堂(1893)。这些外国语学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如外文翻译、外交官、国务总理、教育工作者,等等。除了外国语学堂,还相继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15所左右的军事学堂和福州电报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等14所科技实业学堂。这些学堂大都重视外语教育,而且有些学堂的外语教育质量还非常高,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翻译家严复、伍光建等人都毕业于这些学堂。

贯穿晚清外语教育的另一条主线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展的教会教育。如前所述,近代英语教育始于教会学校。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由外国传教士或教会设立的一种特殊的学校教育。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与传统教育制度格格不入的异质教育体系。早期的教会学校,大半集中精力于传教士之培养,于语言(汉语、英语)、科学、医学方面,虽有贡献,却很有限。这些学校中,以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为最著名。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教会学校逐步从通商口岸向内地发展。这时逐渐出现了具有中学性质的教会中学,教会教育进入发展时期,由最早以小学程度为主,渐渐发展为中学和大学程度的教育。至19世纪末,一些发展较好的教会中学演变成为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等。1900年以前,教会学校与中国的教育系统双轨并行,互不干涉。直到20世纪初期,新学制建立,科举制度废除,并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后,教会学校才逐渐被正式纳入中国教育体制。①

## 第一节　教会学校的外语教学

### 一、教会学校概览

#### (一)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开始

虽然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但是,西方基督教会在中

---

① 本章主要根据拙著《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的相关内容补充修改而成。

国创办学校是在19世纪上半叶。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创办的英华书院是按照英国模式首次在海外以华人为主要对象开办的一所向中国学生介绍西方文化、学习英语的新式学校。道光十四年(1834),马礼逊病逝于澳门。时人为了纪念马礼逊的去世,于道光十九年(1839)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校,这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第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教会学校,标志着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开端。

(二)教会学校的竞相设立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英国政府获得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并且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到中国,一体保护"。① 这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敞开了大门。1844年起,《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相继签订。这些条约对在中国成功地从事传教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全改变了先前禁教的状况,外国人在华传教合法化,并允许他们原先只在通商城市,后在中国任何地方随意建造教堂、医院、学校及房屋等。②

1842年,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到香港,次年在香港正式开学。1843年起,香港这个有许多外籍人士居住的西方化城市,十余年之中就已开办各种学校约10所,且拥有一定数量的女子学校,开一代风气之先。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教会相继在中国沿海地区开设教会学校。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的爱尔德赛女士(Mrs. Aldersay)于1844年在宁波开设一所女子学塾,这是五口通商口岸最早成立的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该校于1867年迁往杭州,改为育英书院,其后又发展为之江大学。1850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开设徐汇中学。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斯女士(Emma Jones)在上海虹口创办文纪女塾。它是著名的圣玛利亚女校的前身。1860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设立清心男塾,后发展为清心中学。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从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起,截至1860年之前,确切可考的,仅基督教新教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六地就开设各式学校有50多所,有

① 转引自王嘉弘:《从李春生对进化主义的反驳看其在近代思想史的定位》,台湾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第280页。

②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 10.

学生 1,000 余人。①

（三）早期教会学校的成因及特点

来华传教士把教育当作传教的一种新方式，是有具体原因的。首先，宗教与教育有“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② 宗教和教育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具有培养人勉力向善、开发人们的智慧潜能的功用。其次，传教士兴办学校，开展识字教育，开设英语、算学等西学课程，希望能够培养一批他们所信任的教徒，从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再次，促使传教士转向教育工作是由于使中国人信仰基督的工作出奇地缓慢。例如，福州的美国卫理会教徒花费十年时间才施洗一个教徒，到 1853 年，全中国只有 350 名中国人受洗入教。传教士只好将目光转向孩子，对孩子作感化工作会加快这一进程。

但是，在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土地上办学，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容易。首先，招生异常艰难。中国人对洋人抱有深深的疑虑与敌视，如有些中国老百姓担心传教士会将他们的孩子煮了用来制作鸦片，把孩子的眼睛挖出来做望远镜，或为了邪恶的目的将孩子贩卖到国外去。因此，学校很难招到学生，“1859 年福州设的育英女学校，刚收住校生时，有 7 个学生来校，隔了两三天，或因被邻里耻笑，或因受族人反对，就走了只剩下一个了”。③

师资也是令传教士们深感头疼的问题。招聘在学识和职业操守方面合格的教职工对传教士来说犹如登天。他们时常发现其雇佣的助手“道德上有过失（a moral delinquent）”，莫宁格（Mary Moninger）的学校雇佣的第一个中国人被发现以算命作为副业，第二个中国人有两个老婆。糟糕的是，一个中国教师被发现教学生如何赌博。而且，传教士本身也几乎没有接受过教学及学校管理方面的培训。教师队伍不稳定，由于休假、调动、被开除等方面引起的人事变动对早先创办的教会学校产生了负面影响。④

教会学校办学条件异常简陋，有时就在传教士家里或某个地方租来的一间屋子里上课。1880 年之前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没有自己的校舍。课程

---

①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8 页。

②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③ 金忠明等：《中国民办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1 页。

④ Gael Graham：*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Peter Lang Publishing，Inc.，New York，1995，pp. 14—16.

设置、教学及管理、教科书的编写等都体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而且没有学制，学到哪儿算到哪儿，学生也就没有毕业一说。学校创办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手段培养在华传教士和信徒。因此，其课程设置的特点是以宗教教育为其主要内容，兼授中国典籍和英文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课程，如"圣经、英文……格致(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电光、化、算、诸学，与及中国经史典籍"。[①] 这跟仅研习儒家典籍和经史之学的传统蒙学大相径庭，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几千年来陈陈相因的教学内容格局的突破。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利于招收学生外，还在于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传教工作者。鲁珍晞(Jessie G. Lutz)说："有些传教士开办学校，用中国经典、西方历史、科学、数学和基督教义来培养未来的基督教工作者。中国经典是使牧师取得知识分子地位所必须的；科学和数学是训练推理能力所不可缺少的；西方历史和地理是构成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成分。"[②]

但是，这种注重自然科学和世界知识的课程设置及其教学客观上拓展和提高了中国学子的视野和素质。容闳、袁德辉、黄宽、黄胜、唐廷枢、何进善等人日后在各行各业中的出色表现即是证明。

(四) 外语教学的发轫

早期教会学校主要是由英美传教士创办，因而开设的外语几乎都是英文。如前所述，教会学校的程度都比较低，大多数以小学为主，由于受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威慑，来华的传教士不多，创办学校的数量也有限。开设的课程除基督教教义、中国文化经典课程外，相当多的学校开设英语课程，学习初步的英语读写技能，还将英语作为格致、地理、历史、算学等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教学媒介。但是，1860 年以前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除了像马六甲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等少数教会学校的效果较为理想外，一般都很有限。

教会学校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演变，到了 19 世纪最后 30 年，逐渐出现中学性质的教育。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绝大多数的教会学校都很重视外语教育，有些学校一改以往的免费入学，甚至提供饭食或学费等做法，向学生收取不菲的学费。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教会学校已得到中国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到 19 世纪末，个别发展较好的教会中学发展成为教会大学，教会教育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本节选取早期教会教育开展得较好的两所较有代表性的学校进行讨论。

---

① 周之德：《振兴学校》，《中西教会报》，1897 年 8 月，第 3 卷第 32 期。

②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6.

## 二、马六甲英华书院

### (一) 书院的创办

马六甲英华书院创办于1818年,是一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教会学校,由第一位到达中国广州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Rev. William Milne,1785—1822)于1807年在新加坡马六甲创办。根据《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General Plan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orming at Malacca*),英华书院"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为接踵而至的传教士提供"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的培训;[①]"为恒河以外国家使用汉语的人提供英语语言和欧洲文学及科学"的教育。[②]

### (二) 学生和教师

英华书院招收的学生数量相当有限,第一学年(1819—1820)只招了7名学生。第二学年开始,学生人数呈现稳步增长,到1839年学生有70多名。学生的入学资格相当宽松:"中国人,不管是否在中国本土出生,也不管是否基督徒都可以入学,如同欧美人是否在印度出生一样。"[③]入学的学生几乎大部分是在马六甲出生的华人。所以,一进入书院,这些学生差不多从头开始学习中国官话,英语口语和写作以及其他技能和科学课程。经过6年的学习,都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英华书院强调中西语言教学和宗教训练,英语由首任校长米怜[④]亲自教授。校监马礼逊不仅参与行政和教学管理,而且还亲临教学一线。[⑤] 英华书院的教师队伍中,除了像米怜夫妇、马礼逊这样出色的英文教师外,它的汉语教授均证明为饱学之士,如担任汉语教学的第三任校长高大卫(Rev. David Collie),"中国官话讲得与中国人一样好,汉语写作完美无缺"。[⑥] 理雅各(James Legge)于1839年成为英华书院校长,他也是一位饱

---

① Robert Morrison & William Miln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p. 233.

②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1832, p. 110.

③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4.

④ 详见1832年5月的《中国丛报》上介绍米怜生平的文章: *A Brief Sketch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the Late Rev. William Milne, D. D.*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1832, pp. 321—330.)

⑤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Lanham, Md. ,& Lodon, 1996, p. 182.

⑥ 周岩厦:《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学之士,是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①

(三) 课堂教学及其特色

英华书院的"各项课程之设计,均本以和平传播基督教及东方一般文化为原则,冀以达致有效影响为目的",即,对欧籍学生,"必须授予中国语文,惟各生得按其意愿在宗教、文字、商业诸科上有所选择";母语为汉语的学生,"必须以英国语文授以地理、历史、算术以及有关学术与科学之科目"。② 在所有课程中,英华书院最强调和注重的是英国语言文字的教学,其课程设置有如下特点:(1) 语言和西学相结合。属于语言方面的课程有英文对话、写作、语法等。西学课程有史地、天文、数学等。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掌握一定的将来谋生所必须的西学知识。(2) 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礼逊要求中国学生阅读和掌握《幼学琼林》、《四书》、《三字经》等传统蒙学经典和基督教经典《圣经》。(3) 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根据学生的程度和年龄,把学生分为一班(高级班)、二班、三班和四班(初级班),根据不同的班级,设置不同的课程,如 1826 年高级班的课程是"《圣经》中记载的历史、英语语法、中英文写作、天文、地理和几何初步";1829 年的课程包括"哲学、天文、地理、希腊史、算学等"。③

教学方法上,英华书院摒弃中国传统学堂的单一授课模式,采用近代西方通行的做法,根据学生的年龄大小和程度高低实施分班、分级和分科教学。一是重视经典阅读训练。在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阅读和理解中国经典、圣经、英国文学等,使学生得到较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二是强调技能训练,倡导中英互译。他们精心组织课堂教学,用地球仪做教具,用英文讲解地理知识。开设大量的翻译和写作课程,旨在让学生在翻译和写作实践中掌握英语。例如,书院让学生每天练习英汉互译,通过译文记住一些简单的英文句子及中文翻译。甚至"在每天早礼拜时,必须练习将英文《旧约》的某些章节回译,或朗读英文新约"。④这种让学生直接参与翻译实践的做法,是英华书院英语教学的一大亮点。三是强调朗读、背诵。朗读、背诵等是中国传统语言教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英语语言的学习同

① T. 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p. 75.

② Robert Morrison & William Miln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 p. 234.

③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2.

④ 邹明德:《鸦片战争前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5 期。

样十分有用。

（四）教学效果及其影响

英华书院的创办，开在华新教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其西式管理、西学课程和西方化校风，为我国教育界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内容，对日后创办的学校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华书院强调中西融合的课程设置，分班、分级、分科的教学模式，倡导经典阅读训练、强调做中学的教学方法至今仍极具传承价值。

英华书院规模不大，从 1820 年到 1834 年的 14 年里，完成学业的学生共 40 名，但学校所“栽培的知名人士甚众”，[①]该校毕业的华人学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接受西学训练，特别是会讲英语的知识分子。较著名的有：袁德辉，被他的美国同窗亨特（William Hunter）称为“专攻英语，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深入研究”，[②]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的翻译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个中国籍传教士梁发（Leang Afah）于 1820—1821 年在书院修习神学。何进善（Ho Tsu-Cheen）是中国第一位接受过完整新教神学训练的华人牧师，获得英华书院教师麦沾恩（G. H. Mcneur）的赞誉：“尚未毕业便能阅读英文的新旧约圣经”。[③] 他是理雅各的高足，协助他翻译儒家经典。《理雅各英译七经》至今仍被世界各国汉学家认为是标准译本。[④] 宋湖建毕业后于 1849 年起任教于新加坡学院。此外，英华书院迁入香港时，有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等三位学生赴英国留学。[⑤] 此为中国人留学英国之滥觞。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首批被维多利亚女王召见的中国人。[⑥]

王韬在 1862 年《漫游随录·香海羁踪》中说：英华书院“皆有子弟肄业，教以西国语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国家用”。[⑦] 英华书院训练了第一批会说英语的知识分子，奏响了中国英语教学的序曲，为我国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先声。

① 龚道运：《基督教和儒教在十九世纪的接触：基督教入华先驱马礼逊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2003 年新第 12 期。

② 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4 页。

③ 刘泽生：《中国第一位基督教牧师何福堂》，《广东史志》，2001 年第 3 期。

④ 费正清 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27 页。

⑤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 p. 131.

⑥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 页。

⑦ 王韬：《漫游随录·香海羁踪》，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66 页。

## 三、马礼逊学校

### （一）创办背景及过程

马礼逊是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他于嘉庆十二年（1807）来到中国，以澳门和广州为基地，从事传教、翻译、教学活动达二十多年。1818 年，他和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先声。马礼逊将基督教经典《圣经》全部译成汉文，首次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他还倾 15 年之心血，编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字典——《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此外，马礼逊于 1812 年翻译出版了《中国文学经典汇集》。[①] 马礼逊因积劳成疾，于 1834 年 8 月在澳门去世。在广州的外国侨民为了纪念马礼逊的去世，于 1835 年 1 月发起捐资建立"马礼逊教育协会"，目的在于"筹募基金，开办一间学校，使本地学童，在他们自己的学校中，学习英文，通过这项媒介，使他们进而得以探求西方的各种知识"。[②] 1839 年 11 月，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成立。这是一所"以推介英语、西学及基督教信仰为教育目标"[③]的学校，教学程度相当于后来新式学校的中学。学校于 1850 年停办。

### （二）学生及教师来源

根据《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学生的入学条件如下："（1）不分年龄，性别，在中国内地或海外之青年，并获得协会赞助人接受者，得申请入学，惟仍须由董事会核准。（2）凡六岁、八岁或十岁之儿童，随时均表欢迎接受入学。（3）凡属马六甲海峡、印度、欧洲、美洲为达成学习目的之儿童，如获协会董事核准及家长监护人之保证，乃得申请入学。"[④]1839 年 11 月，马礼逊学校迎来了学校成立后招收的亚灵等首批 6 名学生。1842 年，学校迁离澳门，搬到香港，学生增加到 20 余人。1843 年 4 月，有 12 名新生入学。1844 年下半年，又有 10 名学童进入马礼逊学校，其规模居全港之冠。

1832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布朗（Rev. Samuel Brown）应聘成为学校校长。布朗乃一热心之教育家，"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其为人和蔼可

---

① 关于马礼逊的词典编纂及翻译活动，详见张美平：《马礼逊经典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 期。

② 高宗鲁译注：《China's First Hundred（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华欣文化事业中心 1982 年版，第 13 页。

③ 李金强：《西学摇篮——清季香港双语精英的诞生》，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 2008 年版，第 692 页。

④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No. 9, 1836, pp. 382—383.

亲，温然有礼；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①] 英文科教师，除了布朗夫妇，还有毕业于耶鲁的麦克、邦尼(Mr. Bonny)。中文科教师由华人充任。

（三）教学特点

马礼逊学校的特点是“中英文兼备”。中文科开设《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英文科开设“天文、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化学、音乐、作文”。[②] 除了开设英语语言课程，训练学生的阅读、写作等能力，还将天文学、历史、地理、数学等近代基础科学知识也纳入英语课程的范围，所有这些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并用英语教学”，[③]这不仅大大加速学生掌握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还以西学知识和世界知识有效地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素质，这是以往任何朝代的私塾、书院培养的学生所无法比拟的。

马礼逊学校的教学方法有如下特点：首先，有固定的教学安排和教学时间，在教学中将发展学生的智力和身体锻炼结合起来，使学生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从早晨 6 点钟开始，到晚上 9 点钟结束，其中读书 8 小时，其余 3—4 小时在户外场地上运动和娱乐”。[④] 其次，将学习时间分为两部分，“半天读中文，半天读英文”，既重视西学，也重视中学的教学，便于学生今后在通商口岸谋取职位或参加科举考试。再次，注重因材施教。学校迁到香港后，布朗将随迁的学生和后来招收的学生编成四个层次不同的班级，实行分级教学。最后，重视阅读、翻译、写作等语言实践训练。《马礼逊教育会第 8 次年度报告》称：“学生已经读完所有的《圣经・新约》书籍，从《创世纪》到《以斯帖记》。他们每天以读《圣经》中的片段开始阅读训练。”[⑤]《第 4 次年度报告》有如下叙述：“有些人试图将《孟子》译成英文，在我的指导下，他们还打算练习将中文版的《圣经》译成英文。”[⑥]“该班还重视汉英翻译

---

①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钟叔河标点：《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6 页。英文见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1909, pp. 16—17.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8 页。

③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8 页。

④ 顾卫星：《晚清英语教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 页。

⑤ 丁伟：《布朗与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英语教学》，《广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5 期。

⑥ 吴义雄：《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广东社会科学》，1999 年第 3 期。

练习。其中一名学生将英文版《政治经济学》翻译成汉语。”[1]

马礼逊学校结合所开设的西学课程，配之以合适的教材。各科教本“多由英国及美国教会人士捐赠”。[2] 根据第三、四届年会报告，学校“采用之地理教本乃柏利著之《地理学》(*Perley's Geography*)、数学乃哥顿(Gorden)所著之教本。此外亦授以四书、五经、中文圣经等科目”。[3]

（四）作用和影响

第一，培养了一批既懂西学又有中学[4]素养的近代著名人物。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切实受到西方教育，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移植西方文化的第一人。黄宽毕业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后服务于广州博济医院，“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5] 唐廷枢“成为巨商，曾创办中国第一个轮船招商局”，[6]历任上海海关总翻译、轮船招商局总办。他编写的《英语集全》于同治元年(1862)出版，是国内第一部英汉分类词汇集。

第二，开启了近代中国英语教学的历史。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将西学知识和英语语言知识有效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将欧美先进的外语教育理念引入课堂教学中，采用在宽松的、家庭式的气氛中学习的教学方法。它的英语教育理念不但对鸦片战争以后建立的教会学校以及京师同文馆等早期官办学校的英语课程设置和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成了新教育思想引入我国的先声。

第三，在知识结构上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起着弥补性作用。马礼逊学校除了重视学习西方语言文学、自然和社会科学外，还重视对于“四书”、“五经”以及中国文化经典作品阅读等中学课程。这种以西式教学模式与内容为主并适当保留中国经典教学的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在教学内容与知识在社会应用方面的不足，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

① 商颖：《论马礼逊学校西式教育模式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②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③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3页。

④ 所谓“中学”，就是相对西学而言的中国固有学问，即传统的儒学。

⑤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⑥ 高宗鲁译注：《China's First Hundred(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年版，第14页。

## 第二节 官办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

### 一、官办洋务学堂的外语专业教学

洋务运动时期共有约7所外国语学堂，其中，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滥觞，标志着近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开端。上海广方言馆是集外语与近代科学于一体的新式外国语学堂，在晚清官办外国语学堂中办学质量最高。湖北自强学堂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外国语学堂。

#### （一）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简称同文馆）的创办有其历史的缘由：首先，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开放，中外交涉事件急遽增加，语言沟通成了与列强接触的最基础的需要，而当时中国的外语人才奇缺。1860年相继发生的事件成了清廷痛下决心创办外语学校的直接动因。这年9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主持对外交涉事务的奕䜣受命议和。他命令英国参赞巴夏礼(Harry S. Parkes)致书联军联系议和。不料因巴夏礼的英文署名及日期无人能识，竟在军情紧急时延宕数日以待翻译。奕䜣感叹：“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言语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①其次，清廷不信任在中外商人之间传话的通事。认为这帮人学识浅薄，无法胜任翻译之职，“凡市井中游闲跅弛，不齿乡里……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② 再次，迫于西方列强的建议和压力。1858年5月，美国政府代表列威廉(William B. Reed)向中方首席代表桂良提出4项建议，第一项便是建议学习外国语文。《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③因此，设立外语学校，培养懂“夷语”之人已经刻不容缓。

1861年1月，奕䜣以与外国交涉“必识其性情”为由，奏请开办外语学

---

①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5754页。

② 冯桂芬：《上海设立同文馆议》，载《显志堂稿》，光绪二年校邠庐刊，第975—976页。

③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2页。

校。[①] 奕䜣等人所议,很快获得奏准。1862 年 6 月,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

同文馆先开设英文馆,"招集学生始仅十人,且仅习英文而已"。[②] 奕䜣等人令这些主要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中招收的 10 名学生来馆试行教学。次年 4 月,同文馆又开设法文、俄文两馆,并将乾隆年间开设的俄罗斯文馆归并在内。"六年(1866),议于同文馆内添设算学馆"。[③] 同文馆自此由专习外国语的学堂变成了综合性的学校。

同文馆的教习由西教习和汉教习两部分人组成。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 S. Burdon)和汉人徐澍林被聘为英文和汉文教习。随着同文馆办学规模的扩大,聘请的洋教习有丁韪良(W. A. P. Martin)、傅兰雅(J. Fryer)、额伯廉(M. J. O'brien)等 54 人,担任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化学、天文、医学教习。另聘请李善兰等 32 名中国学者担任算学和汉文教习。

同文馆初创时,学生在八旗子弟中挑选,学生只有 10 名。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学生来源的途径逐渐开放,汉人比例不断提升。迄至 19 世纪末,汉人的比例达到近 80%,人数达到 130 余人。学生入学的途径主要有咨传、招考、保送和推荐四种。咨传对象主要是八旗子弟,选拔"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④] 招考学生始于 1867 年,由总理衙门通过考试录取。保送生主要由总理衙门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调取成绩优秀者入馆学习。1867 至 1896 年间,两馆共向京师同文馆保送英、法文学生共计 74 名,[⑤]大大改善了同文馆的生源结构。达官显贵或馆中教习可以推荐学生。

洋务派在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等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到真正的西技并非是西语,而是算学。1866 年 12 月奕䜣呈上《请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折》,请在同文馆原有英、法、俄三馆之外,添设天文算学馆。但此举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正统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圣道",以"西学"为师是"师敌而忘仇",是"丧心病狂"。但由于奕䜣奏议务实、有远见,且符合形势发展的要求,终于被采纳。这场围绕"天文算学馆"的争论震撼京城四个月左右,在奕䜣等人的强力反击和慈禧

---

① 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5.

② 马挺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 年,第 1 页。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122 页。

④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 804 页。

⑤ 详见苏精:《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学生咨送京师同文馆表》,载《清季同文馆及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 1985 年版,第 108,134 页。

太后的支持下，天文算学馆最终得以成立。此后，同文馆的课程大为扩充，西方许多自然科学输入中国。继天文算学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化学（1866年）、算学（1868年）、万国公法（1868年）、医学生理（1871年）、天文（1877年）、物理（1879年）等。

同文馆以翻译课程的教学与实践为其主要特色：首先，课程设置以培养翻译和对外交涉人才为根本宗旨，“期于晓畅翻译，通澈中外事理，以备舌人之选”。[①] 1876年，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制定了新的课程表，即“五年制课程表”和“八年制课程表”，课程设置趋于规范，学习期限分别改为5年至8年。5年制课程要求“其年齿稍长，不能肄习西文，仅藉译本以求诸学者，卒业需五年”。[②] 8年制课程“则由洋文而及诸学，卒业需八年”。[③]

表1—1　京师同文馆5年制和8年制课程

| 年度 | 8年制 | 5年制 |
|---|---|---|
| 首年 |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 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
| 二年 | 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 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
| 三年 | 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 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
| 四年 | 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 微分积分，航海测算，讲求机器 |
| 五年 |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 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 |
| 六年 |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 |
| 七年 | 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 |
| 八年 | 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 |

资料来源：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

其次，重视学用结合，口笔译实践扎实有效。除了正常课堂教学，同文馆开展了两项与教学有关的活动，一是驻馆学生时时准备好前往总理衙门从事外交文书的翻译以及现场口译，“各国会晤，应派熟悉该国语言之同文馆翻译官及学生等一二人，在旁静听，以免洋员翻译参差。……遇有会晤

① 马挺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第1页。

② 《译学馆沿革略》，载《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章程》序一，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三月。

③ 《译学馆沿革略》，载《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章程》序一，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三月。

时，即随同上堂听话，按班当差。毋许旷误”。[1] 二是教习在学生的协助下翻译西书，以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同文馆学生联芳、庆常、长秀等人共翻译或合译了15部外交、法律、天文、史地、物理、化学等书籍。再次，严格考试制度。《同文馆章程六条》规定：考试分月课、季考、岁试和大考四种。月课和季考的内容为将外文照会译成中文，将中文条约译成外文。岁试在每年十月初十前举行，除进行中外互译的笔试外，还要“堂定日期面试”，[2]即进行口试，称翻译条子。此外，岁试还要求学生用外语进行科学考试。[3]

京师同文馆是由具有一定时代意识和世界眼光的洋务派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新式的官办外国语学堂，是近代中国努力向西方学习而迈出的第一步，其意义不可低估：第一，同文馆的创立，是我国外语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存在时间仅有40年，但它成功地训练了近代中国第一代外语、外交和翻译人才。其外语教学的尝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正式起步，“西学东渐，国人讲求异邦文言，此为嚆矢”。[4]第二，同文馆在办学过程中，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它是求实求真、富国强兵的人才教育的开端。第三，它所培养的学生在近代中国的外交、政治及教育舞台上曾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文馆见证了中国外交从无到有的历史，培养了第一批处理涉外事务的职业外交官与翻译，开创了清末民初外交新局面。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中附“学生离校后情况一览表”，[5]91人中在外交部门或涉外部门任职的有40人，其中担任的职务有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外交部司长、驻外总领事、外交代办、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等。同文馆对教育的影响也很大。其毕业生担任教习的有汪凤藻（南洋公学校长）、蔡锡勇（湖北自强学堂总办）、凤仪、严良勋（广方言馆英文教习）、庆常（天津电报学堂英文教习）、联芳（天津武备学堂监督）、文廉、柏锐、杨书雯、全森（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席淦（同文馆算学教习），等等。张德彝和沈铎担任了光绪帝的英文教师。第四，翻译西书、传播西学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同文馆师生对西书的译介以及开设的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学课程，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部分封建士人，而且扩大了中西

---

① 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②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811页。

③ 关于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学，另见张美平：《略论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学特色》，《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④ 马挺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第1页。

⑤ 马挺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第26—34页。

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传播。

质而言之，同文馆学生的科技知识和外语水平，是封建旧式教育熏陶出来的文人学士所无法企及的。[①] 同文馆的外语教学不仅在近代中国外语教育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而且在新世纪的中国外语教学中仍具有较高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传承价值。

（二）上海广方言馆

同治二年（1863），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1823—1901）奏准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设立上海同文馆。1867 年，上海同文馆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简称广方言馆）。设馆目的是培养“精通番语”、“承办洋务”[②]的人才。设馆之原因，举其大要，有如下数端：第一，办理洋务，需要研究外国。19 世纪 60 年代起，通商“为时政之一”，洋务为“国家招携怀远一大政”。李鸿章说：“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③]但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绝少有“通习外国语言文学之人”。[④]第二，中外交涉需要多种途径培养人才。当时上海的情形是，每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译员传述，“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欲绝此弊，只有中国自己培养外语人才。第三，上海位置独特，是对外贸易中心和学习外语的“庄岳之地”：（1）这里洋人多，有学习外语的环境。（2）有发达的商业和区位优势，中外交涉事务多，设学建馆，不愁学生没有出路。（3）上海系洋人总汇之地，师资较易解决。第四，原有通事不可靠，被李鸿章称为“洋务之大害”，[⑤]须另行培养新人。

广方言馆创办伊始，就把生源质量问题摆在首位，并采取了诸多措施：首先，对学生的入学条件和方式进行严格把关，规定：“肄业学生按照奏定章程以年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充选。自愿住馆肄业，由

---

① 丁韪良记载：“在中法战争期间，有一个学生被派到广东去担任军队中的工程师，因为他知道如何计算弹道轨迹。”（W. A. P. Marta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New York, 1900, p. 318.）这种能力对于科举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② 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载吴汝伦编：《李文忠公（鸿章）全集》，文海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10 页。

③ 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 1411—4112 页。

④ 冯桂芬：《上海设立同文馆议》，载《显志堂稿》，光绪二年校邠庐刊，第 977 页。

⑤ 赵尔巽：《清史稿·选举二》，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121 页。

官绅有品望者保送，取具年貌、籍贯、三代履历，赴监院报名注册，随时呈送上海道面试，择时文之稍通顺者，记名备送四十名，入馆肄业。其余备选者，候有缺出，陆续补送。”[①]北洋军阀政府代总理兼外交总长陆征祥是通过面试方式入学的。[②] 其次，实行淘汰制。广方言馆对于学无成效或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实行淘汰办法。“其有三年期满，学无成效者，或随时考察，不堪造就，即严为裁汰”。[③] 再次，实行助(奖)学金制。实行免费住馆就读，并享受由馆方发给伙食费补贴，“肄业膏火每日银一钱，以代馆餐，旷馆之日勿给”。[④]

广方言馆聘请的西文教习系当时著名中外人士，西教习如英文教习林乐知(Young J. Allen)、法文教习傅兰雅(John Fryer)等。中教习有舒高第、黄达权、吴宗濂等。[⑤] 西学教习有算学教习席淦、严良勋、汪凤藻等。同治九年(1870)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后，外国教习往往兼有广方言馆的教学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翻译职务，如美国人林乐知、英人傅兰雅等都是一身两任。[⑥]

广方言馆创办初期的课程，除了英语，还有四门“中学”课程，即经学、史学、算学、词章四类。移址江南制造局后，广方言馆对课程进行了改革，除已有的英语外，还增加了法语和德语，扩大教学内容，加强自然科学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下列几方面：第一，将以前 3 年一贯制的课程分为基础和专业两个阶段。规定所招学生分为上、下两班，第一年为下班，学习基础课程。第二、三年为上班，学习专业课程。“初进馆者先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如算学、代数学、对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和绘图等事，皆用初学浅书教习。若作翻译者，另习外国语言文字等书”。“期年甄别，择期优秀者”进入上班学习。第二，规定学生入学一年、进入上班后要“专习一艺，以备译才之选”。[⑦] 上班开设七个方向供选择：(1) 矿物学和冶金学；(2) 金属铸件和锻件；(3) 木器和铁器制造；(4) 蒸汽机的设计与操

---

① 佚名：《广方言馆全案》，光绪年间印行，铅印本，第 7 页。

② 参见石建国著：《陆征祥传》，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 页。

③ 佚名：《广方言馆全案》，光绪年间印行，铅印本，第 38 页。

④ 佚名：《广方言馆全案》，光绪年间印行，铅印本，第 9 页。

⑤ 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79—180.

⑥ 关于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的翻译情况，详见张美平：《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江南制造局的翻译及其影响》，《中国翻译》，2010 年第 6 期。

⑦ 吴馨等：《上海县续志》，上海南園志局 1928 年版，第 1 页。

作;(5) 航海;(6) 水陆攻战;(7) 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①] 第三,重视国学和算学。强调读经读史,如《资治通鉴》、《通鉴外纪》、《养正遗规》、《朱子小学》等。算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文亦难施之实用”。[②]

上海系五口通商城市,“华洋杂处”,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氛围给了广方言馆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使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外语教育模式。首先,学用结合,注重学习过程,重视实用能力的培养:(1) 江南制造局为提高工人、领航员、水手和机工的制造与操作水平,开设了夜校。由于授课的外籍工程师不懂汉语,语言能力强的学生就被派去担任课堂翻译。[③] (2) 采取独特的考核评价方式。上海道台应宝时每周日下午都要对学生进行考试:由学生将最近一周从美国或英国领事馆收到的英文照会译成中文。英美人在发出这些英文照会时常同时附有一份中文译本,所以,这位不懂外文的道台能够比照领事馆的译文,检查每个学生翻得正确与否。[④] (3) 让学生直接参与翻译实践。学生与林乐知、伟列亚力(A. Wylie)、傅兰雅、金楷理(C. Kreyer)等外文教习合作翻译西学,其中有些书籍在江南制造局出版。其次,中学和西学并重。广方言馆实行汉语、外语与近代科学并举,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特点。美国学者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说:“英文和算学在所有课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对儒学经典,中国历史和汉语作文等这些科举考试的科目给予了相当的重视。”[⑤]再次,重视课堂教学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广方言馆作为教学机构,又是译书机构,迁入江南制造局后,即在局内开设学堂,翻译外国书籍。广方言馆要求“诸生于三年期满后,有能一手翻译西书全秩”。[⑥] 曾在翻译馆译书的学生至少有朱恩锡、汪凤藻等 11 人。[⑦] 最后,采用翻译法组织教学。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教科书,而外国传教士、商人等从母国带来的原版外文书刊无法直接用

---

① 参见佚名:《广方言馆全案》,光绪年间印行,铅印本,第 23 页。

②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4 页。

③ 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69.

④ Adrian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p. 33.

⑤ 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5.

⑥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2 页。

⑦ 另参见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 1985 年版,第 112 页。

来作教材，只能采取“外籍教师和译员同堂授课、双语交替的教学形式”。[①]

上海广方言馆“开办三十年来，为大清帝国培养了五百名以上的外语人才，与北京、广州两地相比，上海毕业生质量最高”。[②] 它所取得的成就从下列两方面可以看出：首先，从同治七年(1868)开始广方言馆先后五次选送赴京师同文馆深造的二十八名[③]学生身上即可看出。他们在京师学习，大多成绩优良，高出同畴。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说：“其毕业生，率皆籍隶江南。每月每季皆如北京同文馆考试，课卷系道台披阅，皆有奖赏花红。每届三年，择优咨送总署堂考，奏请鼓励。”[④]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记学生大考榜单，光绪五年(1879)大考，英文馆第一名是汪凤藻，第三名是徐广坤。汉文算学第一名是席淦，第二名是汪凤藻。洋文天文第一名是徐广坤，第三名是黎子祥。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考法文第一、二、四、五名获得者都是上海广方言馆送去的。同治十一年(1872)岁试格致第一名朱格仁也是广方言馆送去的。[⑤] 其次，广方言馆培养的人才遍于国中，涉及外交、教育、科技、军事、政治等多个领域。以外交界和教育界为例，毕乃德对 1867 年至 1890 年间送往京师同文馆二十五名广方言馆学生在外交界任职的情况做过统计，经过广方言馆培养的位至公使的有汪凤藻、吴宗濂、胡惟德、刘镜人等 9 人，3 人位至外交总长，3 人为国务总理。毕氏得出结论：“广方言馆的学生质量比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的学生质量高。”[⑥]吴宗濂说：“一馆之中极勋位于首辅，展奇韬于秘府，遍使节于环球，振古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⑦]有相当一部分广方言馆毕业生在教育界工作，其中不乏有成就者，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较为知名的有以下数位：席淦、汪凤藻、经亨咸、吴匡时、徐绍甲、郭世绾、钟天纬、严良勋、朱格仁、瞿昂来、朱敬彝、

---

① 季压西、陈伟明：《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三)——从“同文三馆”起步》，学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8 页。

② 周振鹤：《随无涯之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164 页。

③ 咨送京师同文馆的广方言馆英文学生共有 15 人，他们是：严良勋、席淦、汪凤藻、汪远焜、王文秀(同治七年，第一批)；朱格仁、王宗福、杨兆鋆、黎子祥、徐广坤、金仁杰、杨兆鋆(同治十年，第二批)；朱敬彝、杨书雯、陈贻范(光绪十六年，第四批)。另有 5 名英文学生在光绪十二年办理，至十五年总署复准，学生已离馆，但未成行。(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 1985 年版，第 108 页。)

④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 2002 年版，第 592 页。

⑤ 熊月之：《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65—266 页。

⑥ 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p.195.

⑦ 马挺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 年版，第 2 页。

黄致尧、吴宗濂、周传经等都到广方言馆任过教。

（三）湖北自强学堂

1889年12月，张之洞奉调离粤来鄂担任湖广总督，主持湖北新政。创办湖北自强学堂（简称自强学堂）是其"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学堂的创建，主要基于如下原因：第一，湖北近代化事业的需要。在推行近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张之洞深感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之缺乏。他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强调了"广开学堂"的重要性："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①]第二，对外交涉与通商的需要。省会城市武汉三镇地位重要，素有"九省通衢"之美称，"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②] 设学培养外语人才迫在眉睫。第三，培养民用人才，服务当地经济的需要。两湖茶商希望政府能创办一所能供茶商子弟"专习各国语言文字"的学堂。茶叶贸易是两湖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石，武汉三镇又为中国重要茶市，"商务，关富强之大计"。[③]

1893年11月，张之洞上呈《设立自强学堂片》。奏折说："呈前奏明建立两湖书院，曾有续设方言商务学堂之议，兹于湖北省城内铁政局之旁，购地鸠工造成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自强学堂以"不尚空谈，务求实务"[④]为宗旨，分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四门：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⑤]

自强学堂于1902年11月改名为方言学堂。但因开办时尚无中学毕业生，清廷学部令其延长修业年限或改为别的学堂，纳入奏定的学制体系。但湖北当局以经费奇缺为由，决定自1911年起停办方言及农务学堂。方言学堂至此便告结束。

自强学堂各斋教习，以华人教习为主，以聘用洋人教习为辅，"英文、法文，各省传习较久，目下初学始基，即派华员教习。俄文、德文通习素罕，分

---

① 陈山榜编：《张之洞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② 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③ 张之洞：《设立自强学堂片》，载《张之洞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④ 张之洞：《设立自强学堂片》，载《张之洞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⑤ 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派俄员、德员为教习，辅以华员协同授课”。[①] 自强学堂共有10名汉教习，8名西教习。10名汉教习大多为当时的知名学者，有3位还是归国留学人员，在学堂教授英语的我国著名英国文学专家辜鸿铭即是其中之一。除辜鸿铭外，还有郑毓英（福建闽侯人），在学堂任英文兼算学教习。西教习中，骆丙生（H. H. Robinson）是牛津大学硕士，教学能力较强，学术成果较多。

《自强学堂章程》招考条件如下：“学生必须在二十四岁以内、十五岁以外，口齿较灵，志趣渐定；必须以华文为根柢，以圣道为准绳……非华文精通、义理明白、根基已立者，断不录取；学生以五年为毕业，学生留堂以后，即为官学生。湖北、湖南两省士人方准与考。”[②]但后来由于未能在两省招到足额的合格学生，便打破地域限制，从其他省份招考。

在1902年以前，学生人数不超过七八十人。自1903年起，每年招新生一班约一百二十人，迄1905年时，在学人数已达三百五十四人。至于待遇，校方除供给膳宿外，最初每月还给膏火五元，但规定毕业后，须听由总督指派工作，不得帮助西人，否则追赔五年的培养费用。

创办自强学堂，“意在造就通材，所期远大，欲使学者皆能自读西书、自研西法，则可深窥立法之本原，并可曲阐旁通之新义，既不必读辗转传译之书，免致得粗而遗精，亦不至墨守西师一人之说，免致所知之有限，将来学成以后，通殊方之学，察邻国之政，功用甚宏，实基于此”。[③]本着这一目的，自强学堂在课程设置中体现出以西文及西学为主的特点。

表1—2　英、德、法三斋日课时刻表

| 时间＼周次 |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 午前 | 8:00—9:25 | 方言 | 方言 | 方言 | 方言 | 方言 | 方言 |
| | 9:35—10:50 | 方言 | 方言 | 方言 | 方言 | 方言 | 方言 |
| | 11:00—11:50 | 历史 | 数学 | 历史 | 数学 | 历史 | 数学 |
| 午后 | 1:00—1:50 | 数学 | 理科 | 数学 | 理科 | 数学 | 体操 |
| | 2:00—2:50 | 体操 | 地理 | 体操 | 地理 | 体操 | 兵操 |

①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7页。

② 张之洞：《设立自强学堂片》，载陈山榜编：《张之洞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③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7页。

续　表

| 时间 \ 周次 |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 午后 | 3:00—3:50 | 汉文 | 兵操 | 汉文 | 兵操 | 汉文 | |
| | 4:00—5:25 | 汉文 | 汉文 | 汉文 | 汉文 | 汉文 | |

资料来源：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永裕印刷厂1976年版，第96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方言是自强学堂教学的核心，从授课的时间段(每天都在上午八点到十点五十之间，这段时间可谓是学习的黄金时段)，还是从课时分配来看，方言置于绝对重要的地位。汉文在课时分配上仅次于方言。学堂也很重视数学，与当时的认识有关，“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从天文、算学中来”。[①] 值得注意的是，表中的“兵操”和“体操”两门课程，它们都属于体能训练类课程，且课时不菲。这说明学堂不仅强调知识学习，而且重视强身健体。

自强学堂自1902年10月改名为方言学堂后，课程亦由原来的8门增加至15门，计为：人伦道德、经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地理、历史、算术、博物、物理化学、教育、理财、公法、交涉、绘图与体操。[②]

自强学堂的课程改革很有特色。该学堂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其后，将算学归并于两湖书院，格致、商务停开，只留方言一门，“以为一切西学之阶梯”。方言斋设英、法、德、俄4馆，专学外国语文。并且，该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学生宜专心致志，习学堂讲授诸课，不准在堂兼作时文试帖，亦不准并应各书院课试，以致两误。”[③]这一不准作八股文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学校课程体系的进程。这跟早期的外国语学堂的学生人在学堂、心向八股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张之洞对学生出路的自信，不像当年李鸿章创办上海广方言馆时那样，要给学生留一条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后路。

自强学堂也像“同文三馆”一样实行月考。1899年10—12月间，自强学堂举行了3次月考，测试中西各科。以下是1899年英文大考试题：

---

① 奕䜣等：《请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折》，载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4416页。

② 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永裕印刷厂1976年版，第110页。

③ 张之洞：《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并章程》，载《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十八，1920年铅印本，第15页。

**大课自强学堂诸生题目录**(光绪乙亥年终)

**英文堂洋文题**

试详动字类系字见在曰否之变用格;试详动字类有字过时曰然之变用格;试详动字类作字见时询问之体变用格;疏解字句三问;改正短句十六问(以上论文法)。

译奥员虐待瑞民记一则;译通工通商说一则;译游西克记一则。

从形式上看,题型有论述、解释、改错和翻译。这一考试形式表明,自强学堂的英语教学采用的是语法翻译法,重视语法知识的讲解与翻译技能的训练,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直接阅读原文的能力。

作为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外语学堂,自强学堂在外语教育方面作了努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具体说,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重视"中学"教育,特别重视汉语教育。强调"学生必须以华文为根底,以圣道为准绳"。[①] 这从学堂的课程设置即可看出。第二,坚持优先聘用合格的国人充任教习,教学与管理人员中有不少系洋务学堂出身或留学归来者,对外语教育颇多经验,蔡锡勇、辜鸿铭等人的成就即是证明。第三,在招收学生方面,实行公开招考,面向各省。此举打破了京师同文馆最初只收八旗子弟的规矩,也打破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的地域之限。[②] 第四,自强学堂从一开办起便一改中国传统书院"学不分专门"的旧习,仿照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在全国各学堂中率先实行分门(科)教学、按斋(班)授课的体制,开风气之先,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此后许多学堂"均仿自强学堂成法",进行分科教学。《清史稿》云:"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③]

## 二、官办洋务学堂非外语专业的外语教学

洋务运动时期,以奕䜣、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共创办约 30 所军事学堂和科技实业学堂。这些学堂除有专业的要求外,大多重视外国语文的教学,在招生、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和考核评价等方面突出了外语的基础、能

① 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1 页。

② 季压西、陈伟明:《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三)——从"同文三馆"起步》,学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9 页。

③ 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一百七,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128 页。

力等方面的要求。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简称船政学堂)是洋务学堂中办学时间最长、毕业学生最多、质量最好、影响巨大的一所海军院校,为我国培养出第一代海军轮船的驾驶和制造人才。它是福州船政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州船政局由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奏请创办,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也是洋务运动时期最大的专门制造近代轮船的工厂。

福州船政局的创办,首先是基于巩固海防的需要。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在强敌凭其坚船利炮侵我疆土的情况下,发展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加强海防已迫在眉睫。闽浙总督左宗棠更是把自造轮船看作是"自强"的重要前提,"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①]其次,基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需要。鸦片战争后,航行于沿海及长江的洋行货轮日渐增多,"自洋船载货行销各国以来,商务减色,漕运困难",[②]传统的航运业已濒临破产,巩固海防、保护民族工商业已成当务之急。但设备、人才和技术都得依赖洋人。为摆脱这一被动局面,左宗棠决定"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③] 通过5年学习,"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此类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④] 沈葆桢被任命为首任船政大臣。

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船政学堂正式开办。学堂因校舍楼房分前后被区分为前后两堂,前学堂学习法国语言文字,专习制造,又称法文学堂或造船学堂。后学堂学习英国语言文字,专习驾驶和轮机技术,又称英文学堂或驾驶学堂。法文学堂共有造船学堂、绘图学堂(绘事院)、艺徒学堂(艺圃)三所学堂。英文学堂(后学堂)主要致力于训练学生的英语、航海和工程学。学堂由驾驶、练船和管轮三所学堂组成。驾驶学堂专学驾驶。练船学堂是学生完成理论课程后的海上实习场所。管轮学堂以培养和训练高级轮机技术人员为目的。

①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四册·奏稿四,光绪丁酉冬月,湘阴左氏校刊,第2850页。
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政》(上),1957年,第5页。
③ 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二十,第809页。
④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四册·奏稿四,光绪丁酉冬月,湘阴左氏校刊,第3308页。

自1866年左宗棠奏请设厂起，迄至1912年10月，民国政府海军部把办学近46年的船政学堂改组为福州制造学校等3个独立的学校。至此，船政学堂走完了全部历程，完成了历史使命。

船政学堂采用“借才异邦”的办法，分别聘法国军官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和德克碑（Paul Alexandre D'Aiguebelle）为正副监督。前者“深知中国文字言语，且礼数公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①]后者“长于制造”。[②] 船政学堂所聘教习以英、法两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为主，期限五年，遵行“包教包会一师制，即各班所有课程（中文与兵操除外）都由一位教习包揽，务必保证五年内使中国学生能独立造船与驾驶”。[③] 1874年以后的教师逐渐中外兼用，中国教师多为学成留校的早期学生。

船政学堂前后46年的历史中，共有毕业生629名。学堂在招生制度以及学生管理方面，跟京师同文馆等洋务学堂均有所不同：第一，报考条件宽松，不受出身限制，“十二至十五岁身家清白”的“聪明子弟”。[④] 第二，建立赏罚制度，严格要求学生。学堂施行从难从严的淘汰制。第一批入学的105名学生中，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底，仅剩下39名，另有6名学生死亡，60学生由于各种原因被开除。

船政学堂课程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主，其内容，英国人寿尔（H. N. Shore）在1876年1月参观学堂后写的《田凫号航行记》以及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在1961年写的《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学堂》中，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记载。现将他们两人的记述列表如下（以英文学堂为例）。

表1—3　　福州船政学堂课程设置表

| 部门 | | 课程 | |
|---|---|---|---|
| | | 寿尔记 | 毕乃德记 |
| 英文学堂 | 驾驶学堂（航行理论科） | 英文、算术、几何、代数、三角、平面与球面、天文航行理论、地理 | 英文、算术、几何、代数、三角、平面三角、球面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地理 |
| | 练船学堂（航行实践科） | | 航海术、炮术、指挥 |

①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333页。

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政》（上），1957年，第19页。

③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9页。

④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页。

续　表

| 部门 | | 课程 | |
|---|---|---|---|
| | | 寿尔记 | 毕乃德记 |
| 英文学堂 | 管轮学堂(轮机房) | 英文、算术、几何、画图、机械图说、船用机关的操用规则及汽力指压器与水速计的用法 | 英文、算术、几何、绘画机械制图、船上机械操作规则、指示器、盐液比重及其他计量器的使用方法、80及150马力轮机的装置 |

资料来源：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清代(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略作修改。

课程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重视外语、数学。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胪举的“船政事宜十条”阐明了外语、数学的重要性：“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画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①]第二，课程供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如航行理论、管轮、制造、绘图等专业的课程。这种分类法类似于今天的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反映了近代科技教育的要求。课程内容以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主，门类较多，范围较广，既包括外语、数学等一般性课程，也包括各自专业相关的科学技术课程。这些课程，作为教学内容系统向学生传授，对于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起了一定作用。第三，学堂要求学生“每日日常课外”，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②]

船政学堂培养中国自己的海军驾驶、制造人才以及学堂教习，传播西法西学，取得了重大成就。第一，培养了大批海军技术与教育人才，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输送了第一代舰战指挥和驾驶人才，“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材之嚆矢。……清季海军将领，亦以闽人为最多”。[③]第二，开始了专业及外语教学探索，留下了可供传承与借鉴的专业与外语教学经验。首先，外语与专业合二为一，解决了“专业人员不懂外语，外语人员不懂专业”的难题。无论是学堂的管理层，还是一般的外国教习，大多属既懂专业，又懂外语的双料人才。日意格本身就是一名能驾船的法国海军军官。德克碑本系法国水师员弁，长于制造。教材是原版的，专业和语

---

①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第4457页。

② 沈葆桢：《察看福州海口及船坞大概情形折》，载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23页。

言的教学运作都用外语进行。其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英文学堂的驾驶学堂学生毕业后，还得进入练船学堂进行登船训练。学堂“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为教习，所有教学，包括号令全部用英文”。①

（二）天津水师学堂

同治十三年(1874)，发生了日本出兵侵略台湾的事件。清政府为了巩固海防，决定建立南、北洋海军。要建立近代化海军，船舰、基地等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有器尤须有人”，②新式船舰需要“文武兼资，素习风涛驾驭轮船操法者”，③在此情况下，培养海军人才势在必行。

光绪六年(1880)八月，李鸿章奏请筹办天津水师学堂：“北洋现筹添购碰快铁甲等船，需人甚众。臣于去年十月，奏明拟设练船，选募北省丁壮素谙风涛者，上船练习；尤必以学堂为本，乃可逐渐造就，取资不穷。应就天津机器局度地建设水师学堂，俟落成后，参酌西国成规，拣派监督、教习，招考学生入堂肄业，逐渐练习。”④于是决定由原福州船政局船政大臣吴赞成筹办天津水师学堂(简称水师学堂)。1881 年 8 月，水师学堂校舍竣工落成，设驾驶专业，共有 3 个班，额定学生 60 名。

水师学堂招生章程对学生来源及资格的规定是：“挑选学童，由海关、天津两道会衔先期出示，无论天津本籍，或邻县，或外省寄籍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已经读书数年，读过两三经，能作小讲半篇，或论全篇者，准取。具绅士任保，赴书院报名前，将年岁籍贯三代开报入册，届时由天津道或海关道亲临书院，点名扃门面试，择其文理通顺者先取百名左右，招赴学堂面复。”⑤学生初次入堂，以文理全通，读书甚多者为第一班，每月给赡银一两；文理未尽通顺而读书已多者，为第二班，每季给衣履费银二两；读书不多，文理未尽通顺而资性颖悟过人者为第三班，每季给衣服费银一两，各交家属具领。俟学业果有进益，再为递加，并随考核酌奖。⑥

水师学堂设驾驶、管轮两班。“驾驶学生专习管驾轮船，管轮学生专习

① 顾卫星：《晚清英语教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3 页。

② 《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载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③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载《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24，台湾文海出版社，第 23 页。

④ 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33 页。

⑤ 《酌拟天津水师学堂事宜》，载《申报》，光绪辛巳二月初四(1881 年 3 月 5 日)。

⑥ 《北洋记事·水师学堂》第十本，上海图书馆藏。

管理轮机，在堂应授功课毕业，均上练船历练。”①驾驶与管轮两班的课程均用英文教授，“教授用英文，兼习操法，及读经、国文等科”。② 采用的教学方法是欧洲普遍流行的翻译法。

水师学堂的堂课分内堂课程和外场课程两大类，其中国文、英文和数学是公共必修课。从所设课程可以看出，水师学堂学生所学科目较复杂，比福州船政学堂增加了分量与难度。而外场课程，主要是一些步兵操练初级知识和枪炮、鱼雷等学，是福州船政学堂所没有的。

表 1—4　　天津水师学堂课程表

| 课别<br>专业 | 内堂课程 | 外场课程 |
|---|---|---|
| 驾驶 | 国文、英文、天文、地理、几何、代数、平弧、三角、重学、微积、驾驶、御风、测量、演放鱼雷等。 | 单人教练步兵操法、信号学、成队教练、成营教练、枪炮法理、升桅操练、炮弹及引信法理等。 |
| 管轮 | 国文、英文、舆地、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力、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定鱼雷等。 | |

资料来源：李鸿章：《学堂人员请一体乡试片》，载张侠、杨志本等：《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97 页。

水师学堂实行严格的教学管理，实行班级授课制。学堂重视基础课的教学，在第一、二年中学习的重点是英文、国文和算学，“学生入堂第一年所习西学以语言文字为大宗，兼习浅近算学”。具体时间安排是：“合计每七日中当得两日专事汉文，五日专事洋文矣。其每日晚间七点钟起至九点中止学生各自研习日间所授西学以备明晨答问。”“第二、三年则以算学为要领，如几何、代数、平三角之类均应指授。”③

严复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李鸿章认为他“学业却能深造，以充教习最为相宜”，④因而被任命为学堂的总教习，参与了学堂的筹办、建设与管理工作。他出色的管理工作，得到李鸿章的认可。《天津水师学堂请奖片》云：“经饬监督各员严加约束，教习各员认真课导，欲其于泰西书志能知寻绎，于是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欲其于凡诸学洞见源

① 张焘：《水师学堂》，载《津门杂记》卷中，游艺山庄藏版，光绪十年刊本，第 19 页。
② 赵尔巽等编：《清史稿》卷一百七，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123 页。
③ 《北洋记事・水师学堂》第十本，上海图书馆藏。
④ 李鸿章：《与李凤苞书》，徐建寅：《欧游杂录》，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659 页。

流，于是授以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八线；……其于驾驶诸学，庶乎明体达用矣。”①

水师学堂从创办到 1900 年毁于八国联军炮火中的二十年间，共为中国海军培养驾驶、管轮学生 217 名。其中驾驶班学生前后共毕业 6 届 125 名，管轮班学生前后共毕业 6 届 85 名。另“有 9 名学生在 1886 年送往英国留学，学习期限 3 年”。②

从一些史料以及学界的研究来看，水师学堂的办学成绩较为明显。李鸿章《天津水师学堂请奖片》中对学堂的教学情况作了较详尽的描述：“盖自开堂以来，一日之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最晷分时，兼程并课，数更寒燠，未尝或缀。跌经季考诸生课业，月异而岁不同。今年春秋两季，经臣饬派委员罗丰禄邀同英、俄两国水师兵官到堂会考，该兵官等佥谓，欧洲水师学堂所留以俟上红船后指授之学，此堂均已先时预课。罗丰禄亦谓，堂中所授繁难诸学，多为从前闽厂驾驶学堂洋教习所未及课。计开以来，甫及三年，而驾驶头班学生伍光鉴等三十名均已毕业，堪上练船。又课成肄业美国回华学生王凤喈等九名，或充学堂帮教，或经分派各船，成效历有可稽。”③

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主要充实到北洋水师各军舰，充任将领，他们后来大多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中坚，有的步入政界、教育界等领域。水师学堂著名的毕业生有：黎元洪（两次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谢葆璋（民国海军部次长）、刘传绶（民国海军部次长）、张伯苓（现代著名教育家）、伍光建（现代著名翻译家）等。

---

① 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34 页。

② 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54.

③ 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35 页。

# 第二章

#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下的外语教学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认识到，成立专门的干部学校是教育和培养党的干部的有效途径。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或参与领导了一批培养不同类型革命干部的学校，如上海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平民女校等。这些干部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等都很不完善，存在的时间也比较短，但却实实在在地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其中绝大多数人后来成为党的事业发展壮大的核心力量。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党的早期组织于 1920 年 9 月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从学社里走出的杰出青年包括俞秀松、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职业革命家。1922 年由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成的上海大学，是大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国共合作创办的高等学校”，①享有“武有黄浦，文有上大”之美誉。

抗战军兴，中国共产党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外语教育。最早开展的是俄语教育。陕北公学、新华社、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单位开办了俄语讲习班，但这些讲习班大多带有在职或业余学习的性质，而且学员也不固定，效果有限。1941 年 9 月，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合并成立延安大学，这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办最早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延大设有俄文系，共收学员 80 余人，编成普通班和高级班。1943 年初，俄文系停办。苏德战争爆发后，为便于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必须加快培养懂俄文的军政干部，1942 年军委俄文学校成立。为适应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需要，1944 年 4 月，党中央将军委俄

---

① 夏征农：《辞海》（缩印珍藏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5 页。

文学校改为延安外国语学校，在原俄文教育的基础上，成立了英文系，培养政治、军事、外事活动的人才。抗战结束后，延安外国语学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1945年9月，延安外国语学校俄文系教师杨化飞等人从延安出发，到了张家口，于1946年1月创办华北联大俄文系，并于是年6月与原英文系主任浦化人率领的百余英文系师生合并，成立了华北联大外语学院，下设英文、俄文两个专业。1949年6月，联大外语学院与北方大学外文系等单位合并成立北京外国语学校。抗战结束后离开延安的另一部分俄文队的学生在原外国语学校教务处长卢竞如和俄语教师赵洵的率领下，来到哈尔滨，于1946年11月，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属俄语学校。次年冬，学校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学校分别于1956年和1958年更名为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和黑龙江大学。

在民国时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语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另外三种办学形式——国民政府主导的公立学校、中国社会知名人士设置的私立学校和西方教会组织在中国本土创办的教会学校所开展的外语教育，是无法与之比肩的，但这毕竟是党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开展外语教育，培养出一大批革命干部和优秀的外语人才，为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如同外语教育家付克所说："建国前我党创办的这几所外国语学校，在政治思想教育、外语教育、学校管理、师资队伍和教学行政干部队伍的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全国一解放，一批新型的、革命化的俄文专科学校和外国语学校才得以迅速地建立和发展起来。"①

## 第一节 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
### ——上海外国语学社

#### 一、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建立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②俄国

①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激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研究苏俄革命经验、以俄为师的极大热情。“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们得出的结论。1920 年 8 月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相继建立。上海早期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这是最早成立的中共党组织。但是，这些是不为北洋军阀政府所承认的地下组织，难以公开活动。为了掩护革命活动，为了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必须首先培养一批懂俄语、英语以及其他外语的干部，使之掌握基本的外语知识，能阅读马列著作，同时也为日后被派往外国进修打下基础。为此目的，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李震瀛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以公开形式创办了外国语学社。① 上海外国语学社位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 6 号。外国语学社又叫留俄预备班。② 是年 9 月 28 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登出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

>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③

外国语学社由中共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杨明斋（1882—1938）担任社长，具体负责学社的日常事务。

## 二、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外语教学概览

### （一）外国语学社的师资队伍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教师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为主，④这是一支思想政治觉悟高、学术水平过硬的教学和管理队伍。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一起工作过，对党的早期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周总理赞誉他为我党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上海外国语学社建立后，杨明斋除负责学社的日常事务外，还教授俄文，为留学苏俄进行俄语语言培训。担任俄文

①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8—49 页。

② 姚金果、张玉菡：《建党时期上海的革命干部学校》，《光明日报》，2011 年 2 月 23 日。

③ 《民国日报》，1920 年 9 月 28 日。

④ 姚金果、张玉菡：《建党时期上海的革命干部学校》，《光明日报》，2011 年 2 月 23 日。

教员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及夫人库兹涅佐娃、王元龄[①]等人。袁振英(1896—1979),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为书记,袁振英成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与此同时,他兼任上海外国语学社英文教员。[②] 担任英语教学的还有毕业于南开大学的李震瀛(1900—1937)。他于1922年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俞秀松,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920年9月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任秘书长,并具体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③] 李达(1890—1966)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同时他还兼任外国语学社的日文教员。李汉俊(1890—1927)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与陈独秀等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在此期间,他兼外国语学社的法文教员。

(二)外国语学社学员的学习情况

虽然外国语学社在《民国日报》刊登广告,向社会公开招收英、俄、日(后又增加法文)学员,但实际上大多数的学员是由各地中共党组织的筹备机构和发起人介绍而来的,公开报名的为数不多,如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周兆秋等人均经毛泽东介绍,不远千里从长沙来到上海入学。[④] 也有些青年因对社会不满,满怀爱国热情而来,还有些是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主笔的邵力子,被送进外国

---

① 王元龄是经陈独秀介绍,来到外国语学社担任俄文教员的,那时她尚不足20岁,刚从苏俄回国。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将领的肖劲光曾动情地回忆,“教我们俄文的是一个王小姐,俄文也说得非常好,听说她也在俄国工作过”。(汪晓波、杨楠:《一代人的道路在此开启——追忆渔阳里外国语学社峥嵘岁月》,载《青年报》,2004年4月25日。) 史美伦在《我的俄语老师王元龄》中对王元龄也有介绍:“我是从1952年秋开始从收音机学俄语的,那时我念高一。初级班的老师是一个住上海的俄国人,名叫么植。我没念中级班,第二年就读了高级班,老师是一位5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名叫王元龄。……当时只知道她从小生长在俄国,俄语比一般俄国人还好。……她的父亲叫王维祺,是老同盟会的会员,舅舅叫李家鳌,是张作霖驻莫斯科的公使。在共产党成立以前,在上海淮海中路(那时叫霞飞路)渔阳里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外组织了一个外国语学社,陈独秀把她聘来作俄语教师,当时她19岁,思想进步,教俄语教得很好。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和柯庆施等都是她的学生。”(http://blog.sina.com.cn/shimeilun,2008—11—20。)

② 关于袁振英的生平及事迹详见李继锋、郭彬、陈立平:《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③ 罗征敬:《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人民日报》,1983年8月14日。关于俞秀松的生平,详见陈秀萍:《俞秀松评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④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语学社学习的。学生“少时有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①]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设备极其简单，霞飞路渔阳里 6 号楼下都是教室，不上课时用作其他活动。楼上亭子间分别为杨明斋等人的卧室，客堂则是临时团中央办公室。楼上东厢房一部分是学生寝室，俞秀松、刘少奇、许之桢、柯庆施等在这里住过。学生大多住在外面，半天来校上课，半天回去自修。[②] 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蒋光慈、王一飞、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

外国语学社设有俄语、英语、日语、德文、法语等课程，以俄语为主。学生们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学好俄文，到俄国去学习先进的革命真理。外国语学社是我党第一代留俄生的摇篮。在学社里，学生们除了学习俄文、英文等各语种外，学社还发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必修课。学生们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外国语，一面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参加革命实践。例如，刘少奇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学习俄文，下午和大家一起参加社会活动。除了做工、游行，他还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书籍，思考我国的革命问题。[③] 从 1921 年起，为培养革命骨干，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刘少奇、任弼时、王一飞、柯庆施等约四十名学员，分三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④] 他们在俄留学期间，最初虽难以直接用俄语听课，但凭借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初步俄语基础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很快便达到听懂俄语授课、能阅读俄文书刊的水平。[⑤] 曾在学社学习过的著名翻译家曹靖华[⑥]在《自叙经历》中对在外国语学社的学习作了回顾：

> 1920 年，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六号。我同

① 柯六六：《柯庆施就读上海外国语学社前后》，《江淮文史》，2008 年第 6 期

② 汪晓波、杨楠：《一代人的道路在此开启——追忆渔阳里外国语学社峥嵘岁月》，《青年报》，2004 年 4 月 25 日。

③ 汪晓波、杨楠：《渔阳里点燃进步的烽火》，《青年报》，2004 年 4 月 25 日。

④ 陈秀萍：《俞秀松评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 页。

⑤ 郝淑霞：《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俄语教育概观》，《中国俄语教学》，2006 年第 3 期。

⑥ 曹靖华（1897—1987），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1920 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后并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3 年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并从事俄国和苏联文学的译介工作，并任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主编《苏联文学丛书》。1948 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等职。1987 年获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同年 8 月，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即安徽、湖南、浙江等。刘少奇、任弼时等是湖南的，王一飞是浙江的。我是河南的，只我一个，不能成组，所以编入安徽小组。因为我曾在安徽大通小学教过书，另外，我在河南开封二中时，曾组织过一个青年学会，办了一个《青年》半月刊。青年学会不分性别、省别，都可参加。蒋光慈是芜湖五中学生，是安徽人，也参加了。所以，把我编入安徽组。按地区分组，在语言、生活习惯上都方便些。三个组上课在一起，课外不来往。我们在外国语学社自己看《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五一节时，还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撒传单等活动。当时，我们都不学俄文，从当时的各种情况看，要去莫斯科留学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认为学几个字母没用。我们在中学大都学过英语，能对付着看一点报纸新闻，不如驾轻就熟，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还可看报纸、写文章。这是很现实的一种想法。[①]

外国语学社著名的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张太雷、汪寿华、谢文锦[②]、王一飞、梁柏台、李启汉、陈为人、任作民、傅大庆、蒋光慈、韦素园[③]、曹靖华、周伯棣、魏以新等。[④]

## 三、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影响

由于上海外国语学社设在法租界，其活动也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之中。后来，学社活动以及其组织的会议等，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处境相当危险。曾任外国语学社俄文教员的王元龄的女儿邹灵回忆，外国语学社“一夜之间就没有了”。王元龄当年是在去上课的路上，被人告知不要

---

① 曹靖华：《新文化史料》，1998 年第 1 期。

② 谢文锦(1894—1927)，浙江永嘉人。1920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投身革命。谢文锦曾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在外国语学社就读，后去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军事政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并任中共中央秘书。1927 年 4 月因叛徒出卖，被反动派杀害。

③ 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邱人。1920 年，韦素园入上海外国语学社补习俄语，后与刘少奇、肖劲光、任弼时、曹靖华、蒋光慈等人前往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韦素园一生勤于文学翻译，译著有俄国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俄国梭罗古勃的《邂逅》等。同时还创作了大量散文、小品、诗歌等文学作品。逝世后，鲁迅先生手书“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碑文，并撰写了《忆韦素园君》一文。

④ 汪晓波、杨楠：《一代人的道路在此开启——追忆渔阳里外国语学社峥嵘岁月》，《青年报》2004 年 4 月 25 日。

去的。两天以后,王元龄再到学社,发现已人去楼空。上海外国语学社从开办到1921年7月停办,为时不足一年。她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活动的内容、成绩等均未发现有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很难进一步获知其外语教学情况。但是,就是设在渔阳里的上海外国语学社,走出过革命家、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等人物,如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王一飞、肖劲光、曹靖华、蒋光慈等,"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第一所学校",[①]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短短的一年中,为党培育了一些革命种子,输送了一批革命干部到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去学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赴苏联学习的同志,学成回国后积极开展革命工作,有的成为党的领袖,多数人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 ——上海大学

### 一、创办动因及过程

1922年春,安徽人王理堂假陈独秀等人之名,以提倡新文化为号召,在上海闸北青岛路青云坊(今青云路298号附近),创办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王理堂任校长,陈勣武任校务长。全校共有学生一百六十人(含附中)。学校办学条件较差,各科虽有课程名目,但无教师,即或有之,亦都不称职。学生中不少是在"五四"运动中受过锻炼、被当地反动力量压迫失业失学而来沪求学的。而校方却借学敛财、校政腐败,学生忍无可忍,于10月掀起罢课风潮。学生"赶走了校长,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学校"。[②] 在此之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决定创办一所高等学校,以加速培养党的干部,他曾与李大钊等人多次酝酿筹划。此时正值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事发,党中央研究后,决定接受师生们的要求。原拟推举陈独秀为校长,因陈氏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未成事实。最终还是请国民党出面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就告诉原高等师范闹风潮的学生,应由他们派代表请于右任出来担任校长。1922年10月23日,学校由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改建为上海大学。邀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① 汪晓波、杨楠:《渔阳里点燃进步的烽火》,《青年报》,2004年4月25日。

② 《茅盾回忆录》,载黄美真、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1879—1964)出任校长。于氏虽感“改组大学,前途艰巨”,但表示“自当尽力之所能,力谋学校发展”。[①] 于右任20岁时曾经岁试第一,被称为“西北奇才”,25岁任商州中学堂校长,后加入同盟会。1918年他从日本返回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对教育工作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氏虽是校长,但他常在北京,充当国民党和冯玉祥的联系人。代理校长邵力子,虽是共产党员,但他主要是办《民国日报》,并不到校。所以,他们“只是挂名,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员”。[②]

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先后由叶楚仓、李汉俊、瞿秋白、陈望道担任,总务长(后改称校务长)为邓中夏。在5人中,除叶楚仓外,李汉俊、瞿秋白、邓中夏均为著名的共产党人,都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陈望道的一生也是和党的事业紧密相连的。上海大学的主要领导都是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③]

1923年4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共产党人邓中夏受李大钊委派,到上海大学工作,他担任校务长,负责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如前所述,校长于右任是挂名的,并不到学校办公。邓中夏在了解学校全面情况后,锐意革新校务,紧紧抓住三件大事来做:(一)确定教育方针和目的要求;(二)改革学校建制,草拟上海大学章程;(三)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界人士担任教职。[④] 这三件大事,奠定了学校发展的基础。

根据瞿秋白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中所拟订的“上海大学之组织的预定计划”,上海大学拟分3期办成两院14—16个系,即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哲学、史学以及中文、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绘画、音乐、雕刻等系,分属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上海大学章程》规定:“大学部各系定为4年毕业。毕业时,给予学士学位。”中学部“分设高级中学班及初级中学班,……皆各定为三年毕业”。[⑤] 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实际设置的系有英国文学系、中国文学系、社会学系和美术系等四个系,还设有附属中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为陈望道,英国文学系主任由教务长何世桢兼任,社会学系主任是瞿秋白,美术系主任是洪野,侯绍裘任附中主任。

---

① 《上海大学欢迎校长》,《民国日报》,1922年10月24日。

② 《茅盾回忆录》,载黄美真、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③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④ 黄美真、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⑤ 黄美真、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上海大学办学条件较差，只有一座2层楼房10余间的老式石库门楼房作为校舍，弄堂门即校门。由于青云坊属市郊结合部，青云里只是一条小弄堂，人称"弄堂大学"。设施极其简陋，除了白天正常的教学活动外，晚上是夜校的学生上课，每天从早晨到晚上十点，每个教室也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学生们课余活动的场所是校门前的一大片荒地。1924年2月，这个弄堂大学的学生从160人增加到400人，闸北民房，颇不敷用；同时也为避开封建军阀对担任教学任务的共产党人瞿秋白的监视，学校决定迁到公共租界的西摩路南洋路口(今陕西北路29弄4—12号)，后又借了对面新建的时应里的部分房子办学。那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在中共的推动下，筹划改组国民党，重新培养革命人才，对上海大学甚为关注。1923年春，孙中山南下，驱逐陈炯明，重建革命政府，即亲自批准月拨万元资助上海大学。1925年9月7日，经广州革命政府第十五次会议决定，补助上海大学建筑经费二万银元。1926年又补助一万银元，使学校的办学条件大为改观。

1927年4月1日，通过募捐和借款的办法，新校舍在江湾镇西端奎照路落成。正当学校蒸蒸日上，徐图进一步发展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污蔑上海大学是"赤色大本营，是煽动工潮、破坏社会秩序的指挥机关"。1927年5月3日，蒋介石指令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和陈群查封上海大学。上大被国民党军警当局取缔封闭而终止。部分师生转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并把上海大学的新校址改成了"国立劳动大学"。校舍于"一·二八"事变中被毁。

## 二、外语教学概况

### (一) 师资队伍

上海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①为宗旨，非常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到上海大学任教的教师几乎都是国内有名望的政治名流和学界才俊，如恽代英、蔡和森、萧楚女、任弼时、杨贤江、侯绍裘、蒋光慈、朱自清、叶圣陶、曹聚仁、周建人、施存统、沈雁冰、田汉、朱光潜、周越然等，真可谓群贤毕至、英才济济。上海大学的外语课程有英文、俄文、德文和日文。教授英文的基本上都是知名的专家学者，如：何世桢(1895—1972)，是孙中山的亲密朋友，192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毕业后，毅然返回上海，任东

① 于右任：《上海大学一览·弁言》，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成立特刊，1936年9月出版。

吴大学法学院法律教授兼上海大学英文系主任。周越然(1885—1946),[①]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广方言馆),在上大后期担任英国文学系主任,讲授西洋文学选读及英文文学翻译。王登云,上大初期的英文系主任,毕业于牛津大学,主讲高等英文文法和英文作文。何世枚,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教授,主讲议会法、伦理、小说、散文。孙邦藻,英国格拉斯大学文学硕士,南洋大学教授,主讲修辞学、作文、散文、文学史。冯子恭,香港大学文学士、理学士,主讲文法、作文。茅盾(即沈雁冰),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在英文系主讲希腊神话。朱湘(1904—1933),现代著名诗人,留美文学士,给社会学系上英文课,英文选材结合社会学课程,大多系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名著。邵诗舟,复旦大学教员,教授小说、西史。[②] 张君谋,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之侄,留瑞士大学理科博士,即后来中央大学校长的张乃燕。上大成立初期,任聘为英文特别讲师[③],此外,还有来自英美等国家的教师来校讲学或承担教学工作。

(二) 课程设置

上海大学的学制为四年,毕业时授学士学位。"其大学学程,大学部采用学分制,以每周上课一小时或实习二小时历半年者为一学分。以修满一百四十学分为毕业。"[④]从英国文学系课程来看,学校的课程设置是以英语语言文学为主体的,以培养语言文学倾向的学生为主。瞿秋白拟定的上大英文系必修科目有:散文、诗歌、戏剧、小说、演说及辩论、修辞学、文学评论、言语学、英美文学史、世界文学史、英美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第二外国语等。除了必修课外,尚有文学概论、美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概论八门功课,亦是必修的,但与文学系(中国文)设共同讲座,以中文讲。学生要求修满至少 156 学分,大大超过了学制规定的 140 学分。为了便于学生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开设了一些非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也便于学生更好地面向就业市场。在这四年的时间里,要学习三十余门课程。此外,还要求学习皆

① 周越然(1885—1946),浙江吴兴人。南社社员,曾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以编著《英语模范读本》闻名。周越然在《约伯与短工》中说:"后来又任上海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兼教授之职,但为期亦短,且该校所注重者,并非英语,故余全然无力可用。"(周越然:《六十回忆》,太平书局 1944 年版,第 1—4 页。)周氏除了在上海大学任教英语外,先后在任职于苏州英文专修馆、江苏高等学堂、安徽高等学堂、中国公学、商船学校、南京国立高等师范等学校。

②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1 页。

③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5 页。

④ 黄美真、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3 页。

用中文讲授的选修课程。该课程设置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注重学科交叉，非专业课程的比重较大，约占三分之一，加上选修课，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选修课程的设置，给学生提供了多种选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的有益探索。

表 2—1　　英国文学系课程表

| 第一学年 | | 第二学年 | | 第三学年 | | 第四学年 | |
|---|---|---|---|---|---|---|---|
| 课　目 | 学分 | 课　目 | 学分 | 课　目 | 学分 | 课　目 | 学分 |
| 散文 | 六 | 散文 | 六 | 英文 | 六 | 英文学 | 六 |
| 小说 | 六 | 小说 | 四 | 诗歌 | 四 | 论文 | 四 |
| 演说 | 四 | 演说 | 四 | 戏剧 | 四 | 文学批评 | 四 |
| 高等文法 | 四 | 修辞学 | 六 | 论文 | 四 | 公文程式 | 四 |
| 语音学 | 二 | 作文 | 四 | 文学批评 | 四 | 哲学 | 六 |
| 作文 | 四 | 英国文学史 | 六 | 英国文学史 | 四 | 教育学 | 四 |
| 英文 | 二 | 文学史 | 四 | 欧洲文学史 | 四 | 新闻学 | 四 |
| 文字学 | 四 | 社会学 | 四 | 政治 | 四 | | |
| 西洋心理学 | 四 | 经济学 | 四 | 法律 | 四 | | |
| 第二种外国语 | 四 | 第二种外国语 | | | | | |
| 共　计 | 44 | | 42 | | 38 | | 32 |

表 2—2　　英国文学系选修课目表

| 选修课目(皆用中文讲授) | | | | | | | |
|---|---|---|---|---|---|---|---|
| 文学评论 | | 中国文学史 | | 中国文学史 | | 现代政治 | |
| 美学 | | 美学 | | 比较世界文学 | | 外文史 | |
| 世界文化史 | | 世界文化史 | | 国际法 | | 比较行政法 | |
| 哲学概论 | | 哲学概论 | | 宪法 | | | |
| 哲学史大纲 | | 哲学史大纲 | | 现代政治 | | | |
| 中国史 | | 中国史 | | 全民政治 | | | |
| 现代政治 | | 现代政治 | | | | | |

资料来源：《上海大学一览》，载黄美真、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7—58 页。

上海大学设有附属中学。附中的英语教学及课程设置情况，尚未发现

相关的资料。但从该校的一份《英文科教学大纲》,我们仍可管中窥豹,了解一些大概。

《英文科教学大纲》(简称《大纲》)规定了中学英语教学的目的以及英语教学所使用的教学法。根据该《大纲》,中学英语教学以着重训练学生的两种能力为宗旨:一是“正确而充分地用英文和英语自由发表思想”;二是“流畅地直接阅览原文书报”。这体现了办学者重视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培养的指导思想。但实际上,这一要求似乎偏高,对于办学环境已发生极大变化的今天,这样的要求对于大多数中学生来说尚且不易达到,更何况是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生了。当然,上海作为通商城市,具有较中国其他地方优越的外语学习环境。

对于教学法,《大纲》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分开对待。在初级中学,“直接教授法宜完全采用,并辅以直观教授法”。直接教授法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直接法(Direct Method)[①],系舶来品,民国时期著名的教学法专家张士一(1886—1969)、周越然等曾大力宣传和实践。宣传和推广直接法,是从“五四”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外语教学界对外语教学研究的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之一。[②] 除了在课堂上使用直接教学法外,还辅之以直观教学法。这两种方法交替使用,是符合初中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和认知水平的。在高中阶段,教学方法主要是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为主,因为,阅读是听、说、写、译各单项语言能力的基础。《大纲》主张精研和泛读并举。同时,《大纲》对选材作了规定,“宜选近世英文中最著名的短篇杰作为精深的研究,又选英文中较为浅近的作品,为泛读用”。对所选文学作品的文学体裁作了详尽规定,“选文中文学作品宜居四分之三,富于思想的论文宜居四分之一。而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宜居二分之一……”《大纲》很重视学以致用,讲练结合,“课外宜设时评一小时,使学生对于一周间由英文报纸所得的重要新闻,用英文报告,而后用英语自由发表意见;练习每周两小时,注重翻译和应用文;组织英文演说和辩论会”。这些规定凸现了语言学习的本质,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能力与语言学习规律的。

---

① 直接法也叫自然法(Natural Method)、心理法(Psychological Method)、口语法(Oral Method)、改良法(Reformed Method)等,是用表演(dramatization)、实物(objects)及图画(pictures)或是意义上的联想(association of ideas)等形式教授外国语的方法。直接法产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它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直接学习、直接理解和直接应用。关于直接法的相关内容,详见 Richards, J. *et al*.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1—14.

②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

## 英文科教学大纲

1. 目的

本学科以训练下列两种能力为宗旨：

a. 正确而充分地用英文和英语自由发表思想；

b. 流畅地直接阅览原文书报。

2. 方法

a. 在初级中学，直接教授法宜完全采用，并辅以直观教授法。

(1) 读本文法和会话，至少在前一年半用混合教授法，以互相发明，互相引用。

(2) 以充分的练习和示例，代替文法的规则和定义。

(3) 以英语问答代替中文的解释字句。

(4) 以实物、图画、或动作辅助解释底缺欠。

(5) 以造句底练习为作文和翻译底基础，而后于相当的时机继之以翻译和作文。

(6) 第三年若分教文法和读本，文法宜用详于句法的书，教授八大词类的繁琐的分类和定义，以有实用的为限。

(7) 每小时令学生预备下小时的功课，和读课外的参考书，以养成独立地直接读原文书的能力。

b. 在高级中学，本学科宜注重于直接读原文的文学和科学的书，和阅览原文的杂志报纸；教授宜分为精研和泛读两部。

(1) 宜选近世英文中最著名的短篇杰作为精深的研究，又选英文中较为浅近的作品，为泛读用。

(2) 选文中文学作品宜居四分之三，富于思想的论文宜居四分之一。而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宜居二分之一，近代名剧四分之一，诗歌四分之一。论文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宜居二分之一，关于文学批评的四分之一，关于论物事的四分之一。

(3) 课外宜有阅英文报时间，由教员指导。

(4) 课外宜设时评一小时，使学生对于一周间由英文报纸所得的重要新闻，用英文报告，而后用英语自由发表意见。

(5) 练习每周两小时，注重翻译和应用文。

(6) 作文法和修辞学宜与选文合教，不必另设钟点。

(7) 学生课外宜组织英文演说和辩论会由教员指导。[①]

(三) 教学方法

上海大学很讲求实效，注重教学方法，使读书与生活融为一体，努力营造一个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环境。上大教授的教学水平各具特色、堪称一流。例如，茅盾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商务印书馆编辑，在英文系讲授《希腊神话》和《西洋文学概论》。由于他涉猎广泛，融合古今中外，"据名著节本，演讲世界文学故事，生动活泼，颇受同学欢迎"，[②]被称为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现代女作家丁玲回忆说，在上大"我喜欢沈雁冰先生讲奥德赛、伊利亚特……我还读过沈先生在《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欧洲小说"。[③]

上大初期的系主任王登云讲授高等英文文法及英文作文。其上课特点是常选英国古典文学名著名句，嘱学生抄录熟读，以便作文时应用。他对学生的基本功要求严格，要求他们依照伦敦标准语音 R. P. 的要求发音，以符英语实际。

张君谋主要教授英语。由于他对西洋史有研究，上大还聘请他讲授英文系的西洋史一课，"采用海氏、蒙氏合著《欧洲史大纲》为课本。他讲课清晰，同时指导学生自学课本，一学年完成功课"。[④]

以编著《英语模范读本》闻名的周越然，周启新在《革命的大学——上海大学》中有所介绍：

> 周越然，上大后期任英国文学系主任，讲授西洋文学名著选要及英文文学翻译，每周十二小时。此人系逊清秀才，上海广方言馆毕业，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为使文学与翻译结合起见，所授英国文学名著以有中文译本为限，指示学生对照阅读，研究翻译凡例。一学年中只选讲十篇，不厌其详，务使学生心神领会，运用自如。每逢学期终结，学生须至少实习翻译一篇，不少于三千字左右，材料自择。周以秀才出身，崇拜严复"信、达、雅"三原则，故主文言翻译。谓文学翻译尤应注意"雅"字。[⑤]

---

① 《中学部概况》，《上海大学一览》，载黄美真、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3—74 页。

② 周启新：《革命的大学——上海大学》，载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15 页。

③ 程陶：《八十年前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人民政协报》，2007 年 1 月 4 日。

④ 周启新：《革命的大学——上海大学》，载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15 页。

⑤ 出处同上。

1923年入上海大学求学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施蛰存在《上海大学的精神》一文中对上大的教授作了如下评价：

> 上海大学的教授，主要不是以糊口的教授。他们很热心地聚集在上海大学，将他们所研究到的专长，指示给他们的学生……对于他们自己所任的学科，都能负责。不像别的教授，跑上讲坛，口讲指画了一点钟，便跑了，一切都不管。这样的教授在上海大学里也一位寻不出……上海大学教授的真精神，想读者总已在杂志报章上发表他们的文章中看出。他们并不愿意一天到晚坐在讲坛上死教学生，他们也很知道大学生——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在研究学问之外，还有许多事要做。所以现在的大学中的教授以为应当阻止学生，压迫学生的事，上海大学的教授却偏偏都很热心地帮助学生，指导学生。①

上海大学除了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之外，课外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主要形式有开设特别讲座及举办讲学会，邀请中外名人来校演讲。在寒暑假，上大还组织"夏令讲学会"、"寒假读书会"等。② 所有这些活动，是上大教学生气勃勃的重要原因之一。师生思想活跃，充满朝气，为当时国内各大学所不及。上海大学这所"向不著名之学校，一变而崭然露头角矣"。③

### 三、影响

上海大学是2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创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它也随着统一战线的破裂而终结。虽然创办只有5年时间，但前后共有学生1800余人，培养了许多共产党骨干分子和社会知名人士"④，对旧教育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新教育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发生了很大影响。中共早期的著名领导人、理论家、活动家和教育家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萧楚女、任弼时、杨贤江、茅盾等都曾在该校任职任教。这所设施简陋的学校，成了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在当年上大的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栋梁之才，还有不少人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

---

① 施蛰存：《上海大学的精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0月23日。

② 董宝良、但昭彬、陈晴：《中国近代化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③ 《上海大学革新之猛进》，《民国日报》，1923年6月14日。

④ 董宝良、但昭彬、陈晴：《中国近代化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1925 年，上海大学成为五卅运动的先锋队，学生何秉彝在参加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中壮烈牺牲。上大师生周水平、刘华、贺威圣先后被军阀政府杀害。在短短的 5 年办学生涯中，“上海大学培养了一批职业革命家、理论家和文学大家，学生中有很多都成了政治和文化名人，其中有何秉彝、李硕勋、何挺颖、郭伯和、杨尚昆、张治中、王稼祥、顾作霖、秦邦宪、张际春、李逸民、阳翰笙、匡亚明、张琴秋、孟超、孔另境、戴望舒、施蛰存、袁牧之、葛琴，等等”。[①] 这些都是对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运动极有贡献的人才和社会知名人士。上海大学在中国教育史及中国外语教育史上均占有特殊的地位。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
## ——延安外国语学校

### 一、学校沿革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武装侵略。中共中央预见到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要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就必须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尤其是要同苏联人民一道并肩作战。抓紧时间培养懂俄文的军事干部是当前紧迫任务。为此，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1941 年 8 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俄文队在延安成立，专门培养“通晓俄语、能会话、能联系实际的俄文翻译人才”，[②]后俄文队改名为军事学院俄文科俄文大队。1942 年 5 月，俄文大队改名军委俄文学校，划归中央军委第四局（后改称编译局）领导。

1944 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欧洲战场向有利于盟军方面转化。中国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解放区战场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中国军队也在缅甸北部配合盟军作战。这时，代表美国军方和政府，肩负着开辟与中共直接联系通道的使命的美军观察组即将进驻延安。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外语翻译人才（尤其是英语翻译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为了适应美军观察组即将来延安工作的需要，同时也为新中国及早准备外交干部，外语人才（尤其是英语人才）的培训工作一定要加强。”[③]他还说，俄文学校“不能只局限于培养俄语干部，要

---

① 程陶：《八十年前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人民政协报》，2007 年 1 月 4 日。

②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3 页。

③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4 页。

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看到世界发展的趋势，世界上多数国家是用英文的，英文干部将来大有用武之地，因而除了办好俄文系之外还要开设英文系”。[1] 1944 年 4 月，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央决定将中央军委俄文学校扩建为延安外国语学校，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曾涌泉兼任校长。6 月，在现有俄文系的基础上，增设英文系，仍由军委领导。建立英文系的目的是“培养军事和外事干部”。[2] 英文系学生 70 多人，浦化人为系主任。周恩来十分关心延安外国语学校，亲临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美国主动要求加强与我党、我军联系，派遣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等情况，指出抗战胜利后，新中国需要大量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才。9 月，周恩来再次来校作报告，又一次指出，为迎接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才的培养；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不亢不卑，具有崭新的风格和伟大的气魄。他强调，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还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形势的发展要求俄语、英语两系学生必须赶紧打好外语基础，以适应新的工作需要。为此，学校组织学生集中精力专攻外语。七大以后，校长曾涌泉调离外国语学校，由杨尚昆兼任校长。抗战胜利后，外国语学校师生在与延安军民共同欢庆抗战胜利以后，除了英文系部分师生仍留延安继续学习外，大部分师生分批奔赴华北和东北解放区，接受新的使命。延安外国语学校的日常教学也基本终止。从抗大三分校俄文队算起，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延安外国语学校“前后经历整整四年多的时间，中间除参加生产劳动和军训外，大多数学员学习外语的时间有三年左右”。[3]

## 二、外语教学概览

### （一）师资力量

在战争年代，实施办学最大的瓶颈问题是师资问题，延安外国语学校也不例外。那时，一般的文化课教师都极其缺乏，遑论外语教师了。周恩来非常关心学校的建设，他还把从国民党统治区带来的外文书刊送给学校作为教学资料。他说，教师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多方面发掘人才，教师

①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3 页。

② 付克：《艰苦创业育人才——关于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一些回忆》，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6 页。

③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5 页。

总会找到的。他推荐朱德总司令的秘书黄华和他自己的秘书陈家康去外国语学校兼任英语课。英语系主任浦化人(1887—1974)、国际友人马海德(George Hatem)①、王大才②、马牧鸣、唐海、朱仲芝等都是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先后来到英文系担任英文教学的。③ 除了上述专兼职教师之外,担任英文系教学工作的还有温健风、朱仰止、王才、李晓黎以及兼职教师柯伯年、林迈可(Michael Lindsay)④、沈建图⑤等。

俄文系主任由卢竟如兼任。教员有常乾坤、张培成、李洁民、杨化飞、赵洵、钟毅、李荣华、韩斌、黄正光、唐国华、邵天任、曹汀、王连、刘群、李海等。其中常乾坤、王连精通俄语,既当领导(前者是俄文一大队队长,后者是一大队三队队长),又当教员。尤其是常乾坤,他在苏联留学多年,从事航空工作,回国前在苏联空军服务,担任少校领航员,他的俄文很好,对话十分流利,听起来和俄国人差不多。⑥

(二) 学生来源

延安外国语学校英文系不仅是周恩来建议成立的,而且这个系最困难的教师和学生的来源主要也是他解决的。学员起初从抗大三分校毕业生及干部中抽调一部分,以后又陆续从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各部门、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各根据地前方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调进一大批学员,共计 70 余人。这些学员在新中国建立后大多从事外交、对外文化交流、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成为各部门、各院系的领导骨干。为保存历史资料,现把当年(1945 年)英语系各班学员名单辑录如下:

> 英文 A 班:于山、张天民、凌青、雷一霆、张林生、余实、沈行之、曾远辉、郭戈奇、周宁、沈鸿章。
>
> 英文 B 班:张凛、丁唯坚、沈丙然、周光普、白苹州、梁文林、王进、彭光涵、马振武、田健、杨文宁、曾仰清、霍凯文、陈季瑜、张琳、王刚、庄

---

① 马海德是同著名美国记者斯诺一起到延安的美国医生,后加入中共,是最早参加中共的国际友人,曾任卫生部顾问。

② 印尼人,曾在共产国际工作。

③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4 页。

④ 林迈可(1909—1994),原名迈克尔·林赛(Michael Lindsay),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37 年 12 月来到抗日烽火中的中国,在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任教。1944 年 5 月,林迈可夫妇到达延安,领导创建新华社对外英文广播。

⑤ 沈建图是新加坡华侨,自幼接受英文教育,曾在香港大学学习,参加革命后曾在山东、太行等地区工作,来英播部工作前为延安交际处翻译。

⑥ 曹慕尧:《延安抗大俄文队:中国两所大学的发源地》,《党史纵横》,2002 年第 7 期

涛、杨慧玲、胡奇、李易、严昭、方纪、张凡、杜伦、任琦、陈实、杨诚、高涵、白林、于浩成。

英文C班：梅青、牧岗、康岱沙、余爽人、赵颖、夏静、石风、冯兰瑞、李秀娴、杨云实、徐博、欧阳宿、陈佩明、徐霞、路比、张若天、张敬轩、张纪恒、郝振奎、严季瑜、赵毅、秦江、宋琦、夏阳、杨乐、王治、刘金泰、刘夏君、吕蓬茵、吴昭、张和、徐克之、兰建。①

俄文系就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范围内招生，基本上采取自愿报名和组织选送相结合的方式，吸收了那些渴望学习俄语的知识青年，其中有抗大三分校本身的干部和学员，也有其他机关的干部和学校的学员。1941年7、8月间，从前方战斗部队中抽调回一批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连、排级干部，约三十多人，到俄文队学习。② 俄文系共有学员104人，分成四个班。其中有马列、付克、高中一（高亚夫）、何理良、阎明智（阎明复的哥哥）、安致远、许文益、金毅夫、严立宇、尹企卓、张天恩、张东川、朱子奇、谢文清、罗俊才等。③

（三）课程设计

在抗战时期，“由于亟需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解放区学校的学制一般较短，因此要求各校在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编方面，切实掌握少而精的原则”。④ 根据当时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延安外国语学校确定的培养目标为：经过短期学习（多数为一年），培养成军事、政治和外事口笔译翻译人才。⑤ 因此，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是紧密结合培养目标，根据实际和未来工作的需要来设置的。课程基本上可分为讲读、会话、语法和翻译四类。讲读是主要的课程形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专业主干课，既包括通常所说的精读，也包括泛读。值得一提的是，翻译课“一般作为高年级的课程放在全学程的后半阶段，但学校打破这个惯例，大约在半年之后就开设翻译课”。⑥ 翻译是听、说、读、写、译各单项语言技能中综合性最强、对语言和文化要求最高的一门课程，能够全面检测学生各方面知识的掌握情况，最能使学生发现自己知识和技能掌握的不足，从而能更有效地促进其学习。

---

①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② 曹慕尧：《延安抗大俄文队：中国两所大学的发源地》，《党史纵横》，2002年第7期。

③ 李传松：《新中国外语教育史》，旅游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④ 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⑤ 付克：《艰苦创业育人才——关于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一些回忆》，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8页。

⑥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翻译同样也能促进教师的知识与技能的提高，实现教学相长。这样的课程设计对传统的做法不啻是一个突破，而且具有创新意义。

（四）教学特色

1. 实施分层教学。延安外国语学校根据英文系学员的基础，为了便于更好地实施因材施教将其分成A班、B班、C班三个教学班。A班十余人，英语基础比较好，但久已不用，需要恢复和提高。B班三十人，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学过一些语法知识。C班三十余人，学过点英语，但基本上需从头开始，按部就班学习。学生的共同特点是年龄较大（都在二十几岁以上），文化知识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学校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实行分层次的教学，以适应英语学习基础不同的学生。俄文系也实行分层次教学。原俄文队队长曹慕尧（笔名曹慕岳）在其《延安抗大俄文队：中国两所大学的发源地》一文中写道：

> 1941年6月初，俄文队的学员已达六十余人，正式开课了，一部分学生原在文化俱乐部的业余俄语训练班学习过，掌握了一些基础知识，编为一个班，行政上叫做第一区队，由学员高中一担任区队长，跟班学习。教师李洁民，从前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讲授俄文文法，采用的讲义是北平法商学院俄语教授刘泽荣先生编写的教科书。另一部分学员原来没有学过俄语，编为一个班级，行政上叫做第二区队，学员甘照寰担任区队长，由教师张培成科长授课，从俄语的字母发音开始，逐渐进入单词，每次课讲若干个，要求熟读、牢记、能背诵。下课后，还有王玉、李海、陈鲸三位助教，指导学员写作业，辅助授课。①

2. 坚持自编教材。教材缺乏是除了教师、学生的来源之外摆在学校面前的又一难题。

学校充分发扬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力更生。教材以自编为主，适当吸收一些适合作教材用的现成文章。教材的编写原则，“一是短小、生动和实用；二是注意军事、外交术语；三是便于展开会话。教材来源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带进来的英文报刊杂志、书籍和有关介绍解放区情况的文章。例如英文版《论联合政府》是主要教材之一”。② 编写教材非常注重实际，如口语教材，在结合生活实际和国内外形势，充分运用已学过的词汇、句型、语法编成会话材料，同时注意运用已学过的课文内容作口语练习，使课程

---

① 曹慕尧：《延安抗大俄文队：中国两所大学的发源地》，《党史纵横》，2002年第7期。

② 付克：《艰苦创业育人才——关于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一些回忆》，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8页。

内容和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另外,还编译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区三三制政权"等小册子供学生学习阅读。这样做,一方面解决了教学材料的短缺问题,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运用英语作为工具,学习和了解解放区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英文水平,对学生的语言技能也是很好的训练,对他们未来的工作大有帮助。另外,英文系备有"纳氏文法"(Nesfield's English Grammar),需要的人可以自学。这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条件了。

同样,俄文系的俄语教材也是奇缺,在延安甚至找不到一本俄汉辞典。整个学校只有几本日本人八杉贞利编的《露和辞典》。教材选材的内容主要是苏联报刊、俄文书籍(联共党史、苏联军事论文)和教师自编的延安生活抗战故事等。一些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小说及戏剧《前线》、《马门教授》等作为教材使用。①

3. 重视学用结合。延安外国语学校的教学指导思想是"打好基础,恢复提高,学以致用,边学边用"。② 学校根据急需英语人才的现实,重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体现在教学计划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既有长计划,也有短安排,务使教学工作扎扎实实,走一步看出一步的效果。因此,教学中特别注重听、说、读、写、译各单项语言技能的培养。鉴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要求,英语教学的重心落在"译"(口译和笔译)上面,"译"是学校办学的目的所在。根据形势的需要,必须经常同美军观察组联系接触,因而学生可能随时被抽调外出工作或担任临时性的翻译,学用结合是现实的要求。例如,A 班有的学生就临时调去参加与美方、国民党方面谈判的三人军事小组工作以及和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接触。准确性是翻译的首要条件,英语教学中特别强调精读精译,对内容和词句有准确的理解,做到学一点用一点。同时,阅读跟进,以大量的阅读(有时一天学习十小时以上)促进、丰富内容和思想上的表达,真正做到学用结合,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再则,当时学习条件异常艰苦,③学校积极营造浓郁的英语氛围。规

---

① 李传松:《新中国外语教育史》,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5 页。

② 付克:《艰苦创业育人才——关于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一些回忆》,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8 页。

③ 曹慕尧在《延安抗大俄文队:中国两所大学的发源地》一文中回忆道:"我们的课堂设在露天,就是把黄土窑洞外面平整一块空地,放上一块黑板,教员授课有一张很小的桌子,学员们各自带一条小板凳,听讲写笔记,用自己的大腿作依托冒充当书桌,冬天最冷时,钢笔不下水,写几个字就得把钢笔放进棉衣里去暖一暖,然后再写。这些情况,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党史纵横》,2002 年第 7 期。)

定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人人讲英语，教师带头。通常的做法是“三人一组，两人对话，一人纠错。教师在晚饭后或在月光下（常常没有灯油）和学生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用英语聊天，同时允许学生插话、提问，以提高学生的听力，训练口语”。[①] 学校还考虑到成年人学外语的特点，“采取一名教师和一名助教包一个班，既讲课又会话，课上课下无甚差别，利用一切机会‘抢学’英语”[②]，大大促进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之所以能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是因为他们有着直接和实际的学习动机——学好外语，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个工具同反动派作斗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4. 注重营造师生平等、教学相长的环境。延安外国语学校“始终发扬教学民主精神，教师大多不是本行出身，没有被旧教育思想所束缚，敢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他们的教学方法既不是照搬苏联的，也不是移用英美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在他们看来，哪一种教法对学生学习有利，就应采用哪一种，不拘泥于一定的程式。师生之间平等相待，学员对教师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出，教师也经常征求学员对教学的意见，做到了师生合作、教学相长”。[③]

## 三、成就及影响

延安外国语学校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创办的。尽管在延安的外语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如此恶劣，但是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外语教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办学成就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培养了一批英语人才。在短短的一年时间（有的超过一年）里，多数学生已逐渐能阅读军事、政治方面的原文著作和报刊文章，能进行日常生活的会话和口笔译一般性的文件和资料，也能用英语写日记。“少数则可达到更高的水平，能笔译马列主义理论、经济、政治及文学著作，能为演讲、会议作口译。”[④]他们已能用英语从事相关的工作，有的被调到北平军

---

① 付克：《艰苦创业育人才——关于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一些回忆》，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8 页。

②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9 页。

③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 页。

④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9—110 页。

调部工作，不少人后来到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工作，有的做记者、编辑或翻译工作，并且均能胜任。如A班学生凌青，是著名的外交家，曾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四次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是延安外国语学校优秀学生的代表。

第二，探索出了一条英语教学的新路。在此之前，英语人才主要是在国立大学和教会学校培养，前者如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后者如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学制、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都比较单一。教学内容和教材主要是阅读英语语言文学作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英语专业学生到了二年级就开始学诗歌、戏剧、小说、散文、欧洲古代名著莎士比亚等等。看来这是偏重文学的。语言课只有语音及作文。选修课也几乎全是文学的。"[①]耿宪章回忆："当时的外语系主要就是学文学，学生除上课外，全是自己读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②]而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培养目标很具体，是培养"政治、军事、外事三方面的翻译人员"。课程设置是围绕着培养目标进行的，开设的课程不太多，但很精干。它的教学指导思想也很明确："打好基础，学以致用"。教学方法是强调实用性，强调"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训练"[③]，从而做到学用一致。这对于当今大多数"以培养应用型英语人才"为目标的学校的英语教学无不具有启迪作用。

第三，为今后的英语教学提供了改革思路。在抗日战争那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学生不可能像现在的学生那样有足够充分的时间和良好的条件来学习英语。学校提出了"抢学"的口号，掀起了空前的学习热潮，从早到晚，清凉山上，延水河边，到处都可以听到读书声，英语、俄语会话声和歌声。"抢学"持续了一年时间，取得了可喜成绩。"抢学"活动节约了时间和精力，效果也不错。解放后，我国的英语教学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英语教学却屡受诟病，被原副总理李岚清称为"费时低效"。时至今日，这一现状仍未有多大改观。国外有人提出要研究"语言经济学"，即要对因语言学习、翻译、培训等创造的收益或造成的损失进行成本核算。因此，有学者提出外语教学应该"适当推迟，缩短周期，强化训练，专业提

---

① 戴镏龄：《英语教学旧人旧事杂记》，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②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页。

③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高"方向发展。[①] 这一见解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延安外国语学校的"抢学"等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传承价值。

① "适当推迟"，是指将开设外语课程的时间推迟到初中甚至高中；"缩短周期"指的是把以前分散在中学和大学十几年的教学时间缩短或集中到两至三年的时间；"强化训练"就是针对外语学习的特殊性，采取集中学习、强化记忆、反复实践、学以致用的方法，在短时期内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专业提高"指到了大学阶段，在学生的外语实践能力基本过关以后，开始开设与专业密切相关或结合的外语会话阅读和写作课程，以便学生大学毕业后可以完全适应工作对外语能力的要求。（详见本刊评论员：《外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外国语》，1999 年第 3 期。）

# 第三章

# 教会中学的外语教学

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是以三级学制模式为基础而形成的概念,它是指位于初等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中等程度的教育。就"中学"一词使用的实际来说,通常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特指普通中学,其二是泛指全体中等学校。中国从清末建立近代学制之初,从事中等教育的学校就被分成三种类型,即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实业(职业)学校。普通中学通常是指以加深普通知识、旨在为升学作准备而设计的一类中等学校。且无论在政府教育法规文件中,还是在学者的著述文字中,普通中学通常都被省称为中学。①

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只有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层次,基本上没有中等教育这一层次。同治元年(1862),京师同文馆设置,标志着中国新教育的启动。中国新教育最初为"一段制",迄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津中西学堂成立,发展成为"二段制",但仍无"中学"之称谓。天津中西学堂的"二等学堂"(按:相当于新学制施行后的中学堂)是中国新式中等学校之雏形。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决定实施"癸卯学制",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且在全国全面实行的学制。其中,《奏定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是全国第一个关于中学学制的章程,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将外国语正式纳入到国家学制中,标志着中国普通中等教育正式取得独立地位。但是,独立于中国教育体制的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展的教会中等教育却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开始了。

为纪念最早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由在广州的外国侨民发起,马礼逊学堂于道光十九年(1839)在澳门成立,标志着西方教会开始在

---

① 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中国本土开展较系统的教会教育的开始，也标志着近代中国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启。以此为起点，直至整个民国时期，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了数以万计的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涵盖了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层次。在这一时期，虽然国家内战频仍，强敌环伺，民生蜩螗，但是英语教育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大师辈出，人才蔚兴。在当时的公私立中等英语教育中，教会中等英语教育成为一枝独秀。《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云："中学为教育系统之中坚，下级学校教师之大部分皆能由中学供给之，在全体教育组织中，中学为最稳固最能独立之部分，而入基督教的专门学校之一大部分良好之学生亦皆由斯出焉。"①不仅如此，教会中学也为当时著名的国立大学提供了大量的优秀生源，也为国家社会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当代许多名人，早年皆为教会中学学生，如民国政府总理颜惠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孙起孟，文化名人费孝通、冰心、杨宪益、王佐良、许国璋等，后升入大学或出洋深造。

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对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质量有个中肯的评价：

> 我过去上过教会学校。那时小学是七年，中学四年，共十一年。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英语，小学毕业时学会粗浅的英文会话，后来到了岭南大学附中，那是典型的教会学校，每天早晨八点半全体集合到大礼堂听讲道，每周二次圣经课。这说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是很厉害的，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一个学外语的环境，外文学得比较好。所以，后来做秘密工作时，冒充牧师都混得过去。从中学开始，除了语文以外，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世界地理都是英文讲课。在岭南大学四年毕业后，到英美留学就不觉困难了……旧时代的例子，对我们现在也有若干参考价值。②

## 第一节 教会中学外语教学概况

### 一、教会中学外语教学的历史演变

从时间上说，近代国人接受外语教育最早可追溯到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由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The

①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② 廖承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培养外语人才——在全国外语教育坐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教育》，1978年第10期。

Anglo-Chinese College)。1835年，英国"伦敦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的郭士立夫人(Mrs. Gutzlaff)在澳门开办一所学塾，被称为"中国留学之父"的爱国人士容闳(Yung Wing)曾在此就读。1839年，马礼逊学堂(The Morrison School)在澳门创办，这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很重视英文教育，并以英语讲授其他课程。1841年，容闳转入该校后，学习的课程有英文、算术、天文、史地、化学及生理学等近代西学课程以及"四书"等中国经典，马礼逊学堂培养了容闳、黄宽、唐廷枢等著名人士。在此后二十年的时间里，西方教会组织在华举办的教会教育发展较快。截至1860年，仅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香港及内地的广州、上海等五口通商城市开设的各式学校就有50多所，在读学生1,000余人。在这时期中的学生，皆来自贫寒的家庭。学校从传播福音的角度，培养他们所信任的教徒，提高基督教在身处封闭环境中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除了开设宗教课程，还开设中国经典和西学课程。这一时期，一般称为教会学校的早期阶段，可以说是教会中学的胚胎时期。

进入6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依凭《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进一步扩大传教规模，购置地产，创办学校，招收学龄儿童入学。从1864年开始，山东登州文会馆(1864)、上海培雅书院(1865)、杭州育英书院(1867)等学校相继创办，标志着教会教育逐渐向中等教育过渡。但是，这些学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普通中学，但从其招收的学生、设置的课程及其教学内容来看，无疑是中学程度的教育。因此，教会中等教育是进入发展时期了。

按当时的学校，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英华书院"之类(Anglo-Chinese)，一种是美国式的中学之类(High School)。毕范宇(Frank W. Price)在《教育季刊》(1929)撰文，称："那时的学校，为广揽学生起见，大都不收取学费。唯一般教授英文的学校，则颇有吸引中等以上社会子弟来学的能力。学生共计5917人，其中男生虽占多数，但各差会对于女子教育，也有注重，每个差会至少必创办女校一所。不过当时风气未开，所以求学的学生，多从基督徒家庭来的。女校之中，以广州真光女学，北平贝满女学，上海中西女塾为最著称。"①

1877年5月，为了协调在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加强各传教士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新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登州文会馆

① [美]毕范宇：《基督教中等教育的沿革》，《教育季刊》第五卷第四期，1929年12月。

校长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在会上提出是否开设英语和是否以英语组织教学等问题。狄考文主张应该以汉语教授所有的课程，明确反对教会学校教授英语。他的主张并没有引起与会者足够的重视，但由此引发了长达二十年关于语言教学问题的争论。到 1890 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是否进行英语教学的争论达到顶峰。狄考文等人主张教会学校必须用中国语言施教，其核心理由是学会英语的学生容易变坏，进而脱离传教工作。学生学习英文，不是为了传教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谋生的手段。但是，他们的观点受到多数与会代表的驳斥。到 1896 年“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年会，持续二十年的关于语言教学问题的争论以达成用英语施教的共识而告结束。①

必须指出的是，自从教会学校在中国本土创办以来，多数学校都开设英语课程，甚至有些学校以英语组织教学，而且英语成了招徕学生的王牌，办学成效相当明显。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以及中国沿江沿海地区的进一步开放，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骤增，外语所具有的商业价值日益凸现，外语能力成了中国近代化事业急需的核心能力之一。

戊戌维新之后，中国风气大开，教会学校迅速走向正规化、系统化。教会中等教育进入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教会学校既渐受社会人士的欢迎，而设备也日渐完美。虽经庚子之役，中间不免暂受影响，然而经此打击之后，教会教育事业反更发达。这时期里，上海麦伦书院(1898)，汉口博学中学(1899)，天津新学书院(1902)，奉天文会中学(1902)，太谷铭贤中学(1907)等，皆先后设立。就政策而讲，大概美国差会是注重中等与高等教育，英国差会是注重中等教育。民国以降，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对教会学校实行统制，教会学校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 1914 年，国内共有基督教中学 184 所，学生 12699 人。到了 1915 年，学校数目增至 216 所，学生 13369 人。

这一时期里的教会教育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国人对于西方文化表现出非常羡慕，尽力接受的倾向。教会中学遂因时代的需求，对于英文、科学等各种学科，逐渐注重，同时对于教会中学校旨在营造全盘英语化氛围的所有的学生课外活动，也相继提倡。第二，各种类型的具有中等程度的教会学校如实业学校、聋哑学校、盲童学校和师范学校等，相继成立，开展各种类型的教育。第三，各教会学校多提倡工读制。据 1910 年中国

① 关于教会学校外语教学的争论，详见张美平：《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2—262 页。

教会年鉴所载，在男校中有百分之四十学生是工读的，在女校中有百分之五十学生是工读的，这样便可免除全部或一部分的学膳费。这一举措便于吸引更多的家境贫寒的教外子弟入学，进而扩大教会学校的影响。第四，便是对于基督教教育所发生的批评。虽然此时教会中等教育正处于极盛时代，但教内外人士，已有许多的疵议了。[①] 例如，齐鲁大学的李天禄就把当时的批评中的"比较合乎情理者"归结为5点：(1) 过于洋化，一切设施多属舶来性质，不顾国人之习尚；(2) 偏重西学，轻视国学；(3) 思想因宗教关系，受不当之束缚；(4) 因国际关系，钳制爱国或正义的表示；(5) 名为基督精神办的教育而实未能表现基督精神增多。[②]

民国十年(1921)以后，教会中学校乃渐入改革的时期，是为教会中等教育的第四个时期。教会中学校的数目与学生的数目，皆极发达。此后相继发生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会中学的影响极大，而此时教会学校内部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有许多学校因受内外环境的影响，乃相继停办。截至目前，所开办的教会中学，仅有一百七十二所。这些中学都在改革之中，以便适应新的环境。按毕范宇(Frank Wilson Price)的分类，这些学校可分为下列六种：(1) 高初两级的中学，所有科目皆系普通的；(2) 高初两级中学，设有商科与师范科的；(3) 中学校附设于大学的；(4) "英华式"的中学，其英文程度是很深的；(5) 职业中学，如师范、与农业等，此类学校为数很少；(6) 初级中学并附设小学的。[③]

1921年，英美各教会联合派遣教育调查团来华调查基督教教育。该团认为"中学是教育系统里的中坚。在全体教育组织之中，中学是最稳固最能自立的一部分，而入基督教专门学校的多数优良学生，也皆由中学里产出的"。该团的建议是：今后基督教中学应注重质的方面，应研究各项教育问题，应多聘用中国人为重要职员，应增加职业科目，应通力合作。换句话说，今后之基督教中等教育，应当成为彻底的中国化，更有效的教育化，更切实的基督化。[④] 而在1922年发生非基督教运动之后，民国政府开始加强对教会中学的管理，教会中学开始逐步向公立学校靠拢，其课程设置与公立学校趋同。是年，北京政府颁布"新学制"[⑤]，对教会中学影响很大，各校纷纷依制

① [美]毕范宇：《基督教中等教育的沿革》，《教育季刊》第五卷第四期，1929年12月。
② 李天禄：《基督教教育之我见》，《教育季刊》1926年第3期。
③ [美]毕范宇：《基督教中等教育的沿革》，《教育季刊》第五卷第四期，1929年12月。
④ [美]毕范宇：《基督教中等教育的沿革》，《教育季刊》第五卷第四期，1929年12月。
⑤ "新学制"亦称"壬戌学制"或"六三三四"学制。

由四年一贯制改为三三两级中学，同时实行学分制，英语课学分虽略高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规定，但也相差不大。紧接着发生了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中学开始纷纷向政府立案。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教会中学在保留其外语和西学课程的特色之外，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化的步伐，其课程呈现出商业化、世俗化的趋势。

从 1937 年抗战爆发到 1951 年是教会中学的停滞、混乱和消亡时期。由于战乱和日军暴行，各教会中学不愿接受日伪统治，纷纷停办或迁校。到了 1938 年，各省停办的教会中学已达 37 所，迁往他处的临时校址有 96 所，其中大部分迁至上海的租界与同一差会兴办的其他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迁校的中学仍坚持英语教学，如北京崇德中学。1939 年，学校由于日寇强令改英语为日语，停止宗教宣传而被迫停办。1941 年 12 月，日军占领租界，英美籍教师被逮捕，各学校再次迁校，蒙受重大损失。少数仍在敌后坚持办学的教会中学，被迫取消英语课，改为日语课。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徙到原址，恢复正常教学，但是其英语教学水平再也没有达到抗战之前的水准了。①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教会中学实施撤并，英美籍教师纷纷撤离大陆。1951 年，同教会大学的命运如出一辙，教会中学在中国大陆最终消亡。

## 二、教会中学的师生

### （一）师资构成及其他

"教职员为学校命脉之所系，有关学校之兴衰存亡。"②教师是组织开展外语教学活动的主体，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语师资不足和招选学生的困难是早期教会学校的突出问题。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师资和学生的选拔有较大改观，这在沿海通商城市表现尤为明显。进入民国时期，情况更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 1928 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前的一段时期，政府基本采取放任的态度，教会学校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由于同母国差会有着密切关系，教会中学在资金、人力和物力上得到了足够的支持，加上其极具特色的课程设置以及严格的教学管理，其教学质量普遍优于国立中学及其他私立中学。

民国时期教会中学的外语师资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像早期教会学校那样，几乎全是西方传教士，而是转变为多元的师资构成。其来源主要

---

① 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1 页。

② 袁伯樵：《基督教学校与教师》，《教育季刊》第三卷第二期，1937 年

有三：一是来自英美等国家的学士以上学历的教师及大学毕业生。二是部分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三是毕业于国内外大学的中国籍教师及大学毕业生。例如，广东培正中学"所有教员除国文教师外，绝大部分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或是美南浸信会送来的'客座教员'"。[①] 胡小君(2002)对民国时期部分有代表性的教会中学的外语师资做了统计分析，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3—1　　部分教会中学英语师资情况**

| 校　名 | 英语教员数 | 其中外籍教员数 | 获外国学士学位以上者 | 获教会大学学士学位者 |
|---|---|---|---|---|
| 北平贝满女中 | 9 | 3 | 3 | 6 |
| 汉口博学中学 | 6 | 3 | 3 | 2 |
| 苏州宴成中学 | 5 | 2 | 2 | 3 |
| 东吴一中 | 7 | 1 | 0 | 6 |
| 绍兴越光中学 | 8 | 4 | 4 | 2 |
| 嘉兴秀洲中学 | 9 | 3 | 3 | 5 |
| 太谷铭贤学校 | 5 | 5 | 5 | 0 |
| 合　计 | 49 | 21 | 20 | 24 |

资料来源：胡小君：《浅论民国时期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3 期。

从表一得知，教会中学的师资力量是十分强的。虽然中国籍教师占主导地位，但是外籍教师的比重仍然很大，占 42.9%，太谷铭贤学校竟占 100%。再从学历上看，获得学士学位以上者，高达 89.8%，知识水平相当高，特别是教会大学附中，大学名教师常兼中学英语课，如被许国璋称为"近代中国英语教学界之大师"的吴献书兼任东吴大学附中的英文，[②]圣约翰大学教授黄嘉德兼任圣约翰附属高中的英语语法，[③]等等。此外，各差会所属中学的国人英语教师大多出自本差会所办的教会大学，如东吴一中的中国籍教师全是东吴大学文学士，南浸礼会办的宴成中学则多出自上海的沪江大学等。无论是外籍教师还是教会大学毕业生，其英语水平特别是口语、听力、

① 冼子恩：《六十年间私立广州培正中学的变迁》，载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 45 辑(内部发行)》，1985 年，第 279 页。

② 参见许国璋：《饮水知源 敢忘所自》，载《许国璋文集》2，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3—14 页。

③ 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9 页。

英美文学鉴赏等大都胜于同时期公立中学的英文教师，这样的师资构成明显有别于国立及其他私立中学。这是教会中学英语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值得一提的是，由雅礼会(Yale-China Association)创办的雅礼中学曾推行"学士教员计划"，即每年由雅礼会选派几名耶鲁大学新近毕业的学士志愿者来雅礼中学从事一到两年的教学。这些学士教员一般被安排教授英文或历史等用全英文授课的课程以及课外活动。他们"在耶鲁大学读书时都是班上出色的领袖人物，具有理想与冲动……很容易与中学及大学年轻学生感情融洽，成为好友。对学生的学业、知识、思维与行为等影响甚大"。数十年来，先后共有 70 多位学士学员来到雅礼任教，这种颇具创新性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雅礼中学师资短缺的问题。①

总体而言，在课业方面，在众多的公立和私立中学中，教会中学的教学质量堪属上乘。例如，1934 年河北省举行中学生会考，潞河中学②名列榜首。同年北平会考，育英中学(美国公理会办)获高中团体冠军、初高中个人冠军，贝满女中名列第 5，汇文中学名列第 8。③ 学生的外语水平已相当高。如复旦大学教授孙骊回忆说，他高三用的是经过改写的 *Ivanhoe*，大约相当于 *Michael West* 系列读物中 5000—7000 英语词汇水平的那一档。④

教会中学之所以办学质量出色，是因为其拥有"品端而学硕"的教师团队。"一个为大家所承认的基督教教育目标，就是培植学生有耶稣的牺牲、服务、平等、博爱的精神。可是这种精神的造成，绝不依赖于课本或规则，乃是要从教职员以身作则，使学生的生活与教员的能感应默化来做起。"⑤因此，无论是外籍教师，还是本土教师都非常敬业。如东吴大学附中的吴献书老师，"每堂有作业，或令学生互改，或携归自改，翌日发还。作文，两周一次，隔周批毕。改的不多而批语极详，学子尤为得益"。⑥ 以下是曾就

① 赵厚勰：《雅礼中学的师资及其特点分析(1906—1951)》，载尹文娟：《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0—241 页。

② 潞河中学始建于 1867 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始称潞河男塾，后改称潞河书院，1901 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2 年更名为华北协和大学。1917 年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后组成燕京大学。其中斋部仍留在通州原址，为私立潞河中学。1951 年由人民政府接管。

③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1 页。

④ 孙骊：《回忆我学习英语的过程》，载束定芳：《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5 页。孙骊所说的这一档的词汇水平，相当于现在的大学英语六级水平，英语专业的四级水平。可见当时教会中学生的语言功底相当扎实。

⑤ 袁伯樵：《基督教学校与教师》，《教育季刊》第三卷第二期，1937 年。

⑥ 许国璋：《许国璋文集》2，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3 页。

读于教会中学的学界前辈的回忆，我们从中对教会中学的办学质量可以了解个大概。

◆ 许国璋：《饮水知源 敢忘所自》

余于1930年暑假考入东吴大学附中初三年级，有幸在班上随吴献书先生学英语。……吴师，近代中国英语教学界之大师，毕生著译甚勤，教我们时，已近花甲，每周上课10多节，无倦容。每堂有作业，或令学生互改，或携归自改，翌日发还。作文，两周一次，隔周批毕。改的不多而批语极详，学子尤为得益。先生积长期经验，随时指出学生易错常错于未错之际，学得轻松而愉快，学一年已知拼错自加改正，到高二级，已知句子之通与不通。吴师教英语，重阅读，尤重朗读背诵。盖朗读好坏，可知理解之深浅，朗读而能背诵，即是活用之根本。今之教英语，今日教一句，明日即希望学生活用，夫学生接触语言尚不过一言半语，难怪造出之句形似英文而实为中文也。吴师视急于求成为教学之愚妄。犹记在初三级时，师教分词短语与关系从句，前后不过30分钟，各举三、四例，曰："今日教此二种句法，不必急于用它，以后多看多读，自然就会。"自兹，多看多读遂成我的座右铭。……吴师讲课从不细析语法，亦不多讲时代背景。读文章，懂其能懂者，会之于心，略其东方学生一时不及懂者，这是学英语最快最可靠的途径。当年受吴师之教育，何止百人，毕业后入大学，看英语原著绝少困难，此可谓教学者之上策矣。①

◆ 孙骊：《回忆我学习英语的过程》

首先要谈的还是他（指白约翰，引者注）对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关心。这"德"与宗教无关，他从未在校内讲过道，记得唯一的一次宗教性活动是中学毕业时他主持的一次毕业礼拜，请了一位姓檀的中国牧师作了一次多少与宗教有关的演讲。……他很注意学生的身体锻炼，每天领着全校学生在很窄小的操场上做操，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除了课本中的练习与难得的几篇作文外，他时不时要求学生在10分钟内写出10句，每句至少10个词，又包含某一语法现象的句子，测验与小考时也有这类题。我个人认为这对帮助养成熟练表达是有益的，也容不得你去翻译脑中的汉语句子。上课时他也不是一直站在讲台上讲，而是常在非常有限的通道上游动，时不时手往哪

① 《许国璋文集》2，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14页。

位同学一指,要求回答问题又或是给一个词造句。因此,上他的课,思维总处在高度紧张与兴奋之中,不太敢开小差。这些办法至少在我身上是起了好作用的。……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白约翰先生并不把英语课限制在课堂内,而是将其延伸至课外。他回来后不久,就组织了一次英语表演活动,找了10多名学生参加。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反法西斯战争,由他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领导人物一些著名演讲或文章的片段,加了串联词使它们组成一个整体,由学生分别背诵表演,听的对象是当时在沪的相关中外人士,主要是些洋人……让我背的一段是罗斯福关于"四大自由"演讲中的一节,从自己读背到集体排练花了不少课外时间,但现在看来是非常值得的。①

(二) 学生来源及其管理

作为教学客体的参加外语学习的学生同样有别于当时国立中学及其他私立中学的学生。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 生源素质有别于国立和私立中学。教会中学的生源一般都从教会小学中选拔。"1918—1926年,仅基督教会就有学校6000所,而教会中学只有200余所。"②因此,教会中学的生源选择余地非常大。由于教会中学的教学质量有目共睹,国立和其他私立小学的优秀毕业生也纷纷前来报读。(2) 学习目的性较后两者强。教会学生中有很多人想要出国深造或在沿海通商城市谋求出路,而以外语见长的教会学校为他们实现目标提供了可能。(3) 成分构成也不同。教会中学的学生一般以教徒、商人、政坛及社会名流的子弟为主,其中教会学校升入者占多数。根据《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全国教会中学现有的学生中,由教会学校升来的人数占34—84%,总平均数为60%"。③ 虽然这一数据是动态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由于发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国民政府加强对教会学校的统制之后,这一比例有可能下降,但总体而言,来自教会学校的生源超过其他公立或私立学校的学生的现状是不会改变的。教会学校的学生的视野及经济条件通常优于国立和其他私立学校的子弟。除此之外,学生的学习目的性相当明确,学习很自觉。这种自觉性的养成,除了教会中学的严格管理外,学生对外语的热爱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如果仅仅依赖校方严格的管理,而没有学生的

① 束定芳:《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5页。

②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③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98页。

自觉实践，是很难学好外语的，因为“真正掌握外语还是要靠课堂以外的个人外语实践活动”。[①] 英国的一个大学研究团队发现，一些学习乐器的孩子非常出色，而其他的孩子则表现平平。其中的奥秘是这些孩子练习的时间多。[②] 同样，学习外语和学习乐器一样，需要大量的交际实践。而支持实践自觉进行的，是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并非全是教师。杰里米·哈默(Jeremy Harmer，2000)说，教师并非是最终对学生的动机负责的人。他们仅仅是通过言语和行为起鼓励作用。真正的动机来源于学生自身，他们必须真正愿意学习。学习是教师和学生的合伙行为。好学生并不仅仅等着受教(Good students don't just wait to be taught)。[③] 杨宪益[④]是众所周知的翻译大师，其英语水平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完全得益于他的自觉学习。雷音在《杨宪益的中学时代》中引用了杨宪益《自传》里一段话。他说：

> 我从中学的英文课本中已经学了一些拉斯基、哥尔德司密斯、艾蒂森、斯威夫特和其他作家的散文，也学了一些瓦尔特·斯各特、华尔华兹、戈雷、雪莱、拜伦和济慈的诗。但是大部分西方文学的阅读却是在课外时间完成的。
>
> 开始我感兴趣的是儿童和青少年书籍，像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集，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刘易斯·卡洛儿的《爱丽丝奇境漫游记》、《镜中世界》、巴里的《彼得·潘》、斯蒂文森的《金银岛》、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等等。我发现拉易得·哈葛德的冒险小说很吸引人。后来我读了许多大仲马的浪漫主义的历史小说《达特安系列》，从《三个火枪手》、《天面人》一直到《图波斯的儿子》。上高中前我已经能很快地阅读英文书了。我读了大量英文原著和英译的西方文学作品。那时也有不少欧美文学翻译成了中文。通常我每天读完一至两本书。我读的书多得难以列成一个完整的书单，几乎读完了所有的著名欧美小说和诗集。[⑤]

---

① 孙骊：《回忆我学习英语的过程》，载束定芳：《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8 页。

② Jeremy Harmer. *How to Teach English*.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p. 7.

③ Jeremy Harmer. *How to Teach English*.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pp. 8—9.

④ 杨宪益(1914—2009)，安徽泗县人，翻译家。1927 年进入天津新学书院学习，1934 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40 年回国。他与英国籍妻子戴乃迭(Gladys Yang)合作将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大量现当代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在西方汉学界有广泛的影响。

⑤ 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与学习》，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7 页。

作为杰里米·哈默所说的"好学生"(good student),杨宪益在课外开展的海量阅读实践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凭兴趣的学习。他的学习达到了克拉申(1981a)所谓的"习得(acquisition)"境界,即借助自发地和自然地运用二语,实现潜意识地内化所学的二语知识。① 他学习英语的动机不再是Robert Gardner 和 Wallace Lambert(1972)所说的具有功利目的的工具性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而是属于为了融进目的语文化而学习的综合性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② 他的这种"不带功利性质的快乐阅读"(undirected pleasure reading)③使他达到了别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在中学阶段就解决了阅读问题,突破了外语学习的瓶颈。杨宪益的外语学习经历对于当今身处浮躁社会、不愿下功夫阅读英文经典的学生来说,不啻是一个警示。

## 三、民国教会中学的外语教学概览

### (一) 课程设置

中学是人生成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盖中学学生皆为一般青年男女,其一生重大之问题皆于斯时决定之;如职业之选择,个人习惯及处世态度之养成,以及其一生之师友、学校、教堂皆于斯时选定"。④ 教会学校对此无不心知肚明,因为只有把握好学生的这一重要时期,才能培养出它们所需要的"才全德备,献身事主"的人才,"上达朝廷,下达朝野"⑤,从而影响和领导中国发展的潮流与方向,也就有可能控制中国的前景与未来。因此,教会中学的课程设置自然要与培养目标结合起来。

教会中学是中国基督教教育体制中发育较为完备的一部分。其完备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上。宗教、儒学经典和西学曾经是教会学校的三大支柱课程。教会学校很重视宗教教育,"圣经为各种课程的根基"。⑥ 儒学是

---

① Rod Elli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p. 113.

② Jeremy Harmer. *How to Teach English*.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p. 8.

③ Patsy M. Lightbown £ Nina Spada. *How Languages Are Learned*.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p. 39.

④ 《基督教中学之特殊职务与目的》,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8 页。

⑤ 周之德:《振兴学校》,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9 页。

⑥ 《基督教教育之目的与精神》,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 页。

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包括外语在内的西学（指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应用科学等内容）课程更是教会学校的命根子，这是吸引莘莘学子报读的法宝。限于篇幅，仅对其中的外语课程的设置进行讨论。

早期教会学校“不过于宣讲圣经之外，教以读、写知识，及算术、字母而已”。后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英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商业、政治生活、高等教育机关、社会生活，无处不用英语。职此之故，基督教学校因有英语科之设，应需求也。现在学校之课程亦均有英语。教会学校中且有多数教员，英语之纯熟如其国语，而该学校即以英语闻于时”。[①] 而且，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殖民地色彩极为浓厚，外国资本家协同买办把持了银行、铁路、海关、邮政等重要部门。这些部门特别要求懂英语，“工资特别高，并且是‘金饭碗’，一旦踏进门，只要不犯大错误，一般是长期聘用的，而且退休以后还有‘养老金’。这三种行当都公开招聘，而考试的重点科目是英语”。[②] 因此，教会学校过硬的教学质量和良好的就业前景，是想谋取“金饭碗”的广大学子的向往之地。冰心是因为其父说“教会学校的教学是认真的，英文的口语也纯正”[③]，而于 1914 年秋天进入北京贝满中学。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前，教会学校是游移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办学实体。其师资聘用、学生招选与管理、课程设置等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体系，因而对于中国学制的遵守也就无从谈起。课程设置无疑是教会系统的那一套。以下是立案前的杭州蕙兰中学堂[④]正科[⑤]每周的课程表。

---

①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6 页。

② 朱雯：《思往事，惜流芳》，载李良佑等：《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7—108 页。

③ 冰心：《冰心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版，第 392 页。

④ 蕙兰中学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传教士甘惠德（W. S. Sweet）在杭州石牌楼淳佑桥东堍（今上城区建国中路 70 号）购地建校，建蕙兰学堂。蕙兰取“蕙质兰心”和“蕙洁兰芳”之意。宣统三年（1911）改称蕙兰中学堂。学校创建伊始，学制为五年，后改为四年。民国十二年（1923），改学制为初、高中各 3 年。1937 年日军侵华，学校被迫停办。1938 年学校迁至上海，加入华东区基督教 15 所学校合办联合中学。1945 年复校招生。蕙兰的毕业生人才济济，其中最著名的有教育家陈鹤琴、作家郁达夫和陆蠡、翻译家冯亦代、莎士比亚专家裘克安等。课程除国文外，仿美国中等学校设置课程。毕业生可保送美国滕纳逊大学等校学习。1951 年学校同前浙大附中合并成立杭州市第二中学。

⑤ 宣统三年（1911）后，重订学堂章程，分预科和正科。预科二年，相当于高等小学程度。正科四年，是中学堂程度。

表 3—2　　杭州蕙兰中学堂正科课程表

| 时段 | | 国文 | 英文 | 算学 | 科学 | 历史 | 圣经 |
|---|---|---|---|---|---|---|---|
| 第一年 | 上学期 | 左传、读文、作文 6 | 帝国英文读本一集 3 会话英文法一集 2 | 代数一集 3 | 生理学 5 | 中国新历史 2 | 基督本纪 3 |
| | 下学期 | 左传、读文、作文 6 | 帝国英文读本一集 3 会话英文法一集 2 | 代数二集 3 | 地文学 5 | 中国新历史 2 | 基督本纪 3 |
| 第二年 | 上学期 | 左传、读文、作文 6 | 格致读本 3 会话英文法二集 2 | 代数三集 3 | 植物学 5 | 中国新历史 2 | 耶稣比喻 3 |
| | 下学期 | 左传、读文、作文 6 | 五十轶事读本 3 会话英文法二集 2 | 平面几何 3 | 动物学 5 | 中国新历史 2 | 耶稣比喻 3 |
| 第三年 | 上学期 | 左传、读文、作文 6 | 小历史 3 简要英文法 2 | 平面几何 3 | 物理 5 | 日本史 2 | 天国振兴记 3 |
| | 下学期 | 左传、读文、作文 6 | 《迈迩通史》选读 4 简要英文法 1 | 立体几何 5 | 物理 5 | 《迈迩通史》4 | 天国振兴记 3 |
| 第四年 | 上学期 | 左传、读文、作文 6 | 《迈迩通史》选读 4 英文法 1 | 理代数 3 | 化学 5 | 《迈迩通史》4 | 备立天国记 3 |
| | 下学期 | 左传、读文、作文 6 | 《迈迩通史》选读 4 英文法 1 | 代数四集 理几何 5 | 化学 5 | 《迈迩通史》4 | 备立天国记 3 |

（表头斜线栏：课程、学时及内容／时段）

资料来源：杭州市教育委员会编：《杭州教育志(一〇二八——一九四九)》，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1—112 页。

该课程典型反映了教会学校的课程特点：第一，圣经课程不仅是必修课，而且占的比重大，占总学时数的 12.25%。如果加上平时的晨祷、晚祷等其他宗教活动，占用学生的时间要多得多。这是由教会学校的性质决定的。第二，重视科学和外语的传统不变。自从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近代远东第一所面向华人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以来，科学和外语始终是教会学校的核心课程。科学占总学时数(每周 24.5 小时)的 20.41%，如果把

算学加进去，则高达 34.69%。英文占 20.41%。可以说，外语和科学是教会学校生存的命根。第三，重视中国传统经典及语言文字。众所周知，基督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为普通中国民众及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必须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而且，教会学校主要的使命是培养传教人才(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前更是如此)，其培养的牧师如果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基督教是很难在中国扎根，实现其传播使命的。然而，与当时其他教会学堂不同的是，杭州蕙兰中学堂将中国传统经典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占总课时的 24.49%)，这说明了蕙兰中学堂较其他教会学校对中国社会有着更为成熟的了解。

教会学校为了能与当时中国的国立和其他私立学校竞争生源，“强调适应中国社会对英语及西方科技知识的需求，调整了教育方针，促成了教会英语普及化”。① 为了强化英语教学，在课程设置中加大课时数和课程门数。例如，岭南大学附中 1932—1933 学年初中部的英文课程分英文文法和英文读本两门，平均周课时数分别为 5 课时和 3.3 课时，占总课时数的 21.2%，超过了国文(占 15.3%)和数学(占 12.7%)。而同期国立初中的英文每周为 5 课时。

**表 3—3　　岭大附中 1932—1933 学年的初中课程表**

| 时段＼课程 | | 国文 | 英文文法 | 英文读本 | 数学 | 理科 | 地理 | 历史 | 公民 | 艺术 | 党义 | 童子军训练 | 共计学点 |
|---|---|---|---|---|---|---|---|---|---|---|---|---|---|
| 第一年级 | 第一学期 | 6 | 5 | 3 | 5 | 3 | 3 | 3 | 1 | 2 | 2 | 6 | 39 |
| | 第二学期 | 6 | 5 | 3 | 5 | 3 | 3 | 3 | 1 | 2 | 2 | 6 | 39 |
| 第二年级 | 第一学期 | 6 | 5 | 3 | 5 | 3 | 3 | 3 | 1 | 4 | 2 | 6 | 41 |
| | 第二学期 | 6 | 5 | 3 | 5 | 3 | 3 | 3 | 1 | 4 | 2 | 6 | 41 |

① 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8 页。

续 表

| 时段 | | 国文 | 英文文法 | 英文读本 | 数学 | 理科 | 地理 | 历史 | 公民 | 艺术 | 党义 | 童子军训练 | 共计学点 |
|---|---|---|---|---|---|---|---|---|---|---|---|---|---|
| 第三年级 | 第一学期 | 6 | 5 | 4 | 5 | | 3 | 3 | 1 | 2 | 2 | 6 | 38 |
| | 第二学期 | 6 | 5 | 4 | 5 | | 3 | 3 | 1 | 2 | 2 | 6 | 38 |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度章程第四十五卷，私立岭南大学一览，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教会中学重视英语的另一个原因，正如雅礼中学招生简章中所说，“特别注意将英语作为现代教育的注意媒介”，其所培养的未来领导人必须掌握好西方语言，才能学习和利用西方文化。① 再者，英语取得超越汉语、科学乃至宗教课程的突出地位，表明学校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办学者的理念，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中国社会的一般环境和教会学生的自主选择。② 民国时期的“商业、政治生活、高等教育机关、社会生活，无处不用英语”。职此之故，教会学校突出英语教学，“应需求也”。③

最后，教会中学之所以突出英语的地位，还在于如下理由：一是适应中国社会对英语的需求；二是认为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不完善，其精确性与清晰性都无法与英语相比，作为一种语言媒介，汉语不能胜任科学教育。因此，英语的地位必须得到强化，英语教育优于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的中文教育，成为教会学校师生的共识。事实上，在晚清、民国前期的不少教会中学和大学及学院的预科，英语并不仅仅是一门外语，而且是一种主要的教学语言，不仅自然科学课程要用英语教授，而且哲学、宗教乃至中国历史、公民等课程都用英语教授，相形之下汉语反而成为了一种“外语”。

与国立中学仅开设一门“英文”的做法不同的是，当时教会中学的英语课，大都有“英文文法”和“英文读本”之类的课程，有的还设置“英文会话”等。基督教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创办的北京汇文

① 赵厚勰：《雅礼中学的师资及其特点分析（1906—1951）》，载尹文娟：《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9 页。

② 胡卫清：《晚清基督教中等学校课程研究》，载尹文娟：《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7 页。

③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6 页。

中学的英文课程分别为“英文文法”、“英文名著”、“英文会话”三门。可见，教会中学非常重视语法和阅读，因为这些课程是学会英语的必备条件，这是符合语言学习规律的。

南京政府成立后，教会中学被迫向政府立案，逐步实现与公立学校接轨，被纳入到国民政府的教育体系中，成为其重要补充。教会中学的课程设置上基本都按照部颁标准，宗教课程取消，英文课时数减少，课时数和国文、数学相等，与国立中学基本没有差别。例如，杭州弘道女子中学(1932年)高中部的英文课为32学分(含选修课“应用英文”、“英文选阅”6学分)，浙江省立高级中学(1931年起)的英文课为33学分(含选修课“英文选读”、“英文会话”5学分)。[1] 双方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显示双方各自特色的一些科目的程度上。

（二）教学方法

民国时期盛行的主流教学法是语法翻译法和直接法。教学法的选择全由学校根据各自的现实状况而定。作为泊来品的主流教学法——直接法，由于受到文幼章(J. G. Endicott)、张士一、陆殿扬等中外教育家的推动，曾风靡一时。教会学校与上海等沿海大中城市条件好的国立或私立中学对直接法的推行更是不遗余力。而内地或偏远地方的中学注重文学阅读、翻译和语法分析，即人们所说的语法翻译法。从实际教学效果来讲，两种教学法各有短长。究竟采取哪种方法，随师资、教学媒介等教学条件而定。

直接法是用表演(dramatization)、实物(objects)及图画(pictures)或是意义上的联想(association of ideas)等形式教授外国语的方法，是教会中学普遍采用的主要教学法之一。例如，雅礼中学的外语教师就用直接法上课。骆吉斯(B. Rogers)虽然很年轻，“但在教学上很有自己的一套。他用一盒火柴来做工具，进行各种各样的教学”，颇能引起学生的兴趣。[2]

实际上，教会中学对教学方法的选择，也往往是兼收并蓄，只要被证明是行之有效，不管是当时流行的直接法，还是被认为是传统的语法翻译法，都受到师生的青睐。

当时有不少著名的教会中学尤其推崇语法翻译法。曾培养出许国璋等英才的东吴大学附中，外语教学上走的仍然是传统的路子。吴献书老

---

① 杭州市教委：《杭州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339页。

② 赵厚勰：《雅礼中学的师资及其特点分析(1906—1951)》，载尹文娟：《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师“重阅读，尤重朗读背诵”。[①] 这是语法翻译法的惯常做法。雅礼中学的萧约(B. Schoyer)老师为了增进学生的阅读能力，要求学生每周阅读50—100页英文小说。他以提问的方式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来判断其阅读能力。[②] 阅读是语法翻译法的核心内容，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特别强调之必要，因为“让学生阅读英语文本是教师的一项重要的工作”。[③] 外语教育家董亚芬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中央电视台十套(科教频道)播出的‘中学生英语竞赛’节目，主持人要求参赛者即席回答各种问题，有一定难度。一位外籍评委在点评时说：‘Congratulations for your beautiful English. I was amazed at your broad horizon. Obviously you have all read widely.’短短几句话给我们的启示竟与国内专家们的观点如此惊人地相似，即在实质性口语能力的背后必然有大量阅读的支撑。[④]

而汇文中学的英语教学特点是口语、作文、文法、翻译并重，并要求中西两种语言比照使用。1948届校友陈国新回忆，教英语语法的杨建章老师对学生要求格外严格，他要求学生将《红楼梦》中的片段翻译成英文，并让学生翻译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⑤] 应该说，口语是直接法所强调的，而翻译、文法等则是语法翻译所重视的。因此，民国时期很多学校采用的方法很难说是直接法还是翻译法，称之为折中法似更为妥当。

因此，教会中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尊重学生个性的西洋先进的教育理念，也有值得光大、传承的中国语言教学传统。以下的口述史料摘自《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一书，从中可以直观地了解一些当时的外语教学情况。

◆ 许国璋：《回忆学生时代》

十二岁进嘉兴秀州中学，时1927年。此校始为美国教会所办，创

---

① 许国璋：《许国璋文集》2，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页。

② 陈正仁：《回忆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载尹文娟：《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

③ Jeremy Harmer. *How to Teach English*.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p. 68.

④ 董亚芬：《我国英语教学应始终以读写为本》，载束定芳：《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阅读除了对听、说、写、译的直接促进作用外，它的另一个特性就是能够增强学生的发展潜力。例如，教会中学高质量的教育和早年大量阅读原文或英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积累(这得益于当时社会的开放和他家庭经济的富裕)使杨宪益在19岁(中学毕业)以前就已具备很高的英文水平和扎实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这种“两级兼备”的知识结构使他远超同辈和后辈，为他成为翻译大家打下了基础。

⑤ 王丽：《一所中学远去的背影》，《中国青年报》，2008年3月26日。

于清末，是年收回自办，请老校友一人任校长。他毕业于之江大学，到美国读过书，得硕士学位，颇受新文化影响。……虽是初中，已设有选课，我在初二初三选了应用文、心理学、人生哲学、宗教概论等。不脱课，不缺考，总能及格。英文，一周六节，只有朗读，听写，拼写，不讲课文，不讲语法，更无语法分析。读物，西方民间故事，一百多页之书，一学期读五六十页。平时好玩，叫背，径说背不出，便坐下，师也不甚责。不久寒假，老师说，春季开学罚你连背十页，佯应，心想到时再说。寒假在家，睡在母亲房里，一日早晨，不敢惊动，出书试读，第一页完全不懂，看到页底，原来还有注释，再读，得其半，至第二页，始得大意。低声读下去，渐足以发。如是五日，不觉已读二十多页。倦极而睡，正熟，母亲推醒，以为我梦魇，不知我在梦中背书。开学，老师问：十页之约记否？我起立大声背书，一口气即是五页，师说够了。读书自觉进行，总有收获，前提是老师不逼不催。①

◆ 陆佩弦：《外语教学往事回忆》

说起"抢第一名"，这可说是这个学校的治校"妙法"，从低年级直到毕业班，大考小考不算，每星期必有某一种考试。这考试爽爽气气就叫 competition，如 competition in reading，dictation，geography 等等。既然叫竞赛，那就必须评出名次。回想起来，我当时可以说是为了抢第一名而读书的。

这种教会学校除了利用十多岁孩子的好胜心来促进教学之外，在教学方法上并无独到之处，不外乎一个字：背。记得在六级五班时，上下午第一堂课一开始总有半个小时的背书。老师高踞讲台坐镇，学生都在各自座位上大声读，全班群鸦乱鸣，30 分钟一到，教师手执一个会敲击出声的东西，一声响，大家立刻肃然无声，合上书本，静等老师叫名字，站起来背书，其他学生一律听着，换一个学生如不能接下去背，就要罚抄书五十行。这种中世纪方法虽然陈旧，但在锻炼强记功夫方面却有一定作用。

因为学是以背为主，所以速度是不快的。举个例子来讲，在头班二班（即高三高二时）两学年中，英文读本只读了 Macaulay 的 *Life of Lord Clive*。此篇只六七十页，却读了四个学期，可谓慢矣。但从另一

---

① 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9 页。

方面说，我是读得简直滚瓜烂熟，可以把它从头至尾朗朗然抑扬顿挫地背出来。现在想来，这种土法还是有效。①

（三）教材的编制和使用

教材（即教科书）由三个基本要素，即信息、符号、媒介构成，是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和思想的材料，如书籍、讲义、图片、讲授提纲、电子媒介等。民初，由于教育部没有对教材事宜做出专门规定，市面上的教材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难以满足教学之需。因此，教会中学注重提倡和鼓励教师编写教材。教会中学的师资阵容强大，不仅拥有敬业博学的外籍教师，还有很多是留学国外的大学教师来兼任中学课程，不仅业务精湛，还自编教材，从事翻译、文学创作等。如在东吴大学的吴献书兼任东吴附中高三英文教学，自编《英国文学入门》一书。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 开，约 200 页，布面精本，边页甚宽，生词、发音即注在同页左右，词义列在同页下方”。此外，吴献书曾译柏拉图的《理想国》，许国璋称之为“译意精到，远甚今日之白话译本，诚通儒也”。②

教会中学自编教材，一方面是部颁教材极为缺乏，另一方面是当时各门学科的术语还不统一。冰心说当时使用的课本，都是教会学校系统自己编的，大半是从英文课本翻译过来的。历史教科书，是从《资治通鉴》摘编的“鉴史辑要”。只有英文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也是从 A Boy A Peach 开始。③

教材编写方面，雅礼中学贡献显著。学校开办之初，校长盖葆耐（Brownell Gage）即按照直接法拟定了中学各年级英文教学进度标准，并编配了教材。他于 1915 年以直接法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实用英语教科书》和《中国学校英语教学法》，“一时士林轰动”，后来以之为蓝本、由外语教育家周越然编写的《英语模范读本》，“全国风行采用”。④

在教材的使用方面，一般来说，各教会中学在向国民政府立案之前，英文课程之外的教材也大多使用原版教材。广东培正中学 1916 年创办时，全套照搬美国中学的办法，从旧制中学一年级起，所有课程除国文外，一律

---

① 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8 页。

② 许国璋：《许国璋文集》2，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4 页。

③ 冰心：《冰心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版，第 394 页。

④ 赵厚勰：《雅礼中学的师资及其特点分析（1906—1951）》，载尹文娟：《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96 页。

用原版英文课本，连公民课本亦用美国课本，用英语讲授。①

教会中学向政府立案之后，课程设置被要求与国立中学一致，教学语言也规定用中文。教育部规定，中学除外国语教本外，一律采用中文本教科书，不得用外国文书籍，中学教员一律用国语为教授用语。北京的慕贞女校除英语、宗教课用英语课本外，其他都采用国民党教育部规定的中文课本。宗教课本有《天路历程》，讲的是基督教《圣经》的故事。英语课本用美国出版的《英文津逮》课本。②

实际上，国民政府的规定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在圣方济中学（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英文课每周的教学时数总在十节以上，读本、会话、听写、翻译（只有中译英）、作文等课实际上都是英语课。据1944年升入圣方济的著名语言学家胡壮麟（2005）回忆，除国文、音乐、体育和公民外，英语、算术、化学、物理、代数、几何、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主课都用英文讲授。他高中时使用的英文课本主要为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Charles and Mary Lamb）合编的《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美国散文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Erving）的《见闻杂记》（*The Sketch Book*），语法书是为印度学生编写的《纳氏文法》（*Nesfield Grammar*）。③

从语言学习的实际成效来讲，使用英文教材是上佳选择，能使学生时时处于英语氛围中，增加语言的输入，学到真实地道的英文表达，扩大词汇量，从而解决外语学习的瓶颈问题。算术、化学、物理等课程用英文上，使用原版教材，除了学习这些课程的本身知识外，实际上也是在学英文。这种教学过程中，英语不再是学习对象，而是已经直接成为学生思考问题、表达思想的工具了。当然，使用原版教材，对中学生来讲，最大问题是词汇量太大，很多术语用中文理解起来尚感困难，遑论用英文理解了，因而挤占了学习其他功课的时间。从教材使用情况即可看出民国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不同凡响。以下是广州岭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初、高中教材的使用情况。

---

① 冼子恩：《六十年间私立广州培正中学的变迁》，载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45辑（内部发行），1985年，第279页。

② 马燕：《记慕贞学校》，载《文史资料选编》第24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223页。

③ 胡壮麟：《一个英语教师的独白》，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2005年版，第146页。

表 3—4　　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度岭大附中初中英文课本书目表

| 级别 | 科　目 | 书　　名 | 著　者 | 出版处 |
| --- | --- | --- | --- | --- |
| 初中三 | 英文文法 | *A Handbook Of English Grammar for Chinese Students* | C. A. Seidle | 岭南大学 |
| | 英文读本 | *The New Method Readers, Book IV* | Danial Difoe | LongmanGreen |
| 初中二 | 英文文法 | 新学制初中英文读本法合编(二) | 胡宪生 | 商务 |
| | 英文读本 | *The New Method Readers, Book II* | Danial Difoe | Longman Green |
| 初中一 | 英文文法 | 新学制初中英文读本法合编(一) | 胡宪生 | 商　务 |
| | 英文读本 | *The New Method Readers, Book I* | Michael West | Longman Green |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度章程第四十五卷，私立岭南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出版，私立岭南大学印行，第 267—269 页，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表 3—5　　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度岭大附中高中课本书目表

| 级别 | 科　目 | 书　　名 | 著　者 | 出版处 |
| --- | --- | --- | --- | --- |
| 高中三 | 英　文 | *Lambs Tales From Shakespeare* | Charles Lamb and M. | 商 务 |
| | 数　学 | *College Algebra* | S. Davidson | MacMillan |
| | | *Commercial Algebra, Book II* | G. Wentworth | Ginn |
| | 物理学 | *New Practical Physics* | Black&Davis | MacMillan |
| | | *Exercises In Elementary Physics* | W. W. Stiflev | 商 务 |
| | 西洋史 | *Modern History* | Hays&Moon | MacMillan |
| | 数学选科 | *Analytic Geometry* | C. E, Love | 商 务 |
| 高中二 | 英　文 | *Correct English (1st Course)* | W. M. Tanner | Ginn |
| | | *Short Stories Old And New* | Smith | Ginn |
| | 数　学 | *Plane And Solid Geometry* | G. Wentworth | Ginn |
| | 化　学 | *Practical Chemistry (revised)* | Blac&Conaut | MacMillan |
| | | *Laboratory Experiments In Practical Chemistry* | Blac&Conaut | MacMillan |
| | 西洋史 | *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 | Hays&Moon | MacMillan |
| 高中一 | 英　文 | *The New China* | H. B. Graybill | Ginn |
| | 数　学 | *New Complete School Algebra* | Lub&Touton | Ginn |
| | 生物学 | *Essentials Of Biology* | Mcier | |
| | 地　理 | *Our Modern World* | Norton | 伊文思 |

续 表

| 级别 | 科 目 | 书 名 | 著 者 | 出版处 |
| --- | --- | --- | --- | --- |
| 高中一 | 英文选科 | *A Handbook Of English GrammarFor Chinese Students* | C. A. Seidle | 岭南大学 |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度章程第四十五卷，私立岭南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出版，私立岭南大学印行，第264—267页，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四）教学管理

教会学校以管理严格著称。教会学校因为其教学严谨、管理严格、出路好而受到广大学子家长的青睐。陆佩弦在《外语教学往事回忆》中说，教会学校"毕业生中很多进了各种洋行、工部局、邮政、海关等等机关，其中从小职员开始逐步成为'买办'的也大有人在。但是父亲把我送到这学校去倒不是期望儿子将来当'买办'，而是因为'教会学堂管得严，学习抓得紧'的缘故"。[①] 曾在上海中西书院就读的文学家、翻译家夏丏尊（1886—1946）因为忍受不了刻板的管理及繁琐乏味的礼拜，只学了一学期，便转入绍兴府学堂学习。他在《我的中学生时代》中回忆道：

> 上海中西书院门禁森严，除通学生外，非得保证人来信不能出大门一步，并且星期日不能告假（因为要做礼拜），情形几等于现在的旧式女学校。告假限在星期六下午。我的保证人是我的大哥，他在商店做事，每月只来带我出去一次，有时他自己有事，也就不来领我。我在那里几乎等于笼鸟，尤其是礼拜日，逃不掉做礼拜觉得很苦。
>
> 礼拜真正多极。每日上课前要做礼拜，星期三晚上要做礼拜，星期日早晨要做礼拜，晚上又要做礼拜。每次礼拜有舍监来各房间查察，非去不可。每日早晨的礼拜约须三十分钟，其余的都要费一小时以上。唱赞美歌，祷告，讲经，厌倦非凡。这种麻烦，如果叫现今每周只做一次纪念周犹嫌费事的学生诸君去尝，不知能否忍耐呢。读了一学期，学费无法继续，于是只好仍旧在家里。[②]

教会中学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学生的升学、考核、选课、请假、休学、奖惩乃至日常的穿着都有明确规定。培正中学规定：住宿生每月只

---

① 李良佑等：《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② 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与学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准请假外出一次，平时不得外出。如私自外出，则作“偷出街”论处，除罚托枪一小时外，还要记大过一次。每一个学期记大过三次，就被开除学籍。外出越宿也在禁止之列，一经查实立即开除。有一次，中学监学发现几个学生出外越宿，其中一个是校董某人的弟弟，也立刻开除学籍。学校严禁吸烟，发现一次罚款五元。① 慕贞女校的女孩子把星期六视为过节，因为每周只有这个时候才允许出校门，“一个个领了出门证，拿着包袱，喜气洋洋走出了校门，有的还脱去了学衣，换上一件花衣服，或穿上一双新皮鞋呢！只到六点半，一个个回来了。虽然学校规定不许吃零食，但今天不妨例外些”。②

教会中学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采取选拔的方法招选新生。要进入教会中学读书，大多要经过严格考试，且要求很高。例如，圣约翰中学是一所与大学接轨的完全中学。③ 1918 年这所中学的招生简章规定，招收 13—17 岁学生，“西文”(Reading)考《华英读本》第四册(*The Anglo-Chinese Fourth Reader*, or equivalent)，“文法”考那思非而《文法》第二册(*Nesfield's Book II*, or equivalent)，“地理”考霍金斯《世界地理》(Hawkins, *Geography of the World*)，仅算学、国文用汉语考试。入学后，文学部学生，第一年用加鲁、勃劳克的读本第四、五册，第二年级用同一读本第六、七册，第三年级用亚尔特《顽童故事》、司梯文生《金银岛》，第四年级用迭更斯《二城故事》、唐顿《舟中二年记》。④

（五）全盘外语化氛围

就效果而论，最理想的外语学习的环境是目的语环境。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前 372 年—前 289 年)早就指出过了。他是赞成直接从外国人那里学外语的，但认为要到外国去学才彻底。《孟子·滕文公章句下》里有这样一段话：“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

① 冼子恩：《六十年间私立广州培正中学的变迁》，载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 45 辑(内部发行)》，1985 年，281 页。

② 《慕贞校闻》第 3 号，1940 年。引自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1 页。

③ 前身为圣约翰书院，1879 年初创。

④ 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95 页。

楚,亦不可得矣。"[①]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外语学习者来讲,孟子主张在国外学习外语的理念是不可能实现的。退而求其次的举措便是努力营造全盘外语化的氛围。教会中学在这方面的举措有如下数端:

第一,多数课程用外语讲授。如前所述,外语学习最理想的途径就是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作为课堂教学主要场所的教室,是外语学习极为有利的环境(supportive environment),也是学生体验成功的地方。[②] 教会中学在努力营造"有利环境"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在课堂教学中一般都使用外语组织教学,不管是外语课程,还是数学、理化、史地等非外语类课程(国文等课程除外)。杨宪益就读的天津新学书院(Tianjin Anglo-Chinese College)除中国语文和中国史地外,其他课程如物理、化学、数学、世界地理和历史等都由获得过大学学位的英籍教师教授。用的是英文课本,[③]直接用英文讲授,这对学生的英文水平要求较高。[④] 许国璋回忆道:"初二起有化学实验,每二人一盘试剂,约二三十小瓶,置柜中一格,用毕锁上。老师讲到发明家名字,即用英语读出;一边板书化学方程,一边用英语说明。"[⑤]再如,广东培正中学 1916 年开办时,全套照搬美国中学的办法,从旧制中学一年级起,所有课程除国文外,一律用原版英文课本,连公民课本亦用美国课本,用英语讲授,甚至手工教员李福耀亦用英语教课。[⑥] 在圣约翰大学高中部肄习三年的冒舒湮在《在梵王渡的日子——圣约翰大学纪事》里说:"高中课程繁重,除国文外,一律用美国同等学校的原文课本,有的课程还由美、英教师讲授。历史是讲美国史,地理是英文版的世界地理。学生对中国史茫然无知。平日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用英语交谈。我在高二时已

---

① 这段话的译文是:"这里有位楚国的官员,希望他的儿子会说齐国话,那么,找齐国人来教呢?还是找楚国人来教呢?"答道:"找齐国人来教。"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在打扰,纵使每天鞭打他,逼他说齐国话,也是做不到的;假若带领他在(齐国的)临淄庄街狱里的闹市,住上几年,纵使每天鞭打他逼他说楚国话,也是做不到的。"(引自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51 页。)

② Patsy M. Lightbown £ Nina Spada. *How Languages Are Learned*.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p. 163.

③ 营造外语氛围,增加外语输入是使用外语授课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缺少学科术语也是教会中学用外语授课的直接动因。

④ 雷音:《杨宪益的中学时代》,载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与学习》,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4 页。

⑤ 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89 页。

⑥ 冼子恩:《六十年间私立广州培正中学的变迁》,载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 45 辑(内部发行),1985 年,第 279 页。

直接阅读莎士比亚、雨果、狄更斯、笛福、萨克雷、萧伯纳等名家的著作，并学会以英语写作和通信，这就为我在少年时代即打下英语基础。我在班上功课属中上水平，而后来转学东吴大学时已上升到上中，最后在国立大学读完大学时，几乎毫不费力就成为尖子，足见读书也靠'幼功'。"①

第二，用外语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第二课堂活动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教会中学除了在课堂教学中积极营造近乎目的语的语言环境，即加拿大语言学教授 Patsy M. Lightbown 所说的"自然的习得环境"(natural acquisition settings)，②还竭力创造条件，增强校园的外语氛围。因此，教会学校的课外活动大多以英文进行，以便他们能观看到或参与许多不同类型的语言交流活动：打招呼，商业交易，交流信息，辩论，模拟教学和车间实习，等等。在这些活动里，学生通过讲故事、角色扮演和使用真实的语言材料(real-life materials)，如阅读外文书刊获得了大量的外语输入(input)，从而为实质性的输出(output)创造了条件。李孟标在《千般感慨话当年》中记载，培正中学在早祷会里，唱诗、祷告、读经、演讲、校务宣布都用英语。宿舍里许多房间都贴着"室内谈话，概用英语"的标语，如果违反，罚款半角至一角。③ 雅礼中学就连晨操的口令也是用英文，中学生分成若干小队，每队由一大学生率领，喊的是英文口令，如有偷懒不用力的，也用英文责难。别的学校学生转学进来并不容易，因为这个学校所有功课都是用英文教的，要英文好才行。④ 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不仅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拓宽了他们的视野，而且英文的综合实践能力得到大幅提高。有一位苏州桃坞中学(今苏州四中)⑤校友曾深情地回忆道：

读书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广览书海。例如读英文，不仅读一本课本，而是要求看许多小说、杂文、小品文等，不但要求会看，还要求会写

① 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9 页。

② Patsy M. Lightbown £ Nina Spada. *How Languages Are Learned*.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p. 163.

③ 《培正中学六十周年纪念特刊》，1949 年，第 81 页。

④ 赵厚勰：《雅礼中学的师资及其特点分析(1906—1951)》，载尹文娟：《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4 页。

⑤ 苏州桃坞中学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和中英文并重，曾培养出钱钟书、潘承洞等名人，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于 1902 年创办。桃坞中学向来以"教学严谨、管理严格"著称，以"一流名师执教，师资水平高；多门学科采用原版教材用英语授课，要求高；学生入学、在学考试成绩均一律以 70 分为及格，标准高；收费相当于他校三倍，学费高"而闻名。桃坞中学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之一，学生毕业后可直升大学。(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9 页。)

日记，做作文，用英文讲话、唱歌，经过中学时代的英语训练，到读大学时，英文就不再是难题，而是应用提高的问题。除读书外，还要求体育运动、山水游览，每件事都要总结，还要体验各种生活……每年还要有各种各样的背诵比赛、数学竞赛、论文写作竞赛、《圣经》知识竞赛，分初中和高中两级，以促使同学之间的学问竞争，相互学习、共同提高。除体育外，还有歌唱团，使我们中学的生活繁花似锦。①

全盘英语化氛围，是学好英语的必备条件，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投入英语学习的时间过多，削弱了其他课程的学习。

第三，开展电化教学。南京国民政府从 1935 年开始推行电化教育，截止 1936 年底，“中等以上各级学校及省级以上各种社会教育机关均已设有收音室。中等以下学校及县市级社会教育机关，亦有百分之二十置有收音室”。② 后来随着中日军事危机的加剧，教育机构惨遭破坏，电教设备添置更加困难，电化教育也无从推进。作为外语教学的辅助手段，教会中学大力开展电化教学。除了课堂教学之外，教会中学生在课外还可以通过听外语广播和留声机片等途径学习外语。

留声机和留声机片是当时进行外语课堂教学和课外自修的必要设备，设施完善的中学基本都备有留声机，战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几家大出版社都发行过英语教学的留声机片。这些留声机片都请发音标准的外籍人士发音，配套教材都是由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编写。学习者利用留声机片一方面可以训练听力，另一方面可以纠正语音语调，学说一口地道的外语。此外，留声机片的内容可以多次重复，学习者也可以反复练习。当时发售的留声机片内容多属单词、短语的发音以及会话语句、英诗朗诵之类，但“真正作为一套有系统的语言课程（Language Course）的留声机片还不曾有过”。③ 由于留声机在进行外语教学时具备诸多优势，它受到教师和学习者的青睐。但留声机的价格不菲，不少家庭都不具备购置这种设备的经济实力。

除了利用留声机之外，收听无线电广播中的外语节目也是学习外语的一种辅助手段。收听这类广播，对于训练听力、纠正发音大有好处，还可以

---

① 《世纪之忆》，苏州第四中学 2002 年编印，载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9—180 页。

②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九编 · 社会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年初版。

③ 张沛霖、钟子岩：《英语教学》，上海开明书店 1949 年版，第 28 页。

增加知识,加深对国内、国际时势的认识和了解。当时不少电台都播放英语时事新闻和英语学习节目,例如1933年中华书局为了推广"基本英语"学习法,从8月1日到10月底,邀请留美语言学家周椒青在上海永生电台每天上、下午进行45分钟的英语教学播音,对于学习者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在广播中集中答复。①

第四,图书资源丰富。一般而言,教会中学较公立中学和其他私立中学有更多的图书资源。教会中学外籍教师多,采购图书十分方便。而且,还能获得各差会的资金支持,用以购置图书资料。另外,图书资料丰富的教会大学也向教会中学开放,为学生提供很好的学习资源。武昌文华中学(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②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与教会大学的密切关系以及享有公共图书馆的资源。王佐良等文华学子经常去"公书林"看书,这是文华图书专科学校的图书馆。

第五,拥有良好的学习外语的外部环境。抗战胜利后,在一些大城市,到处放映美国电影,有原版的,有中文字幕的,也有另掏钱租的"译意风",即今天从耳机里听同声传译。教会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常常去看,这对提高英语听力很有帮助。1944年升入上海圣芳济中学的胡壮麟的一位高班同学曾说他看伊莉莎白・泰勒的"玉女神驹"达七次之多。③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外语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看到各种外语广告牌,可以听到外国人的谈话,可以看外国电影,随时随地都有学习外语的机会,长期的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提高了他们运用外语的能力。在一些大城市,学生接触外籍人士的机会比较多,锻炼听力和口语的机会也比较多。当时很多城市都有电影院,放映外国电影,有外语对白和外文字幕,学习者在观看影片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外语,可谓一举两得。当时国内很多地区都有教会,并有外籍牧师,这些教堂经常举行外语礼拜。一些教师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带领学生去教堂参加礼拜,把教堂变成了外语教学的

① 广告,《中华教育界》第二十一卷第二期(1933年8月号)。

② 清同治十年(1871),文华中学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武昌横街头。初创时为男童寄宿学校,次年取校名"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中文名"文华书院",以纪念美国圣公会来华第一位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1893年,文华书院分正、备两馆,正馆为大学部(文华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备馆为中学部,1909年向美国政府立案,1924年定名为武昌文华高级中学,1929年向中国政府立案,改名为私立武昌文华中学。解放后改名为武汉市第33中学,1985年恢复原校名。

③ 参见胡壮麟:《一个英语教师的独白》,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2005年版,第146—147页。

“第二课堂”，并且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外国的新闻记者、民众团体代表纷纷到中国考察，常常公开发表演说，这给外语学习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训练听力、模范口语的好机会。[①]

## 四、民国教会中学外语教学的成就及影响

如果从19世纪60年代算起，到1951年在大陆消失，教会中学在中国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外语是教会中学最主要的课程。应该说，民国时期是教会中学外语教育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民国学生的外语水平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1934年毕业于上海圣芳济中学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陆佩弦教授，到圣芳济毕业时，已经能看懂《字林西报》、《大陆报》、《大美晚报》等英文报纸，即使有个别生词，也能根据上下文推知它的大概意思。他在高中最后两个暑假中，把一千几百页的英文原著《福尔摩斯全集》看完了。[②]这样的外语阅读功底，当今一些高校的英语专业学生也未必能完全达到。

教会中学的教学质量还可以从表3—6中看出。从1932年开始，中央大学教授艾伟历时7年，对全国九省71所中学的高中英语阅读水平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是，教会中学英语教学质量普遍高于非教会中学（浙江省除外），广东省的这两类学校之间的差距尤其大。

**表3—6　　9省高中英语默读测量结果（高三）**[③]

| 省份 | 江苏 | | 浙江 | | 广东 | | 河北 | | 山东 | |
|---|---|---|---|---|---|---|---|---|---|---|
| 类别 | 非教会立 | 教会立 | 非教会立 | 教会立 | 非教会立 | 教会立 | 非教会立 | 教会立 | 非教会立 | 教会立 |
| 均数 | 77.85 | 81.82 | 80.57 | 79.44 | 60.93 | 83.85 | 67.96 | 72.75 | 55.17 | 69.80 |
| 15%最优 | 91.89 | 93.61 | 92.68 | 90.25 | 75.34 | 94.27 | 86.32 | 87.35 | 70.09 | 80.12 |

资料来源：李良佑等：《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1988年版，第201页。

1932年，广州市进行了一次专科以上及中学的调查，报告书称：本市

---

① 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4—35页。

② 陆佩弦：《外语教学往事回忆》，载李良佑等：《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页。

③ 以下是江苏、浙江等5省的测量成绩。另外4省（安徽、广西、河南、山西）仅有非教会立的测量成绩，没有教会立的成绩，故引用时将这4省删去。

中等教育除省立数所外，皆为私立，为数达六十余家。足知私立中学校，在本市中占教育上极重要之关系，若其设备完善，教学有方，必能予社会以优良之影响。其中排名在前的私立中学几乎都是教会中学，如培正、真光、岭南附中等。此时公立中学的程度，总体水平上来说，教学质量差于教会中学，由公立中学转入教会中学之学生往往要降级一至三学年。以"广东省三十一年保送师范学院学生成绩统计"为例，涉及 80 所学校，其中列出成绩有 22 所，没有教会中学，全部是公立与私立中学，考试成绩较佳的是国文、史地、公民，成绩较差的是数学、理化、英文。在这些学校中，广雅中学(公立中学)属于成绩较高的一组。但在关于英语科教学的说明中特别指出："普通学生所患，不但词汇贫乏，且最习用之辞句，亦每每耳不能听，口不能说，手不能写，习用辞句所知既少，无怪写作之失败。吾人觉得口说足以供给学者以多量之基础辞句，故目下初中上及高一之课本，皆采用富于普通会话者，以资口头练习，此亦吾人一种趋向。"这反映了广雅中学学生的英语程度较培正(教会中学)低，其他更低一级的公立学校的英语水平可想而知。①

教会中学教育是中国历史上特殊阶段的一种特殊教育形式和教育体系。它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渊源，它的发展也有异乎寻常的历史作用。就本质而言，教会中学最初的产生是传教士传播教义、培养教徒的"副产品"，但它的发展证明了它不仅是外国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它还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教会中学不仅培养了传播福音的教徒，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和精通外语的各领域(特别是科技界)的精英。外语界英才有朱生豪、钱钟书、杨宪益、王佐良、许国璋等。科技界精英除了过硬的专业技术外，其外语水平同样独秀群伦。中科院院士贾兰坡于 1929 年在汇文初中部毕业后再没有上过学。他后来在研究动物化石工作中，便是靠在汇文打下的英文基础，啃完了伦敦出版的原版《哺乳动物骨骼入门》一书。② 这些外语和科技精英后来大多在国内外著名的高等学府中进修提高，外语和科技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他们扎实的根基是在中学时奠定的。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二，教会中学是与中国传统教育迥异的异质教育体制，它们引进了

① 鲍静静：《民国时期广东的教会中学于公立中学比较研究》，载尹文娟：《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7 页。

② 王丽：《一所中学远去的背影》，《中国青年报》，2008 年 3 月 26 日。

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方法和课程。中国教育从近代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教会中学率先启动了课程革命，其贡献不可低估。例如，近代西方先进的人文和科学技术课程（社会学、理化、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最初是在中学课堂上通过英文教学引介进来。对于英语教学本身来说，教会中学也是国外先进教学方法传播到中国其他公私立学校的中转站，直接法的发展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第三，教会中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闭关自守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前，人文、科技等西学课程在中国传统教育机构里是没有一席之地的。1862 年中国新教育启动之后，这些西学课程才逐渐开始在洋务学堂里教授。但是，洋务派创办的外语、科技和军事学堂总共才 30 余所，其影响力极为有限。在民国时期，全国各主要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都在开展教会中等教育，其影响力无疑较前者大得多。因此，西学课程真正得到广泛、全面、系统地讲授，是从教会中学里开始的。又由于当时缺乏能够教授西学的教师和西学课程中的术语没有对应的汉语译文，早期教会中学只能聘请传教士或其他欧美人士任教，授课也用原版教材。后来，虽有一部分留洋归来的华人担纲讲授这些课程，但许多术语问题仍未解决，因而他们更愿意用原版教材，用英文讲授。这样做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中国学生可以更直接、更全面、更系统地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西学在华也得到了更有效、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而西学的传播，英语在商业上、文化上价值的凸现也逐渐改变了国人‘闭关自守’的封闭意识和对外部世界的陈旧看法。”①

但是，我们对教会中学的外语教学要有清醒的认识。薛正记载：“在立案前所用的课本，除语文外，一律都是英文的，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翻开史地课本，触目的就是鸦片烟、缠小足、拖辫子、留长指甲、茅草棚、乞丐等侮辱性的材料，而其他英文课本，都是些美丽花鸟、‘英雄肖像’、‘辉煌的战绩’以及高楼大厦等等。”②这些蔑视中国传统文化、竭力炫耀西方文明的文字对于认知能力尚未完全发展的中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过度强调英文，中文教育流于形式（如林语堂就读的圣约翰中学规定英文不及格领不到文凭，但中文不及格也照常毕业），加剧了课程

---

① 胡小君：《浅论民国时期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 年第 3 期。

② 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0 页。

学习的不平衡性。其结果,学生"英语烂熟"、"与一封中文的白话信弄不清楚",[1]对祖国传统和语言文化价值认同的日益疏离与弱化。即便如此,教会中学的外语教学仍然具有借鉴和传承价值,其积极意义不容低估。[2]

## 第二节 "高深学问之涵养"——武昌文华中学

### 一、学校沿革

清同治十年(1871),美国基督教圣公会(The American Protestant E-

① 杨程:《基督教教育之将来》,载《青年进步》第93册,1926年。

② 毛泽东在谈到教会教育的作用时说:"为了侵略的需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大小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西方国家在中国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侵略的需要",二是为中国培养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在各行各业为国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孙中山、陈毅、廖承志、黄华等职业革命家。因此,对于教会教育,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看到它在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开启民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出的贡献,也要认识欧美传教士的两面性。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虽然毛泽东的话语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宣传而非学术话语,但确实有一些在中国传教办学的传教士,参加了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他们以"中国通"的资格,暗中测绘中国地图、调查和了解中国的物产风情,为西方殖民者出谋划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曾经是外国侵略者不平等条约的起草人。英国传教士马儒翰(John R. Morrison)在鸦片战争中,他随英军以领事身份担任中英交涉的英方秘书和译员,并充任《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人。1864年创办北京裨文女学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曾是《中美望厦条约》的起草人之一,他还充当过美国侵华使团的中文秘书。但像这些充当不光彩角色的传教士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是做出过贡献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1923年考入武昌文华中学的李公朴(1902—1946),于1941文华中学建校70周年时,特为母校题词:

文华,你是一座伟大的熔炉,你锻炼出多少灿烂的花朵坚强的果实,你是这一块大地勇敢而最持久的革命播种者,我们看到今日千万为国家人类服务牺牲的优秀儿女、民族战士,有好多都是受着你的诱导与陶冶而成。

文华母校创立七十周年纪念

抗战第五年十月二日于昆明 李公朴

李公朴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因"爱国有罪"被捕入狱,成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根据史料,许多教会学校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斗争,有不少像李公朴一样的教会学生献出了生命。可见,教会学校绝不是"为了侵略的需要"而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法机构。(李公朴为母校的题词引自周天度、孙彩霞著:《李公朴》,群言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页。)

piscopal Church)驻鄂湘教区主教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为了传布福音,培养教牧人员,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在基督教圣公会著名华人牧师颜永京(Yen Young-Kiung)等人协助下,决定在武昌创办一所寄宿学校。是年10月2日,学校正式开学。开学时只有一名教师杨用之先生和十四名学生。校舍是租用的民房。次年取校名"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中文名"文华书院",以纪念美国圣公会来华第一位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①] 这是外国人在武汉创办最早的一所学校,其最初宗旨是要训练一些在华传播福音的教牧人员。学校类似于中国的私塾,教学内容一半是《四书》、《五经》,一半是《圣经》。为了吸引学生前来就学,书院不仅免收学费和住宿费,而且还为学生每人每天提供6个铜钱的津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以及外国人在华金融、运输、邮电、海关等业务的扩张,文华书院为了求自身生存,乃于1890年开始,在美国传教士贝锡鼎主持下,把以培养教牧人员为单一宗旨的"书院"改变为面向社会按照西方教育制度施教的新式学校。改制后的文华书院建立以道学(基督教教义)、经学(孔孟经书)、西学(英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声光化电)等为主干的课程。英语课占有特别地位,除国文外,其他课程都以英文教授,从此开始了以英文教学为主的文华教育。此外,书院按照西方教育制度逐步推行寒暑假制、班级制、计分制、升留级制,一年的三次假期(春节、端午、中秋)也改为欧美学校的寒暑假制。改制后的文华书院已是一所完全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新式中学,比国人在武汉自办的第一所中学早12年。[②]

1903年,文华书院分正馆、备馆。正馆为大学部,备馆为中学部。1909年,"正馆"执行大学学制,学制改为四年,并于年底向美国政府立案,定名为"文华大学校"(Boone University)。"备馆"则改为"文华大学校中学部"。至此,文华书院的历史宣告结束。1924年,文华大学校中学部改名为"武昌

---

① 文惠廉(1811—1864),美国卡罗莱纳州人,是基督教圣公会在中国的奠基人和第一任主教。早年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学习法律,后来为了传教而改习医学并获医学博士学位。1834年5月,美国圣公会差会决定以中国为布道区,文惠廉提出申请并被接受。1837年先到爪哇的华人中间传教。1842年进入厦门。1843年成为主教。1845年进入开埠不久的上海,开辟江苏教区。1848年向上海道台要求开辟美国居留地,被允许得到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后成美租界)。1853年,圣公会第一所有堂宇建筑的救主堂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口落成,是上海吴淞江北建立最早的教堂。1864年7月,文惠廉在上海病逝。后来美国圣公会在武昌所办的大学也以他的姓氏命名为"Boone University"(文华大学)。

② 陈忠:《文华书院——清末民初西方文化传入武汉的窗口》,《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4期。

文华高级中学”，1929 年向中国政府立案，正式定名为“私立武昌文华中学”。抗战时期，文华与另外几所圣公会开设的中学合并，组成“鄂湘教会联合中学”，前往大西南等地继续办学，抗战胜利后迁回原址，恢复校名。解放后改名为武汉市第 33 中学，1985 年恢复原校名。

## 二、教学管理与特点①

### （一）以“不跌文华招牌”为目标的管理体制

进入文华就读的学生的家庭背景相当不错，有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教育背景。根据立案表“家长概况烂”中记载：“军政界 5%；教育界 30%；商界 55%；农工界 10%”。② 这一良好的背景，为文华的学生提供很好的成长环境。然而，根据个体的成长规律，好的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它为个体的成才提供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但是，好环境如果得不到妥善利用会向相反方向转化，变成消磨个体意志的温床。文华中学厉行管理，明确“不跌文华招牌”的“品牌”意识，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其办学规模由开办时的 14 名男生，增加到 1933 年的 427 名男女学生，32 名教师（含兼职）。1947 年，学生人数上升至 853 名，教师 54 名。这是复校后学生人数飙升的最高纪录。办学层次由当初的寄宿男塾演变为具有大学和完全中学建制的大型书院（1924 年后大学和中学分开办学）。

文华中学首先从严格管理教师入手：“改阅学生作业须尽力，期不跌文华招牌。”③其严格的管理模式可从档案中得到印证：

> 考试：各科有小考、学月考试及学期考试。小考成绩由老师依比例并入学月考试成绩中。学月考试成绩与学期考试成绩平均即为学期成绩。
>
> 课程进度：各科老师有学期进度表，各级长有每周实际进度表，二者均由教务处收集而稽核之。
>
> 练习实验或实习：各科练习均按原则。除练习外尚有笔记或读书报告。理化生物等科另有实验，本校仪器及实验器材颇多，教务处随时调阅各科作业薄。
>
> 升学就业指导：组成升学就业指导委员会，由校长及毕业班级长

① 本节参照康志杰的《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武昌文华中学研究》一文加以修改和补充而成。参见尹文娟编：《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7—235 页。

② 《文华档案》，卷宗号 69—5—87。

③ 《复校后第三次会议记录》，1946 年 9 月 24 日，卷宗号 101—1—1276。

任导师，每周作集体训话或个别谈话，观其兴趣所在及学生之力是否胜任而因势利导之。

教学辅导：依各科性质分别组织有国文、英文、算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等五科教学委员会推举职员及决定研究范围及每次开会时之议事日程。

级务日志：各级级务日志，由级长逐日填报各节授课之纲要及缺席学生姓名。①

虽然教学工作体现的是我们常说的“良心活”，但如果没有制度保证，“良心”也会被腐蚀消磨掉。因而良好的制度和广大中外籍教师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是文华中学取得出色成就的前提。1929—1934 年在文华中学求学的著名外语教育家王佐良（1916—1995）深情地回忆其“至今不忘”的两位恩师：

有两位英语老师我至今不忘。

一位是米勒先生。他教作文有一套办法，要我们一周写一篇，改文用符号，如句法错了就在旁边批一个 S。每次都打分，百分制，用所写字数除以所犯错误数就得出了分数。例如你写了 300 字，犯了 30 个错，得 10 分；犯了 5 个错，则得 60 分，如此等等。这办法看起来机械，而且会使学生谨小慎微，但在一定阶段上，尤其针对基本语法和拼法之类的错误，很奏效。

……

另一位是简纳小姐（Miss Jenner）。她那时只有二十多岁，还未结婚，全心全意教书，办法似乎比米勒先生更高明。米勒有点机械，简纳小姐则灵活。她教我们阅读，选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经常提问，使大家深入内容，同时也练了口语。我就是在她的引导之下读了一些名著，如华盛顿·欧文的《里卜·凡·温克尔》、霍桑的《点金术》、狄更斯的《圣诞歌》等等，逐渐感到了英美文学作品的魅力。她不仅教我们读，还教我们演，即以所读故事为基础，编成一个小剧本，制定学生分别担任角色，先在课堂上演，好的又拿到全校性的晚会上演。……

这一切都发生在初中阶段。②

在学生管理方面，采取学校监管与学生自律相结合的策略。学校规定

① 《文华中学教学管理档案》（残档），卷宗号 101—1—651。

② 王佐良：《在文华中学学英语》，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0 页。

除周日外，学生平日不得离校，并规定学生夜间自习，不准缺席，并有教员轮流辅导。自习规则是："准时；不准擅离座位；非不得已，不得出自习室；禁止在自习课堂上作任何团体活动；请老师不用自习堂；如有学生犯规，即令级长记其姓名及犯规事由；自习堂点名级长司之；训育日志请老师先加审核然后签名。"

为培养合格人才，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学校努力完善学生自治制度，形成"领班制"，即"每学期选择品学兼优之学生，辅助训育方面及教学方面"。[①] 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学校制定了奖勤罚懒的措施，其中"对有问题学生区别三等，一须警告者，二劝令退学者，三勒令退学者，一一个别函知其家长"。[②]

（二）英语学习者的洞天福地——"公书林"

文华中学十分重视对图书资料的利用。学校章程规定："本校除教室应用图书外，与大学部合设有图书馆（文华公书林）一所，中西书籍均数万卷，每日开门有一定时间，借书阅览有特定规则。"[③]

文华中学办学具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与基督教大学的密切关系及享有公共图书馆的资源。王佐良回忆：

> 我在武昌上中学，一个大院子里有三所学校：文华中学、华中大学[④]、文华图书专科学校，这三所学校是有血亲关系的……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是当时中国唯一讲授图书馆学的高等学府，它拥有一个图书馆，叫做"公书林"，这里有丰富的中英文藏书，而且全部开架，连我们中学生也可以进去随便阅览。我在文华中学学到了许多东西，至今都怀念我那时的中外老师，但给我知识最多的却是这个"公书林"。"公书林"的房子也宽敞、舒服，而且环境幽雅，至今我都记得馆外的一片绿色和馆内的幽静整洁。我在那里翻阅了许多英文小说……
>
> "公书林"还帮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即看英文杂志。我是在它的期刊室里第一次接触到一些美国杂志，如《星期六邮刊》、《全国地理》、

---

① 《教育部吴视察研因制定学校概况调查表》，1933年12月30日，卷宗号101—1—110。

② 《复校后第二次会议记录》，1946年7月11日，卷宗号101—1—1276。

③ 《私立武昌文华中学章程》"管理规则"第11条"图书"。

④ 王佐良回忆中提到的华中大学系在文华书院大学部（后改称"文华大学"）基础上与博文书院大学部、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组建而成。关于华中大学的相关情况，详见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p. 102—105.

《美丽的房子》等。①

王佐良在《在文华中学学英语》一文中也专门提及"公书林(Boone Library)"："英文书特别多，大概总有四五万册，全部开架，而且准许我们中学生也可去自由阅览，也可以借书。这真是一个洞天福地！打蜡的地板，上等木料做的长书桌，一排一排的各类书籍，光线略有点暗，但是幽静极了我在那里消磨了无数下午，一开始看中文书，接着摸英文小说，而始终注意的则是它的大量英文杂志，主要是看图，看各种广告。"②

王佐良所说的"公书林"，坐落于武昌昙华林，是我国最早按美国图书馆模式建成的一所开放式的图书馆，也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由美国韦棣华女士(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1862—1931)创办。到抗战前公书林的中外藏书已达44,560册，其中中文书籍为11,300册，外文(主要为英文)书籍33,260册。蔡元培称："文华公书林建筑巍峨、书籍繁富，固可云中国最早之新式图书馆也。"③公书林不仅是公共图书馆，而且是大、中学生扩充知识的殿堂，更是英语学习者的洞天福地。

(三) 重视英语的课程设置

教会中学在中国社会被广泛认同，尤其是受到商界、政界和教育界的青睐，其原因在于其优良的西学教育质量。教会学校一般都很重视英语、自然科学等西学知识教育，其教育质量也比同期的多数公私立学校要高。教会学校重视英语等西学课程的教学，主要是基于如下原因：第一，20世纪20年代开始，教会中学的数量已无法同公立学校竞争，而且，位于政治、经济中心的大中城市的公立中学的教学质量也相当不错。加上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蓬勃发展，教会中学为了在中国立足，必须采取迎合中国主流社会的要求，在其传统的强势课程(英语等西学课程)上进一步取得领先地位，以便同公立学校竞争。第二，教会大学对英语、数学、自然科学的要求较高，而大部分公立和私立中学的生源质量达不到教会大学的要求，这种状况反过来加重教会大学对教会中学的依赖。教会大学的大部分课程用英语组织教学，而且正如葛德基(Earl Herbert Cressy, 1883—1979)所说："教会大学对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强调，使得教会大学无法直接从公立或私立学校中招收新生，除非是极其特殊的情况。"教会大

① 王佐良：《上图书馆》，武昌文华中学编：《文华学子风采录》(内部印刷)。

② 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③ 查启森、赵纪元：《文华公书林纪事本末》，《图书情报知识》，2008年第5期。

学对英语和科学的倚重，强化了其对教会中学的依赖，因为教会中学的课程是按照教会大学的要求而设置的。1925年，有4/5以上的学生来自教会中学。[①] 因此，教会中学倚重英语教学就在情理之中了。以下是文华中学初中各科用书一览表(1928)[②]中的英文及部分西学课本的使用情况：

英文课本：《英语活用读本》(3册)，福司德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开明读本》(3册)，林语堂编，开明书局出版

《英文津逮》(4册)，葛理佩编，伊文思出版

《英语论说文范初级》，周由廑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几何课本：《平面形学》(2册)，MacMillan Co.出版

代数：《中学代数》(2册)，Ginn Co.出版

世界地理：《英文世界地理》(2册)，武尔科特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20年代末以后，获准立案的教会中学的英语课程大多开设英文文法和英文读本两类课程(同期的公立学校只开英语一门)，如岭南大学附中初中部开设文法和读本两门课。文法用的教材是胡宪生编的《新学制初中英文读本法合编(一、二)》和C. A. Seidle编的 *A Handbook of English Grammar for Chinese Students*，读本用的是Michael West、Danial Difoe等著的 *The New Method Readers*, *Book* (Ⅰ、Ⅱ、Ⅲ)。[③] 与岭大附中初中部仅英文使用英语教材不同的是，武昌文华中学初中部除英文课本外，初中几何、代数、世界地理等非英语语言类课程均使用英文课本讲授。我们知道，要是学生没有较好的语言基础，教师没有扎实的业务功底，以英语组织课堂教学活动是很难进行的。这说明文华中学初中部的教学质量与众不同，学生基础稳定扎实，教师水平不同凡响。

文华中学高中部的课程设置更为详尽、具体。仅如英文课就设置了四门，并且专门开设英文作文，这在当时或现在的高中阶段是绝无仅有的事。读本是论说文、短篇小说和戏剧，这对高中生来说是相当高的。这些课程在今天看来相当于现在的英语专业的课程。其实，民国时代的中学开设类似于现在的专业课是相当普遍的，如许国璋就读的东吴大学附中

---

①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Brook Street,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td., 1971, pp. 165—166.

② 康志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武昌文华中学研究》，载尹文娟编：《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220页。

③ 参见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度章程第四十五卷，私立岭南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出版，私立岭南大学印行，第267—269页，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在高二年级开设英美文学入门。[①] 文华中学非英文语言课程的英文教材使用面更广，涵盖了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 12 门课程，甚至音乐课也在教唱英文诗。使用英文教材授课，虽然也存在诸如加重学生负担，占用时间过多等弊端，但对于扩大英文阅读量、增强语感、突破词汇瓶颈的好处不言而喻。

表 3—7 湖北私立武昌文华中学校高中各科用书一览表(1928)

| 科目 | | 采用课本 | 出版社 | 编者 | 一学年 | 二学年 | 三学年 |
|---|---|---|---|---|---|---|---|
| 党义 | 三民主义 | 高中党义 | 世界书局 | 魏水心<br>郭伯棠 | 1 册 | 2 册 | 3 册 |
| 国文 | 国文 | 高中国文 | 世界书局 | 朱建芒 | 一上<br>下册 | 二上<br>下册 | 三上<br>下册 |
| 外国语 | 英文 | 英文作文 | 伊文思 | 葛理佩 | 上册 | 上下册 | 下册 |
| | | 英语论说文范二集 | 商务印书馆 | 周由廑 | 2、3 册 | | |
| | | 精选英文短篇小说三集 | 商务印书馆 | 何喜杰 | | 1 册 | 1 册 |
| | | 近代戏剧 | 选文 | | | | 初级 |
| 数学科 | 代数 | 英文代数 | 美国 | Hawk | 1 册 | 1 册 | |
| | 几何 | 英文平面几何 | 美国 | Hall Stevens | 1 册 | 1 册 | |
| | 三角 | 新学制高中三角术 | 商务印书馆 | 赵修范 | | | 1 册 |
| | 商算 | 商业算学 | Ginn Co. | Miner | | | 1 册 |
| 自然科学 | 科学常识 | 英文科学常识 | World Book Co. | Wash Burne | 1 册 | | |
| | 生物学 | 高中英文生物学 | 商务印书馆 | Lauphit | 1 册 | | |
| | 生理学 | 英文生理卫生学 | MacMillan Co. | Ritchie | | | |
| | 物理 | 英文实用物理学 | MacMillan Co. | Black Davis | | 1 册 | 1 册 |
| | 化学 | 英文实用化学 | MacMillan Co. | Black Davis | | | 1 册 |

① 参见许国璋：《回忆学生时代》，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3 页。

续 表

| 科目 | | 采用课本 | 出版社 | 编者 | 一学年 | 二学年 | 三学年 |
|---|---|---|---|---|---|---|---|
| 社会科学 | 社会问题 | 社会概论 | MacMillan Co. | Black Davis | 1册 | | |
| | 本国史 | 中国文化史 | 泰东书局 | 许世英译 | 1册 | | |
| | | 新学制中国近代史 | 世界书局 | 印书心 | | 1、2册 | 3、4册 |
| | 世界史 | 英文世界史大纲 | Watts Co. | H. G. Wells | 1册 | 1册 | |
| | | 英文世界史 | MacMillan Co. | Renouf | | | 1册 |
| | 哲学 | 人生哲学 | 商务印书馆 | 舒新城 | 1册 | 1册 | |
| 艺术科 | 音乐 | 中学校唱歌英文诗歌 | 大江书局 | 求孟珩 | | | |
| | 工艺 | | | | | | |
| | 体育 | | | | | | |

资料来源：康志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武昌文华中学研究》，尹文娟编：《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1—222 页。

对于使用英文教材进行教学，王佐良持十分肯定的态度："高中的时候，英语本身似乎时间少了，而有了许多用英语开设的其他课程，如康明德先生（Mr. Kemp）教的物理，柯尔先生（Mr. Cole）教的数学，客广德小姐（Miss Clark）教的生物学，一位英国先生教的历史，等等。通过这些课我们训练了听力，掌握了大量词汇，当然也学到了专门知识。当年的文华，除了国文（汉语）课以外，几乎所有课程——包括体育——都是用英语教的，而且多数教师都是美国、英国或加拿大人。几乎从每门课，我都扩充了英语知识，例如 given 这字的用法（Given X, it follows that…within a given period；作'已知的'、'假设的'解）就是在几何教科书上首先学到的。"①

（四）宗教氛围对学生的影响

宗教教育是教会学校设立的初始目的，也是教会学校最倚重的课程。②圣公会传教士认为开办教育"是用福音影响和塑造人们生活的手段"，因而

① 王佐良：《在文华中学学英语》，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1 页。

② 余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 · 清代（下），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1 页。

文华初创时期，学校的目的是训练宗教人才。圣公会的牧师，都是文华毕业的。学校有礼拜堂，每天有早晚祷告，星期天有三次礼拜，还有主日学。大革命前，无论学生宗教信仰如何，都必须参加读圣经、做礼拜。另外还有其他宗教活动，如查经班、宗教团契会、青年会、立志布道团等。进入文华中学的学生在入学时要取一个英文名字，如李辉祖（后任文华中学校长）初进文华中学，即取英文名 Mark Li。①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随着国民政府对教会学校统制的加强，准允立案的教会中学强制性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宗教教育并未因此而淡化或削弱，而是采用方式略加修改。宗教活动不仅仅是祷告、礼拜，可以被赋予更加灵活的内涵。根据马鸿钢的调查，上海基督教中学使用英文版的圣经或宗教讲义，如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等，②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此举达到了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便于他们更好地学习英文和了解宗教知识等多重目的。同样，文华中学设计出既丰富多彩又充满人性关怀的宗教活动，如英语会话班、幼童辅传道服务团、宗教演讲周、基督教史料展览、郊外礼拜、圣经常识测验等。而且，学校教师常常对那些需要得到关爱的学生伸出援助之手，文华校长李辉祖在回忆中说："教室里没有宗教课了，学校所有的宗教活动改在圣诞堂举行……我们的基督徒学生有一个已经参加青年团。这位放弃了信仰的学生生了病，没有钱买药，我的基督徒团契募集了一大笔款帮助这个孩子。"③

宗教教育不仅对英语学习是个促动，更是融入了博爱与人性关怀，给广大学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丁丑级（1937 级）同学在总结中学时代生活的文章中也谈到了宗教信仰给他们人生所带来的影响："级指导史笃培夫人在宗教里的德行与热忱，使大家在灵性生活里，也同样地向前进步了许多。"④

### 三、成就及影响

文华中学关于"健全人格之培养，团体生活之陶冶；革命精神之锻炼，

① 李辉祖：《我所经历的教会学校——小学、中学和大学》，卷宗号 112—1—509，第 69—72 页。

② 参见马鸿钢：《上海基督教中学宗教课本调查》，《教育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1940 年 8 月。

③ 《文华中学幼童辅传道服务团工作预报书》，卷宗号 112—1—25。

④ 《文华中学丁丑级毕业纪念册·六年来了的回忆——一代级史》，卷宗号 bG321。

固有道德之恢复；学生自治之训练，公共利益之注重，高深学问之涵养，社会恶习之去除”的办学理念，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文华精神的优秀学子。其办学成绩从以下数据中可见一斑：

从1930年开始，毕业生参加全省高中毕业会考，文华连续9年获全省第一。1933年的会考中，文华获全省初中团体第二名，且与第一名相差不到一分，自从行会考制度以来，这成绩在文华初中要算首创。抗战期间，全国统一高考，1939年文华中学获全国第三，1940年获全国第一。

作为一所教会中学，文华中学的师生们表现出一种荣誉、一种责任，他们的办学实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一位在文华任教的美籍教师（佚名）对该校的教学质量作了如下评说："在我看来，文华中学是唯一独特的服务社会、服务中国青年的学校。我准备利用教育服务于文华。文华是武汉最棒的、最知名的学校，这不仅只是一个外国人的简单看法，而是根据大量的观察、了解而得出的结论，作为一所中学，文华能够吸引华中地区优秀的男生……这些凝聚在文华的男生，将成为新中国的桥梁。"

文华学子除了直接进入文华大学（后改称"华中大学"），国内也有其他大学认定文华中学的教学质量，希望招收其毕业生，如国立浙江大学、金陵大学等。①

1947年9月23日，华中大学韦卓民校长到文华中学训话，他说："文华中学之所以得着外人的好评，并非校舍华丽，功课认真，管理严谨，而是文华为一教会学校，是以宗教来训练学生的思想，向着真理之路迈进的。"②

## 第三节 "四方学子负笈来"——北京汇文中学

### 一、学校沿革

汇文中学始建于同治十年（1871）。旧汇文校史记载："咸同③以后，力倡维新，泰西文化相继东漫，创其始者，厥有汇文。"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于崇文门内船板胡同建立教堂，

① 《国立浙江大学向武昌私立文华中学发函，招收优良保送生面试升学办法》，卷宗号101—1—1276；《金陵大学要求文华选送优秀学生进金陵大学》，卷宗号101—1—1282。

② 《几件要事纪略》，《文华季刊》复刊第1期，第78页。

③ "咸同"是清末咸丰和同治两位皇帝年号的简称。咸丰，即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1851—1861年在位。同治，即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1862—1874年在位。

创办一所男塾，传教士靠“每天放学后有一碗饭(that the school closed each day with a bowl of rice)”的条件招到三个男孩入学。[①] 这是当初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该馆教授“四书”、《圣经》等课程。自光绪八年(1882)以来，蒙学馆学者日众，学校规模逐渐扩大，始任美国牧师贾腓力(Frank D. Gamewell)为校长。光绪十年(1884)，在原蒙学馆基础上，建立了“怀理书院(Wiley College)”，开设博学(大学程度)、备学(中学或全日预科)、成美(相当小学)和蒙学(启蒙教育)诸馆，同时将英语及基本科学增入课程，重要课程皆以英语授课。1888年，美国传教士李安德博士(Dr Leander W. Pilcher)升任校长，学校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Peking Academy)”，取“融汇中西文化之精华”之意，增设了文、理、神、医、艺术等科。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汇文书院惨遭灭顶之灾，校舍被毁。此后，时任校长刘海澜(H. H. Lowry)通过教会的施与，在北京崇文门内船板胡同原址重建汇文书院。1904年改名为“汇文大学堂(Peking University)”，由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三部分组成。民国元年(1912)，学校又更名为“汇文大学校”。

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及通州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合并为燕京大学，[②]迁到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址，汇文大学校自行解体。原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校址留下大学预科和中学两部，定名为“汇文学校”。自此，“私立北京汇文中学”作为一所独立的教会中学开始了它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历程，1926年，按教育部规章，学校正式交于华人主办，留美归国的爱国民主教育家高凤山(1882—1973)博士[③]出任汇文第十任校长(汇文中学第一任中国校长)，对学校进行改组，一切职员均以华人为主体。高凤山校长任职期间，提出“全人教育”思想，为汇文百年发展奠定了基础。1927年学

---

①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31.

② Bishop I. W. Wiley, in Dwight W. Edwards, *Yenching University* (New York, 1959), p. 5. 引自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 Brook Street,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td., 1971. p. 31. 另见 Kwang-Ching Liu.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6. p. 45.

③ 高凤山，河北遵化人。北京汇文大学文科学士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1926年起担任北京汇文中学校长，任职长达26年之久，为汇文中学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第一任中国校长。高凤山掌校期间，治学严谨，勇于改革，汇聚人才，以“全人教育”思想奠定了汇文的办学方向。其本人以“爱国、民主、严谨、重才”的高尚情操，名垂北京汇文中学的史册。

校呈准教育部备案,开创了教会学校在中国备案的先例,遵部令改名为“京师私立汇文中学”。蔡元培先生曾为之题释,内容为:“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以此书赠汇文中学。1937 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汇文中学因经费短缺,学生名额锐减,办学环境极为恶劣。1941 年,李荣芳博士代理校务并于同年 9 月升任校长。1942 年,学校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九中学”。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北平私立汇文中学”。1952 年,私立汇文中学由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成为公立学校,更名为“北京市立第二十六中学”。自此,作为一所教会名校,私立汇文中学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 二、教学与管理[①]

### (一) 践行“全人教育”

汇文中学是一所教会中学,在目标定位和教育理念方面,自然秉承西方较为全面的、符合学生身心发展做法,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在早期阶段,大多数教会学校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开设的课程既有西方的自然科学课程,又有外语和中国经典课程,倡导人性关怀。例如,近代“中国留学之父”容闳就读的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Rev. Samuel Brown)“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秩序井然。其为人和蔼可亲,温然有礼;且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对于各种学生,无论其为华人、为日人或为美人,均能审其心理而管束之”。[②] 可以说,培养“真正的人(true man)”是教会学校办学目标的落脚点。教会学校的培养目标虽然指向宗教信仰,但其终极目的是人的培养与发展,[③]除了有扎实的知识基础,还要有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心智。1935 届圣玛利亚女中毕业生孔宝定在《难以忘怀的母校恩情》中回忆:“圣玛利亚女中德智体齐头并进。学生全部住校,一个月放假一次,可以回家看望亲人。每晚集中温课和预习,从不放松。下午放学,全校教室和宿舍以及图书馆等都关上了门,让所有学

---

① 本节参考王丽《一所中学远去的背影》(载《中国青年报》,2008 年 3 月 26 日)加以补充修改而成。

② 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4—75 页;英文见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1909, pp. 16—17.

③ 参见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1 页。

生在外边活动。我们有时去健身房锻炼，或去广场运动，有时在大草坪上嬉耍。记得春天金花菜开出小百花时，我们采集起来，做成花环戴在头上，跳舞唱歌，其乐无穷。"①

汇文中学源自西方现代教育，其自有一套更加严谨、系统的理论基础，以及更加具体、明确的教育目标。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与现代教育的目标结合起来，成为高凤山那一代秉持教育救国信念的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追求。高凤山主长汇文不久，便提出了"全人教育"的宗旨：(1) 增进身体健康；(2) 涵养审美情操；(3) 增殖职业知能；(4) 预备升学基础；(5) 练习善用闲暇；(6) 学做良好公民；(7) 养成高尚品德。"全人教育"之内涵，一言以蔽之，乃德、智、体、美、劳"五育"全面发展，成为努力为国家服务的人才。据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1936 年毕业于汇文高三理科甲班的何纯渤(1914—2007)回忆：当时汇文运动场所一个大院里边运动项目就有 48 种。每天下午 4 点到 6 点，所有的图书馆、自修室全部锁门，不让学生呆在屋子里。"我们那个田径队啊，足球队啊，下大雨下大雪，4 点到 6 点都在外边训练。学校规定的这些制度就让你有一个好身体。"汇文重视体育，源自古希腊的传统，这也是西方现代教育精神的重要内涵。在高凤山看来，"A strong mind lies in a strong body(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重视体育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为了塑造坚毅、勇敢、顽强、大度、乐观和自信等优秀的人格素质。除了重视体育，汇文极为重视书法。书画同源，书法是美育教育两翼中之一翼。汇文在体育课之外，每个年级每周都设有武术课。武术教师由出身武术世家的教员担任。学校还很重视"尊师重道"的传统，规定学生升入高中后，对任课教师一律称"先生"。在校园中遇到老师要驻足、鞠躬。

汇文中学为开阔学生眼界，活跃学生思想，每周都设周会，邀请当时一些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来学校作讲演，其中有胡适、冯友兰、张奚若等著名学者。此外，她们还邀请美国专家来校演讲，由校长和教务主任先生亲自担任翻译。汇文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在其全盛时期，全校各种社团多达 30 几个，有壁报社、读书会、合唱队、话剧团、京剧团、国乐队、西乐队、书画社、运动队等。学生们还自己捐资于 1929 年创办了义校，其中的校长、教务主任、教师全部由高中学生担任，招收附近贫苦儿童就读，自初小至高小共六个年级，学生多达 200 余人。

---

① 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5 页。

（二）“融会中西”的课程设置

1888 年，李安德博士掌校后，之所以取“汇文”二字，即有融汇中西文化精华之意。这既与 19 世纪末清政府开科取士、兼试西学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学校的创办历史有关。1871 年美以美会在中国设立教堂附设蒙学馆时期，其教学内容即“课以四书圣经诸籍”。发展到 1884 年的怀里书院时期，时任校长的美国牧师白雅各博士（1884—1888 年在任），进一步申明：“举凡一切重要学科，多用西文教授，盖欲诸生之学贯中西，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输调和者。”用西文教授的课程，主要是除中国经典外的其他科学课程。西文和圣经是教会学校的支柱课程。早期教会学校的目标是培养传播福音的教牧人员，“教授圣经，并以圣经为各种课程的根基。”[①]然而，1926 年，高凤山作为汇文第一任中国校长接任后，毅然取消了圣经课，但“融汇中西”的宗旨却得到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贯彻。首先，汇文中学重视作为中华民族立身之本的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作为民族国粹的文言文，受到空前的重视。著名书法家、语言学家启功先生 1926 年考入汇文初中，是汇文 1932 届的商科肄业生。他当年的同窗对他曾有这样的描述：“元伯启功者，世居旧都，睹其貌，观其服，知其然也。言语诙谐而恣肆，举止倜傥而乖僻，见者疑其狂，实则笃信坚贞，恺恻之士，余独知之焉。每寄意于诗词书画，时有慷慨之音，荒寒之韵，流露期间，则可见其不仅爱好已耳。无能遁世，又不能合污同流，故宁学商，所以苟全性命而已。”由此可见当时汇文学生语言文字水平之一斑。扎实的中国语言文字教育，使得学生耳濡目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扎下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并确立了安身立命之“本”。有了如此的“根”和“本”，才有可能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

其次，重视英文教育。民国时代，公立学校的英文课程设置一般都按照教育部的“课程标准”，即开设一门“英语”课程。如 1933 年的《中学规程》的初、高中课程表上仅有“英语”一门课程。[②] 而汇文中学，像几乎所有教会学校那样，开设“英文文法”、“英文名著”、“英文会话”等课程。汇文通常由外籍教师教“英文会话”，中国教师教“英文语法”和“英文名著”。英文文法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初中英文课上中英文混合授课，高中英文课堂上则全部采用英语授课。据老校友回忆，初中英文名著选读的有《神灯记》、

① [美]好韦尔：《基督教教育的特点》，《基督教育》，第四卷第 1 号，1923 年。

② 参见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册），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0 年影印版，第 126—128 页。

《鲁滨逊漂流记》、《亚瑟王》、《罗宾汉》等。高中英文教材则选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等。可见，英文选文的难度相当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汇文学生的语言功底不同凡响。汇文还要求两个星期写一篇英文作文，并要在课堂上公开朗读，请同学相互指正，最后由老师当堂评点修改。

当时英文教学的特点是口语、作文、文法、翻译并重，并要求中西两种语言比照使用。1948届校友陈国新先生回忆，教英语语法的杨建章老师对学生要求格外严格，他要求学生将《红楼梦》中的片断翻译成英文，并让学生翻译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

除了英文课之外，汇文高中的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及外国历史、地理等课程的教材全部采用英文原版，完全秉承了怀里书院时期定下的"举凡一切重要学科，多用西文教授，盖欲诸生之学贯中西，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输调和者"之宗旨。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之下，汇文学生高中毕业后大多已具备良好的英文阅读、写作、会话及翻译能力，考大学时数理化试卷可以使用英文答题，入大学后基本可以免修英文。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贾兰坡(1908—2001)于1929年汇文初中毕业后再没有上过学。他后来在研究动物化石工作中，便是靠在汇文打下的英文基础，啃完了伦敦出版的原版《哺乳动物骨骼入门》一书。

汇文的中西融合还渗透在校园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当年学校医务室的病历要用英文书写，运动场上打篮球时裁判发令要用英语，连报分数也用英文。期末考试时教务主任在大会上对大家讲："你们不要作弊，上帝在上面看着你们呢。"连汇文的课外活动也呈现出中西融汇的色彩：学校有阵营强大的国剧团(京剧社)和国乐队，也有西乐队和话剧团。话剧团能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每当圣诞前夜，同学们成群结队秉烛到住在校园中的校长和老师家门口唱圣诗祝贺，过后每人必抱回一大包花生糖果之类的礼物。

(三) 打造一流的师资队伍

一所好学校总是与一流的师资联系在一起，汇文也不例外。汇文办学资金充足而稳定，故所聘之授课教师，皆为一时之选。1918年汇文大学部迁出，除原汇文大学教授仍留校授课外，新进之教师多为拥有博士学位的留美学子。特别是高凤山接任校长后，更是不惜重金延聘师资。教师多数毕业于燕京、北大、辅仁、师大，很多教师同时都在大学兼课。如国文教师李戏渔，同时在北大中文系兼课。英文教师金振华，原为中国驻日内瓦领事，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兼教汇文英语。物理教师张佩瑚同时兼任北

大物理系副教授。绰号“生物侯”的侯恩炬，上世纪50年代后到北师院做了生物系主任。化学老师于一峰，授课使用的是自编的《化学计算法》。主讲代数课的刘开祥当时在汇文讲授高中三年的五门数学课。他后来被调往北大数学系任教。在当时的汇文，即使是一些“副科”教师也非同凡响。音乐教师杨荣东，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选修音乐系。在汇文教过英文课，后改教音乐课。如此“豪华”的阵容，即便放在今天的大学里也毫不逊色。而事实上，1952年后，相当一批汇文杰出的教师，皆已成为许多大学教师中的翘楚。[①] 正因为具备如此优良的办学质量，使得汇文蜚声国内外，吸引了全国22个省市，乃至海外众多的学子负笈前来。正如校歌中所唱的：“四方学子负笈来，东南西北萃一堂。”

### 三、成效及影响

从1871年创办迄今的140余年间，从汇文中学走出去的毕业生接近5万人，其中涌现出众多学界、艺术界、政界、商界、军界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和社会中坚，他们在各个领域见证、传扬和书写汇文精神。

据汇文校友会不完全统计，汇文的校友中间先后产生了22名院士。贾兰坡、瞿同祖、王大珩、卢肇均、王忠诚、李学勤等，其中包括外籍院士林同炎。还有一代国学大师、教育家、书画家启功先生，京剧大师黄桂秋，作家邵燕祥等。值得一提的是，像书法泰斗启功和考古学家贾兰坡，分别是汇文高中、初中的肄业生，后来再没有上过学，但在汇文打下的基础让他们终身受用。

---

① 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师资质量普遍优于当时的公私立学校。除了外语教师极具专业水平，非外语专业中的大多数教师外语水平较高，能胜任以外语教授外语或其他课程。圣约翰大学附中46届毕业生倪庆饩在《怀约中》中回忆：“教（高中）一年级英语阅读课的李名炀老师虽是西装革履，却不大修边幅，他英语口语也不错，但文学修养不深，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约大）大学部的体育教师。我们的课本是哥尔史密斯的小说《威克斐牧师传》，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女主人公奥丽薇亚的肖像，神态衣裳都跟插图毕似，这使我大吃一惊，‘李老师还有这一手’。”（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 第四章

# 中华民国的中学外语教学

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作为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本身不是中国封建传统的自然演变，而是在西方文化教育观念的强行楔入下产生和发展的。中国传统教育中很早就有"小学"、"大学"的观念，但没有"中学"之说，中学教育观念的引入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中国新教育肇始于清朝同治元年(1862)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中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开始了具有中等教育性质的实践。但从国家制度层面来看，中国近代学制诞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1)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后的 1902 年。是年，清政府颁布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近代学校系统——"壬寅学制"，将学制分为三段七级，其中第二段为中等教育，《钦定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为四年制，"中学堂之功课，限修业四年"。[①]《钦定中学堂章程》把外国语等"西学"科目纳入法定的中等教育课程之中。虽然"壬寅学制"没有实行，但奠定了今后中学教育之基础。1904 年 1 月，清政府在兴学热潮中颁布的"癸卯学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近代学制。和"壬寅学制"一样，"癸卯学制"将学制分为三段七级，第二段为中等教育阶段，设中学堂，但将年限由四年增加到五年。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中，外国语同样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占总课时数的 20%，居各课程之首。

中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知识认同、价值取向、道德水准的潜在中坚。作为普通教育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它一方面对初等教育的发展与提高起导

---

①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74 页。

向作用，另一方面又为攀登文明高峰提供坚实的支撑。民国时期的中学教育属于精英教育的范畴。迄至1930年，全国约有4亿人口，而中学生只有40万左右（据教育部十九年统计，高中学生有179,000人，初中学生有218,000人），平均每千人也只有一名中学生，而高中生更少，每4,000多人才有一名。① 可见，民国时期的中学生素质是相当不错的。这一时期整体的师资质量同样是可靠的。师资来源主要有以外语见长的教会大学毕业生及公私立大学的外语专业毕业生，条件好的中学还有大学教师和归国留学生加盟。尽管存在地区差别，如沿海沿江地区以及内陆的大中城市学生的外语水平一般较高，偏远及落后地区的学生则相对较差，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中学外语教育质量还是比较过硬的，“中学生的英语水平还是理想的”。② 例如，季羡林、葛传椝、梁实秋、范存忠、钱钟书等学界前辈的外文功底哪怕在今天也鲜有人能超过，虽然他们中的多数后来都在国内外知名高校进修提高，但他们都接受过高质量的中学基础教育，其坚实的底子是在中学里打下的。

## 第一节　中华民国的中学外语教学概况

### 一、学制与课程改革

（一）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

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旨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体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翌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聘请蔡元培担任新组建的教育部的总长。教育部为全面改革旧的封建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清末学制进行了彻底改造，构建起现代学制体系。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启动了对旧学制的改革。9月3日，中华民国第一个《学校系统令》公布，史称“壬子学制”。从“壬子学制”到次年8月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法令和规程，对新学制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从而使学制内容进一步具体化，综合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学制系统，总称“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年学制”。其中，有关中等教育的法令法规有《中学校令》、《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令》等

① 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硕士论文，第26页。

②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多个法令和章程，为各类学校的办理提供了有利操作的标准和细则。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实行三段设学——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段不分级（不分初中和高中，实行一贯制），中学校以所属性质分为省立、县立、私立三种。"壬子·癸丑学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入学资格、课程设置、修业年限、行政管理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相应规定。1912 年 12 月 2 日，教育部颁布《中学校令》和《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令》（部令第二十八号）。《中学校令》规定"中学校修业年限定为四年"，①将"癸卯学制"的中学学制由五年改为四年，并对课程内容作了很大的调整。课程内容规定如下："中学校之学科目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校加课家事、园艺、缝纫，但园艺得缺之。外国语以英语为主，但遇到地方特别情形，得任择法、德、俄语一种。"②外国语课程贯穿四年始终，第一学年每周 7 小时，第二、三、四学年 8 小时，平均周学时数达 7.75 小时（见表 4—1）。外国语在"壬子·癸丑学制"中学课程表占了很大比重，达 22.6%，其比重甚至超过了国文（周学时数为 6 课时，占总课课时的 17.5%），足见主事者对外国语的倚重。

表 4—1　　1912 年"壬子·癸丑学制"中学课程表（单位：课时、周）③

| 学科＼学年 | 修身 | 国文 | 外国语 | 历史 | 地理 | 数学 | 博物 | 理化 | 法经 | 图画 | 手工 | 乐歌 | 体操 | 总计 |
|---|---|---|---|---|---|---|---|---|---|---|---|---|---|---|
| 第一学年 | 1 | 7 | 7 | 2 | 2 | 5 | 3 | | | 1 | 1 | 1 | 3 | 33 |
| 第二学年 | 1 | 7 | 8 | 2 | 2 | 5 | 3 | | | 1 | 1 | 1 | 3 | 34 |
| 第三学年 | 1 | 5 | 8 | 2 | 2 | 5 | 2 | 4 | | 1 | 1 | 1 | 3 | 35 |
| 第四学年 | 1 | 5 | 8 | 2 | 2 | 4 | | 4 | 2 | 2 | 1 | 1 | 3 | 35 |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二日部令第二十八号，《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十一号，第 55—56 页。

① 《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八号。

② 《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十一号。

③ 这是男校的中学课程表。女校的课程表与男校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一）女子中学对外国语的要求有所降低，周学时数与国文一样，为 6 课时，占总学时数的 17.5%；（二）增加家事、园艺课程，周课时为 2（第二、三、四学年开设）；（三）增加缝纫课程，周课时为 2。参见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29 页。

《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令》中的第四条对开设外国语的“要旨”，即本学科的培养目标作了具体规定：“外国语要旨在通解外国普通语言文字，具运用之能力，并增进智识。”同时还规定了外国语课程应掌握的内容：“外国语首宜授以发音、拼字，渐及简易文章之读法、书法、译解、默写，进授普通文章及文法要略、会话、作文。”①

1913 年 3 月 19 日，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校课程标准令》（部令十六号）。《中学校课程标准》进一步细化了中学校课程的学科目、每周时数以及学生在不同学年的内容要求。对外国语一科各学年的教学内容是：

第一学年：发音、拼字、读法、译解、默写、会话、文法、习字。

第二学年：读法、译解、默写、造句、会话、文法。

第三学年：读法、译解、会话、作文、文法。

第四学年：读法、译解、会话、作文、文法、文学要略。②

“壬子・癸丑学制”是依据民国初年教育宗旨制定的中华民国第一个学制，反映了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新学制，直接推动了民国初期学校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在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除旧布新、继往开来的作用。该学制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部重要且相对稳定的学制，直到 1922 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前基本上没有变化，沿用了十年。但是，该学制仍存在诸多不足，如中学修业四年，相对于其教育内容而言明显偏短。另外，外国语的课时偏多，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影响了其他基础课程的学习。

从 1922 年起，开始了学校系统之改革。1912 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实行之后，发现存在的问题颇多：第一，预科制之阻碍学制统一；第二，各级学校程度不衔接；第三，中小学年限太长；③第四，中学科目太笼统，学生毕业后，升学既感困难，就业又不容易，不能适应社会之需要。④ 职此之故，自 1915 年起，即有改革学制之声浪，新文化运动成为学制改革的新动力。1915 年湖南提出“改革学校系统案”，成为新学制讨论的嚆矢。陈独秀、蔡元培、舒新城、⑤夏丏尊等学界名人对学制改革的呼吁和实践以及

① 《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十一号，第 53 页。

② 《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二号，第 21 页。

③ 根据“壬子・癸丑学制”，小学校年限七年，其中，初等小学校四年，高等小学校三年。中学校四年。完成中小学学程共需十一年。

④ 蔡芹香：《中国学制史》，世界书局（上海）1933 年版，第 187 页。

⑤ 详见舒新城：《中学学制问题》一文，载《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一号，第 1—21 页。

1921年广东提出"学制系统草案"等举动促成了1921年学制系统草案(史称"辛酉学制"),[①]的诞生。1922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学制会议,与会代表对以广东提案为蓝本的"辛酉学制"进行讨论,并参酌各方合理意见进行修改,最后通过了《学校系统改革案》。1922年11月1日,新学制诞生,由黎元洪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颁行全国。1922年学制,即所谓"新学制",亦称"壬戌学制"或"六三三四"学制。[②]

"壬戌学制"与"壬子·癸丑学制"一样,依旧分三类(普通、职业和师范)和三段(初等、中等和高等)设学。新学制中最精彩的,是中等教育一段。与旧制相比较,中等教育,尤其是普通中学的改革最大。[③] 其中改动最大的地方是,中学校由旧制的四年一贯制改为三三两级制,即中等教育段由原来的一级增为"初级"和"高级"两级。学程由四年增为六年,初级三年,高级三年,"但依设科性质,得定为初级四年,高级二年,或初级二年,高级四年"。[④] 新制是在旧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更切合实际,是我国近现代学制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相比,"壬戌学制"对于中等教育的意义体现在如下两方面:第一,从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基本状况出发,采用美式"六三三四"学制划分学校阶段,理顺了普通教育整体上的衔接关系。第二,中学由四年一贯制改为三三两段制,有助于初中教育的发展。"壬戌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三部正式实施的学制,也是采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熟的学制。它的产生表明中国教育制度的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⑤] 虽然"壬戌学制"也有不合国情、不切实际的规定,但总体而言,"这是一次力图与国际教育和现代化趋势接轨的,比较成功的学制改革",可以这样说,"中华民国学制在1922年新学制颁行时就已定型;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陆续订立的各级学校组织法及1937年和抗战时期颁布的学制系统,只是在'六三三四'学制大框架不动的前提下,对其具体实施作一些因时变通或局部调整。"[⑥]

1922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于济南举行会议,决定组织新学制课程

---

① "辛酉学制"内容详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141页。

② 关于"新学制"的内容,详见李桂林:《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288页。

③ 吕达:《我国1922年中学课程改革及其反思(二)》,《课程·教材·教法》1990年第5期。

④ 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⑤ 张传燧:《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页。

⑥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3页。

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由袁希涛、金曾澄、胡适、黄炎培、经亨颐五人组成。12 月 6 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二次委员会上，通过了中小学毕业课程标准，分中小学两组，编订各学科课程要旨，分别请专家草拟各科目课程纲要。初级中学纲要中的“外国语”部分由胡宪生起草。[①] 高级中学的“外国语”由朱复起草。[②] 全国教育联合会于 1923 年 6 月制定并颁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新学制课程纲要总说明》规定：初级中学授课以学分计。每半年度每周上课一小时为一学分。但如国画、手工、音乐、体操运动，及理化、生物之实验无须课外预备，自修；或预备自修时间较少者，应酌量折量，其必修科目分配如下：

表 4—2　　初级中学必修科目分配表

| 学科 | 社会科 | | | 言文科 | | 算学科 | 自然科 | 艺术科 | | | 体育科 | | 共计 |
|---|---|---|---|---|---|---|---|---|---|---|---|---|---|
| | 公民 | 历史 | 地理 | 国语 | 外国语 | | | 图画 | 手工 | 音乐 | 生理卫生 | 体育 | |
| 学分 | 6 | 8 | 8 | 32 | 36 | 30 | 16 | 12 | | | 4 | 12 | 164 |

资料来源：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编：《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第 7 页。

《初级中学外国语课程纲要》（以下称纲要）规定，在初级中学开设社会科（含公民、历史、地理）、言文科（含国语、外国语）、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含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科（含生理卫生、体育）六科。实行学分制，学生要修满 180 学分（必修课 164 学分，选修课 16 学分）方能毕业，所余学分得选其他科目或补习必须科目。外国语为 36 学分，占必修课的总学分的 20%。

“纲要”对外国语（暂以英文为例）课程设置的目的、“教授方法”和毕业标准作了如下规定：

目的：

（1）使学生能阅浅易的英文书报；

① 详见胡宪生：《初级中学外国语纲要》，载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编：《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第 56—61 页。

② 详见朱复：《高级中学公共必修课的外国语课程纲要》，载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编：《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第 85—88 页。

(2) 使学生能用英语作浅近的书札及短文;

(3) 使学生能操日用的英语。

"教授方法":

(1) 应注重反复练习,使能纯熟;

(2) 多用直接会话,减少翻译;

(3) 在学生已经学习的范围内鼓励学生自由应用;

(4) 耳听、口说均须注重;

(5) 随时提示文法,使能切实应用;

(6) 并随时指导学习的方法。

毕业标准:

(1) 能自动地补充阅读故事(如天方夜谭、鲁滨孙漂流记、海外轩渠录之类),书报(如《英文周刊》、《英文周报》之类);

(2) 作最普通会话,能令人了解;

(3) 能造简单语句,于文法上无错误。

(4) 能作简单之翻译(汉译英)于文法上无错误。①

"纲要"的对象是初中零起点开始学英语的学生。"新学制小学校以不教外国语为原则,故初级中学第一年级学生学英语,应自字母教起。"从"纲要"规定的目的和毕业标准来看,要求着实不低。以词汇为例,"纲要"对词汇的要求是初中毕业要求达到 1600—1700 个词汇(未说明是否包括词组)。这一要求与上世纪 90 年代由原国家教委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要求的高二年级结业时要求"学会 1800 个单词和一定数量的短语和习惯用语"②接近。它甚至超过了目前国家英语课程标准要求的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的九年级(按:初级中学)结束时应达到的对词汇量的基本要求(学会使用 1500—1600 个单词和 200—300 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③而现在国家的开放程度及学习英语的环境和条件较八十年前大为改观,不可同日而语。

"纲要"虽未经政府批准实行,但其起草委员会的成员由教育界知名人士组成,因此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各地中学纷纷按"纲要"中的规定重新

---

① 具体内容详见《初级中学外国语课程纲要》,第 56—61 页。

② 国家教育委员会:《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 页。

③ 参见国家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 页。

安排课程。“纲要”和语文等其他课程纲要一样，是我国第一次以现代教育科学为理论依据的体系较为严整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此后，1929 年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1932 年的正式课程标准，均以 1923 年的“纲要”的框架为基础。

本次会议对高级中学课程总纲未作具体规定。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合本地实际的课程纲要。

下面是刊登在民国十六年(1927)《教育杂志》上的一所初级中学的英文课程的目标与内容，便于我们能更直观地了解这一时期基层中学的外语教学情况。

**东大附中英文课程的目标与内容**①

(甲) 课程的目标

1. 能听、能说简易的英语，流利而无困难。
2. 能读短篇故事和简易的杂志报章。
3. 能做短篇作文；能写普通的礼札，无文法上的错误。

(乙)课程的内容

第一第二学程

1. 教授日常通用单字或子句一千个。
2. 关于训练发音正确的材料。
3. 练习命令句、问句、答句。
4. 利用会话与简单的戏剧，练习讲话自然的态度。
5. 书写正确清楚。
6. 上面所说数项，取材于下列各书：

a. *Model English Readers*, Vol. I and half of Vol. II, by Tseu Yih-zan.
b. *English Learned by Use*, I and II, by Brownell Gage.
c. *Mastery of English*, I and II, by H. B. Graybill.

第三第四学程

1. 日常通用单字或子句，增加至二千五百个。
2. 复述短篇故事。
3. 文法最主要的一部份。
4. 句式的变化。

---

① 曹刍：《东大附中初级中学课程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八号，第 23—25 页。

5. 能阅读短篇记叙文。
6. 上面所说各项取材于下列诸书：
a. *Model English Readers*, *Vols II and II*.
b. *Mastery of English*, *Book III*.
c. *Aesop's Fables*.
d. *Chamber's Short Narrations*, *1st and 2nd Series*.
e. *Eighteen Dramatic Dialogues*. (*Part I*)
f. *Chamber's Narrative Readers*, *Sets A and B*.
g. *Sunny Hour Series* (*Commercial Press*).
h. *Easy Volumes of Students' Library Series Such as A Scottish School Boy*.

第五第六学程
1. 日常通用单字及子句，增加至四千个。
2. 几分钟的演说。
3. 系统的文法。
4. 书信的练习。
5. 教授用英语社交的智识。
6. 上面几项取材于下列各书：
a. *Thirty More Famous Stories*.
b. *Mastery of English*, *Book IV*.
c. *Chamber's Narrative Readers*, *Sets C and D*.
d. *Eighteen Dramatic Dialogues*. (*Part II*)
e. *English Weekly*.
f. *Selective Volumes from Student's Library* (Commercial Press).
g. *Fifty Famous Stories*.
h. *"Greece and Rome" in World Famous*.
i. *Stories* (the Macmillan Co.)
j. *Sketches of Fifty Famous People*, by Fong F. Sec.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

1927 年 4 月 18 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1928 年底，国民政府完成了中国统一，中国教育始步入良性发展之轨道。自是以降，直至 1937 年对日抗战，此十年间，可谓中国实施新教育以来最有成效之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学校系统方面承袭了 1922 年“新学制”的规定。1928 年 5 月，国民政府主管全国教育、学术的最高行政机构——大

学院①在院长蔡元培领导下，于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以1922年"新学制"为基础，重新制定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草案》，即"戊辰学制"。主要内容有：中学校的修业年限为六年，分初、高两级，初级三年，高级三年，但可按照中学实际情况来设置，定初级中学学程为四年，高级中学为两年，但有特别情形时，也可以单设。可见，该学制与"壬戌学制"相比变动不大，以三三制为主体的框架基本没有改变。

192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规定初、高级中学科目及其所占学分。其中，初级中学所设科目为：党义、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自然科、生理卫生、图画、音乐、体育、工艺、职业科目、党童子军，总计180学分。相对于"壬戌学制"，外国语的变动最大，对外国语的规定更加灵活。原先初中外国语为36学分，②比国语多6学分，"戊辰学制"改为30学分，比国语少6分。而且，在第三学年，学生根据自己的意向，可以选修，如不继续升学，可以选修职业科目10学分代替外国语。这种非一刀切的举措，当是极具人性化的。

高级中学所设科目为党义、国文、外国语、数学、本国历史、外国历史、本国地理、外国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生物学、军事训练、体育、选修科目，总计150学分。高级中学取消了文理分组，选修科目占总学分的12%。

这次学制改革主要是为了纠正1922年学制存在之不足，如科目繁多、重文轻理、外语课程比重不协调等问题。学界对1922年"壬戌学制"有关初中外语的比重过高及其必修地位的确立等规定提出了异议，并在《教育杂志》和中学教育协进会会刊《中等教育》上发表了多篇文章。1924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大会为此通过了《初级中学外国语应列为选修案》，动摇了初中英语的必修地位。因此，在1929年的"戊辰学制"中，初中外国语的总课时数由原来的20%下调到11%—16%。在一些不以升

① 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大学院，以蔡元培为院长，隶属国民政府。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取消大学院，重新恢复教育部，隶属行政院。

② "壬戌学制"这一课程设置，在实行几年后引起了争议。人们普遍认为初中外国语所占比重过高，甚至许多人反对把英语作为初中的必修课。贡沛诚认为，"我国中学毕业生除了十分之二三得升学者外，余都赋闲无事。推原其故，则因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其至重至大之原因，在教授英文时间太多，以致其他切合社会需要之科学，无可添增。学生终日困于英文一门，无暇旁及他种学科，毕业后，言中文则不敷应用，常识则多半缺乏"。（贡沛诚：《我对于中学生读英文之感想与救济》，《中等教育》第三卷第三期，1924—1925。）而苦学了几年英语，见了外人不敢启齿，让他说时支支吾吾，阅读报刊也是磕磕碰碰，更不用说阅读科学书籍以介绍文化了。因此，对不升学的学生来讲，于外国语上所费的时间几乎等于虚掷。

学为目的的初中里，弱化英语教育，加强了职业教育。即使在以升学为目的或重视英语的发达地区的初级中学，也改变了原来英语课时数超过国文的现象。①

1932 年 12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中学法》。该法以“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为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为目标，规定“中学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修业年限各三年，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得混合设立之”。次年 3 月，教育部制定并公布《中学规程》，其第五章二十四、二十五条规定：初级中学之教学科目为“公民、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体育、卫生、劳作、图画及音乐”；高级中学之教学科目为“公民、国文、英语、中外历史、中外地理、算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卫生、军事训练（女生习军事看护）、伦理、图画及音乐”。② 该课程与 1929 年公布的暂行课程表相比，有下列几个主要区别：(1) 取消学分制，改用学年制。(2) 安排自习时间，初中每周上课时数为 34—35 小时，在校自习总时数为 12—13 小时，合计每周学习 46—48 小时。高中每周上课时间为 31—34 小时，每周课外运动及在校自习总时数为 26—29 小时，合计每周 57—63 小时。(3) 初中英语改为三年必修，取消第三学年选修办法。(4) 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均设有“一表（见表 4—3；见表 4—4）”、“二表（略）”。其中“二表”增设蒙、回、藏语或第二外国语（指俄、德、法、日语等而言），初中每周 3 小时，高中 5 小时。这些语言仅适用于需要之特殊地方所设立中学。(5) 取消选修课。

**表 4—3　　初级中学各学期每周各学科教学及自习时数表**

| 学期＼时数＼科目 | | 公民 | 体育 | 卫生 | 国文 | 英语 | 算学 | 自然（分科制） | | | | 历史 | 地理 | 劳作 | 图画 | 音乐 | 教学总时数 | 自习总时数 |
|---|---|---|---|---|---|---|---|---|---|---|---|---|---|---|---|---|---|---|
| | | | | | | | | 植物 | 动物 | 化学 | 物理 | | | | | | | |
| 初一 | 上 | 2 | 3 | 1 | 6 | 5 | 4 | 2 | 2 | | | 2 | 2 | 2 | 2 | 2 | 35 | 13 |
| | 下 | 2 | 3 | 1 | 6 | 5 | 4 | 2 | 2 | | | 2 | 2 | 2 | 2 | 2 | 35 | 13 |
| 初二 | 上 | 2 | 3 | 1 | 6 | 5 | 5 | | | 4 | | 2 | 2 | 2 | 2 | 1 | 35 | 13 |
| | 下 | 2 | 3 | 1 | 6 | 5 | 5 | | | 3 | | 2 | 2 | 2 | 2 | 1 | 34 | 14 |

① 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3 页。

② 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册），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0 年影印版，第 124—127 页。

续 表

| 学期 \ 时数 \ 科目 | | 公民 | 体育 | 卫生 | 国文 | 英语 | 算学 | 自然（分科制） | | | | 历史 | 地理 | 劳作 | 图画 | 音乐 | 教学总时数 | 自习总时数 |
|---|---|---|---|---|---|---|---|---|---|---|---|---|---|---|---|---|---|---|
| | | | | | | | | 植物 | 动物 | 化学 | 物理 | | | | | | | |
| 初三 | 上 | 1 | 3 | 1 | 6 | 5 | 5 | | | | 4 | 2 | 2 | 4 | 1 | 1 | 35 | 13 |
| | 下 | 1 | 3 | 1 | 6 | 5 | 5 | | | | 3 | 2 | 2 | 4 | 1 | 1 | 34 | 14 |

资料来源：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册），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0 年影印版，第 126 页。

表 4—4　　高级中学各学期每周各学科教学及自习时数表

| 学期 \ 时数 \ 科目 | | 公民 | 体育 | 卫生 | 军训 | 国文 | 英语 | 算学 | 生物学 | 化学 | 物理 | 本国史 | 外国史 | 本地 | 外地 | 伦理 | 图画 | 音乐 | 教学总时数 | 自习总时数 |
|---|---|---|---|---|---|---|---|---|---|---|---|---|---|---|---|---|---|---|---|---|
| 高一 | 上 | 2 | 2 | | 3 | 5 | 5 | 4 | 5 | | | 4 | | 2 | | | 1 | 1 | 34 | 26 |
| | 下 | 2 | 2 | 2 | 3 | 5 | 5 | 4 | 5 | | | 2 | | 2 | | | 1 | 1 | 34 | 26 |
| 高二 | 上 | 2 | 2 | | 3 | 5 | 5 | 3 | | 7 | | 2 | | 2 | | | 2 | 1 | 34 | 26 |
| | 下 | 2 | 2 | | 3 | 5 | 5 | 3 | | 6 | | | 2 | | 2 | | 2 | 1 | 33 | 27 |
| 高三 | 上 | 2 | 2 | | | 5 | 5 | 4 | | | 6 | | 2 | | 2 | | 2 | 1 | 31 | 29 |
| | 下 | 2 | 2 | | | 5 | 5 | 2 | | | 6 | | 2 | | 2 | 2 | 2 | 1 | 31 | 29 |

说明：本表中的“自习总时数”是指“每周课外运动及在校自习总时数”。

资料来源：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册），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0 年影印版，第 127—128 页。

1932 年的课程标准实行以来，因每周教学时数过多，课程过于繁重，于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利，而受到教学界的批评。1935 年 3 月，教育部征集专家意见，着手对其进行修正，于次年 6 月公布了新的课程标准。与 1932 年《课程标准》不同，《修正课程标准》在英语方面作了较大改动：(1) 将初中英语的周课时数由原来的 5 课时改为 4 课时，教学总时数由 14.4% 降到 12.9%。(2) 高中自第二学期起实行文理分科，降低文科组的算学要求。在第三学年起增加文科组的英语要求，将高三的周教学时数由 5 课时调整到 8 课时，即第一、二学年的英语周课时为 5 课时，第三学年为 8 课时。

理科组三年维持5课时不变。[①]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英语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广大莘莘学子学习英语的机会由此而中断。在自由区，[②]由于抗战初期京沪杭平津等地国立大学纷纷迁移西南各省，其后华北、华东、华南各省立中学有一部分西迁，改为国立中学，弦歌不辍。1939年4月，教育部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决议试行六年一贯制中学的试验，决定在“中等教育阶段内，除原有的‘三三制’中学外，另设六年制中学，不分初高中”。[③] 由教育部指定在部分省市的部分中学内进行实验。次年9月，制定了《六年制中学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各科教学时数表》。其中英语教学时数为每周5小时，六年贯彻始终。[④] 翌年，教育部又公布了《六年制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草案》，规定了六年制中学英语课程目标。该草案由“目标”、“时间支配”、“教材大纲”、“实施方法概要”四部分组成。[⑤] 以升学准备为目的之六年一贯制中学，由于存在一定缺陷，在全国的部分中学实验后，未能全面推广。

193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除了试行六年一贯制中学的试验，还收到许多与会专家关于教育改革的议案，其中关于中学英语教学的有四个，内容主要集中在英语教学时数、英语课程的存废、英语是否改为选修科目等。

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现行中学课程应行修正案》中指出，现行科目太多，如初中一年级科目有十三门，初二初三有十一门，科目太多，学生预备时间不足，精神不易集中，应酌行归并或减少。英语课时因现时小学不授英文，四小时嫌少，拟增加一小时。如不预备升学，则不妨比四小时再少，甚或完全不学。

西康省教育厅长韩孟钧主张减少初级中学教学时数，应减为二小时。他说：

> 英语原为研究外国学术之工具。若不作高深学理之精研，英语之应用，于吾人之日常生活者极少。查初级中学英语，每周教学四小时，学生每日自习时间，消耗于英语之阅读练习，在二小时以上。按修正

① 相关内容详见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初版，第8—9页。

② 指未受敌寇蹂躏、占领的西北、西南等后方地区。

③ 《六年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1941年教育部颁行，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页。

④ 详见《六年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1941年教育部颁行，商务印书馆出版，第7—8页。

⑤ 详见《六年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1941年教育部颁行，商务印书馆出版，第67—82页。

中学规程，初级中学之教学科目之一，学生以升学关系，多以全力以赴之，妨害其他科学之进度甚大。况初级中学毕业之学生，能升入高级中学者，按诸事实，其数甚少。此大多数不能升学之学生毕业后，几与英语绝缘；是其在校时对英语钻研全为虚费。初级中学每周英语教学时数，似宜酌减，以免阻碍其他学科之进行。

贵州省教育厅提交的《请将中等以上学校英文科改为选修科目案》指出：

查我国兴学之初，鉴于西洋物质文明日臻发达，非讲求科学，无以富国强兵。因揭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而以文字为沟通中西文化之工具，故列英文为学校必修课程，在当时因不得谓为无见。唯是近年以来，国立编译馆已经成立，欧西文哲科学各种学说，经学术团体、文化机关暨私人介绍之译本，已如汗牛充栋。学生阅读译本，即可直接研习，无兼顾文字之劳。又一般中学学生毕业后，有力升学者，十不及三四，其无力升学而服务社会者，所学英文，绝少应用。基上理由，除大学外国语文系外，英文无列为必修课程之必要。拟请与其他外国文同列为选修科目。①

上述提交议案进行表态的都是学界、政界名人以及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门，虽不说能够完全左右教育部的决策，但至少能够对支持中学英语改革的舆论起到引领作用。

1940 年 2 月，教育部重新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并修正公布《初高中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各科教学时数表》，通行至抗战结束。这次修订的课程标准与 1936 年的课程标准有明显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有二：一是每周教学总时数由原来的 35 小时减少至 31 小时。二是实行分组选修，以英语作为分组的标准。初中课程变化的主要有：(1) 分组选修。规定自第一学年起，选修课分甲乙两组。两组分别为就业和升学做准备。甲组为就业组，选修国文、历史、公民与职业，乙组为升学组，统选英语。(2) 英语改为选修，不升学者可以免修，减少教学时数(由 1936 年的 4 课时改为 3 课时)。高中自第二学年起分为甲乙两组，甲组第二三学年全周算学为 5 小时，化学、物理为 5 小时，国文 4 小时，外国语第二学年 5 小时，第三学年 6 小时。乙组第二三学年算学为 3 小时，化学、物理各为 4 小时，国文 6 小时，外国语第二学年 6 小时，第三学年 7 小时。同时还要求“各科教学时间之排列须力

①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3—154 页。

求其合理化”,即国文、算学、科学、外国语等主干课程“须排列于最有效之时间(如上午八至十一时,下午二至三时)”。①

教育部为适应抗战需要修订初、高中课程标准,将初中英语改为选修,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舆论及时代的要求。自1902年我国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颁布以来,初中英语历来是必修科目。1940年的课程改革中,英语改为选修,不啻是一个突破。但是,初中英语改为选修课后,学生学习英语的机会,便延缓缩短了,势必加重高中阶段的学习压力。而且,中学六年的英语课程内容,势必迁就学生英语程度而加以改变。鉴于这一情形,1945年秋季,教育部复将初中英语改为必修,并规定每周教学时数高初中一律改为6小时。②

在沦陷区,敌势猖狂,教育界人士,除少数败类变节附逆外多跋涉山川,逃入自由区内,或国际中立地带,如香港,或国内通商地带。上海租借以外区域及京沪、沪杭沿线公私立大中小学纷纷迁至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复课。因人才集中,与英美人士接触的机会增多,和教科书供应的便捷,英语教学一时颇占便利。而广大沦陷区多数学生,非但无力到“孤岛”上求学,享受同等机会,而且敌伪政府竭力推行奴化教育,禁止各学校教授英语。沦陷区废止英语课达六七年之久,直到日本投降,始得恢复。然而,“孤岛”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仅持续了三年。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以后,在沪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形势突转恶劣,许多迁沪复课的学校纷纷自动停闭,或改组为私立补习馆③以苟延残喘。日寇指派日人到各校充任教师,时时干涉学校行政,于是各校被迫减少英语教学时间,增设日语课程。工部局设立的各中学,自经伪政府接办后,一律废止英语教学,英语补习学校加授日语。

1937年5月,日本侵略者一手建立并操纵的伪满政府公布了一个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新学制”。这个所谓的“新学制”废除了1922年的“六三三”学制,改为三段四级,学习年限为十三年。这个所谓的“新学制”,后来也成了华北、南京伪政权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基础。在教学内容方面,取消

① 详见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四编·中等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初版,第9—10页。

② 参见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四编·中等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初版,第11页。

③ 如光华大学改称为“壬午补习馆”,省立扬州中学第一院停办,第二院改称“慈淑补习馆”,省立松江中学改称“会文中学”,省立上海中学迁移法租界时即改名为“沪新中学”。

原有的党义，改添修身、经学，减少英语教学时数，并将日语列为必修的“国语”之一，而将原有的国语（中文）改称汉文。“新学制”还规定，无论哪一段、哪一级学校，都要注重日语学习。在伪满政府颁布的《学校教育纲要》中竟然规定：“任何学校，均须列日语为必修的国语科之一；而将来满洲国的共通语言，决限定用日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嚣张之气焰，汉奸走狗们奴颜婢膝的丑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随着抗战的胜利，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教育界人士即开始酝酿对中学课程作新的调整。1946 年 2 月，教育部举行修订课程会议。4 月又举行分科修订会议，制定了《中学课程草案》，决定废止分组制度、增加英语和数学教学时数以及调整教学科目及时数等多项措施。[①] 1948 年 12 月，教育部在此基础上又集合各方面意见对中学课程进行修订。制定了《初高级中学的教学科目及时数表》和《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这次公布的初中教学科目表中，英语又被重新列为主科之一，初一、初二每周课时为 3，初三周课时为 4，三年之总学时数仅次于国文（每周 5 课时），略高于数学（每周 3 课时）。高中英语每周 5 课时，与国文相同。在高中科目表后附有说明若干条，其中一条为：“高中外国语之教学，可分为二类：一类专门学英语，每周五小时；一类为适应学生之特殊需要，教学他种外国语，如印度语、日语、朝语（或其他东方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或其他西方语），每周六小时，惟同时每周须学习英语三小时。凡习他种外国语者，除外国语外，其他科目及课程标准一律相同，但第三年之选科可不选习。”[②]

《初、高级英语课程标准》虽然由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而未来得及实施，因而对当时的英语教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这两份课程标准是教育家们精心设计的成果，应该说是民国期间三十多年中学外语教学的经验总结。

## 二、教学与管理

### （一）外语教学特色

#### 1. 以阅读作为外语学习的主要门径

民国时期的外语教育质量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以外语和科学擅长的教会学校，还是公立及其他私立学校，曾培养出了季羡林、朱生豪、钱钟书、

① 详见谢长法：《中国中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0 页。

②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158 页。

杨宪益、曹禺、梁实秋、王佐良、范存忠、许国璋等外语界英才。这些博古通今、融会中西的学界泰斗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受益于广泛的阅读。他们甚至在外语学习的入门阶段，就开始接触读本。早在1946年，季羡林在《大学外语教学法刍议》一文中就专门谈及接触原文、进行大量阅读的重要性。他引用19世纪德国大语言学家Ewalp的一段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学外国语就像学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旁讲理论，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学生到我这里来，我立刻把他推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季羡林说："我希望中国的教员先生们有推学生下水的勇气，青年同学们有让教员推下水去的决心。"①

杰里米·哈默(Jeremy Harmer)在《怎样教英语》(*How to Teach English*)中提到了阅读对外语学习的促进作用：首先，"如果阅读文本是很有趣、很吸引人的话，那么，一些语言就会作为语言习得的一部分保留在脑子里。而且，语言习得会更加成功"。其次，"阅读文本能够为英语写作提供好的模板。我们教授写作技巧，需要给学生展示鼓励他们进行写作的模板"。再次，"阅读文本能够提供学习语言的机会：词汇、语法、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及我们构建句子、段落和篇章的方法"。最后，"优质文本可以引入有趣的话题，激起讨论的兴趣，产生具有想象力的应答。优质文本还是完整的、具有吸引力的课程的出发点"。② 可见，大量地阅读非常有助于外语学习。民国时期的英语课程设置，除了文法、读本外，还要布置学生阅读大量的英美文学名著。著名语言学家章振邦(1918—)回忆：

> 早在初中二、三年级，孔老师就引导我们在课外阅读一些浅易的童话故事，如安徒生、格林的作品，既提高了我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又巩固了课内的英语习得。到了高中阶段，课外阅读的范围扩大了，阅读也增多了，每学期都要读几本简易读物，最后我还"啃下"了一本带有中文注解的狄更斯原著，但那有点事倍功半。我时常想，当时如能读到反映现代生活的英文原著，我该要减少多少困难，少走多少路！在高中阶段，除大量阅读外，我还背诵了不少范文：范文结构严谨，文字精练，题材广泛，反映现实生活，且富有教育意义，容易学，容易懂，便于朗读和背诵，学习了就能用。通过这些范文，我扩大了词汇量，加深了语言知识，并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了文章的起承转合以及如何联句谋篇。……通过大

① 《季羡林谈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② Jeremy Harmer. *How to Teach English*.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p. 68.

量阅读和背诵范文而积累起来的语言知识是比较可靠的，因为脱离了上下文孤立地记单词、学句法往往难以学以致用。[①]

从外语学习成功者的经历来看，民国时期的中学外语教学注重阅读，显然是抓住了外语教学的根本。笔者以为，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乃至将来，阅读始终是中学外语教学的核心，抓住了阅读，就如同抓住了牛的鼻子。因为掌握外语的关键问题是词汇的理解、记忆及使用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大量阅读。[②] 克拉申的输入假说(Krashen's Input Hypothesis)也印证了只一点。他指出习得语言的唯一途径是进行大量的可理解的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具体说就是不带功利性质的快乐阅读(undirected pleasure reading as a source of comprehensible input)。[③]

2. 营造全英文环境

民国时期外语教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另一原因的重视全英文环境的营造。全英文环境体现在多个方面，如用英语组织上英语课；用英语上数学、理化、史地等文化课程；非英语课程使用英文课本；用英语组织各种第二课堂活动，如竞赛、游戏、实习、创办英文期刊，等等。这样的环境近乎自然的

① 章振邦：《也谈我国外语教改问题》，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10 页。

② 《大学英语》总主编董亚芬说："读写是我国英语教学的主攻方向：阅读是语言输入和积累的主要来源，即使在英语国家，普通公民也须经常读书看报以加强语言应用能力，否则难以应付竞争。虽然只听也能够吸收语言营养，却远不如阅读那么有效与可靠。例如，我们每天收听的内容中经常出现一些值得学习的新颖的表达方式，但声音转瞬即逝的特征使听者难以在瞬间记住全部内容。而书面阅读材料的静止状态则能使读者通过反复阅读来锁定需要的目标，并且在必要时还可从容地求助于辞典。显然，对迅速充实你的语库而言，阅读比光听更有为有效。"(董亚芬：《我国英语教学应始终以读写为本》，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 页。)董亚芬的话切实地抓住了外语学习的本质。语言学习中，口语是第一性的，但是外语学习不同于母语的自然习得，情况要复杂许多。根据教育部(2003)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 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四大语言技能中，"听"、"说"排在"读"、"写"之前，在外语学习的入门阶段无可厚非。但是，在学生有了一定基础、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之后，"读"、"写"似应排在"听"、"说"之前。因为，没有通过阅读积累大量的语言素材，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口语交际的，如同董亚芬所说："在实质性口语能力的背后必然有大量阅读的支撑。"(出处同上，第 36 页。)在非母语习得环境中，没有建立在大量阅读基础上的听说练习，说严重一点，简直是瞎折腾，终将导致许国璋所说的学生"几问几答、无言可继"的情况。(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78 年第 2 期。)"咱说英语，老外不懂"的情形绝非个案。(参见姜澎：《咱说英语，老外不懂》，载《文汇报》，2001 年 6 月 12 日。)清末、民国时期培养的许多外语高手，如严复、季羡林、杨宪益等，在中小学阶段几乎都没有经历过严格的听说训练，可以说，阅读是他们外语能力提升的唯一支撑。

③ 参见 Patsy M. Lightbown and Nina Spada. *How Languages Are Learned*.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p. 39.

母语学习环境(natural acquisition settings),如同 Patsy M. Lightbown £ Nina Spada 所说的,这是因为学习者差不多每天都有许多时间沉浸在语言环境中。[①] 这样的环境是十分有利于外语学习的。但是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要在所有学校中营造这样的氛围是不现实的,但是至少在工商业较为发达的通商口岸及沿江沿海等发达地区是可行的。特别是以英语作为工具,上各种文化课,能够使英语学习贯穿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中,对提高英语水平极为有利。以下学界前辈的回忆,便于我们更直观地了解。

◆ 方重(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求学年代漫笔》

当年清华(按:指就读的清华学校中等科)园内的外语气氛确实十分浓厚。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同外语打交道,许多教材是英文的,许多课程用英文讲授。教师上课讲英语,同学之间不但很自然地用英语交谈,并且经常抽出时间去教室里练习拼写生词,互相纠正发音。此外还学唱英语歌,如学生常唱的"清华校歌"(Tsing Hua College Song)……至于全校师生集会,则除唱校歌外,还常有英语辩论或演讲的竞赛。外国教师很多,他们的西式平房住宅就叫"外国地"。师生来往密切,不分彼此。甚至校医处的大夫也是外国人;学生去看病时,更免不了用英语交谈。我们的早操,有许多年内是由著名的马约翰先生(John Ma)用英语发口令带领着做的,至今我还依稀记得他那几套动作。[②]

◆ 范存忠(著名外国语言文学家):《学然后知不足》

我一进交大(按:指上海交大附中),就觉得它同我以前上过的学校不一样。它设置的课程,除"国文"和"修身"而外,都用英语课本,也用英语讲解(此外还设法语和德语),真是国内学习外语的良好环境!我在那里,中学读了三年,大学读了一年。在史地(西洋史、自然地理)、数学(从代数、几何、三角到微积分)、理化(物理、化学)、制图(投影几何)、工厂实习课上,听的是英语,读的全是英语,其中有些内容甚为奇特。例如"公民学"一课用的是美国中小学的课本,谈论美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③]

① 参见 Patsy M. Lightbown and Nina Spada. *How Languages Are Learned*.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p. 93.

② 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22 页。

③ 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4—45 页。

3. 教师水平较高，责任心强

关于民国时期的外语师资状况，田利芳(2007)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学外语师资状况可以概括为：数量不足，质量不高”。[①] 但笔者以为，这样的论断对于广大的偏远及农村地区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以此来形容这一时期全国整个师资队伍的现状，似乎有些武断。实际上，农村地区也有好的师资。例如，在上世纪20年代，浙江上虞的一所乡村中学——春晖中学，可谓名师荟萃，极一时之选：朱自清(文学家)、朱光潜(翻译家、美学家)、丰子恺(漫画家、翻译家)、夏丏尊(翻译家、文学家)等。先看下列的“教师情况表”。

表4—5　六省中学教师情况表

| 类别＼省份 | 浙江 | 江西 | 湖北 | 湖南 | 山西 | 河北 | 总计 | 百分数(%) |
|---|---|---|---|---|---|---|---|---|
| 国外留学 | 107 | 76 | 84 | 113 | 73 | 49 | 502 | 7.07 |
| 大学毕业 | 539 | 338 | 294 | 418 | 264 | 361 | 2214 | 31.22 |
| 师范大学毕业 | 31 | 56 | 66 | 117 | 39 | 52 | 361 | 5.11 |
| 高等师范毕业 | 157 | 157 | 113 | 344 | 84 | 160 | 1015 | 14.32 |
| 专门学校毕业 | 465 | 257 | 243 | 387 | 96 | 161 | 1609 | 22.69 |
| 其　他 | 531 | 165 | 77 | 272 | 166 | 178 | 1389 | 19.59 |
| 总　计 | 1830 | 1049 | 877 | 1651 | 722 | 961 | 7090 | 100.00 |

资料来源：杨亮功：《对于训练中等学校教师之一个建议》，载《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七号。

从上述情况来看，民国中学的师资力量整体上说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六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除浙江外，在全国的位置算中下游水平。可以说，《六省中学教师情况表》大致能反映当时全国的实际情况。专门学校以上学历的教师占80.41%，这样的学历构成，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可能不算很高，但民国时期，有这么高的百分比真是不容易的，就是在上世纪末的

① 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7页。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抗战时期，在广西的一个县城，有一次曾有一个被迫降落的美籍飞行员过境，一个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奉召充任翻译，没想到这位教师既听不懂飞行员说什么，自己也说不出话来，那位飞行员没有办法，只好通过笔述说明情况。(许侃：《略论中学英语教学的改进》，《中华教育界》复刊第二卷第十一期，1948年11月号。转引自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8页。)

中国大陆也算是很高的。[①] 其中有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更是达到了7.07%，这样的比例，恐怕在21世纪中国大城市的中学里也算是很高的了，更何况是在民生蜩螗，国家处于多难之秋的民国时期。虽然无法获取民国英语师资情况统计表，但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民国中学英语教师的学历当不会很低，因为这一时期的英语教学质量是有目共睹的。像季羡林、杨宪益、朱生豪、吴宓(钱钟书的老师)、朱光潜、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许国璋的老师)、王佐良、曹禺、许国璋，还有下文提到的吕叔湘等外语界英才厚实的英语根基无一不是在国内中学奠定的。而且，上述名师的许多教师都有留学国外的背景。我们认定民国英语教学质量高还在于如下理由：

第一，名师任教中学课程。民国时期很多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大学者都有过从事中学教育的经历，如朱自清、鲁迅、叶圣陶、夏丏尊等。外语界有吕叔湘、朱光潜、葛传椝、曹禺、王宗炎、徐燕谋、沈同恰(钱伟长的老师)、丰子恺(漫画家、翻译家)，等等。

第二，大学教师兼任中学课程。民国时期的大学，尤其是教会大学，名师如云，皆为一时之选。当时很多大学的教师都到中学兼课。如许国璋在东吴大学附中就读时，担任他的高二"英美文学入门"课程的英语老师吴献书就是东吴大学的老师，此人不仅敬业，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许国璋称之为"近代中国英语教学界之大师，毕生著译甚勤"。[②]

第三，教师队伍中外籍人士、教会学校和名牌大学优秀毕业生占有较高的比例。这些人无疑为提高民国中学外语教育质量做出过重大贡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一书收录了季羡林等30位知名学者关于外语学习、教学与研究的回忆文章。这30位终身从事外语教育、翻译、文学研究的学者，个个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外语大家。在书中明确提到中学阶段接受过外籍教师、教会学校和名牌大学优秀毕业生严格训练的有18人，占60%。另外40%的学者大多未提及中学教育，即便有提及的，只是泛泛而谈，未提及任课教师。但如果继续追踪这些学者的中学外语教育历程的话，接受过这些优质

---

① 笔者在上世纪80年初就读高中时，整所中学只有3个本科学历的教师，其中1人为英语教师("文革"前某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80年代中期笔者分配到浙江某县的一所完全中学任教，当时学校共有6位英语教师，1人为大专学历(系笔者本人)，1人为外语中专，1人为高中(经过短期培训)，另外3人为代课教师。在90年代初笔者离开该校时，全校在原来6位教师的基础上仅增加了2位具有大专学历的教师。可见，当时教师极为紧缺。

② 许国璋：《饮水知源 敢忘所自》，载《许国璋文集》2，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页。关于吴献书的相关情况，另见朱雯：《思往事，惜流芳》，载《外语教育往事谈》，第107页。

教师严格训练的比例无疑会大得多。

第四，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一些条件好的中学不惜重金聘请高水平教师前来任教。例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在聘任名师这一环节上抓得很紧。一些教师宁愿放弃上海交大副教授或讲师的职位来南模任教。英语教师朱翼东出身外交官家庭，曾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精通英语及西班牙语。曾任驻美国及中美洲诸国使馆总领事。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他却不愿内迁继续从政，毅然来到南模执教。① 于光远在《古老而自由的北京三中》中深情地回忆其恩师：

> 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是初中教我的马观海先生。他出身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我三年，从 ABC 直至文法，严格得近乎苛刻：背单词有定数，期末必须达到；造句出错，重作三遍；练习"互译"与英语作文，有缺必补。这样，上高中时一般已能依赖字典阅读林语堂《开明英文文法》英文版，优等生则可以从原文看《范氏大代数》了。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的张芳杰，与我同班受教，曾与梁实秋先生共同主编《英汉大词典》，闻名海岛；教授英语颇有建树，是马师的得意弟子。没有良师，何来高徒！②

（二）教学管理

1. 课程设置及教学要求

无论是在军阀混战、局势动荡的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在实现统一、建立起高度集权的国民政府时期，在教育管理方面，执行的是相对柔和的政策，使这一时期(抗战爆发之前)的教育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得到较快的发展。当时国家教育部虽然也制定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草案》、《中学校令》、《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令》、《初、高级中学外国语课程纲要(或标准)》以及《初、高级中学各学期每周各学科教学及自习时数表》等各类法令、法规和课程计划等，但是这些并非都是指令性的，特别是课程设置及教学时数，各地享有一定的灵活度，存在可增减的空间。各地课程、教学时数的变动，政府一般不会横加干涉，能体现一定的民主性。因此，各地学校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对课程设置及教学时数做出适当调整。例如，1924 年的南京东南大学附属初中的课程设置与 1923 年部颁课程标

---

① 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39 页。

② 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与学习》，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0 页。

准就有很大出入。

表 4—6　　1924 年东南大学附中课程设置与 1923 年部颁课程标准的差异

| 学科 | | 学分 | | 占总学分的% | | 备注 |
|---|---|---|---|---|---|---|
| | | 部订标准 | 附中实设 | 部订标准 | 附中实设 | |
| 语文科 | 国文 | 32 | 36 | 19.5 | 24.5 | ① 部订标准指 1923 年部颁课程标准。<br>② 附中实设指东大附中自订课程表。 |
| | 外语 | 36 | 36 | 22 | 24.5 | |
| 算学科 | | 30 | 30 | 18.3 | 20 | |
| 自然科 | | 16 | 12 | 9.75 | 8 | |
| 社会科 | | 22 | 18 | 13.4 | 12.3 | |
| 艺术科 | | 12 | 6 | 7.3 | 4 | |
| 体育科 | | 16 | 6 | 9.75 | 4 | |
| 童子军 | | （无） | 4 | （无） | 2.7 | |
| 学分总数 | | 164 | 148 | 100 | 100 | |

资料来源：张正东：《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 页。

东大附中的初中外国语课程虽然学分数为 36，跟部订标准数一样，但它的教学总时数比部订标准低，故所占百分比仍比后者高，其他大部分的课程跟部订标准都不一样。这一情形实际上是当时全国课程设置情况的缩影。1929—1930 年间，中央大学教授艾伟等人，曾就这一时期中学英语教学的情况做过一次书面调查。被调查的有京、津、鄂、皖等省市的二十所学校的高中和十三所学校的初中。根据调查结果，初中实际教学时间多的达 8 课时，少的则为 3 课时。一年级平均 5.62 课时，二年级 6.25 课时，三年级 5.46，而这时的部颁初中各年级的周课时为 5 小时。高中的英语教学时数的两级距离跟初中一样，也是 3—8 课时。各年级之平均数为 5.75、5.39和 4.94 课时，均高于部订标准的 4.33 课时（高一 5 课时，高二、三各为 4 课时）。可见，初、高中各年级的英语教学时数均高于当时教育部规定之时数。从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对外语教学是十分重视的，中学生的课业负担着实不轻，应试教育的情形也比较突出。

以下是 1934 年制定的《省立处州初级中学各科教学改进实施办法》（英语科），内容颇具体。其中对教学法、学生课内外的作业的要求规定甚详，特别是关于作业的规定，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为本位，迄今仍具有可行的借鉴价值。如果该"办法"能切实地得到贯彻，即便学生初中毕业

后不再升学，进入社会，亦能应付初步的涉外交际任务。

**省立处州初级中学各科教学改进实施办法(二十三年度)**①

**英语科**

(一) 关于教学法者：

(1) 除在第一学期者外，其余各班，于学期始时，分别举行听说看写测验，以明白学生之程度若何，而定施教之方针。

(2) 如一班内学生英语程度，优者多而劣者少，则以优者为中心，用程度较深之教材，施以适宜之教学法。

(3) 如程度优者少而劣者多，则以劣者为中心，用程度较浅之教材，施以适宜之教学法。

(4) 如程度优劣相差不甚远，则采用中庸性之教材，调剂之教学法。

(二) 关于英语语法上之中文译名者：

(1) 请本会各会员搜集各种译名，制成一表，备学生参考，以补救直接教学法之不足。

(2) 本中学各级组英语教学，语法上所采译名，应统一。

(3) 使学生认识英语语法上之原文名词。

(4) 与国文科教学研究会联络，使国语语法上所用之名词，与英语语法上之译名，互相一致。

(三) 关于学生课内作业者：

(1) 一年级英语教材，读物部分，均使学生背诵，及周重温之。

(2) 二三年级英语教材，每小时选已授读物中之一段，使学生背诵，及周重温之。

(3) 二年级第一学期学生须精读短篇记叙文五篇，会话文二篇。

(4) 二年级第二学期学生，须精读短篇记叙文三篇，会话文二篇，信札与单据各五则。

(5) 三年级学生，须精读短篇记叙文二篇，短篇论说文五篇，会话文二篇，信札与单据各五则日记五则。

(四) 关于学生课外作业者：

(1) 令各级组学生，以级组为单位，组织英语讲演会，每星期机会练习英语讲演一次。

---

① 浙江省教育厅编印，《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六卷第二十三期，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64—65页。

(2) 令各级组学生以自修室为单位，组织英语会话练习会，定每日中午十二时至一时及下午六时至七时，为练习英语会话时间，在此时间内，会员概用英语谈话，违者每次罚铜元十枚，罚款用途，由各会员分别自行决定之。

处州初级中学英语科的“改进实施办法”很重视英语交际技能的培养和文学作品的学习，很符合外语学习规律。对初中生作这样的要求，委实不易。其实，民国时期，凡有条件的学校，都很重视文学作品的学习。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在《忆恩师》中写道：

到了高中，三年中几乎每年都设有国文和英文方面的选修课。(北师大附中)国文方面的进修课程，高一设有文学选读、伦理学(即逻辑)、心理学，高二设有修辞学，高三设有学术文选读。英文方面的选修课程，高一设有英文短篇小说，高二设有英文长篇小说，高三设有英文时事文选。从高中二年级起，高中代数、解析几何和物理课都采用英文教材，这对于学生熟习英语和练习阅读英文科技书籍，曾起过很好的作用。①

2. 招生考试

民国时期，各中学的招生考试均系自主命题，题型和题量存在很大差异。1931 年，张文昌曾征求粤、闽、江、浙、鲁、冀六省 32 所初中和 20 所高中的暑期招生考试，对中学招生考试试题做了一次调查。虽然外语在小学并非必修课，但调查发现仍有 5 所学校的初中入学考试科目包括英文，占学校总数的 26%。试题题型不尽相同，主要包括：英译中、中译英、单字注解、填字、问题、造句、默句，试题数目多少不等，多为 11 到 20 题。高中招生考试英文科考题的题型和“采用校数”如下表所示：

表 4—7 中学招生考试题型统计

| 题　型 | 采用校数 | 题　型 | 采用校数 |
|---|---|---|---|
| 改误 | 14 | 中译英 | 12 |
| 英译中 | 8 | 填字句 | 8 |
| 作短文或写信 | 7 | 文法造句 | 6 |
| 变动时间式 | 3 | 词字译英 | 3 |
| 词字注解 | 2 | 问答 | 2 |

① 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与学习》，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0 页。

续 表

| 题　　型 | 采用校数 | 题　　型 | 采用校数 |
|---|---|---|---|
| 图解句子 | 2 | 举相反字 | 1 |
| 写文法定义 | 1 | 改声 | 1 |
| 默读测验 | 1 | 并字 | 1 |
| 默句 | 1 | | |

资料来源：张文昌：《中学教务》，世界书局 1948 年版，第 107—109 页。转引自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35—36 页。

从表 4—7 中看出，各校考题中普遍出现了“英译中”、“中译英”、“词字译英”这类题目，这是当时中学普遍采用语法翻译法的一个直接反映。

在民国时期，专科以上学校都是自主命题，自主招生，招生试题的题型、题量、难易程度各不相同。当时的题型主要有“华英互译”、“改错”、“作文”、“语法”等，题量大都集中在三至五题范围之内。由于高校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所以对于考试外语水平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一些名牌大学考题的难度普遍高于一般大学，例如上海交大曾经有一个时期，除了英文，其他一些科目也用英文命题，答题也要用英文。

1938 年，教育部为适应战时特殊环境，制定了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笔试科目有七门，其中公民、国文、英文(投考同济大学及中山大学医学院者为德文)、本国史地四门完全相同。命题及评分标准规定，英文考题包括作文一篇及英汉互译各一篇，其中作文占总分的 50%，汉英互译各占 25%，德文考题与此相同。1941 年以后，又停止全国统一招生，各大学重新自主招生。①

3. 毕业会考制度

1932 年，教育部规定对中学毕业生实行会考制度，外语在会考科目之列。推行会考制度的初衷是提高中学毕业成绩，但在实行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就外国语一科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点：

(1) 试题内容不科学。当时各地外语会考试题过分注重语法和翻译能力的考查，普遍缺乏对听说能力和阅读能力的考查。

---

① 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35—36 页。

(2) 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应试教育的倾向。由于“毕业会考与学校及学生利害较切，教者学者不免舍弃课程标准而迎合毕业会考试题”①，很多教师不得不沿用传统的语法翻译法，间接增加了推行直接法等新型教学法的难度。

## 三、外语教学法

在民国时期，各类中学里使用最普遍和最具影响力的外语教学法主要是语法翻译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和直接教学法(The Direct Method)。从使用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两种教学法各有千秋，可起到互补作用。从使用的范围、可接受性及美誉度②来看，语法翻译法胜过直接法。根据1931年张文昌对中考试题的研究以及当时高考外语试题的题型来看，民国时期的主体教学法是翻译教学法。章兼中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③

### (一) 语法翻译法

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说，他中学课本用的是生活书店的英语课本，“老师先教了我们国际音标，然后读生词，读课文，讲语法，做练习，跟现在的英语课差不多，只是课文全是原文，有伊索寓言，也有泰西五十轶事的选文，不同的是没有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式英文课文，也没有口语和会话的内容”。④ 应该说，胡明扬老师的教学方法是语法翻译法。所谓语法翻译法，是指用母语翻译教授外语书面语的一种传统外语教学法，即用语法讲解加翻译练习的方式来教学外语的方法。语法翻译法又称传统法、古典法、旧式法(Old Method)、阅读法、普鲁士法(the Prussian Method)等。其代表人物为奥朗多弗(H. Ollendorff)和雅科托(Jacotot)等。

根据外语教学史，现代语言教学是在中世纪末开始的。⑤ 迄今为止，外语教学法流派大大小小数以百计，但较有影响的仅有语法翻译法、直接法、交际法、任务教学法等十几家。在外语教学中运用语法翻译法已有几千年

---

① 陆殿扬：《从事实判估毕业会考的价值》，《中华教育界》，第二十一卷第五期(1933年11月)，第8—9页。

② 美誉度是公共关系学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组织获得公众信任、好感、接纳和欢迎的程度。

③ 参见章兼中：《外语教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④ 胡明扬：《外语学习和教学往事谈》，载束定芳：《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⑤ A. P. R. Howatt.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 1.

的历史，但从理论上对语法翻译法进行概括和说明，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外语教学法体系却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在所有教学法流派中，语法翻译法具有最悠久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外语教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因此，关于语法翻译法的诞生背景、内涵特征、是非功过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讨论。

近代学者庄启在1915年的《教育杂志》第七卷第二期上发表《外国文直授法》，首次提出了译授法（翻译法）的五大弊端。庄启可能是最早研究并揭示语法翻译法弊端的学者。[①]

除了肖辉的专著 *A Critique of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②] 及散见于 Jack C. Richards&Theodore S. Rodgers 编著的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③] 等相关的教学法专著中的论述外，还有刊登在各类期刊上的张美平[④]等众多研究者的专题论文（可在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库检索）。这些文献中，人们对语法翻译教学法的态度，可谓见仁见智。限于篇幅，恕不一一罗列。笔者仅摘引相关文献中学界前辈的论述，供参考。

◆ 张沛霖、钟子岩：《翻译法与直接法》

在翻译教学法（Translation Method）上，学生用耳去吸收外国语的机会极少。在四五十分钟的英语授课时间中，学生从教师所听到的英语，其分量远不及讲解英语时所用的国语，学生开始学习英语，并未浸淫在"英语的气氛"（English atmosphere）中，他们在国语的气氛中学英语，常常靠着国语的媒介来理解英语，靠着国语的媒介来发表英语。因为染了这根深蒂固的恶习，他们在英语的解释和发表两方面所表现的成绩，显得非常之坏。要知道，靠翻译得来的外国语的知识，是极不完全的。一国的语言，要丝毫不走样地把它翻译成别国的语言，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思想表现的式样，是各国不同的。而且一国的惯用语句，自有其独特的构成形式，无论译得怎样适当，终难免有

① 《外国文直授法》一文见张正东：《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8—100 页。

② 肖辉：*A Critique of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Jack C. Richards & Theodore S. Rodger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张美平：《语法翻译法的存在价值及其创新运用》，《广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0 期。

隔靴搔痒的地方。①

◆ 王宗炎:《六个教师和一个用低调子说话的人》

使我对英语发生兴趣的不是英国人,而是阿拉伯人——他们创造了文学名著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天方夜谭》)。对于一个十四岁的青年,这本故事太引人入胜了。在我们那个中学里,《天方夜谭》是三年级英语科的唯一教材。……在课堂上,老师从头讲到尾,就像广州广播电台讲《西游记》一样。这种做法,今天的英语教学法专家不免嗤之以鼻,可是对我们却有效。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所读故事离奇有趣,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第二,教材中语言素朴,句法简洁。第三,我必须提到麦念勤先生,在英语方面他是我的真正启蒙者……按今天的标准,麦先生恐怕不能算是很优秀的教师。他把每一个英语音节都念得清清楚楚,没有轻重之分。……但是他有他的长处。他是个十分热心的讲课者。他人虽不高,嗓音可很响亮。他讲课时显然自己觉得饶有兴趣,所以越讲越精神,越讲越眉飞色舞。每个英语句子,他都译成流利的汉语,听起来毫不费劲。我本来想说他的教学法是"语法·翻译法",可是细想起来,语法他也没讲多少,恐怕只能叫做"翻译法"吧?

"翻译法"——单纯的"翻译法"——在教学上也能用吗?许多人会问。我不认为这是没有缺点的方法。可是也有人问过我,"不用翻译法,行吗?"有些补习英语的技术员、工程师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不能把课文译成明白流畅的汉语?为什么他老是在那里枝枝节节地讲单词,讲短语,讲什么主语,什么宾语,可从不直截痛快地告诉我们,一个长句子说的是什么"。

一朵花如果把它擘成七棱八瓣,就再也不是花了。麦先生的办法,也许还有可取之处吧。②

对语法翻译法的是非功过,学界可能会继续讨论下去。不管将会讨论出什么样的结果,但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语法翻译法开启了中国

---

① 张沛霖、钟子岩:《翻译法与直接法》,载《英语教学》,1949 年 6 月出版,开明书店印行,第 34—35 页。

② 王宗炎:《六个教师和一个用低调子说话的人》,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5—136 页。

外语教学法的历史。①

（二）直接教学法

所谓直接教学法（The Direct Method，简称直接法），按照《韦氏大辞典》的解释，是教授现代外语的一种方法，它通过用外语本身来进行的会话、交谈和阅读来教外语，而不用（学生的）本族语，不用翻译，也不用形式语法。直接法又叫“改革法（Reform Method）”。顾名思义，它是对教死语言的语法翻译法的一种根本性改革。改革法是直接法各支派的总称，如贝力子（M. Berlitz）法、古安（Gouin）法、帕默（H. Palmer）法、韦斯特（M. West）法和叶斯珀逊（O. Jesperson）法等。直接法还有自然法（Natural Method）、心理法（Psychological Method）、口语法（Oral Method）等称呼。

① 中国官办的近代外语教育的源头是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自那时起到1922年为止的60年的外语教学中，使用的教法基本上是语法翻译法：首先，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以翻译为主轴：“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孤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其考核方式及其第二课堂活动（如口笔译训练等见习活动）也是如此。其次，上海广方言馆的教学方法是“每日西教习课读，派通习西人语言文字之委员董事四人，环坐传递语言，发明西教习意旨，使诸生易于领受。……课读讲解之时，拟宜用中国语言，讲明意旨。次以西语口授，不但审其字音，并分明句读，以西语连贯读之，日久习熟。”（佚名：《广方言馆全案》，光绪年间印行，第36页。）再次，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外国语一科中学四年教学内容的规定是“读法、译解、会话、文法、作文、习字”。（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12—514页。）最后，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规定：第一学年：发音、拼字、读法、译解、默写、会话、文法、习字；第二学年：读法、译解、默写、造句、会话、文法；第三学年：读法、译解、会话、作文、文法；第四学年：读法、译解、会话、作文、文法、文学要略。”（《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二号，第21页。）从外语教学内容可知，外语教学法基本上是采用语法翻译法。这种方法范存忠有记述：“1920年暑期，我考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二年级……英语课程分三项：读本、语法、练习。语法课上用日本人斋滕编的《英语语法》，要比当时国内通行的语法详细得多。练习课先由老师讲他自己翻译的中国戏剧，我们随笔记录，课后熟读，到了下一周上课时，由老师指定几个人起来背诵，不准出错。”（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张正东称从1862年迄至1922“壬戌学制”颁布共60年的时间为“译学中心期”。这一时期的外语教学的目标指向是为国家服务的翻译和外交人才，这在前30年的体现最为明显。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只能采用翻译法。究其原因，不外三端：一是要解决“急用先学”的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后，同侵略者谈判时连一个懂外语的中国译员都找不出来，而要由外国人来充当译员。所以，创办京师同文馆等外国语学堂，培养翻译人员迎合了政府视野中的国家需要。二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翻译法所走的朗读、背诵、阅读等路子切合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的路子，更符合普通百姓的文化接受心理。三是这一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其他为国人普遍接受的教学法。直接法尽管“五四”前后由庄启和湖南雅礼中学校长盖保耐（Brownell Gage）等人积极引介，但被社会普遍接受还须较长的时间。

直接法是继语法翻译法产生后的有影响的外语教学法流派，它在历史上曾对外语教学法科学的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直接法是民国时期的英语教学中国内采用最为广泛和最有影响的两大外语教学法之一。①

直接法是19世纪末西欧外语教学改革运动的产物，1901年经法国教育部正式命名。它被称为科学外语教学法之始，它开启了外语教学的"方法时代"(methods era)，②20世纪20—30年代是直接法的鼎盛时期。近代学者庄启和湖南雅礼中学校长盖保耐(Brownell Gage)可能是最早将直接法引介至中国的两位学者。盖保耐于1915年著《中国学校英语教授法》，完全采用直接法。庄启则于同年在《教育杂志》第七卷第二七上发表《外国文直授法》，首次提出了"直授法"(直接法)和"译授法"(翻译法)两个术语。在20年代以后，直接法逐渐发展成为与语法翻译法相抗衡的两大主流教学法之一。主要有以下原因：

(1) 在我国出现了一批外语教学法专家，他们不遗余力地推介直接法，除了躬行实践外，还编写了许多直接法的学术专著和教科书。例如，专著有张士一的《直接教学法》、《英语教学法》(中华，1922)、陆殿扬的《英语教学言论集》(正中，1937)；周越然的《初级外国语科教学法》；钟鲁齐的《中学各科教学法》(商务)；张士一等的《外国语教学法》(商务，1925)等。教科书有文幼章的《直接法英语读本》；张士一的《初中直接法英语教科书》(商务，1930)；陆

① 著名学者张正东说民国1922—1949年的教学法"以直接法为主"，似不很确切。我国外语教学在这一时期的28年中，"知名中学、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学校以及教会学校大都采用直接法，外语教学法研究也集中于直接法的运用与拓展"(张正东：《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页)，并且编制出版了大量的直接法教材，这是事实。但是，在面积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直接法的使用受到很大的制约。直接法对教师等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即使一些学校采用直接法教材，不见得就能够按要求去上课，估计按翻译法路子上课的教师不在少数。而且，教师有结合学生的实际对教材的内容和教法有一定的裁量权。更何况语法翻译法"未必像批评者描述的那样恐怖"，而且"对教师水平要求不高"。(Jack C. Richards&Theodore S. Rodger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在1948年，著名学者钱歌川在《英语教学》上撰文说，"在中国一般的学校里，却很少有人采用(直接法)，现在似乎还值得重新提倡。文幼章(James Endicott)编的'直接法英语读本'，虽则编得很好，然而销路不佳，据说是教师不大吃得消，不敢随便采用呢。"(钱歌川：《直接法的英语教学》，载《英语教学》第一卷第一号，民国三十七年六月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出版，第19页。)即便在直接法大行其道的教会学校，也并没有完全排斥语法翻译法。实际上，不少教会学校走的也是传统的翻译法的路子，如许国璋就读的东吴大学附中即是明显的例子。(参见许国璋：《饮水知源 敢忘所自》，《许国璋文集》2，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15页。)

② Jack C. Richards&Theodore S. Rodger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殿扬的《国民英语读本》、周越然的《英语模范读本》(商务,1930)等。

(2) 政府的倾向性。教育部制定的1933年和1948年课程标准基础倾向于直接法。特别是1948年的课程标准[①]更为明显。

(3) 参加制定课程标准的一些专家本身就是直接法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如张士一[②]等。此外,直接法在民国时期得到发展是与盖保耐、周越然、陆殿扬、文幼章、沈同恰等中外知名学者的推动分不开的。

总体而言,用英语教授英语和其他学科的直接法主要在英美等国设立和控制的教会大中小学中盛行。有些私立学校也用直接法,如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匡仲谋先生创办于1907年的私立无锡县匡村中学(现在的锡山市高级中学),物理课就是用的英语原版书。[③] 直接法注重直观教学(intuitional instruction),[④]深受学生喜爱。茅盾于1909年从植材高级小学毕业,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他回忆道:"就我所在的班级说,来代英文课的也姓钱,我们猜他是钱老先生的儿子,私下里称之为小钱先生。他先教发音,从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在黑板上画了人体口腔的横剖面,发某音时,舌头在口腔内的位置。这真使大家感到十分新鲜。这位小钱先生又看了过去我们所作的造句练习,他认为英文教师只是发音不准确,造句练习该改的,他都改得不错,而且英文读本《泰西三十轶事》也是公认的一本好书。"[⑤]

---

① 关于1948年12月修正公布的《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详见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68页。

② 张士一(1886—1969),江苏省吴江县人。1901年考进上海南洋公学。1907年到四川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教英文。1908年回上海南洋公学教英文,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进修,获文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任教,任英文系、教育系教授和系主任等职。为总结张士一教授的教学思想和方法,1986年,《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发起"张士一诞辰10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发表了一组纪念张先生的文章:范存忠:《著名的英语教育专家——张士一先生》;吕叔湘:《回忆张士一先生》;段熙仲:《张士一先生和国际音标教学》;龚启昌:《缅怀先师张士一先生》;吴棠:《重读〈初中直接法英语教科书〉书后》;邬展云:《张士一先生与直接法英语教学》;张贻真:《先父张士一先生的简历和著作》;等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张士一教授的生平和英语教学思想及其活动,是研究张士一及其英语教学活动的珍贵资料。

③ 章兼中:《外语教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④ 直观教学即利用教具作为感官传递物,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向学生展示,达到提高学习的效率或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法是由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把"直观性"作为一项教学原则正式提出后,直观教学便由教育者的不自觉活动转而成为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教育行为。民国时期正式引入了直接法。从教学方式来讲,直接法就是直观教学法,就是通过演示、动作、模仿、手势、物体等直观手段组织教学。

⑤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6页。

尽管直接法在主场地，如课程标准的编写、教材和教学法中占优势，但是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有很大差异，限于教师的水平，大多数学校仍用语法翻译法。中央大学教授艾伟等人于1929—1933年对北京、天津、湖北、安徽等省市30所学校的高中和13所学校的初中包括省立、县立、私立、教会学校进行调查的结果，初中英语教学中重翻译的多。解放前夕在乡镇中学也多采用翻译法，也说明了这一点。[①] 关于直接法，学界前辈多有论述。

◆ 吕叔湘：《回忆张士一先生》

士一先生提倡直接教学法，自己在江苏省第一中学(后来的南京中学)教一个实验班。我间接听到有些家长的反应，说是学生学了一个学期，老是练 Open the door, Close the door，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得。我对这些家长的埋怨还真有几分同情。后来我在苏州中学教英语，教的是高中，课文比较深，很难不用中文讲，连士一先生的得意弟子沈同洽先生也不例外。然而同洽先生教学效果比我好，因为他跟士一先生学过教学法。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一个初级中学兼课，教的是初二的英语。前任教师教的效果不太好，我接手之后试着用点直接教学法，活跃一下学习空气，效果不坏，这才相信直接教学法有道理。[②]

◆ 林语堂：《直接教授法之用处与范围》

凡谈外国语教授法的人，都讲到直接教授法。所谓“直接”是用外国语直接表达意思，不靠本国语翻译。因此法是小孩学话的法，故又称为“自然教授法”。因为抽象观念不易直接表示，故直接法每由具体物件，如衣帽、钟表、耳目五官等教起，故此法又称为“物体教授法”。但是物体教授法范围极狭，譬如教家禽野兽时，不能全数将家禽野兽搬到课室来，所以平常总限于最初的二十课而已。其余须以图画代替实物，或用联想方法表示抽象意义。在此层上，有便有不便。譬如糖盐可以带到课室来，而甜咸之味，却不易表示，除非由教员表演尝味之神情不可。所以极端主张不用翻译者矫枉过正，尝自讨苦恼而已。专重翻译以为练习，固然根本不对，因为翻译时使学者心中时有本国语观念，译入英文，定然不成功，但是在许多解释意义的地方，一二字翻译出来，省却许多周折。再如叫学生译整句的意义，或述其大旨，再令以自然英语译出，是有益无损的；若令字字对译，再使叠字成句，则利少弊多。[③]

---

① 章兼中：《外语教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② 吕叔湘：《回忆张士一先生》，《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3期。

③ 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13，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192页。

直接法虽然在一些学校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也招来不少的质疑声。[①]但是，要在政治、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全面实施直接法教学，是不现实的。理查兹等人(Jack C. Richards *et al*)说，直接法"过分强调并且歪曲课堂中的外语学习和自然的母语学习之间的相似之处，无法考虑到课堂的实际情况"。直接法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它要求教师系"说本族语的人或者说外语要像说本族语那样流畅"。[②] 直接法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教师的技巧，而不是教材。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教师的外语水平都能熟练到能够实施直接法教学的程度。严格实施直接法还会起到反作用，因为教师被要求尽最大努力避免使用母语。然而，有时用母语作简洁明了的解释恰恰是理解和掌握语言的更有效的途径。

## 四、教材的使用与出版

### (一) 教材沿革

中国在科举时代，可以说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材的。八股取士所用的所谓"教材"，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一般学童所用的书籍，仅仅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启蒙读本。[③] 这些书籍，从严格意义上说，算不上是教材。具有近代意义的教材的使用以清末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为发端。例如，道光十九年(1839)创办的马礼逊学校，结合所开设的西学课程，配之以合适的教材。学校"采用之地理教本乃柏利著之《地理学》(*Perley's Geography*)、数学乃哥顿(Gorden)所著之教本。

---

① 例如，关于直接法不主张教学中使用母语，以翻译作为媒介的做法，饱受非议。但根据陆殿扬、张士一等人的观点，系误会。1935年1月，东南大学教授陆殿扬在《教育杂志》上撰文指出："施行直接教学法的教师有二种场合必须要用本国语言：第一种是说明教学方法之如何进行，教材之如何应用——即非教材本身——对于初学是应当用本国话说明的；第二种是解释字或句的意义，凡不能用其他方法解释的字句，自可用本国语言来解释，可以节省时间，免除误会。原来会意的方法有多种：(一)用实物或动作的联想；(二)用翻译；(三)用定义；(四)用上下文。会意本非绝对不可用翻译。……所以 H. E. Palmer(按：直接法的代表人物之一)氏并不严格禁止本国语的使用。H. Wyatt 氏在他的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India* 内亦说：'直接教学法要使学生用英语想，所以要在课内尽量的利用英语，免除一切不必要的本国语。但是为解释生字起见，与其耗费时间及使意义含糊不清，毋宁径用本国语。'"(陆殿扬：《排除外国语直接教学法的误会》，《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四号，第191—192页。)

② Jack C. Richards & Theodore S. Rodger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13.

③ 梁漱溟(1893—1988)在其自传中说："我于六岁开始读书，是经一位孟老师在家里教的。那时课儿童，入手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取其容易上口成诵。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了。"(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但各科教本多由英国及美国教会人士捐赠”。[①] 后来，教会学校使用的很多教材系自编，如创办于同治三年(1864)的山东登州文会馆编写了许多教材，如《笔算数学》(上、下)、《地理志略》、《形学备旨》、《圆锥曲线》等等。这些西学教材系校长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带领师生编写而成。[②]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中创办的一些外国语文学校、军事技术学堂为解决教材问题，相继编写和翻译了一些教材。但这些学堂教材编写是以外国传教士为主体，中国学者(科学家)参与为格局的。京师同文馆编译的西学书籍共有27部，[③]这些书籍大都用来作教材。创办于1868年6月的江南制造局，在1907年完成使命为止，共翻译了约200部[④]的西方人文社科、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大部分作为教材在其附设机构广方言馆、操炮学堂以及烟台、厦门等地的学校使用。1877年5月，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s Series Committee，又称“益智书会”)，决定由傅兰雅(John Fryer)、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人为教会学校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教科书。“教科书”一语即来源于此。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编纂《蒙学课本》三编，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⑤] 光绪二十四年(1898)，管学大臣孙家鼐即奏请于京师大学堂内，附设编译局，集中一些懂外语的人才专门翻译、编辑西方教科书。是年7月3日，光绪帝发布上谕，正式建立译书局，由孙家鼐督率办理，梁启超具体操办。清末民初掀起了编译(写)教材的高潮。

至于何时出现近代中国英文教科书，相关史料似未专门提及。根据石鸥(2008)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上海)于1898年出版，由谢洪赉(1872—

①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② 关于登州文会馆正备斋的课程设置及使用的教材的情况，参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印刷，1913年，第29—31页。

③ 详见《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二十四年(1998)刊。另见张美平：《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335页。

④ 关于江南制造局译书的数量及种类，文献有不同说法。参见魏允恭编《江南制造局记》，1905年刊印；陈洙等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清宣统元年七月石印版；上海制造局出版发行的《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光绪二十六年印行；吴馨等修的《上海县续志》，上海南园志局于1928年出版。

⑤ 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出版周刊》第156号，1935年商务印书馆刊。另有“1895年钟天纬在上海开办三等学堂，即自行编辑教本”一说。(参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47页。)

1916)译注的《华英初阶》[①]、《华英进阶》是中国最早的英语课本。[②] 次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中国大陆第一部英汉字典——《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商务印书馆由此开始了中国人独立编纂英文教科书的历史,从 1898 年开始,在五十多年的岁月中为我国的英语教学编辑出版了一百多种教科书,对我国的英语教学、英语普及作出了贡献。根据张英(2004)的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教科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读本类,课文为主,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涉及语法等。第二类以语法为主,全书基本按照语法体系排列。第三类是合编类,将课文与语法合编在一起,边学习课文,边学习语法。同时商务印书馆还注意了编辑有不同侧重点的英语教科书,如有的侧重作文,有的侧重练习,有的侧重语法。[③]

创办于 1912 年 1 月的中华书局(上海)和商务印书馆一样,是民国时期英语教科书和各类读物及词典等工具书的出版重镇。中华书局创办伊始便相继出版了沈步州编写的《中华中学英文文法教科书》(1912)、李登辉的《英文》(1913)、沈步州的《中学英文法初步》(1914)等各种类型的中学教科书。

民国以降,清末掀起的英语学习热持续升温,[④]英语教科书的需求量很大,而当时有资质的出版社不是很多,因而各类学校大多采用这两家出版

---

① 《华英初阶》是一部中英文对照排版印刷的英语教科书,以英国人为印度小学生编印的课本 *Primer* 作为母本,经翻译改编而成。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影响很大。据梁漱溟回忆:"1893 年我出生在北京。那时北京也开始办起了洋学堂。小学时我进的是当时的中西小学堂。学校的主持人叫陈镕,是福建人。在中西小学堂,我开始学习 ABC,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 页。)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也曾提及,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学英语的课本就是《华英初阶》。(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2 页。)胡适在他的自传《四十自述》之《在上海求学》中,说他上梅溪学堂时"英文班上用《华英初阶》"(胡适:《胡适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5 页)。《华英初阶》成就了近现代许多名人的英文。

② 石鸥:《我国最早的自编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与〈华英进阶〉》,《书屋》,2008 年第 5 期。

③ 张英:《〈启迪民智的钥匙——商务印书馆前期中学英语教科书〉绪语及结语》,载《出版史料》,2007 年第 4 期。

④ 不仅政府重视(从课程设置从即可看出),规定中考、会考和高考等必考外语,而且像银行、铁路、邮政、海关等热门行业招收雇员时,外语都被列人必考科目,这充分说明时人对外语的倚重。比如投考邮局,首先要写一份申请书(Letter of Application),说明投考者的履历以及投考邮局的理由,中文、外语都可以。举行正式招考测验时,先把报考人分成几个小组,进行口试,主考官先用外国语询问报考人的姓名、住址、家庭状况、毕业学校、投考愿望以及考上后是否服从调遣等,然后让投考者念一篇没有标点的文言文、最后还要从外文报纸上挑一段短文让投考者读一读,并简单翻译一下。笔试科目包括外国语(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均可)、国语、地理、算术。(仙寄:《投考邮政的经验》,《中学生》1934 年 6 月号,第 113—117 页。)

的出版物。总体而言，当时编写的教材质量是过关的。知名学者刘炳善在《英语学习：回忆与感想》中说："当时的中学英语课本的确编得很好，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那时候各大书店（出版社），如商务、中华、开明、北新，都不惜重金礼聘外语界的大师名家编辑英语课本，互相竞争，各有特色：初中课本除林语堂、李唯建编的之外，还有林汉达编的；高中课本当中，林语堂曾编过《开明英文文学读本》，因内容过专（只收英国文学作品），没有怎么流行；后来开明又出了柳无忌编的《高中英语》，内容更广泛多样，在抗日战争中各地使用过。"①

民国时期国人自编的教科书，程度深浅不一。一般来说，课本程度比较深，词汇量比较大。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语编辑室的研究（1982），民国时期流行较广的教材有下列几种：

表 4—8　　建国以前流行较广的教材

| 书　名 | 编　者 | 出版者 | 初版年份 |
|---|---|---|---|
| 华英初阶 | 谢洪赉 | 商务 | 1898 |
| 华英进阶 | 同上 | 商务 | 1898 |
| 英华初学 | E. A. Spencer | 商务 | 1898 |
| 纳氏英文法 | J. C. Nesfield | 印度 | 1899 |
| 英文初范 | 徐永清 | 商务 | 1902 |
| 英文汉沽 | 严复 | 商务 | 1904 |
| 帝国英文读本 | 伍光健编，学部审定 | 商务 | 1904 |
| 中等英文典 | 神田乃武 | 商务 | 1908 |
| 英文教程 | （不详） | 商务 | 1909 |
| 增广英文法教科书 | G. L. Kittredge, S. L. Arnold | 商务 | 1909 |
| 英文益智读本 | （不详） | 商务 | 1910 |
| 简要英文法教科书 | Newsom | 商务 | 1910 |
| 英语模范读本 | 周越然 | 商务 | 1917 |
| 英文津逮 | H. B. Graybill | 伊文思 | 1919 |
| 英文读本文法合编 | 胡宪生等 | 商务 | 1923 |
| 开明初中英文读本 | 林语堂 | 开明 | 1927 |
| 文化英文读本 | 李登辉 | 商务 | 1928 |

① 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 页。

续 表

| 书　名 | 编　者 | 出版者 | 初版年份 |
|---|---|---|---|
| 初中标准英语读本 | 林汉达 | 世 界 | 1930 |
| 直接法英语教科书 | 张士一 | 中 华 | 1930 |
| 国民英语读本 | 陆步青(即陆殿扬) | 世 界 | 1932 |
| 综合英语读本 | 王云五等 | 商 务 | 1933 |
| 直接法英语读本 | 文幼章(James G. Endicott) | 中 华 | 1935 |

资料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语编辑室：《建国以前的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2年第一辑。

(二) 民国教材的特点

(1) 用直接法编写。代表人物有直接法的热心倡导者周越然、陆殿扬等人。重视语音训练。不重视语法翻译,所有讲解都用英文。《英语模范读本》(周越然著)、《正中初中英语》(陆殿扬著)是直接法的代表性教材。1928—1935年"是外语教学相对规范发展的时期,其时经教育部正式审定的初中英语教材20种,含直接法观点者达15种,占75%。据《建国以前的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一文列举,《九种代表性材料内容》中初中教材有七种,直接法教材占86%"。[①]

(2) 以传统的语法翻译法编写。重视语法训练,不重视语音。如《(伪)国定教科书初中英语》等。

(3) 用折中法编写。如林语堂的《开明初中英文读本》,从口语入手,既重视语音训练,又重视语法训练,着重抓关键问题,着重比较。

从内容和词汇量来看,民国教材也有自身的特色:

(1) 不管是以直接法编写的教材,还是用语法翻译法、折中法编写的教材,都很重视英美文学作品。题材广泛,程度较深。有些课文直接选自原作,长而深。

(2) 要求高,词汇量大。以表4—9为例。《英语模范读本》等5种初中教材的平均词汇量高达2,942个。词汇量最大的《英语模范读本》,高达4,433个,最小的是林语堂的《开明初中英文读本》,词汇量也有2,356个。这样的词汇要求是很高的,很可能是脱离实际的。《英语模范读本》(4,433个词汇)的要求竟然达到了现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2003)中

① 张正东:《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的九级标准(要求学会使用4,500个左右的词汇和一定数量的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而普通高中英语毕业标准(七级)是要求学会使用2,400—2,500个单词和300—400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①] 初中毕业标准(五级)是学会使用1500—1600个单词和200—300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②] 词汇量最少的《开明初中英文读本》居然也接近现在普通高中所要求的毕业标准。众所周知,现在的外语学习条件和氛围远远超过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高中英语教材的种类不多,主要是文选类的教材。有一定声誉的教材主要是《高中英文选》(苏州中学教员英文研究会编)、《标准高级英文选》(李儒勉编)。

表4—9　七种有代表性的教材内容和词汇量比较表

| | 书名及相关信息 | 初版年份 | 册数 | 词汇量 | 内容及编排特点 |
|---|---|---|---|---|---|
| 初中(或相当于初中)教材 | 英语模范读本(供旧制中学四年用,改三三制之后,有些学校在初中使用一部分,然后换用其他教材(周越然编) | 1917 | 4 | 4,433 | (1) 完全不用翻译法,所有讲解都用英文。<br>(2) 语音,在第一册中间介绍国际音标,发音要求严格。<br>(3) 词汇丰富,一般实用。前三册侧重日常生活的内容。<br>(4) 二、三册讲语法,以归纳法为主。第四册讲修辞、作文。<br>(5) 第四册全部是英美古典文学片段,题材多样,程度深。 |
| | 开明初中英文读本(林语堂编) | 1927 | 3 | 2,356 | (1) 从口语入手,重视语音训练和习惯表达方式。全是使用国际音标。<br>(2) 语法训练,着重抓关键问题,着重比较。<br>(3) 课文生动、活泼,注重兴趣。<br>(4) 重视词汇、句型的重现。 |
| | 初中标准英语读本(林汉达编) | 1930 | 3 | 2,500(约) | (1) 重视听、说、读、写全面训练。<br>(2) 语法,例句多,重实用,理论讲述少。<br>(3) 课文注重兴趣,小诗、小故事多,体裁、题材多样。<br>(4) 重视词汇、句型的重现。 |
| | 正中初中英语(陆殿扬编,伪教育部审定) | 1935 | 6 | 2,990 | (1) 运用直接法,主张从口耳入手,多用问答练习。1947年经修订,改称《国民英语读本,编者改署陆步青。第一册增加了国际音 |

① 国家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 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7页。

② 国家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 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续 表

| | 书名及相关信息 | 初版年份 | 册数 | 词汇量 | 内容及编排特点 |
|---|---|---|---|---|---|
| 初中（或相当于初中）教材 | 正中初中英语（陆殿扬编，伪教育部审定） | 1935 | 6 | 2,990 | 标的材料，从第一课起开始正规的音标教学。又，此书采用正楷（印刷体）练习书法，不用手写体。<br>(2) 语法，用归纳法，不用语法术语。<br>(3) 课文内容，讲自然、史地等知识的材料和文学作品占较大的比重。 |
| | 伪国定教科书初中英语 | 1941 | 3 | 2,430 | (1) 以语法为纲。<br>(2) 没有语音教材。<br>(3) 课文以故事为最多，第二册占 65%，第三册占 59%。 |
| 高中 | 高中英文选（苏州中学教员英文研究会编） | 1929 | 3 | 2,628 | (1) 选欧美名作之富于兴趣者，由浅入深编排。<br>(2) 有问答、造句、背诵练习，平均每课 10 题左右。<br>(3) 注释及解说用英文。 |
| | 标准高级英文选（李儒勉编） | 1931 | 3 | 4,473 | (1) 选欧美名作，课文长而深。<br>(2) 练习要求高，有写出故事要点、用英语释义等。 |

资料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语编辑室：《建国以前的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2 年第一辑。

上述教材中，周越然的《英语模范读本》(*Model English Reader*)，H. B. Graybell的《英文津逮》(伊文思公司 1919 年版)一样，是民国时期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英语模范读本》共四册，供中学各年级使用，是按照直接法编写的教材。该书完全不用翻译，所有讲解都用英文。在第一册中间介绍国际音标，前三册侧重日常生活的内容，第二册、第三册讲语法以归纳法为主，第四册讲修辞、作文，该册全部是英美古典文学片段，题材多样，程度较深。由于“这时期的英语教材，比较侧重培养阅读和翻译能力，对口语不甚重视；比较重视语法教学，并且多采用传统的由词类而句法注重定义解说的教学方法”①，而以直接法编写的《英语模范读本》适应了时人的要

① 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7 页。

求，所以该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成为畅销书。[①]

（三）部编教科书制度

部编教科书制度滥觞于清朝末年。清政府中较早认识到编译教科书重要性的是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上奏的《敬陈大计疏》把翻译教材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求才莫先于教学，而教学莫先于译书”；“采西法而不能翻译各国书籍，是犹无米之炊。”[②]次年，张百熙又呈《奏办京师大学堂疏》，称：“然译局非徒译一切书籍，又须翻译一切课本。泰西各国学校，无论蒙学、普通学、专门学，皆有国家编定之本，按时卒业，皆有定章，今学堂既须考究西政西艺，自应翻译此类课本，以为肄习西书之需。惟其中有与中国风气不同及牵涉宗教之处，亦应增删润色，损益得中，方为尽善。”[③]20世纪初，《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时，就已有了审定教材的规定。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设立编译图书局，拟编辑统一各种教材，取各家著述加以审定，以备各学堂之用。这是我国部编教科书的开始。此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审定教材的凡例和书目，如《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文》、《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并表》等。1909年，学部变更初等学堂课程，将部编各教科书书目注于各科目之下，从此时起也就产生了“国定教科书”的说法。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民国宗旨，前清学部所颁及民间通行教科书中有崇清及旧时官制避讳抬头等字样，应逐一更改；教员遇有书中有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并报指教育司或教育会，通知书局更正。”[④]根据同年颁布的《审

---

① 周越然的《六十回忆》介绍了《英语模范读本》的出版情况：“英模成于民国七年戊午（1918），初为四册，后因中学学制变更，改成三册，即取消第四册，以符合初中教程也。从开始至现今，修订计五六次，销行约百万部——在此二十五年中，华人自编之外国语读物，绝无胜过其耐久力或超过其畅销性者。民国十年至二十年为英模最盛时代……当民国五六年间，西人及华人之以英文读本稿件投人商务者，为数甚夥；非太简，即太繁，非材料不称，即不合学制——千篇一律，陈腐可笑。盖当时‘作家’皆不谙外国语教育法原理，专究英美人本国文之读物，而未见德法人外国语之教材耳。长沙盖保耐之《实习英语》，尚合初学之用，但只出两册，屡催而不继续。……余抵南京未及半月，而邝君即有信来，谓所长与彼皆以余之样课为最佳，已决定收受印行，嘱我从速完成云云。后闻当时应邀而投稿者有八九人之多，或全部完成，或已成一册，或誊写精审，或自描彩画，商务皆一一却之……英模销路极广，同业中皆知之。有爽直抄袭者，亦有黯然仿效者。至于滥用‘模范’或改用‘标准’或其他类似之字为书名者，更指不胜屈。”（周越然：《六十回忆》，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62—70页。）

② ［清］张百熙撰：《张百熙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7页。

③ ［清］张百熙撰：《张百熙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3页。

④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版，第242页。

定教科用图书暂行章程》，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的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①] 1915 年，教育部设立教科书编纂处。1918 年，教育部第一次公布重新审定之教科书。1932 年，教育部设立国立编译馆，行使审查教材图书之职。1933 年 5 月，教育部成立“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此后，至 1949 年在组织机构上未有多大变动。[②] 以下是 1929—1935 年间经教育部审定的部分中学英语教科书：

**表 4—10　　暂时课程标准公布前审定中学教科图书表(英文)**

**(此表自十七年大学院成立，至十八年九、十月教育部公布初高中暂行课程标准时止)**

| 书　　名 | 适用年级 | 册数 | 编著者 | 送审者 | 审定时间 |
|---|---|---|---|---|---|
| 新学制初中英文读本文法合编 | 初中 | 三 | 胡宪生 | 商务 | 十八年五月八日 |
| 新学制初中英文法教科书 | 初中 | 一 | 胡宪生 | 商务 | 十八年五月十日 |
| 新中学教科书英语读本 | 初中 | 三 | 沈彬 等 | 中华 | 十八年六月十四日 |
| 新中学教科书高级英语读本 | 高中 | 一 | 朱有渔 | 中华 | 十八年二月五日 |

资料来源：浙江省教育厅编：《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六卷第二十三期，第 19 页。

**表 4—11　　暂时课程标准公布后审定中学教科图书表(英文)**

| 书　　名 | 适用年级 | 册数 | 编著者 | 送审者 | 审定时间 |
|---|---|---|---|---|---|
| 英语模范读本 | 初中 | 三 | 周越然 | 商务 | 十九年一月六日 |
| 开明英文读本 | 初中 | 三 | 林语堂 | 开明 | 十九年二月廿六日 |
| 现代初中英语教科书 | 初中 | 三 | 周越然 | 商务 | 十九年九月九日 |
| 英语标准读本 | 初中 | 三 | 林汉达 | 林汉达 | 二十年四月廿一日 |
| 进步英语读本 | 初中 | 三 | 进步英文学社编译 | 世界 | 二十年六月十三日 |
| 英文修词学 | 高中 | 一 | 林天阑 | 中华 | 十八年十二月廿一日 |
| 新中学高级英文典 | 高中 | 一 | 王昌社 | 中华 | 二十年一月八日 |
| 高中英文选 | 高中 | 三 | 苏州中学教员英文研究会 | 中华 | 二十年六月十日 |

资料来源：浙江省教育厅编：《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六卷第二十三期，第 15 页。

①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19 页。

②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1 页。

表 4—12　　正式课程标准公布后审定中学教科图书表(英文)

(自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二十四年二月)

| 书　　名 | 某学校用 | 册数 | 编 著 者 | 送审者 | 审 定 时 间 |
|---|---|---|---|---|---|
| 开明英文读本 | 初中 | 三 | 林语堂 | 开明 | 二十三年六月卅日 |
| 国民英文读本(一、二册) | 初中 | 二 | 陆步青 | 世界 | |
| 初中英语标准读本 | 初中 | 三 | 林汉达 | 世界 |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 |
| 英语模范读本 | 初中 | 三 | 周越然 | 商务 | 二十二年十月廿七日 |
| 直接法英文读本 | 初中 | 四 | 文幼章 | 中华 | 二十三年一月十一日 |
| 新标准初中英语(第一册) | 初中 | 一 | 赵廷为等 | 开明 | |
| 综合英语读本 | 初中 | 六 | 王云五等 | 商务 | 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三日 |

资料来源：浙江省教育厅编：《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六卷第二十三期，第 12 页。

此外，除了部颁审定教材，配合英语教学，一些出版机构编译出版了相关的教材或补充读物，流传甚广，如：

《鲁滨逊漂流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木偶奇遇记》(*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

《天方夜谭》(*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

《泰西五十轶事》(*Fifty Famous Stories Retold*)；

《泰西三十轶事》(*Thirty Famous Stories Retold*)。

高中多半不用课本(当时出版的高中英语课本也极少)，一般是采用一种文选，或者采用一两种名著，同时采用一种语法。这三类书，流行较广的是以下几种：

《高中英文选》(苏州中学教员英文研究会编，中华 1929 年版)；

《标准高级英文选》(李儒勉编，商务 1931 年版)；

《中学英文选》(赵乐溪等编，文化学社 1937 年版)；

《莎氏乐府本事》(G. Lamb & M. Lamb：*Tales from Shakespeare*)；

《伊尔文见闻杂记》(W. Irving：*Selections from the Sketchbook*)；

《富兰克林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块肉余生述》(C. Dickens：*David Copperfield*)；

《威克裴牧师传》(O. Goldsmith：*The Vicar of Wakefield*)；

《高级实验英文法》(邓达澄编，商务版)；

《纳氏英文法第四册》(J. C. Nesfield)；

《泰氏英文法》(W. M. Tanner：*Correct English*)；

《英文典大全》(D. Lattimore：*A Complete English Grammar for Chinese Students*)；

《自修英文文法大全》(山崎贞著，金则人编译，世界版)；

《开明英文法》(林语堂编，开明版)；

《开明新编中等英文法》(吕叔湘编，开明版)；

《泰氏作文和修辞》(W. M. Tanner：*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李氏英文修辞作文合编》(李登辉，*Lee's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除去上述初、高中教材之外，这个阶段还出版了一些教学辅助用书，一般可分四类：(1) 名著的注释本，节本，英汉对照本。(2) 语法、修辞、作文、应用文、会话之类的书。(3) 学生用的英语期刊，如：《英语周刊》(商务版)、《中华英文周报》(中华版)等。(4) 工具书，如：《英汉模范字典》(商务版)等。这些辅助用书，对英语教学所起的作用很大。①

民国时期，教材使用的环境相对宽松，教育行政机关一般不会干涉，部颁教材仅是指导性的，并非指令性的，因此，各学校使用教科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以下是东南大学附属初级中学的教材使用情况：

表 4—13　　民国十三年度东大附中各级科目用书(英文)一览表

| 级 别 | 必/选修 | 科 目 | 书　名 | 出版或购处 |
|---|---|---|---|---|
| 初一 | 必修 | 英 文 | 1. 模范英语读本第一册 | 商 务 |
| | | | 2. 英文津逮卷一 | 伊 文 |
| 初二 | 必修 | 英 文 | 1. 模范英语读本第二册 | 商 务 |
| | | | 2. 英文津逮卷三 | 伊 文 |
| | 选修 | 英 文 | 实习英语教科书第二册 | 商 务 |
| 初三 | 必修 | 英 文 | 1. 泰西三十轶事 | 商 务 |
| | | | 2. 英文津逮卷四 | 伊 文 |
| | 选修 | 英 文 | 天方夜谭 | 商 务 |
| | 选修 | 商业常识 | 英文商业常识 | 商 务 |

资料来源：曹刍：《东大附中初级中学课程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八号，第 13—14 页，有改动。

① 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语编辑室：《建国以前的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2 年第一辑。

## 五、民国中学外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民国中学外语教学质量还是不错的，民国时期能够培养出季羡林等众多的外语英才即是明证，而这些人后来在国内外的知名高校里接受优质教育，但他们深厚的功底是在国内中学里打下的。他们的外语水平、国学功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恐怕直至今天也鲜有人能超过。许多后来就读非外语专业、在各行各业取得非凡成就的人们，他们的外语水平也非同一般，这应当归功于受到良好的中学教育。在抗战爆发之前的 25 年的时间里，外语教育发展平稳，没有经历大起大落。民国时期教学环境宽松，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相对较松，各校因而获得了很大的办学自主权。这是教学质量获得发展的必备条件。

然而，民国时代的外语教学不是没有缺点，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忽视语音教学

语言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学习的根本，只有学好语音，“语言知识才能有效地表达出来，才能有成就感，增强自信，形成良性循环。”①民国时期，除了少数条件好的教会学校和公立学校，大部分学校都忽视语音教学，普遍不教国际音标。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刘炳善(1927—2010)指出：

> 解放前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共同缺点是不对学生教语音知识，遇到讲生词的发音，只是按照“韦氏音标”(美国 Webster 字典的注音方式)标一下重音，讲讲哪个“母音”(元音)字母该发“长音”或“短音”——但关于“韦氏音标”也不系统讲解。因此，学生只能跟着老师念，老师念错了跟着错。记得一位老师讲 water 一词中 wa 的发音时，只是打比喻说：“嘴里就像吞下一个滚烫的丸子，张得那么大！”我还听见另一位老师总是把 Robinson Crusoe 说成是“Lobinson clusoe”。其实，当时国内已有关于语音学的书，国际音标中 48 个因素也不难掌握，但老师们不是只重文学，就是重语法，不教语音，所以学生往往发音不准。范存忠先生曾在一本书里说他在中央大学松林坡居住时，每天早晨听学生们从窗下念英文走过，都带有各自家乡的方音，因此想

① 王初明：《抓好语音训练 培养良好心态》，《英语知识》，2002 年第 1 期。

了一副对联："一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1]

（二）不重视听说能力的培养

这应当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当时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很多学校都对听说能力重视不够。受条件所限，内地省份和大部分农村地区都采用语法翻译组织教学。该法的一个重大弊端是不太重视听说教学。[2] 当时的中考和高考都没有将听说列入考查范围，更是导致了听说被边缘化的结局。二是当时中学生自身对听说也不够重视，"往往认为学习英语只要自己能读书就好，会话是不必要的，所以不注意口耳的练习"。[3] 他们在外语课上，"往往羞于启口，年龄较长者尤甚。他们愿意默坐静听，不愿自己说话或有何动作，以致授课时间完全为教师讲解发问所占去，学生模仿练习时间甚少，偶有问答，亦仅说一二字，已若不胜羞惭者。"当时不少中学生的英语会话能力，"还不及上海一般外人家中所雇佣的 boy 和 amah 呢！自然，这些仆欧与阿妈所说的英语，是夹七杂八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但他们能听懂外国人所说的话，同时也能使外国人听懂他们所说的话，无论他们说的怎样幼稚，拙劣"。许多中学生"就连这点也办不到"，"因口音不正确，音调错误，使听的人莫名其妙，结果弄得面面相觑"。[4]

（三）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当时中学生在外语这一科上所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多于其他学科。"他们日夜勤读英语的情形，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没有一校的学生不是对英语怀着莫大的戒心，没有一个学生不是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便精神奋发地起身，捧着英文书籍努力攻读。平常的自习时间也是这样的情形，只要其他各科的练习或笔记已经做完，没有不读英语的。"这些学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中去，效果却不理想。1931 年 9 月，国际联盟应国民政府的请求，特派考察团来华研究改进中国教育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最后考察团完成一项题为《中国教育之改进》的报告。报告中对中国外语教学做了简要评价："中学生约费六分之一之时间以学英文，六年之后，学业告终，尚多不能参考各种课程中应阅之英文书籍，多未读过几册值

① 刘炳善：《英语学习：回忆与感想》，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8 页。

② Jack C. Richards & Theodore S. Rodger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

③ 张沛霖、钟子岩：《英语教学》，开明书店 1949 年版，第 4 页。

④ 杨承芳：《英语学习法》，开明书店 1948 年版，第 2 页。转引自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45 页。

得一读之英文书本。”国联考察团虽然走马观花，但旁观者清，其报告倒是部分地触及到了民国外语教育问题的本质。①

虽然民国时期的外语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但大多数问题是外语教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任何时代都是难以避免的。当然，有些是为时代或外语教学条件所局限，如培养外语听说能力所需要的媒介（英文广播、电视、纸质文本、收录音机等）在民国时代除了大中城市、沿海通商口岸等地，是相当缺乏的，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更是阙如。民国的外语师资在农村地区也是不尽如人意的。虽然有一些归国留学生、国立、私立和教会立的大学毕业生充当师资，但毕竟人数是有限的，很难惠及偏远省份及农村地区。而且，整个民国时期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对教育的影响至大而深远。因此，要求这一时期的外语教学完美无缺是极不现实的。不管怎样，民国中学外语教学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通今博古、中西贯通的外语英才和众多的人文、科技才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些人才后来在国内外的大学、研究院中继续深造，大多数成了服务祖国的建设人才。他们中很多人的外语水平、人文社科和科学技术知识，哪怕在 21 世纪的今天也鲜有人能够超过。

## 第二节　荣光永久招展——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 一、学校沿革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是从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外院②演变发展而来的。要探讨南洋模范中学的来历，得从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③公学谈起。

时任直隶津海关道的盛宣怀（1844—1916）在创办洋务过程中，深感“不谙文语，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苦”。④ 他体会到要使洋务事业发展，必须培植通西语、懂技术的人才。因此他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

① 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44 页。

② 南洋公学外院即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创建于 1901 年，为中国“公立小学之始”。

③ “南洋”是指当时的上海。因为清末从闭关自守到鸦片战争后，就以天津和上海两个城市作为对外贸易联络的主要口岸，设有两个大臣，一个叫北洋大臣，一个叫南洋大臣，分别主管这两个地区的对外事务。现在我们常常说起北洋军阀，就是从袁世凯在天津培植起来的军队骨干得名的。南洋这个名称当时在上海用得很普遍。

④ 《上海交大档案》508 卷，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 页。

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以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为先务之急"。[①]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氏多方奔走,"实以学校作之根柢,常与美国博士福开森、武进何梅生两君参考欧美学制",继上年在天津创办了中西学堂之后,又在上海"捐购基地,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②] 他在向清廷呈奏《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道出了他的设学意图:"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政治、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皆可兼学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学堂系士绅所设,然外部为其教习,国家于是取材。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③]办学经费由招商局和电报局的商人捐献,"今上海学堂之设,常费皆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所捐"。[④] 翌年1月24日,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奏折,得到清廷的批准。

盛宣怀亲自担任南洋公学督办,总理(校长)一职由何嗣焜(1843—1901)担任,美国传教士、前南京汇文书院院长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任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根据《南洋公学章程》,学校将设立四院,即上院、中院、外院和师范院。关于南洋公学的创办及四院,《清史稿》记载:"二十三年,宣怀又于上海创设南洋公学,如津学制而损益之,经费取给招商、电报两局捐助。奏明办理,因名公学。分四院:曰师范院,曰外院,曰中院,曰上院。外院即附属小学,为师范生练习之所。中、上院即二等、头等学堂,寓中学堂、高等学堂之意。"[⑤]

在这四院中,"先设师范院一学堂,延订华洋教习,课以中西各学,要于明体达用,勤学善诲为指归"。[⑥] 南洋公学于1897年2月张榜招生,考选成才之士四十名。是年9月,南洋公学仿照日本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校的做法,设立外院,其缘由,正如盛宣怀所说,"臣惟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蒙养正则圣功始,故西国学程必植基于小学。"外院相当

① 盛宣怀:《奏陈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附章程),载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上海书局石印,光绪辛丑年,第323页。

② 唐文治:《愚斋存稿·序》,载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卷二,思補楼藏版,1930年刻本,第1—2页。

③ 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④ 盛宣怀:《奏陈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附章程),载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上海书局石印,光绪辛丑年,第326页。

⑤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25页。

⑥ 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于小学，主要是为将来成立的南洋公学中院输送毕业生。招收的第一批外院学生共120名，年龄在8至18岁之间，学业深浅各异。公学根据其中文、英文程度的高低，分成大、中、小6个班。1898年2月，南洋公学创办中院，中院即二等学堂，是为设立上院而创办的。上院于1901年设置。

"南洋公学"之名从1896年一直沿用到1904年，前后历时共8年。是年学校改隶商部，改称"商部高等实业学堂"，之后又数易校名，先后改称"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等。1921年，北京政府统一学制，统称交通大学。

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在创办时期，程度相当于后来的高等小学。学制先是三年，有一段时期是四年。课程设置，开办时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理科、图画、体操等学科。第三年(1903)起加唱歌，第五年(1906)起加英文，以后相继加上读经、手工、童子军及拳术等。当时学校里英文课本是《Roval Reader》，有好几册，据说是英国人编来给印度人读的。还有文法，读的是《Nesfield Grammar》，通常叫纳氏英文法，一共有四本，附小里读到二卷或三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首任堂长(校长)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1865—1953)。

20世纪20年代，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改为初中小学共计五年。从1901年到1927年，是南洋中小学作为交通大学附属学校的时期，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前身。1924年增设初中。1927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下令停办中小学，于是学校脱离大学独立，改为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1930年增设高中，1938年迁入天平路200号，增设女子部。1956年改为71中学，1958年恢复原名。

## 二、教学及其管理

### (一) 学生选拔标准严格

南洋模范中学(简称南模)作为一所名校，是万千学子梦想的精神家园。每到招生时节，总是门庭若市，被来自全国各地考生挤破门槛。充足的生源为学校提供了很大的挑选余地，因而学校制定严格的选拔标准。据1939届校友奚正修在《难忘的恩泽》中回忆："南模入学选拔严格，学生凡具备良好的品行和优秀的学习素养者，才能获选入学。我在南洋中学刚读完高中一年级，就爆发了淞沪抗战。由于南洋中学因故暂不开学，我怀着对南模仰慕的心情，去校申请转学。接待我的是校长沈同一老师，他听我诉说了情况后说：你在原校的学习成绩，虽名列前茅，但不能马上接纳你，必

须先经过两位老师的口试,如能合格,还要试读半年,各课都在70分以上时,才能得到转正。后来,这些要求总算一一通过了,我才终于成为一个南洋模范中小学的正式学生。"①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朱雯(1911—)的父亲认为英语有用,学好英语可以"吃铁路饭"。于是在1923年夏天朱雯小学毕业后,就让他报考南模的前身——南洋公学附属中学。由于"英语不过关",朱雯"名落孙山"。② 这一细节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南模的英语教学质量为社会所认可,二是学校重视英语,不录取英语不合格者。

决定学校教学质量高低优劣的因素有很多,如教师的职业素养及责任心、校长的能力等,其中生源素质也是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有时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学校照顾少量的不合条件的学生入学也符合情理与常规。但在这一问题上,南模体现出名校的风范,常常摒弃这种"情理与常规",严把入学质量关,"即便是校长的儿子,也毫不例外。当年赵宪初校长的一个儿子报考南模,未达到分数线,赵校长也没有为此给自己开后门,而是让他进了分数要求相对低些的徐汇中学"。③

(二)重视英文教学,教师要求严格

民国时期,由于中国的殖民地色彩比较浓厚,英语得到畸形发展。最为典型的是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已成为一枝独秀。而此时的公立和私立学校,尤其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大中城市的公私立学校为了与以英语和科学教学优长的教会学校竞争,也不甘落后,纷纷将英语作为重要的课程来抓,而且要求非常高。如季羡林读高中时,老师用英文上历史课。英语课用的教材对中学生来说是相当难的,如《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拊掌录》(*Sketch Book*)、《格里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纳氏文法》(*Nesfield's Grammar*)等。④

作为"交大附中",南模非常重视英语和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立体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全部用英文原版教材。这些教材都是从国外最新教科书中精选出来的。除了采用英文原版教材,

① 转引自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硕士论文,第29页。

② 朱雯:《思往事,惜流芳》,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③ 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硕士论文,第29页。

④ 参见季羡林:《我和外国语言》,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学生的数理化课本中所有的习题都是英语的，作业也必须用英语解答。这样数理化课同时也就成了英语的练习课。数理化教师如俞养和、贾冰如、徐宗骏、沈克超、王季梅、朱仲铭、任象天等全部采用双语教学。而英语课要求更加严格，精选了不少名著名篇，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威廉·华斯渥兹的著名诗篇——《水仙花》、狄更斯的《大卫·科柏菲尔选段》等，重点课文要求学生必须滚瓜烂熟地背诵。此外，教师在讲授语法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培养学生写作修辞的本领。学生每两周写一篇英文习作。这些教学方法的实施，在培养学生准确发音、行文写作以及开展语言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强的效力。此外，在英语教学中，不仅教师要求严格，学生也从不敢掉以轻心。1949 届毕业年刊中有一篇描写上英文课的小品《我们的一课》，把当时的课堂情形描写得呼之欲出，现摘录其精彩片段：

> 上课前传出一片琅琅的读书声，"问不出"不是好玩的事……门一开，全室寂然。……揩台、抹椅、卷袖三部曲完毕后，开始点名。一声 Close your books 吓得灵魂出窍，于是展开最紧张的一幕，每个人的背弯下来，头低得几乎碰着桌面，谢天谢地，可以躲在前面同学的影子里。哎呀！名字被叫到了，犹如一跤跌入了鬼门关，面色如土，上下的牙齿格格做声。胆小的同学常常把背出的书吓得忘记，被罚站立。假使侥幸没有把所读的忘记的话，在一两分钟的苦刑后，就可以安心地坐在你的座位上欣赏别人的窘态。但是别太开心，因为可能再度被呼。一旦霉星高照，自己又读得不熟，那么你今天就有"插蜡烛"的可能。有时流年不利，满堂蜡烛，好似给先生做寿。Open your books 是我们的赦免令。除非和你的腿作对，千万要把生字查得仔细，否则又得再尝一次苦刑。要慢条斯理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不然的话，你将……大家心照不宣。"当当"的钟声又响了，原来也有下课的时候，真如大旱之望霖雨，一阵哈欠懒腰送走了这一课。①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寥寥数语写出了少小顽童的一片憨态，也反映了课堂教学生活的紧张严格。

（三）一流的教师队伍

民国时期大中城市的英语师资是相当不错的。著名莎学专家刘炳善说："就个人印象来说，解放前中学英语教师一般来说业务能力较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学外文系毕业生才具有中学（包括初中）英语教师的资

① 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 2004 年度硕士论文，第 29 页。

格。更重要的是全面文化素质较高。譬如上述《高中英文选》，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全国，编者是苏州中学的英语教研组。"[①]英语教师来源主要有如下途径：一是来源于教会学校。当时很多教会大学的毕业生来到中学任教，如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就读高二时的"满嘴洋文"的英文教师毕业于有"东方的哈佛"之誉的圣约翰大学。[②] 二是从大学聘请高水平教师兼职。如许国璋就读的东吴大学附中聘请吴献书兼任英语文学课的教师。三是从社会招聘。如外交官朱翼东被聘为南模的英文教师。南洋模范中学的外语教师队伍在同类中学中一直处于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拥有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非常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重视聘用学术水平高，甚至是具有国外求学背景的教师，并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因此，一些教师宁愿放弃上海交大副教授或讲师的职位来南模任教。"英语教师朱翼东先生出生在外交家家庭，曾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后从事外交，驻美国及中美洲诸国，任总领事，精通英语及西班牙语。抗战开始，当时政府内迁重庆，他看清了旧社会的腐败，不愿内迁继续从政，离开了从事十年的外交生涯，弃政从教，来到南模，执教英语。"[③]

南模的外语教师不仅业务过硬，而且和学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深受学生的爱戴。倪裕珍在《流光中的身影》一文中写道："英语教师沈克超先生英俊潇洒，风趣诙谐，是一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他酷爱体育运动，在浙江大学读书时，便是校队队员，对球类活动尤为热衷。我最喜欢在课余听他大侃'球经'。什么篮球、足球、排球，他似乎都很精通。当然，精彩的球类比赛他从不放过，总要想方设法搞到票子，去一睹为快。有时，他若是费尽周折拿到两张不好买到的球票，便如获至宝，举到我们这帮小球迷面前显献一番，摆出一副英雄得胜的架势，不可一世得很呢！好一位生龙活虎的师长。"学生对教师的喜爱敬佩之情跃然纸上。[④]

南模虽然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也很重视劳逸结合，注重学习效率。在其英语教材上还特地编入了这样一段谚语：

---

① 刘炳善：《英语学习：回忆与感想》，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7 页。

② 参见胡明扬：《外语学习和教学往事谈》，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 页。

③ 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 2004 年度硕士论文，第 36 页。

④ 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 2004 年度硕士论文，第 39 页。

Work while you work,

And play while you play.

Only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意为："学习时学习，玩耍时玩耍。只学习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

### 三、教学效果及影响

南洋模范中学从社会和学校发展的需要出发，升学教育和素质教育并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狠抓教学质量建设，积极营造努力向学、奋发向上的学习氛围，实现了素质教育和升学教育的平衡，为学生今后的就学、就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一百年来，从学校毕业的3万多学生的足迹遍布祖国各地和海内外，他们在各行、各业、各种岗位上为祖国、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自创办以来截至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在南模就读过的知名人士，科技界至少有18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央研究院院士。除此之外还有非院士知名人物，如胡刚复（1903届），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傅焕光（1909届），林学家，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李熙谋（1910届），电机专家，原台湾省立博物馆馆长、台湾交通大学校长；童大埙（1923届），铁道工程专家，中国"铁道工程"学科的开拓者之一等。军政界有叶公超（1911年入读），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费骅（1927届），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部长；周建南（1934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康（1942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李道豫（1949届），原中国驻美国大使等。文史经济界有陈源（1910届），文学家，原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代表；朱东润（1910届），文学史家，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拓者；邹韬奋（1913届），中国知名记者、出版家；杜定友（1914届），图书馆学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傅雷（1920年入读），知名文学翻译家；白先勇（1947年入读），台湾知名作家；厉以宁（1947届），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等。这些知名人士中，绝大多数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英语作为工具，在各自的岗位上，在科学技术、对外交往和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南模的求学生涯奠定了他们能够努力为国家服务的源源不竭的知识基础。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南模校友的口述史料中感受南模英语教育的不同凡响：

1950届校友陈正包在《饮水思源 怀念母校》中回忆道："十年浩劫，俄、

日、德语全部丢光，只剩下英语，仍能读、能听、能写、能讲、能接待外宾，比另外请来的外语学校毕业的年轻翻译更方便，因为他们只会生活英语而不会专业英语……这一切都是南模打下的基础。”①对此 1949 届校友刘恩科也有同感：“50 年代初改学俄语，英语不学不用。十年浩劫后，在教学和科研中又重新需要英语，需要阅读大量的英语专业书籍，查阅大量的英语科技资料，还要与国外交流，虽然已有很长时间不用英语了，但重新使用起来感到很容易。1982 年学校准备派我去美国作访问学者，但要先在校内考一下 TOFEL，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考了 500 多分，这在当时是不低的分数了。这些都是与南模打下的英语基础分不开的。”②

南模不愧为是校风纯正、名师荟萃、质量上乘、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校，如同“南模校歌”所说：旧南洋，新南洋；说新旧，感沧桑；旧历史，念七年；新记录，日方长；有许多家庭信仰；得一般社会帮忙；全校精神，个个向上；何等蓬勃气象；老根基昔年师范；新规模近代南洋；锦绣醒狮古校旗；永久招展有荣光。

## 第三节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③——天津南开中学

### 一、学校沿革

南开中学滥觞于天津的严氏家馆。严氏家馆是清末翰林、力主废科举、兴新学的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的家庭学校。严修（1860—1929），字范孙，道德学问颇为人所景仰。光绪二十年（1894），严修任贵州学政，政绩斐然。严修持己清廉，守正不阿，思想开明，为北方学界耆宿。戊戌政变后

① 陈正包：《饮水思源 怀念母校》，《我和南模》（第一辑），转引自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 2004 年度硕士论文，第 31 页。

② 刘恩科：《感谢母校的三年教诲》，《我和南模》（第三辑），转引自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 2004 年度硕士论文，第 31 页。

③ 作为南开精神，“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由南开创办人严修和张伯苓于 1920 年代前后共同制定，并作为南开的校训。张伯苓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南开大学校长室：《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9、133 页。）

(1898)，严修辞官退隐家居，特设私馆，礼聘近代教育家张伯苓(1876—1951)，[①]以新学教授严家子弟。从此，为南开学校创办奠定了基石。1901年，天津邑绅王奎章也设馆延聘张伯苓教授他家子弟，是为王馆。王氏本为天津盐商，即所谓益德王家。是时，严、王两馆，共有学生十余人。严馆自光绪二十四年(1998)起，到光绪三十年(1904)南开学校成立，这六年的期间，严馆及王馆为南开学校胚胎时期。

1903年，严修携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他们"见彼邦社会秩序良好，交通发达，实业振兴，而人民工作勤，知识富，即贩夫走卒，于闲暇之时，亦无不人手一报，明悉国家世界大事。叹曰：是非由教育之力不为功"，[②]从而更加坚定了兴办学校以推广新学，启发民智，建设国家的信念，遂决意筹设中学。1904年秋，严馆与王馆合并，并招新生73人，张伯苓被聘为监督(即校长)。校名初称"私立中学堂"，这是南开历史的肇端。是年底，学校易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次年，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1906年，学校由严宅迁入由津绅郑菊如捐地，新建成坐落在"南开洼"的校舍，校名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这是学校称"南开"之始。宣统三年(1911)，天津提学史傅沅叔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卢中学堂，并入南开中学。民国元年(1912)，学校更名为"私立南开学校"。1914年，直隶省工业专门和北洋政法两校的附设中学同时并入了南开中学，学校的办学实力进一步加强。1916年，张伯苓校长在校董徐菊人帮助下，从孟恩运手中购得本校毗连西南界隙地六十亩。1919年9月，在这里建大学部(1923年迁往八里台)，聘请教授，招收学生百余人，设文、理、商三科，是为南开大学之雏形。1923年，应社会人士之要求，学校设女中部，招收女生七十余人。1928年，学校添小学部。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南开学校毁于日军炮火。部分师生迁到英租界内的耀华中学，另一部分师生内迁到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南渝

---

① 张伯苓，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891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学堂总教习严复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1894年以优等第一的名次毕业，正值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这场创痛剧深的民族灾难以及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张伯苓受到震动。他深感"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早就新人才"。(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南开四十年纪念校庆特刊》，1944年。)于是他愤然脱离海军，立志从事教育救国事业。适值天津名绅严修倡办新学，于1898年严修礼聘，主持严氏家塾。他在严氏家塾的基础上，相继创办了天津南开学校、南开大学、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等学校。1948年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② 喻传鉴：《三十年来之南开学校》，转引自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中学”。1938年9月，“南渝中学”获准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以示天津南开中学生命之延续。1945年，抗战胜利后，天津南开中学复校，重庆南开中学保留。翌年，南开中学迁回原校址南开四马路，同时恢复女中部。1952年，天津南开中学改为公立中学。

## 二、教学与管理

### （一）重视科学和外语教育

民国中学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是非常重视科学和外语教育。教会学校为了吸引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学子，普遍实施优质的外语和科学教育。为了同教会学校竞争，国内的公私立学校也对外语和科学极为重视。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首次将“外国语”、“数学”、“博物”、“理化”等西学课程以国家课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年，教育总长蔡元培第一次突破封建教育重义轻利的藩篱，将“实利主义教育”写进国家教育方针。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学规程》，将“充实生活知能”、“培植科学基础”明确写入中学实施的各项训练之中。这些规定使科学教育成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拥有重要地位的教育内容。这种对科学教育地位的理论认知又充分地反映到当时的教育实践之中。

南开中学作为民国时期私立中学教育的领头羊，科学和外语教育十分先进。首先，它拥有全国一流的科学馆，仪器设备数量较多，学生科学实验已可满足两人一组，品种也较全。因南开课本美国版居多，而美国蚯蚓和中国本土蚯蚓有些差异，于是学校便不惜路途迢迢，将学生实验用的蚯蚓，专门从美国运来。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里奥曾到该校参观，见中国中学有如此设施，深为赞许和惊叹。① 对科学的重视还体现在使用英文课本组织教学。南开1935届毕业生、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回忆，理科方面不但有一般的基础课程，还给优秀生开设相当于大学一年级课程的高级选修课，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例如高级大代数（用范氏大代数教本）、高级解析几何（用史密斯与盖尔教本）、高级化学（用谈明化学教本）、高级物理（用达夫物理教本）等。从初三学习平面几何开始，就使用英文教本，用英语做习题。以后所有理科课程和世界史课程（海斯与穆恩《近代史》）一律采用英语教本。高中毕业时，英语的读、听、写作、会话水

① 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硕士论文，第8页。

平，大概高于今天的6级标准。①

实际上，以英文进行科学教育，是民国著名中学的传统。1929年入杭高的吴祖垲在《回忆在母校的三年》中回忆："我们一年级学英语课，当时的教师沈昭文先生教我们学'Thinkers £ Doers'一书。这其实是一本科技发展史，对早自阿基米德晚自飞机发明家弗来脱兄弟 Wright Brothers 都有详尽的叙述。我在学英语中同时领悟到做科技工作要有百折不挠、不怕失败、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②

使用英文课本不仅能够掌握许多科学术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能提高英文阅读和理解能力，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习兴趣。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能将原本用于语言操练的时间节省下来，用于进一步的学习或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可以说，这是南开等著名中学的科学和英文教育质量过硬的秘诀。

其次，在英文教学方面，南开的英文课时数很多。20年代初，其英文课时数超过了国文和算学。1923年6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制定并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相当于国家标准)，初中英语为36学分，占毕业最低标准180学分的20%。而这一时期南开初中部的英文平均周课时为8，占总学时数94课时的25.53%，大大超过了国文(21.28%)和算学(19.15%)。

表4—14　　南开学校初级中学周学时数表

| 第一年 | 每周时数 | 第二年 | 每周时数 | 第三年 | 每周时数 |
|---|---|---|---|---|---|
| 国文 | 8 | 国文 | 6 | 国文 | 6 |
| 英文 | 8 | 英文 | 8 | 英文 | 8 |
| 算学 | 6 | 算学 | 6 | 算学 | 6 |
| 其他科目略 | | | | | |
| 合计 | 32 | 合计 | 32 | 合计 | 30 |

资料来源：喻鉴：《南开学校之三三课程》，《新教育》，1922年第5期，引自朱红梅：《社会变革与语言教育——民国时期学校英语教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南开的高中课程设置中，非常重视外国语的教学，英文处于一枝独秀

① 叶笃正：《感悟张伯苓教育思想》，载《南开校史研究丛书》(第二辑)，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② 杭州高级中学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1988年5月，浙江新华印刷厂，第19页。

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开设了第一外国语和第二外国语，这在民国中学中是极为罕见的。南开高中部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要求，根据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分为文科、理科和商科，实行分科教学。这三科中，英文的地位远在国文和数学之上。英文占的总学时数分别为 25.28%(文科)、20.22%(理科)、23.26%(商科)，在所有课程中课时数是最高的，见表 4—15。

**表 4—15　　南开学校高级中学课程普通部学时表**

| | 第一年 | 每周时数 | 第二年 | 每周时数 | 第三年 | 每周时数 |
|---|---|---|---|---|---|---|
| 文科 | 国文 | 6 | 国文 | 6 | 国文 | 6 |
| | 英文 | 8 | 英文 | 8 | 英文 | 6 |
| | 中国近百年史(下) | | 第一外国语 | 6 | 第二外国语 | 6 |
| | 其他科目略 | | | | | |
| | 合计 | 29 | 合计 | 30 | 合计 | 28 |
| 理科 | 国文 | 3 | 国文 | 3 | 国文 | 3 |
| | 英文 | 6 | 英文 | 6 | 英文 | 6 |
| | 物理 | 8 | 化学 | 6 | 第二外国语 | 6 |
| | 其他科目略 | | | | | |
| | 合计 | 30 | 合计 | 30 | 合计 | 29 |
| 商科 | 国文 | 6 | 国文 | 6 | 国文 | 6 |
| | 英文 | 8 | 英文 | 6 | 英文 | 6 |
| | 算学 | 3 | 西洋近世史 | 3 | 商业英文 | 3 |
| | 体操 | 2 | 第二外国语 | 6 | 第二外国语 | 6 |
| | 其他科目略 | | | | | |
| | 合计 | 29 | 合计 | 29 | 合计 | 28 |

资料来源：朱红梅：《社会变革与语言教育——民国时期学校英语教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3 页。

南开充分尊重外语教学规律，重视文学阅读训练。英文被列为最主要课程，不仅课时最多，而且“自修时间，英文一门，殆占时之七八”。学校要求每周必须有拼读练习及默写，而且强调汉译英练习。[①] 黄钰生在《早期的

①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2 页。

南开中学》一文中回忆：

1912年初，我入学之初，全校只有二百多人……我的第一个英语课本叫《英文津逮》，是当时天津北洋大学堂的一位美国教员专为中国学生编的，颇有地方色彩，如说“塘沽离天津九十里”之类的例句。我们那时候学英语，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我们认、读、写英文字像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我们硬学，天天默单字，天天背课文。从二年级起，我们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读本》，里边有中国故事英译，也有外国故事的简写。这些我们不大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泰西五十轶事》和《泰西三十轶事》。豪桑的《古史钩沉》，希腊神话，故事有意思，文字太深，到了三年级下半年和四年级，我们就读英文原著小说了。《威克菲牧师传》我们班读了很久，其中的一首故事诗，我们都会背。①

当时很多私立中学为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英语，在英语教材的选用上非常严格，大多是难度比较大的课本。如广益中学初一英语课就有《直接法英语课本》、《泰西五十轶事》、《英语会话》、《文法》等，难度都相当高。除了文法，其他课程都是英美人教授。二年级就增加英文《三民主义》、《英文作文》。三年级再加《耶稣言行录》。南开中学也不例外，其初、高中英语所用的教材大多系现代名著与中篇故事。②

再次，聘请外籍教师教授科学和外语课程，这是南开的传统。早在民国成立前的私立中学堂时期，南开就延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饶柏森(Robertson)、霍克(Walker)等美国人任科学及英文教员。③ 而且南开聘请的外籍教师都非常敬业，深受学生欢迎。黄钰生回忆：“早期南开中学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从二年级起年年都有美国或英国教员教我们。我记得Hersy夫人教我们简单英语会话的情形，入了中国籍的崔伯先生用英语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嗓门那么大，以至于华午晴先生以为他和我吵了起来跑上楼来‘劝解’。总的说来，南开中学毕业，一般地能够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不仅是简单的句子，成段的讲话也能听个七八成。”④

---

① 钟叔河 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7页。

② 端木凡义：《国民政府时期重庆私立中学发展探析》，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6页。

③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④ 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载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

当然，南开的中国籍教师同样是不负众望的好老师。黄钰生深情地回忆他到周老师宿舍去的情形："我清楚地记得周梦贤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去，发还我的汉译英卷子，我那本卷子，写满了他写的红笔字，他左手指着我的卷子上的某句某字，右手指着我的鼻子，用上海方音，大声喊道：'黄珏生！你这个字是怎么用的？你这个句子是怎么造的?!'我在他的手下最高分是 75。我的英文底子，是周老师给我打的，我至今还念周老师。"①

（二）重视教学管理

据民国 1923 年的报告，全国公立、私立和教会所设立的中学中，学生总数仅仅 118,588 人。以全国人口作比，差不多 3,000 人中只有一个中学生。到了 1930 年，每千人中也只有一个中学生，而高中生更少，每 4,000 多人才有一名。南开中学由于办学成绩卓著，声名远播，每年的平均入学率只有 16%。当时有 22 个行省以及蒙古和西藏，南开学生就来自于其中的 18 个行省及蒙古，只有四个省及西藏没有学生进南开。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时，西南各地初中毕业生云集重庆，报考南开高中者竟达 6,000 余人，而录取 300 人，录取率只占 5%。这一盛况，乐得时任重庆南开中学校务主任的喻传鉴在开学致辞中发出"'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乎!"的感叹。②

众所周知，南开学生起点高，基础扎实，这与入学考试严格、择优录取有直接关系。南开招考新生须考试国文、英文和数学三门。南开的教学要求严格，注重作业练习；考试多，而且严肃不苟。考试有临时测验、学期末考试和各科特试。临时测验由各科教员平日举行，其历次得分平均数，作为一学期考试应得分数的一半；期末考试在暑假、年假举行。考试科目分主次两项，主要有英文、算学、国文。有一时期规定，英文得分六成以上为及格，算学五成以上为及格，其他科目得分均以四成以上为及格。南开考试极为严格，每年因不及格降级重修或退学者众，有的班级学生在毕业时不及入学的二分之一，甚至有剩几个人的。1918 年招收新生 9 个班约 360 人，而读完中学毕业的仅剩 70 多人。③

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师资力量雄厚，聘请知名学者加盟，如夏丏尊、许寿裳、鲁迅、李叔同、陈望道、刘大白、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等均在杭州高

① 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载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7 页。

② 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 2004 年度硕士论文，第 26—28 页。

③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2 页。

级中学任教过。南开中学聘请的老师，如原南开大学校长、化学家杨石先、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央研究院院士姜立夫、语言学家罗常培、哲学家熊十力、剧作家老舍、诗人何其芳等亦皆为一时之选。此外，民国著名中学从相关高校聘请名师兼任中学课程的教学已成常态。如外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就读的文华中学从文华大学（后改称华中大学）延聘教师任教。南开中学为了使学生学好基础课，同样选聘最优质的教师任教，常从南开大学聘请一些教授去中学兼课。例如，1925 年化学教授杨石先为高二、高三上高等化学；心理学教授黄珏生每周在初一 2 组任教英文 3 学时。学校还组织英文教师到南开大学观摩教学。同时，学校礼聘美国人崔伯（Percey Tripp）为学校英文科顾问，对英文教员进行业务指导，还从美国聘来凯女士教授英文，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①

民国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抄西方的，体现在教学管理上，如考试、选科、积点等。课本大多采用外国的原本教科书，不少课程都用英语讲授，甚至三民主义也用英文讲授，似乎有些过火。这样做固然有助于较快地达到与西方学校相同的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的外语程度，同时也给学生造成不可低估的心理影响。正如 1915 年《校风》发表《对于国学之感言》中所说："学校以西文为重，而学生亦以中文为轻，故于教授英文时，则注意听之，唯恐一字之或遗；及教授国文则略不注意，倦而睡者有之，旁阅他书者有之，心思鸿鹄者亦有之矣。"②周恩来后来回忆中学学习生活也说，"我从中学三年级起，耳朵里就不大听中国话了。除开国文还有一个中国先生讲中国话外，英文、代数、三角、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都是用英文教，用英文的课本。把一个青年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办法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呢？"③

（三）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德育教育的延伸，也是德育教育的重要载体。民国时期，无论是公私立学校，还是教会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我们知道，学校的德育仅仅注重理论的建构和知识的传播是不够的。德育过程绝非只是一个概念识别和知识记忆的过程。美德是知识、情感和意志的综合表现并通过行为习惯的培养而获得。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是学校德育的有效载体。教育心理学家廖世承说：

---

①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3 页。

② 陈铁卿：《对于国学之感言》，《校风》第 4 期，1915 年。

③ 周恩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的讲话》，1951 年 9 月 20 日。

人格的训练，在于培养各种良好的道德习惯，而培养良好习惯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等学校内注意各项课外活动。从道德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道德是一个高度情境化、情感化的东西。脱离具体的情境去谈道德培养是空幻而无力的。正是基于对校园文化德育功能的认识，在实践中，南开中学十分注重德育价值的开发，充分利用校园文化活动来对学生进行品德的熏陶和磨砺，将品德教育融入到校训、校规、校歌、文艺体育活动、学术研讨活动、编辑刊物之中。南开的学生团体尤为发达。学生自己组织的团体有敬业乐群会、演说练习会、童子军、义塾服务团、救国储金会等。其中，张瑞峰、周恩来等组织的敬业乐群会是个很知名的团体，分稽古、智育、演说、俱乐四部。该会组织时事座谈会、社会调查、课外学术研究和音乐、演剧等娱乐活动，并编印《敬业》会刊。学生组织、由教员辅助的团体有国文学会、英文学会、德文学会、军乐会、唱歌会等。此外，还有师生合组的团体，如新剧团等。[①] 1928届毕业生、著名剧作家曹禺就是南开话剧团骨干。他回忆说："从1925年开始演戏，这是我从事话剧的开端。感谢南开话剧团，它使我最终决定搞一生的戏剧，培养了我对话剧的兴趣。当时新剧团的指导老师张彭春先生给我许多帮助。"[②]曹禺对戏剧评论家田本相说："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把易卜生英文版的大多数作品都读了。他那种宁可孤立，要对大多数宣战的思想，对我影响不小。《人民公敌》中的医生说：'最孤立的人是最强的人。'给我印象很深。"[③]

南开中学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的思想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 三、成就及影响

从1904年南开学校成立到1952年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公立中学近50年的历史中，南开中学创造了辉煌，成为引领当时中国中等教育的标杆学校。温家宝在《同南开中学的师生们谈心》一文中对南开的办学质量给予了充分肯定："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

① 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9页。

② 黄殿祺：《曹禺与恩师张彭春》，载《南开校史研究丛书》（第二辑），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③ 黄殿祺：《曹禺与恩师张彭春》，载《南开校史研究丛书》（第二辑），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①

张伯苓曾自豪地对校友说：“我们所以能负此时誉，绝不是因为我们校舍比人大，或者学生比人多，实际还是靠我们所产的‘果子’品质精良。因为诸君出校后在社会各方面都能稳实从事，人格上、学问上又能奋斗向上。”②

叶笃正所在的1935班是南开校史上有名的“院士班”，一共出了叶笃正等四位院士。叶笃正深情地回忆：“在南开中学的5年时光给我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从张伯苓校长身上学到了爱国主义，张信鸿、李尧林（巴金的三哥）等先生培养了我对科学和真理的好奇。南开中学锻炼了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学校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磨练了我的意志品质，开阔了眼界，给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知识和精神财富。”③

办学历史的积淀，在南开校友中涌现了以周恩来为杰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周恩来（1917届）、屈武（1922届）、林枫（1930届）、万国权（1938届）、孙孚凌（1938届）、邹家华（抗战时期重庆南开中学1944届）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梅贻琦（1908届）、江泽涵（1922届）、吴大猷（1925届）、黄家驷（1926届）、吴阶平（1932届）、叶笃正（1935届）、刘东生（1937届）等57位中外著名科学家；叶公超（1918届）④、曹禺（1928届）⑤、端木蕻良（1933届）、韦君宜（1934届）、穆旦（1935届）⑥、周汝昌

---

① 《光明日报》，2011年10月29日。

② 崔国良编：《今后南开的新使命》，《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③ 蒋娟：《叶笃正深情说南开》，《今晚报》，2006年1月10日。

④ 叶公超（1904—1981），江西九江人。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1938年5月，任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主任。1949年任外交部部长。解放后，叶公超去了台湾。

⑤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于1929年入读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曹禺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

⑥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著名爱国主义诗人、翻译家。祖籍浙江海宁，出生于天津。曾用笔名梁真，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52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1958年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1937届)[1]、黄宗江(1938届)[2]、齐邦媛(抗战时期重庆南开中学1938届)[3]等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使学校享誉海内外。正如1997年李鹏总理给天津南开中学的信中所说:"南开中学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为科学进步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英雄辈出,功不可没。"[4]

---

① 周汝昌(1918—),天津人,我国著名红学家。他是继胡适等人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先后就学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曾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其《红楼梦新证》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② 黄宗江(1921—2010),剧作家,浙江瑞安人。1938年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9年,黄宗江人伍。1958年调人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先后创作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优秀电影文学剧本。

③ 齐邦媛(1924—),辽宁铁岭人,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主任。齐邦媛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英译《城南旧事》(与殷张兰熙合译),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中英对照台湾小说 *Taiw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文文学》等。

④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2月26日。

# 第五章

# 教会大学的外语教学

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教会大学作为教会教育体制的重要环节,受到教会和教会所在国政府的普遍重视。从时间上说,教会大学早于国人自己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1881年1月成立的福州鹤龄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是教会高等教育的肇端,其学生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两年制初级学院毕业生的水平。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成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天津中西学堂(即后来的国立北洋大学)。而此时,教会系统已有鹤龄英华书院、山东文会馆(1882)、北京汇文大学(1990)、上海圣约翰大学(1892)等教会高等教育机构。清末民初是教会大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教会大学曾一度达到近30所,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同期的国立及其他私立大学。根据由在华传教士专门成立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1919年统计,已完全具备本科设置的基督教新教大学达十三所,它们是: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山东基督教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17年后又叫齐鲁大学 Cheeloo University)、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金陵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大学(Hwa Nan College,立案后改称"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立案后改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此外,基督教大学还包括下列3所天主教大学:上海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北京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天津工商大学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Industrielle et Commerciales*)。

外语教育家付克在《中国外语教育史·前言》中写道:"一九五一年,我代表教育部在成都接办美国教会办的华西大学,并留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分文、理、医、药几个学院。整个学校是个英语环境。各院系的课程多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师、学生、职工的外语水平较好。这样就有机会了解这所学校的教学特点和外语教学情况。这所学校的教师不少是英、美、加拿大人和归国留学生,可以直接用英语讲授各种课程,学生多数均达到用英语听课的程度。因为学生入学时英语已有一定的基础,适应这种环境并不太吃力。"①付克所说的华西大学的教学情况,是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一个缩影。教会大学的外语教学成为一枝独秀,"所有的教会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学中很多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外语都十分流利"②,因而绝大多数的公、私立大学难以与之比肩。另外,教会大学的医学、农学、法学、新闻、社会学等学科是教会大学的优势学科,均具有上佳表现,其成就超过国内的公、私立大学。就外语教学质量而言,李良佑等人认为,民国"无论是专业英语还是大学普通英语,教学质量一般并不低下。地区与学校之间差异较大,其中以教会大学的英文教学水平最为突出"。③

教会大学从19世纪80年代产生,迄至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消亡,仅存在约70年的时间。但是,其培养的人才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的推动是不容小觑的。

## 第一节 教会大学外语教学概览

### 一、教会大学沿革

自从道光十九年(1839)在中国澳门创办第一所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The Morrison School)以来,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播福音、获得稳定的传教对象的需要,在中国本土陆续创办了为数不少的教会学堂。早期教会学校创办的目的,主要是把学校当做一种辅助之物,帮助其传教事业的发展。

①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② 周为筠:《消失的教会大学》,《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第84页。

③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除了当初的五口通商城市外，逐渐向其他沿海和内陆地区拓展。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学校发展较快。截至 1875 年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有 800 所，学生 20,000 名。其中基督教会学校有 350 所，学生约 6,000 人，其余均为天主教开设。这一阶段的教会学校仍以小学为主，但已有少量教会中学出现，约占教会学校总数的 7%左右。①

传教士对实施高等教育目的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早期创办教会大学的目的主要是培养高级布道人员或宗教领袖，也为了便利教徒尤其是神职人员的子女进一步深造，最终谋求基督教（或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中华归主”，使中国基督化。《基督教高等教育之起源与情况》一文指出：

> 教会高等学校之设也，其初心主旨，有欲以为养成牧师教长之资者；有欲尊其为同宗诸校之冠者；有欲以高等教育灌输于教中儿女者。更有出于常通宗旨，欲以扩充基督教势力范围者；藉兹方法为华人通译教义者；以及教授备有新常识，染有宗教观念之男女少年，以谋助国人之进步之发达者。其目的虽异，其坚心竭力谋导学生信奉基督为大主宰则同。……为中国輓近高等教育先河之导，及以为政治、实业、教育、宗教各界中早就名贵领袖。②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在中国沿江沿海城市相继开办，迫切需要大量的懂西文西语的各类人才。而且，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向中国渗透，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银行、铁路等也亟需这方面的人才。因此，单纯的辅助传教、培养牧师已不能满足西方列强及整个社会的需要。“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她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中国。不仅如此，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使得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③社会的发展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教会发展高等教育起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时的做法是在寄宿制中学的基础上安上一顶“学院”的帽子，俗称戴帽子学院，以示发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7 页。

② 《基督教高等教育之起源与情况》，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7 页。

③ 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 页。

展方向和学校追求的目标,其中有名者如圣约翰书院、上海中西书院、鹤岭英华书院及登州文会馆等。真正将发展教会高等教育的构想公开提出来引起传教士们的普遍关注的是在1890年的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在这次大会上林乐知(Y. J. Allen)明确提出要发展"一所本地的基督教大学",并提出各教派之间应当进行充分的合作。[①] 李承恩(Rev. N. Plumb)也提出必须发展高等教育。他说:"在西方国家,各地都有由各教派建立、管理和支持的学院和大学,教会的财产维持着它们,教会最能干的人充任它们的教授,那么在中国不应当同样如此吗?"[②]山东登州文会馆校长狄考文更是强调了发展高等教育的必要性:"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对传教士来说,全面地教育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这样做,可以胜过培养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但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着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其他异教国家来,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③]

创办教会大学的最早尝试,为美以美会外洋布道部(后改名卫理公会)于1881年1月在福州成立的鹤龄英华书院。书院规定修业8年又4个月,毕业相当于美国大学2年级程度。1890年1月,第一届学生毕业(仅陈孟仁1人)[④]创建教会大学较有成效的是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主持的山东登州文会馆,该校于1882年建立6年制教育后,部分课程已达到大专水平。卜舫济(Francis L. Hawks Pott)在1886年执掌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也增设了一个3年制大专班,第一届学生于1895年毕业。此外,还有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西书院,后来形成了东吴大学;1888年哈巴安德博士(Rev. Andrew P. Happer)等人在广州创办的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成了岭南大学的前身。到19世纪末,中国已有了十几所所谓的教会大学或学院,但据杰西·格·卢茨判断:"在1900年前没

① Y. J. Allen. "*The Changed Aspect of China*",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990, p. 22.

② Rev. N. Plumb,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Mission Schools and What Further Plans are Desirable*",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990, p. 454.

③ 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④ 详见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330页。

有一所真正达到大学水平”,“而且许多学校最后解散或改为中学或初级学院”。[①] 这时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在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规模都比较小。据统计,1900 年时全国教会大学学生有 164 名,到十年后的 1910 年,学生才只有 898 名,平均每校不过 64 人。[②]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内地被迫向西方教会全面开放,各差会认为这是扩大教会势力的极佳时机,应当立即着手教会大学的正规化建设。1903 年“癸卯学制”颁布,中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的学制。1905 年,中国延续了 1300 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终于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仿照日本和西方实行的学校教育体制,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兴学热潮。学生开始进入新式学校,学习西学西语。这一变革使教会大学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此时,虽然中国建立了若干大学,[③]但因建校时间短,设备不足,教师匮乏,难于满足众多学生深造的需要。还有些学生想远涉重洋、出国留学,希望在国内学习英文,对这些学生来说,入教会大学的确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些进不了公立学校或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都来教会学校求学。[④]后来在中国比较著名的 16 所教会大学(新教 13 所,天主教 3 所),其中 14 所的雏形在此期间已经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开始了教会女子高等教育。1905 年 5 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在中国华北、华中、华西和华南各建立 1 所女子大学。是年,由 1864 年裨治文夫人(Mrs Eliza Bridgman)创办的一所学塾演变而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成立。四年后,4 名读完全部大学课程的学生毕业。1908 年,华南女子大学预科在福州正式开办。程吕亚

---

①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30 页。

②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61—762 页。自 1900 年至 1925 年间教会大学的招生数虽然增长了几倍,但学校规模仍旧不大。根据鲁珍晞(Jessie G. Lutz)的研究,1925 年各教会大学平均招生只有 218 人,而最大的燕京大学也只不过 508 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立中学的毕业条件与教会大学招生条件相脱节。因为教会大学大部分课程用英语教学,而公立学校主要用英语教授自然科学。而且,公立中学的毕业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达不到教会大学招生的要求。由于教会大学对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强调,使得教会大学无法直接从公立或其他私立中学招收毕业生,除非是及其特殊的情况。因此,非教会中学毕业生一般都要吃亏两年,他们得先进附属中学或预备班,且这里的淘汰率非常高。教会大学因而被迫把主要招收指标投向教会中学。1925 年教会大学有五分之四以上的学生是教会中学毕业生。(参见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Brook Street,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td., 1971. pp. 165—166.)

③ 此时中国只有国立大学三所,即北京大学(1898)、山西大学(1902)和北洋大学(1895)。

④ 董宝良、但昭彬、陈晴:《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9 页。

底(Miss Lydia Trimble)任校长。该校系1859年创办的毓英女塾演变而来。1914年,学校开始提供两年制的大专教育。1917年,实施四年制的大学教育。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由于把教会学校视为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机构,感到无力控制它们,所以拒绝把教会学校纳入中国人的私立学校一类"。[①]政府对在中国本土的各类教会学校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因而这些学校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这反倒促使了教会高等教育继续发展。

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1927年10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私立学校规程》,明确规定"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须接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私立学校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亦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②]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督导下,从20年代末开始,岭南大学、燕京大学等绝大多数教会大学先后向国民政府立案,获得了政府的认可,正式纳入国民政府教育体制。向政府申请立案最晚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直到1947年才获准政府立案批复。教会大学和在中国所有的学校一样,最好的发展时期是在抗战爆发前的岁月。此后的15年的时间里,教会大学都是在动荡不安中艰难办学,尽管期间也取得不菲成绩,但很难跟战前相比。

**中国教会大学一览表**[③]

(创建、合并和更改校名的时间)

新教学校

齐鲁大学,济南

登州蒙养学堂,登州,1864年→登州文会馆(登州书院),1882年
青州男寄宿学堂(广德书院),青州,1894年
} 山东联合大学(广文大学),潍县,1902年→

① 董宝良、但昭彬、陈晴:《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② 《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一期,1928年1月。

③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63—765页。英文见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531—533.

山东联合大学
青州神道学堂,1885 年→郭罗培真书院,1903 年 } 山东新教大学,1904 年。
共合医道学堂,济南,90 年代

山东新教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1909 年 } 山东基督教大学,济南,
济南学堂,1905 } 1917 年→

山东基督教大学 } 山东基督教大学,1924 年→齐鲁大学,
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1908 年 } 1931 年

福建协和大学,福州
福州英华书院(高年级) } 福建协和学院,1916 年→福建协和大学,
格致书院　(高年级) } 1918 年
三一书院　(高年级)

金陵女子大学,南京
金陵女子大学,1913 年创建,1915 年开学

之江大学,杭州
宁波崇信义塾,1845 年→杭州育英义塾,1867 年→杭州育英书院,1897 年→之江大学(之江文理学院),1914 年→之江大学,1948 年

华中大学,武昌
文氏学堂,武昌,1871 年→文华大学,1909 年 } 华中大学,1924 年→
博文书院,武昌,1885 年
博学书院,汉口,1899 年
华中大学,武昌
湖滨书院,岳州,90 年代 } 华中学院,1929 年→华中大学,1946 年
雅礼大学,长沙,1906 年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
福州女子学院预科,1908 年→华南女子学院(两年制),1914 年→华南

女子文理学院(四年制),1917年

岭南大学,广州

　　格致书院,广州,1888年→岭南学堂,1903年→岭南大学,1926年

金陵大学,南京

　　汇文书院,1988年

　　基督书院,1891年
　　益智书院,1894年 } 宏育书院,南京,1906年

　　} 金陵大学,南京,1910年

圣约翰大学,上海

　　培雅书院,上海,1865年
　　度恩书院,上海,1866年 } 圣约翰书院,1879年→圣约翰大学,1905年

沪江大学,上海

　　上海浸会学院,1906年→沪江学院,1918年→沪江大学,1931年

东吴大学,苏州

　　博习书院,苏州,1871年
　　上海中西书院,1882年
　　坤宏学堂,苏州,1896年 } 东吴大学,1901年,与上海中西书院 } 东吴大学,1911年 → 东吴大学中国比较法律学院,上海,1915年 } 东吴大学,1915年

华西协和大学,成都

　　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

燕京大学,北京

　　潞河男塾,通州,1867年→潞河书院,1889年→华北协和大学,1904年
　　金氏纪念神道学院,1893年→华北协和神学院,1904年
　　北京美以美会男塾,1870年→卫理学堂,1885年→汇文大学,1890年
　　} 汇文大学,北京,1916年→

贝满女塾，北京，1864年→贝满女学堂，1895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4年 } 汇文大学，1920年→燕京大学，1928年
汇文大学

罗马天主教学校

震旦大学，上海

震旦大学，1903年
震旦女子学院，1938年 } 震旦大学，1938年

辅仁大学，北京

辅仁大学，1925年
辅仁女子学院，1938年 } 辅仁大学，1938年

津沽大学，天津

天津工商学院，1923年→津沽大学，1947年

## 二、教会大学的师生

### （一）教会大学的师资

教会大学的西学课程（外国语、数理化、外国史地等）由外籍教师担任，国文、中国历史等少数课程由中国学者担任。总体而言，教会大学外语教师水平很高，尤其是外籍教师。加拿大学者文佳兰（Karen Minden）在她以华西协和医科大学为对象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学生评价外教的主要因素是：会讲汉语、关心同学和学识渊博。会讲汉语，不仅使外籍教师可以直接与学生沟通，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尊重。不管是在教会学校的早期阶段，还是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的清末民初，这都显得极为重要。从历史上看，那些发展快、有影响的学校大都由被称为“中国通”的传教士教育家所主持。例如，登州文会馆校长狄考文入华不到一年就开始用中文上课。他用中文编写的教科书，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流行。创办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的前身）的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常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研究，曾用中文撰写《中国历代著录画目》、《中国历代瓷器图录》、《中国历代著录吉金目》等，他还是故宫博物院的顾问。燕京大学创校元老高厚德（Howard S. Galt）初来中国时，对华文既不会听说、也不会读写。30年代以后，已成为燕大中汉语水平最高的外籍教授，他对古文的阅读与理解能力，大大超

过他的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他能把张之洞的《劝学篇》全文背诵。[①] 此外，任圣约翰大学校长达52年的卜舫济，主持燕京大学校务27年的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②]等无一不是"中国通"。因此，一所大学教学质量的好坏，取决于教师水平，而教师水平的高低，又与学校的负责人有极大的关联。一个业务水平高的校长，不仅能选拔与重用优秀的教职员工，而且对他们身上所起的示范作用与影响是巨大的。

教会大学一般规模不大，但教师以传教士(或外籍人员)居多，华人只占很少的比例，这在其创办的早期阶段尤为明显，如金陵大学的教授当时皆为美国传教士，只凭母语是英语就从事教学，只有教中文和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才聘请华籍人员。再如，1915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的金陵女子大学创办时"教职员只有6人，其中美籍者4人，中国籍者2人"。[③] 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要求在华教会大学向政府立案，要求由华人担任校长后，师资构成发生了变化，华人教师人数有了增加，但外籍教师仍占极大比例。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教会大学逐渐大量聘请中外籍专家教授担任主讲教师。又如燕京大学从20年代开始，"重视教师资历，聘请的教师多为本科专业有所成就，在学术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在科研方面有显著成果的中外饱学之士。"[④]

20世纪3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的师资更上层楼，可以说起了质的变化。例如，沪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有着强大的师资力量，根据1936年的数据统计表明，全系13位教师中有12名为美国教员，仅有1位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教师。从学历来看，博士3人，占23%，硕士5人，占38.5%，学士5人，占38.5%。这样的学历和人员构成，哪怕在76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相当合理的。

---

①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323页。

②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司徒雷登在中国杭州度过了他的童年，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

③ 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页。

④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表 5—1　　1936 年沪江大学英文系教师名单

| 教师、国籍 | 教育经历 |
| --- | --- |
| 郝齐佳教授(HuiZinga H.)美国 | 胡帕学院、西部神学院文学士、硕士、密执安大学博士 |
| 普天德教授(Poteat Gorden)美国 | 维克森林大学学士、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硕士、福尔曼大学博士 |
| 包哈拿副教授(Plowden H. J.)美国 | 温索普大学学士、北卡罗来纳大学硕士 |
| 贝特副教授(Byrd J. C.)美国 | 密西西比女子学院文学士、硕士 |
| 高纳贝副教授(Knabe E.)美国 | 斯沃斯默学院文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 |
| 蒲思夫人教师(Booth Plorence D.)美国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
| 司徒登教师(Stocktom Guy C.)美国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
| 湛罗弼夫人教师(Chambers R. E.)美国 | 哈尔滨—蒙斯大学学士 |
| 扑禄登教师(Pruden E. H.)美国 | 爱丁堡大学博士 |
| 韦爱伦夫人教师(Wiley E. E.)美国 | 南浸会神学院学士 |
| 余安义教师(Root A. E.)美国 | 林菲尔大学文学士 |
| 詹森教师(Jesen J.)美国 | 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士 |
| 黄宪昭教授,中国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密执安大学新闻系学士 |

资料来源：私立沪江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年，引自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9 页。

### (二) 教会大学的学生

最初入教会大学的学生多半来自没有能力让其子女受中国经典教育的家庭。[①] 而且，学校要与家长签署"愿书"(按：类似于当今的保证书)。如《圣约翰书院章程》规定："入正馆(按：指圣约翰的大学部)者，须具愿书，内开某生愿遵守圣约翰书院一切宪法，服从一切条教，愿尽学生义务，并保守书院之荣誉各节。进院时该生须遵例签名。"[②]金陵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③]《金陵大学堂章程》规定："凡入学学生必须有志求学，品行端

①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6 页。

② 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0 页。

③ 金陵大学前身是 1888 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Nanking University)，书院设博物馆(文理科)、医学馆(医科)和神道馆(神学科)。1907 年，美国基督会于 1891 年创立的基督书院(Christian College)和美国长老会于 1894 年创立的益智书院(Presbyterian Academy)合并为宏育书院(Union Christian College)；1910 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成立私立金陵大学(Private University of Nanking)，有"江东之雄"美誉。约翰·福开森、师图尔(G. A. Stuart)、包文(A. J. Bowen)、陈裕光、李方训先后担任校长。1951 年 9 月，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 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并入南京大学。

正，立志愿书加保证人。"[①]签订"愿书"除要求学生遵守校纪校规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留住学生"。[②] 可能是招生困难等原因，早期的教会大学对年龄似乎未太介意。金陵大学对入学年龄的规定是："小学学生以十岁以上、十六岁以下为合格，中学、高等学及大学不拘年龄。"[③]

随着办学环境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教会大学声名鹊起，并提高入学门槛，制定更为严格的录取标准，例如要求入学考试、拒绝给预考不合格的学生补考等举措来提高水平。[④] 但由于教会大学都是由当初的教会中学脱胎而来，而教会中学一般规模又不很大。中国传统教育又是没有中学这一层次的，中等教育自成体系是在 1904 年 1 月清政府颁布《奏定中学堂章程》之后，所以中学毕业生也不太多，能升大学者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教会大学的规模不大。迄至 1900 年，中国教会大学的学生总共只有 164 人。[⑤] 在以后的一二十年的时间里教会大学的招生数虽然增长了几倍，但规模始终不大。如金陵女子大学第一届(1915 年)学生只有 9 人，毕业时仅有 5 人，其中包括金女大第二任校长吴贻芳。至 1918 年，金女大已招四届新生，四个年级总共才有 52 人。[⑥] 根据胡卫清的研究，1912 年全国 30 所教会大学和学院平均每校不足 34 名学生，到了 1920 年全国只有 2000 名学生，平均每校约 126 名。[⑦] 1925 年各校平均招生数只有 218 人，而最大的燕京大学也只不过 508 人。[⑧]

---

① 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4 页。

② 早期教会大学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即当学生能够负担一部分家庭经济或结婚时或在沿海通商城市就业时(因为懂外语的人员很容易在海关、邮政、银行等涉外机构找到工作)，学校就很难留住他们，多数未等到毕业就离校。为了留住学生，许多学校采用订立契约的办法。按照契约，家长同意让子弟在学校学习一定的年限或学到毕业，而学校则承担学生的全部费用，否则，家长必须付清其子女在学习期间的伙食费。(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7 页。

③ 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4 页。

④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 39.

⑤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2 页。

⑥ 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56 页。

⑦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9 页。

⑧ 由于受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整个 20 年代教会大学的发展相对缓慢。据统计，1926—1927 年度，教会大学学生总数为 3500 人，但进入 30 年代后，特别是一些教会大学的立案要求被批准得以合法发展后，教会大学又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到 1936—1937 年度，教会大学人数增加到了 7000 人。1920 年时，没有一所大学人数超过 500 人，而到 1936 年，已有八所大学的学生超过 500 人。1941 年，仅燕京大学学生就达 1156 人。1947 年，全国教会大学学生总数达到 12000 人左右。(金忠明、李若驰、王冠主编：《中国民办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3—145 页。)

其原因，如前所述，是生源不足。教会大学的生源来自教会中学、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但后两类中学的毕业条件与教会大学的招生条件相脱节，因为教会大学对于英语都有较高的要求，如北京汇文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在进校前必须读过五年英语。另一个原因是教会大学在一年级到四年级之间的淘汰率很高。1922 年之江大学校长司徒华林（Warren H. Stuart）估计说中途辍学人数大约是毕业生数的五至十倍。上海浸会学院觉得有 40%的一年级学生坚持到四年级已是很不错了。另外，由于强调宗教，规定学生要参加读经班和做礼拜，而疏远了许多非基督徒，并减少了优等生的数量。① 当然，教会大学严格的招生条件把相当一部分学生挡在了门外。就算是教会大学的生源大户教会中学，其毕业生中的许多人也不愿进教会大学，而是选择出国。例如，岭南大学自 1888 年创办至 1916 年成为大学，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创办大学的愿望才得以实现，期间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学生。期间岭大附中虽然培养了一部分中学生，但大多赴国外留学了。简又文的《岭南我岭南》记载：

> 先从本校中学说起。初期几届毕业人数已寥寥无几，而毕业者，非离校入世任者，即自费赴美留学，或有未毕业即赴美者。民国成立，广东省政府一度考选学生，由官费遣派赴美留学。本校中学毕业生多名入选。一时本校有“群马遂空”之概。未几北京清华大学开办，专门预备学生留美，本校毕业生入选者更多。亦有考入其他华北各大学者。至 1918 年，本校同学留美者逾百人矣。
>
> 职是之故，为实现开办完全大学计划计，非先解决学生来源问题不可，而最善之法即是先行尽量扩充本校中学为基本，以定标准。其后，又与各教会所办之男女中学，如培正、培英、培道、真光、协和、华英等，连成一体系，各校程度配合本校标准，互相衔接，使其毕业生可直接升入大学。于是来源问题乃得解决，而“岭南大学”之开办终成事实。②

上述引文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生源缺乏；二是解决生源的途径。岭南大学为了解决招生困境，采取和其他教会中学采取联合办学的方式，“使其毕业生可直接升入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也是从中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91 年才添设正馆（按：大学部），教授大学本科课程。为了保证生源及其质量，圣约翰将各地一些发展比较好的教会中学列为其附属中学，如

---

①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5—156 页。

② 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42 页。

上海的约大附中、圣玛利亚女中、圣约翰青年会中学、民立中学和扬州美汉中学、苏州桃坞中学、安庆圣保罗中学、宁波斐迪中学、泉州培元中学等。这些中学成为圣约翰大学的基础和延伸。岭大、约大等教会大学这样做是因为教会中学十分重视对英语、自然科学等西学的教学，重视西学恰恰适应了教会大学的招生要求，“1925 年教会大学有五分之四以上的学生是教会中学毕业生”。①

民国教会大学的外语教学质量是有目共睹的。根据教育学原理，决定教育质量高低有两大要素，一是教育者(教师)，二是受教育者(学生)。如前所述，教会大学师资力量是很强的。从相关史料来看，教会大学的生源质量当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师资质量稳定，如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92.3%的教师是学士以上学历的外教。仅有一名中国籍教师也具有国外受教育的背景。师资质量是决定学生质量的前提。其次，学生目的性强。他们来此学习是为了学习英文和数学，好在通商口岸的商行、电报局、铁路、海关或其他需要外语的地方找一个职位，或者赴国外留学，如岭南大学，留学国外的学生很多，“至 1918 年，本校同学留美者逾百人矣”。目标决定态度，态度决定成败。以下史料在某种程度解答了教会大学名声在外的原因：

> 我班(即 1914 年级)自升入二年级时，即自动增立规则一条：凡在课室内谈话必须操英话，违者每次罚款一仙(此当然限于本班班友)。此为同学互相督责操练英语之善法。初时，所识英字不足用，则准插以中文补足之；于表情句法文法不熟，亦准以中文补充；几成为不咸不淡，非驴非马，中西合璧，有类似于“咸水话”的英语。而且初行试用全部英语会话，自然有格格不吐，期期艾艾，呐呐不出诸口的多种毛病，颇为可笑。但全班具有共同志向，决心苦心学习，不敢互相嘲笑，勉力从事，不移时居然有进步，出口亦易。迨行之半年、一年，读书识字愈多，文法句法愈熟，则进步更远，发音正确，而且凡艺以多习而愈熟，居然会话流利，英语冲口而出。尤要者则习惯成自然，凡用英文则头脑中想象所及之意见及观念，必先以英文构成，即随口讲出，不须先行由中文思想翻译过来，然后以英语说出。此是大凡学习外国语之必要的程序也。是故二三年后，成效大著，我班同学毕业后，凡留校出校或赴美留学，即能操纯熟的英语，此则早年大家发奋努力，苦心自治之功

①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6 页。

也。于此书出此宝贵经验，或足为今代学生之学英文习英语者他山之助焉。①

从学生的来源来看，教会大学主要来自商业界、知识界、教会系统和自由职业者群体。例如燕京大学学生多数来自知识分子、商人和基督教家庭。早期的圣约翰大学学生有一半是商人子弟，其次是学者或自由职业者的子弟，而农民和牧师子弟为数极少。同样地，东吴大学和上海浸会学院大部分学生也来自商人和学者家庭。但是，山东基督教大学一直是农村基督徒家庭子弟的教育中心。②

### 三、教会大学的教学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主要有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16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以成就和影响论，其中有不少差不多可与全国最著名的学府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高校比肩。教会大学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一些系科，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金陵大学的农林学、物理学，圣约翰的外语和医学，东吴的法科、理科，和岭南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都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们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解放后，中国政府参照苏联模式，开始了教育改革，于195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公立高校院系合并、专业调整，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学校，教会大学被并入相关高校。至此，教会大学在中国消失。尽管教会大学如过眼云烟，在中国大陆消失近六十年，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对过去一些做法的反思中，人们重新发现了教会大学的价值，乃至近年来教会教育成为学者，尤其成为治史学、教育学的学者研究的热点。之所以教会教育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会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遗产，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教会大学在办学思路、目标地位、人才培养规格、教学方法、资金筹措、

① 简又文：《岭南我岭南》，《岭南通讯》第17期，载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544页。

②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158页。

校园建设等诸多方面具有许多公立大学所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特点。限于篇幅，这里仅讨论与教学有关的若干特点。

（一）宗教气息浓厚

教会大学在课程方面，“与国立大学大抵相同；其所异于一般大学之处，即在教授宗教与造成宗教的环境”。[①] 教会学校宗教仪式十分严格，宗教课为必修课。根据原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1893—1989）在《回忆金陵大学》中的回忆，1910年由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而成立的金陵大学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亦即培养‘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实际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因此，每逢礼拜，师生必须参加”。[②] 由于基督教像其他宗教一样，都有刻板的宗教戒律和仪式，且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尽管后来有所改变，但总体而言，宗教氛围还是很浓厚的。刻板的宗教戒律和仪式对于学校中的非教徒而言，是不可忍受的，有些学生干脆实行邹韬奋所说的“马虎主义”。因为，很多入教会学校学习的学生不是为了学习宗教而来的，是因其他的动机如为了出国留学或在洋行谋一份好差使而来此学习英文的。例如1937年创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1921届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潘序伦进入该校学习“完全是为了学好英语”。[③] 邹韬奋（1895—1944）是中国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于1919年从南洋公学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他在《经历》中描述了圣约翰大学刻板的宗教仪式：

> 在约翰（按：即圣约翰大学）时最使我索然乏味的事情，是每晨二十分钟和星期一上午一两小时的“做礼拜”。每日早晨上课之前，全体同学千余人要聚在大礼堂上，校长和教授们便聚在大礼堂的讲坛上，由校长领导着大玩其祷告和朗诵圣经的玩意儿。依例全体都要跪着，幸而除却前两排的同学因为太近于讲坛不得不下跪外，后面的大多数同学坐在一排一排的矮椅上，和跪下的样子也差不多，大家便实行马虎主义，还是堂而皇之地坐着。星期日上午，不得不坐在教室里听那个主教的胡说八道，也是一件苦事。抵制的办法只得让他尽管张开他

① ［美］罗炳生：《基督教高等教育当前的问题》，载《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26年9月。

②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谢泳、智效民等：《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③ 潘序伦：《我在约大——从旁听生到正式生》，载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的嘴巴，我却尽转着我自己的念头，这也许是另一种的“走曲线”吧。[①]

教会大学宗教气息浓厚，这是事实。特别是教会大学的早期阶段，校方对学生在宗教方面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在发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各教会大学纷纷向政府申请立案后，学校对学生的宗教信仰的要求逐渐放松。以下是原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1903—1967)的回忆：

> 我是不信宗教的，沪江的外国教师常找我谈宗教信仰的问题，大学二年级时一个美国教师对我说：“在沪江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学生是不信宗教而可以毕业的。”这等于警告我，要不信教就不要指望在沪江毕业。我不愿信教，只好转学到复旦大学。在岭南却没有谁对我说过一定要信教，教我们《圣经》这门功课的教师找我到他家里吃饭，显然是有意图的，但也没有明白地提及信教的事。
>
> 在岭南有宗教活动。比如说，《圣经》列为一门功课，但是学生并不重视它，只是跟着念经。学生要参加每天早上举行的早会，这个全校学生集中的活动，也有宗教内容，但不完全是宗教活动。星期天做礼拜或其他正式宗教集会，并不强迫每人参加，我在中学读书时就从来没有做过礼拜。这些都和其他教会学校不同。尽管这样，基督教的影响在岭南还是一个主流。宗教活动虽然不带有强迫性，但它无处不有，浸透到各个方面，表面看来宗教色彩虽然不浓，但总有宗教色彩。[②]

教会大学重视宗教氛围的营造，有其自身的目的。陈序经在《有关岭大与钟荣光的几点回忆》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办岭南在方法上有这么几个特点：(1) 岭南虽是和其他教会学校，比较起来宗教色彩不很浓厚。美国人在表面上不强制别人信教，但利用宗教影响、习惯势力来达到宗教上的目的。(2) 美国人要培养合乎他们期望的美国化的中国人。(3) 美国要利用岭南来传播西方文化，但不排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倒是反过来利用中国文化的研究来扩大岭南的影响，提高岭南的地位。[③]

**(二) 重视英语的课程设置**

教会学校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教会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是最为完备的一环。在这个课程体系中，宗教、西学(含外语)和儒学是教会大学课程设置的“三驾马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宗教教育可

---

① 邹韬奋：《踏进了约翰》，载《经历》，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5 页。

② 陈序经：《有关岭大与钟荣光的几点回忆》，载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 年内部发行，第 38—39 页。

③ 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 年内部发行，第 41 页。

以说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教会之目的非他，盖即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并创造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而已。”因而“圣经为各种课程的根基”。[①] 由于国民政府不允许再将圣经列入必修课，30 年代之后，各校纷纷将圣经列为选修课，但教会大学的宗教氛围还是很浓厚的。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根本，教会学校要在中国扎根，为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教会大学总体上说是很重视的。“许多学校给中国语言和文学安排许多课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北京汇文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入学之前还必须读完有关的中文课程”。[②] 但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学校，对儒学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金陵大学对儒学及中国文化课程极为重视，国文、周礼、书经、中国历史选编等贯穿四年始终。[③] 圣约翰大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对儒学课程也很重视，聘请国学大师钱基博等人主持国文系。但是，教会大学中轻视儒学的现象是存在的。“学生本身的态度也促进了轻视中文课程的做法，当教师责备他们对中文不感兴趣时，他们多半会这样回答，他们来教会大学就是为了学习英文和西学，他们能够在别处把中文学好，……外国的学问已在中国取得威望和金钱价值。因此，学生集中精力努力掌握外国的学问。”[④]

包括外语在内的西学(指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应用科学等内容)课程更是教会学校的命根子，这是吸引广大学子报读的法宝。限于篇幅，仅对其中的外语课程的设置进行讨论。

总体而言，教会学校对外语课程都是极为重视的。例如，被研究者认为只有小学程度的中国本土第一所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其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当高，部分优秀学生的作文水平很可能超过现在的某些英语专业大学生。[⑤] 1882 年，圣约翰书院(按：圣约翰大学前身)创办伊始，监院(按：校长)颜永京就作出决定要重视英语教学。他指出，圣约翰必须给那些不会

①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 页、第 48 页。

②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Brook Street,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td., 1971. p. 70.

③ 参见《金陵大学堂高等学堂课程表》(1912 年)，载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90—591 页。

④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4 页。

⑤ 参见张美平引用的文献，载《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5 页。

被教会雇佣的学生一个谋生的手段，而英语正是在上海谋生最好的工具。[①] 1881年，圣约翰书院设立专门的英文部，招收英语学生，此举开中国教会英语专业教育之先河。1888年传教士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升任校长后，便推行"英语运动"，强化英语教学。从清末到整个民国，在卜舫济领导下，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育傲视群雄。

1910—1920年这十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国学子赴欧美留学。由于英语是奖学金考试的重要内容，因此，教会大学的学生有着真正的有利条件，录取比例往往很高。懂英文也是在外交、电报、铁路、海关等部门寻找职业的本钱，许多教会大学毕业生进入这些部门工作。他们占有的英语便宜，往往在奖学金考试中名列前茅，并且很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②] 而且，清末民初，科学课程的教学缺少教科书，术语不统一，也是促使教会大学重视英语，加大英语课程力度的原因之一。如北京协和医学院以英语作为教学用语，因为学校非常缺乏能用中文教学的医生和中文的现代文献。

当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会大学时，西方正强调着语言、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学习，教会大学也将其移植过来。1925—1926年，教会大学文理学院提供的教学概要表明，占学时最多的四门课程是英语、化学、中文和生物。[③] 显而易见，英语是最为重要的课程。

尽管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都非常重视英语教学，但其重视程度还是有区别的，教会女子大学对英语教学更加注重，学生学习也更刻苦，其中饱含了中国女子自强自立的精神。其他教会大学的英语被列为一、二年级的公共必修课，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规定学生从一年级至四年级均要学习英语，将读、写、作、译作为必修课。英文课的具体要求包括：(1) 记述文类：一年级，进行读文、作文、谈话训练；(2) 辩论文类：二年级，包括读文作文、谈话训练；(3) 说部剧本：三年级；(4) 英美文艺：四年级；(5) 英文教学法。金陵女子大学英语虽只列为一、二年级必修，但有额外的要求。例如，除掌握一般读本上的内容外，还要求学生每学期必须读若干本英文名著。上课使用的教学参考书也以英文原版书为主。学生记笔记、写报告、答考题均要求使用英文进行。在二年级结束时，学生还要参加英语综合考试，及格

---

① 游捷译自 M. Lamber Ton《圣约翰大学》，载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2页。

②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Brook Street,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td., 1971. p. 175.

③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者才允升到三年级，不及格须补读一年，然后再参加一次考试，仍不及格，则予以自动退学。①

从上述课程设置看出，仅英语一门课程内容非常具体和广泛，这跟民国国立大学仅开设"大一英文"、"大二英文"有显著区别。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办有英语专业。其英语课程的设置大同小异，不同的是个别科目名称、课时数等方面存在差异。其课程有两大突出特点：(1) 重视文学；(2) 语音、听说等课程不太重视。我们可以从"1934 年沪江大学英文系课程设置及要求"了解教会大学英语专业课程设置的大概。

**表 5—2　　1934 年沪江大学英文系课程设置及要求**

| 课程名称 | 学程说明 |
| --- | --- |
| 英文写作 | 练习写作纠正文法，启发思想，为研究修辞之准备 |
| 英语读本 | 浏览名著小说以养成默读英语的技能 |
| 修辞学 | 讲授修辞要诀，并随时练习作文，以养成写作兼擅的技能(大一必修，二学期，每学期 2 学分) |
| 读文 | 阅读短篇名著，讨论起结构、命意、题材与修藻等要点(大一必修，二学期，每学期 2 学分) |
| 文学要略 | 选读著名小说三种，须做笔记。复于课外选读近代小说一部，须作书后一篇(大二必修，二学期，每学期 2 学分) |
| 文选 | 选读时代文学，书读精研详加讨论(大二必修，二学期，每学期 2 学分) |
| 散文 | 选读各国长短名著，注重课外研究(大三、四选修，二学期，每学期 3 学分) |
| 诗选 | 选读英美各国诗家作品，注重诗的欣赏力和结构的研究(大三、四选修，二学期，每学期 2 学分) |
| 近代戏剧 | 研究各国著名戏剧，注重表情和结构(大三、四选修，二学期，每学期 3 学分) |
| 演说学 | 研究演说的技巧，如姿势、态度、声浪、取意理由、结构……同时注意发音的训练(大三、四选修，二学期，每周讲授一小时，每学期 3 学分) |
| 英文文学史 | 研究英国文学的趋势和进步的程度，兼涉美、法、德、俄、斯堪维纳等国的文学(大三、四选修，二学期，每学期 3 学分) |
| 短篇创作 | 本课预备英文程度优良之学生，得有较深文学创作训练之机会，注重短篇小说、论著、诗词、戏剧……(大三、四选修，二学期，每学期 3 学分) |
| 研究莎氏各种戏剧 | 研究莎士比亚各种戏剧(大三、四选修，二学期，每学期 3 学分) |
| 文学概论 | 研究各类文学著作以养成文学评判鉴别欣赏……能力(大三、四选修，二学期，每学期 3 学分) |

①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6 页。

续　表

| 课程名称 | 学程说明 |
| --- | --- |
| 圣经文学研究 | 应用文学眼光研究圣经内叙事言论诸文体（大三、四选修，二学期，每学期 3 学分） |
| 新闻学 | 研究新闻学的书法、体裁并练习之（大三、四选修，二学期，每学期 3 学分） |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 Y8—1—234——75，沪江大学 1934 年，引自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8 页。

（三）重视外语氛围的营造

教会学校为了在中国立足，都很重视英语，竭力营造英语氛围。克拉申（Stephen Krashen）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了输入假设（The Input Hypothesis）。[①] 该假设指出，人类是以唯一的一种方式习得语言的，即通过理解所获得的信息或者获得大量的可理解的输入。[②] 营造一个较为真实的目的语环境，让学生沉浸在真实语言的海洋中，即是获得可理解的输入的最重要的条件。威多森（H. G. Widdowson）在《语言学习面面观》（*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中指出，外语学习是一个有意识的介入（conscious intervention）过程，语言运用（performance）是由自然的、无意识的习得过程启动的。[③] 外语学习中"有意识的介入"的举措有许多，其中营造外语学习的氛围，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只有做到这一点，外语学习中"自然的、无意识的习得过程"才有实现的可能，进而达到较熟练地运用语言的目的。教会大学学生的英语水平较国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的学生高的原因在于教会大学不遗余力地营造了有利于外语学习的真实的语言氛围。金陵大学原校长陈裕光对此不无自豪：

> 一年级新生入学，仅英文一项，就要过五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常见字的字义及用法）。在课本方面，除去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全部采用英文，连

① 美国南加州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克拉申（Stephen Krashen）在 20 年代 70 年代末提出了监控模式（Monitor Model）。此模式建立在五个假设之上。它们是：输入假设（The Input Hypothesis）、习得与学习假设（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监控假设（The Monitor Hypothesis）、天然顺序假设（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以及情感过滤假设（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输入假设是监控模式的核心部分。

② Vivian Cook.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p. 55.

③ H. G. Widdowson .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p. 20.

助教指导实验、运动场上运动员的口语、学生助威的拉拉队,也不例外。我是学化学的,必须读英国文学史、英文修辞学、英国古典文学。由于一系列的强制措施,金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高。30 年代华东四大学(金大、圣约翰、东吴等校)一年一度的英语辩论会,金大常占优胜……其他学校师生都是西装革履,而平时既穿西装、也穿中装的金大学生,在辩论会上一律穿长袍,满口流利英语,一般学究打扮,直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①

尽管营造外语氛围对语言学习具有促进作用,但也招致质疑。刘泽霖在《在岭南经济商学系教书的回忆点滴》一文中写道:“在学校的行政大楼(格兰堂),四面一看,到处张贴的教务处、注册处、各个学系的布告、通知等等,一律是英文的……不久,我出席校务会议,会议所得印象极深。席上发言者毫无例外一律用英语,我当时好像又到了美国,我不禁暗想:这里到底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②

从刘泽霖的质疑看出,教会大学跟国内其他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外语氛围特别浓厚,几乎与目的语环境毫无二致:通行的语言就是英语,不论是办事、上课、看病、注册、出布告,一切的一切全用的是英语,只有中文课才用汉语。在这样的环境中,英语不仅是一种教学语言,而且是校园语言、工作语言和生活语言,即使在英文系,英语也不是学习的对象,而是学习的工具。学生一入学就得适应这样的环境。但是,一开始,由于基础、胆量、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学生说英文往往比较被动,这对教师的责任心和耐心是一个考验。如何逼迫学生张开嘴巴,关系到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艺术的高低。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营造外语氛围的重担更应落在教师的头上。1948 年毕业于以英语教学见长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的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名叫特克(Tucker)的可敬的外教:

记得 1946 年抗战结束后的那个学期,从后方来的一些学生就非常不习惯,听课听不懂,办事也成了问题。一位后方来的新闻系同学,为了调课就犯了难,因为他还不会说英语。他知道我是英文系的,就求我当翻译。我跟他一起去见当时的教务长 Tucker。进了办公室,我跟特克说这位新闻系的同学想调换课程,但是不会说英语,所以我陪他来当翻译。特克说,“你出去,不用翻译,让他自己说!”我没办法,只得退出。

①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谢泳、智效民等:《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4—155 页。

② 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 年内部发行,第 140 页。

课还是调了，那位不会说英语的新闻系同学是怎么对付的我不清楚，不过逼得没办法，只好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连比划带指指点点，也能解决问题。在圣约翰大学学英语口语就大都是这么学会的。一二年级有基础英语课，但是没有口语课，口语就是靠在各种不同场合大量听，然后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逼得没办法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这样慢慢学会的……这是一种自然的“获得”过程，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习”过程，特别是没有正规的“教”和“学”的过程，完全是靠在一个英语环境中熏陶和被迫进行口头交际，自然而然慢慢掌握的。这跟没有文化的中国保姆或小孩子在国外学当地的语言基本相同。①

第二课堂活动是营造全英语氛围的主阵地，教会大学从来都不会放弃这一阵地，况且它们比国立大学有更好的条件，如外教多，很多原版资料和设备可以从外教母国带来。因此，第二课堂活动异常红火，各种竞赛、演讲、辩论会等应有尽有。华南女子大学的英语演说会很有特点，“每月一集，以英语演说、辩论、讲述故事，以至于游戏议事，亦并用英语，以资练习。”②冰心在《我的大学生涯》中说：

我记得我们演过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时我们英文班里正读着“莎士比亚”，美国女教师们都十分热心地帮助我们排练，设计服装、道具等等，我们演得也很认真卖力，记得有一次鲁迅先生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看过我们的戏——忘了是哪一出——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演的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③

（四）教师认真负责，师生关系和谐

1. 教师认真负责，重视过程学习。教会大学的教师大多认真、负责，对教学很敬业，充满爱心。1942届约大经济系毕业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张祥保在《我的中学和大学》一文中提到的教师逐个面谈改作文的方法，既是负责敬业的表现，又是教学方法的创新。她说：“我选修了一门高年级写作课，授课的是一位细声细语年龄较大的沈老师。上课时她先让学生读一篇某种类型的文章，接着要求学生写一篇同一类型的作文。过些日子，她叫学生一个个的面谈，她并不动笔改作文，是在边上做些记号，当面向学生指

① 胡明扬：《外语学习和教学往事谈》，载束定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8页。

② 《华南女子大学〈章程〉》，1925年，载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

③ 冰心：《冰心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版，第400—401页。

出作文中的缺点。学生把修改过的作文再交给老师，下一次课时，她总把较满意的作文向学生朗读。”①沈老师批作文的方法属于面批。作文批改主要有集中批改、教师面批和学生换批等三种形式。如果时间允许，面批效果最佳。面批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反馈性强，教师能够及时掌握和反馈学生所犯错误；二是指导性强，方便对学生直接指导；三是激励性强，便于师生沟通，激发学生兴趣。

我们知道，外语学习要取得想望的效果靠的是平时的积累。积累就是过程。岭南大学美籍教师包令留（Prof. Brownell）通过其独创的“读书印象”来评定学生的成绩。他的这一做法就是现在所谓的“形成性评价”。②“形成性评价”跟“终结性评价”不同，强调对学习过程的考察。黄敬昌在《我所接触的美帝分子包令留》一文中说：“他平日对学生强调所谓‘读书印象’，意思是说读书印象好的即使考试成绩不好也可以多给分，‘读书印象’不好的，会少给分。因此，很多同学为了功课过关，要获得‘读书印象’，上课时也就格外留心、认真……许多同学在平时特别在考试前便常常到图书馆（包令留考查学生‘读书印象’，除了上课外就在图书馆等地方）看书，而不留在宿舍里。即使有时不是做他所指定的功课，也要在图书馆和包令留碰个面或在他指定的参考书的卡片中签个名。”③黄敬昌的记述明显带着时代的印记，但我们还是能从中读出包令留这位敬业的国际友人的良苦用心和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在大谈要重视学习过程，可解放前的教会学校早就这样运作了。历史在跟我们开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玩笑。

教会大学课堂教学民主，开放，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的主体性特征，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成学习的主人。1943届经济系毕业生陈琨在《记忆中的母校》中记载：

> 现在常看到报刊上报道，外国学校的教学不是满堂灌，而用启发式。教师常让学生自由发言，很民主，值得我们学习。殊不知，这种教学法，在我们母校早已实行。大学里，老师更不单讲课本，而是多方启

---

① 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② 所谓形成性评价，是指对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反映出的情感、态度、策略等方面的发展所做出的评价，是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反思而做出的发展性评价。其目的是激励学生学习，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培养合作精神。形成性评价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变成为评价的主体和积极参与者。

③ 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年内部发行，第164页。

> 发，并鼓励学生常去图书馆查阅参考书。我上过一位美国教师（Mr. Roberts）的原版世界史课。他充分发扬民主，上课成了开座谈会，让学生随意发言，对历史事实发表不同意见，进行辩论。老师随时给予指导。有时还结合历史，讨论当时英、法与希特勒交战的时事。这确实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①

2. 宗教信仰成为自主选择。教会大学一方面是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产物，同时又从西方带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的思想，所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封闭落后的大环境中，教会大学又是一个思想上相对自由、文化上相对开放的场所。教会大学在初期普遍把宗教课程当做一种必修课，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宗教活动，但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宗教信仰逐渐成为一种自由的选择。正如司徒雷登所说："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这里反映出具有民主思想的新一代教会高等教育家的普遍心态，是他们为适应在中国社会生存而采取的重大策略转变。从全盘实施宗教教育到世俗教育占主导地位，表明教会大学的培养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培养信徒和牧师，而是将按教会的意图改造中国社会，培养未来的领袖人物作为首要任务。②

3. 教会大学师生关系平等。教会大学非常重视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平等、民主关系的构建。特别是教师，无论是中籍外籍，都和同学保持平等关系，而不会像中国传统社会那种"师道尊严"居高临下的关系。尽管教会大学中也存在极少数的体罚现象，但总体而言，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民主平等。在节日活动和各种团体活动中，这种关系往往发展到极致，如在圣诞节、愚人节等节日中，学生可以恶作剧，拿老师、校长开玩笑，而老师们也不介意。学生把老师当做知心人，和老师平等相处，互相关爱，如同置身于"大家庭"中。冰心于1926年从美国回来后在母校燕大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她在《当教师的快乐》中回忆在燕大十年的教学生涯时说："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了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

---

① 陈琨：《记忆中的母校》，载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② 董宝良、但昭彬、陈晴：《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的接触十分频繁。我们常常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或是作个别谈话。这种个别谈话就更深入了！有个人的择业与择婚问题等等！”①

这种平等关系，体现在课堂教学中，就是教师给学生创造和谐轻松的气氛，在就某一问题展开讨论时，让学生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用英语各抒己见，而教师对学生从不或绝少疾言厉色、恶语相向。课堂外，学校构建起亲密平等的师生关系。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称“司徒（按：指时任燕大校务长的原校长司徒雷登）与燕大团体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②“每年新生都有机会受到老师的邀请，分批到外籍老师家中做客，平时在周末或节假日，老师的家门也总是对学生敞开，像圣诞夜的‘Open House’活动，凡是参加过的学生都终生难忘。师生之间不仅平时交往多，而且在教授家中举行的联谊活动也多，这就使学生在活学活用英语的同时，还能接触到西方的习俗礼仪”。③ 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经常深入学生宿舍。几乎每天清晨都手持鲜花到医务室病房探视每一个病人。④

努力营造课堂内外的这种充满学术气氛、充满友爱之情的人文环境，被称为“隐性课程”建设。⑤ 这种“隐性课程”使得许多学生即便离开母校多年之后，依然对自己的老师和母校的一切怀着深深的感情。这也是教会大学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五）重视中国语言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教会大学“洋气太重”，⑥重视英文，忽视国文及中国文化的教学，“当时在中国的一般教会学校，并不重视国文课的教学”。⑦ 这一说法在教会大学的早期阶段，在一定程度是符合实际的。但随着传教士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特别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开始，各教会大学调整了办学策略，决定实施更加基督化、本土化的方

① 冰心：《当教师的快乐》，载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7 页。

② 冰心：《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燕大周刊》，1936 年第 6 期。

③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6 页。

④ 郑朝强：《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91 期，第 97 页。

⑤ 参见郭德侠：《中国近代高等学校课程设置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3 页。

⑥ [美]罗炳生：《基督教高等教育当前的问题》，载《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26 年 9 月。

⑦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5 页。

针。实际上，教会大学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重视程度是因时因校而异的。有些学校确实不重视中文教学，虽然一些中国籍教师被聘请教授中文课程，也大都地位很低。学生对中文学习也不重视，如早期的圣约翰大学。曾在金陵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P. Fenn)指出，“圣约翰毕业生因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无知而饱受訾议”。①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一些教会大学开始课程改革，认为“要使得所有教会学校毕业生，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能；如此方有影响中国人民生活与思量的力量”。② 改变了忽视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做法，开始重视汉语和中文课程的教学。例如，1921 年开始，司徒雷登校长礼聘刘廷芳、洪业、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顾颉刚、张东荪等学术界极有地位的学者大师来校工作，大大增强了燕大中国文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教会大学开始重视中国文史的目的，诚如许美德(Ruth Hayhoe)所说，“纯粹是出于实用的考虑，想通过设置这些课程使得学生把宗教同中国文

---

①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122. 到了后来，这一状况已有较彻底的改变。1936 年考入圣约翰附中，1943 年从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陈琨在《记忆中的母校》中记载：“在母校，除国文、中国历史、地理外，其他功课一律用英文，老师都用英语讲课，锻炼学生的听讲能力。因此，社会上有人以为母校不注重中文。其实不然。我们用的中文课本远比当时政府统一规定的深。高中课本选自《开明活页文选》，其中除少数白话文外，多数是自秦汉至清末的古文。每周一次中文作文，英文作文。中文作文都要用毛笔写正楷。英文作文不求篇幅长，只求通顺而少错误。大学一、二年级都必修国文课。课文是学校自选的秦汉以前的文章，和高中课本衔接。”(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1 页。)而有些教会大学一直都非常重视国文教学，由 1864 年创办的登州文会馆演变而来的山东基督教大学(即后来的齐鲁大学)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文会馆时期，校长狄考文非常重视中国经典的学习，拒绝给青年学生教授英文，因为他不愿意这些人学了英文后受到诱惑而离开宣教事业，去从事商业活动。但是他所做的唯一让步是在临近学业结束时给那些成年人教授英文，因为他们的性格已经养成。(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 20.)芳威廉(1999)说，“贯穿山东基督教大学历史的问题是它对中国语言文字教学的重视。这是该大学所标榜的特征之一。就在全国上下都对英文抱有强烈兴趣的时候，这一现象(在这里)却受到强烈的质疑。1906 年学校发生了要求引进英文教学的罢课事件。”(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46. 另参见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 123.)

② [美]罗炳生：《基督教高等教育当前的问题》，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0 页。

化融合起来，从而最终达到在中国广泛传播基督教的目的。"[①]芳威廉指出，传教士重视中国语言文字的教学还基于如下"最具说服力的理由"（the most cogent reasons）：一是"教授英语将会给中国的年轻人展示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未来，而这与传教使命完全背道而驰"。二是"尽管中文有显而易见的缺点，但它每年都成为教授最高级的各种科学课程的值得考虑的媒介。乐于从英文课本里教授科学无异于战斗还未打响就承认失败"。[②]

除了在课堂上重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学，教会大学还重视汉学研究。1928 年，哈佛燕京学社[③]成立，专门以研究汉学、培养汉学家为目标，每年拨给该社八九万美元的经费，还津贴燕京大学的国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后来扩大拨款范围，在华的许多教会大学（如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都曾获得该社的津贴。[④] 哈佛燕京学社还规定在燕京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两校合作，在美国出版英文版《哈佛亚洲学报》，在中国出版《燕京学报》和收集中国文物图书资料。

（六）重视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

教会大学有良好的学风，这是他们实行严格的考评制度、对生源不断淘汰的做法密切相关的。"以考促学"、"以考制懒"是教会大学赢得闻名遐迩的口碑的利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重视通过经常性的考试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考试分平时考查、月考、期考三种。平时考查主要是笔试或口答，教师根据需要不定期进行；月考规定每学期三至四次，于该科授课时间内举行；学期考试于期终。每月成绩以一月内的平日成绩和月考成绩合并平均得出。

金陵大学规定："各生每班以七十分为及格，若不及格者，下学期重读，或于下学期入学考验日期按时来堂重考。凡所读之书考未及格者，均不得升班。每学期有小考数次，日期系由本班教员择定。若一星期上五堂者，须有五次小考；一星期上三堂者，须有三次小考。所用时间仍系平时上课

①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1 页。

②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123.

③ 哈佛燕京学社，英文全称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交流的典范。在东西文化交流上举足轻重的哈佛燕京学社，是由美国铝业公司创办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的遗产捐赠而建成的。

④ 参见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p. 126—127.

时间，不得与他班交杂。至于总分，则以小考积分与大考分数均分而得，小考积分作为三分之二，大考分数作为三分之一。"①

震旦大学实行周考、月考、学期考和年考的多级考试制度。年考中最为典型的是证书考试。按规定，学生在某项课程中有一次考试不及格可以补考，补考不及格则需留级。考试一般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进行，笔试试卷由两名教授分别阅卷评分，口试则由三人组成的考试委员会分别考问。

华中大学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新生入学后立即举行分班考试，经过两年的学习后，还要通过一次中期考试，每年都有部分学生因未能通过中期考试而被迫留级。毕业前夕还进行一次对主修课的总考试。同时，要求用一年的时间撰写毕业论文，总考试成绩合格，而论文没有达到规定的水准，不能毕业。

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对考试也都非常重视。虽然各校采取的考试方式各不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通过考试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淘汰。金陵大学各院系每年录取约 200 名新生，在经过四年的学习后，能够顺利毕业的仅 100 人左右。在金陵大学，仅 1937 年，就有 43 名学生因成绩欠佳而被劝退。②

### 四、教会大学的成就及影响

教会大学是近代西方差会（Missions）③在中国晚清、民国时期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教会大学安静的校园环境、良好的教学设施、优良和谐的师生关系和高质量的英文教育等优势吸引了无数中国学子。不少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教会学校读书。教会高等院校不仅对中国现代高校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引导与示范作用，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进一步影响中国教育甚至社会的各个层面。章开沅教授说："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已经绝迹四十多年，但它的校园、建筑、图书以及其他各种教学、研究设施，仍然继续用于高等教育，它的教师和毕业生（包括中途辍学的肄业生，后者为数更多），仍然

---

① 《金陵大学堂章程》，载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5 页。

② 董宝良、但昭彬、陈晴：《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9 页。

③ 差会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负责集资、派遣人员到国外传教布道的机构。由差会派出去的人员，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如传教的牧师、医院的医生、护士学校的教师职员等都被称为传教士（missionary）。

在许多大学或其他部门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工作，而其中一部分已经成为若干领域的领导与骨干，如农业、医学等。他们不仅运用在母校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服务，而且还或多或少继承着教会大学传统校风中的优良部分。"①

就教学质量而言，教会大学一般要高于国内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国外注册，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国外有关大学研究院深造并获得学位。金陵女子大学是其中之一，它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对其学士学位的认可。金女大校长、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吴贻芳回忆："有些大学研究院不了解金陵女大毕业生的水平，还有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直到金陵女大 1921 年毕业生严彩韵去该校暑期学校选读三门课，每门成绩都是'A'以后，才信服金陵女大毕业生的水平，同意接受他们进研究院。金陵女大最早的四届毕业生共 33 人，赴美深造获硕士、博士、医学博士学位者有 20 人。"②1932 年至 1934 年间，中央大学艾伟、张士一等教授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之委托，对大学一年级英语阅读理解及速率进行了一次测试调查。这次测试是民国期间大学英语教学水平调查测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的结论是："教会大学的水平总体来看略高于其他大学。"

表 5—3　各类学校测试成绩统计

| 类别 | 人数 | 理解 | | 速率 | |
|---|---|---|---|---|---|
| | | 平均成绩 | 名次 | 中数 | 名次 |
| 国立 | 1147 | 36.11 | 3 | 113.52 | 3 |
| 省立 | 282 | 26.53 | 4 | 109.40 | 4 |
| 私立 | 235 | 38.20 | 2 | 118.59 | 2 |
| 教会立 | 678 | 51.86 | 1 | 150.42 | 1 |

数据来源：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53 页。

教会大学学生的外语实际应用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例如，齐鲁大学社会学系一位同学在外籍教师的指导下，对济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总体调查后，用英文写成《济南社会一瞥》。这篇文章材料详实，叙述客观，而

① 转引自陈国钦、袁征：《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前言》，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吴贻芳记金陵女大的四十年》，载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56 页。

且能以比较和审视的眼光看待济南的社会问题。[①]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圣约翰大学1939届新闻系毕业生经叔平，在得知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的喜讯时，高兴之极，就根据报纸上的新闻，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英文的《中国评论周报》上。[②] 从中也可以看出教会大学学生不凡的语言功底。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说，以翻译莎士比亚闻名的朱生豪是之江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应该承认那个时期英语公共课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是很不错的。[③]

教会大学学生利用其出色的外语能力在维护民族独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在1944—1945年冬天，燕京大学有大约13%的男生志愿报名参军，其中一些人进入了军官学校，一些人参加了空军。还有不少基督教大学学生利用外语较好的条件，为盟军服务，担任翻译、通讯等工作。[④] 在1943年国民政府发起的“学生从军运动”中，燕京大学共有79名学生被录取。还有相当多的教会大学生成了美军翻译，有3名福建协和学生在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军队里担任翻译，相当一部分金陵女子和燕京的女生在成都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担任打字员、电报员或会计等地勤工作。[⑤]

“一校之成绩，观其出产人才可知矣；人才之成绩，观其服务社会可知矣。”[⑥]鲁珍晞(Jessie Gregory Lutz)说：“评估教会大学影响力的一个具体方法是通过对其毕业生的了解。学生的社会、知识背景，他们进教会学校的目的，开设的课程以及他们毕业后的所从事的职业，所有这一切都能说明教会大学对社会的贡献。”[⑦]综合相关史料，中国大陆主要的教会大学，办学质量相当不错，尤其是英语教育质量举世共睹，为中国培养了为数不少的翻译、外语教学、新闻、出版、科技、外交、经济等各界优秀人才。仅以1926年统计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的分布情况为例：在中国政府任职的有43人，其中内阁部长级7人，局长级16人，外交官6人，铁路官员14人；在商界任职的有158人，其中

① 董宝良、但昭彬、陈晴：《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② 经叔平：《母校的教育永远铭记在心》，载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页。

③ 胡明扬：《外语学习和教学往事谈》，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④ 刘天路：《抗日战争与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进程》，《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⑤ 刘家峰：《论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关系》，《史林》2004年第3期。

⑥ 《圣约翰大学四十年成绩志略》，转引自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⑦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94.

经理24人，买办107人，银行界27人；在教育界任职的有72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大学教师65人，中学校长5人。[①] 毋庸讳言，上述中的许多职业领域除了过硬的专业基础与技能外，都需要扎实的外语功底的支撑，以圣约翰等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大学毕业生在国学知识、西学修养以及掌握与运用英语等方面的造诣极为精深，其视野也较为广阔，为教会大学赢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业绩，也为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还可以从周为筠的《消失的教会大学》一文进一步了解教会大学的贡献：

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以当时的成就和名誉论，很多都可与北大、清华媲美。这些学校中有些特色专业闻名遐迩，比如燕京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

如金陵大学，从这所位于南京的教会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校友可以说数不胜数，如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

不过要论金陵大学最具特色的还属农科，开创了农林研究的很多先河。恰如胡适所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

像金陵大学农科一样闻名的要数东吴大学的法科，它很早就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所有的课本都是美国大学的原本，培养了一大批最一流的法学专家。在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中国组成的法官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以至于很多学生都冲着法学报考此校，连以小说鸣世的金庸也是，学校一半人数居然都是学法的。这所大学部分校友于1949年迁台后，经过砥砺发展，其法学一脉香火仍存，依然成为全台翘楚。

教会大学的医学教育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医学发展贡献颇多。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西医教育，改变了中国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协和医学院在上个世纪初是中国条件最好、质量

① 金忠明、李若驰、王冠主编：《中国民办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最高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普通的临床医生，更多的是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专家。①

毋庸讳言，尽管整体而言教会大学教学质量可靠，师资阵容齐整，但仍然存在瑕疵，特别是在其早期阶段。他们中的很多教师是由传教士充当，他们为传教而来，多数不懂教育，缺乏教学经验，素质和专业水准也差。② 胡适曾抱怨"来传教的都不用经过严格的天然淘汰"，"有不能在本国吃饭而来中国教书的，有来养病的，有来休息的，有来玩的"，"今日教会选择传教士，还不如美孚公司或英美烟草公司选择内地经纪人之严格"。③ 从其外语教学来看，有的教会大学存在很大问题。1937 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教育系、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的王神荫回忆了英文系的教学情况：

> 要说教员多的系，首推英文系。一则因为只要是外国人在别处安排不下的传教士，都可以到齐大来教英语，既不讲教学方法，也不教授课文内容。二则因为立案后，英语列入公共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念两年，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由于过去不重视英语，一时提不高新生的英文程度，以致入学新生的英语程度参差不齐，差距很大。英文系就根据入学考试英语成绩的好坏，重新分班。程度好的可以选修二、三年级的英文课，程度差的则入不列等级也没有学分的预备班，这样一来也需要较多的英语教师。自 1917—1937 年先后任英文系主任的有巴克尔(Parker)、罗天乐(Lotenslauger)、凌达杨……除中国人凌达杨和撒尔真是专职还有英语修养外，其余都是由传教士或他们的妻子兼职。其中以奚尔恩夫人懂得最少、教得最多……圣经内容虽然很多，与英语的发展关系密切，但(她)上课时东扯葫芦西扯瓢，乱说一通，既学不上英语，又谈不上宗教。其他英语课和教师也大同小异……教师只会普通口语，既不懂文学，又缺乏历史知识，因此学生一年下来还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④

而且，一些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

① 周为筠：《消失的教会大学》，《凤凰周刊》，2009 年第 22 期，第 84 页。

② 参见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61—63.

③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④ 王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载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1—182 页。

引起不少中国民众的反感。自 20 世纪 20 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教会学校被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实际上，这种尖锐的批评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例如，美国人费正清(R. M. Fairbank)曾在清华大学任教，足迹遍及十七个行省，中国抗战时期，任美国在华情报员。著有一书名为《美国和中国》于 1948 年印行，流行一时。文内力称岭大、燕大等是西洋民主在中国最大的堡垒，美、英花在这种学校身上的钱为数甚大。①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少数教会大学存在瑕疵，以及少数传教士死守其殖民情结，就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概予以否认。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混为一谈，这是政治语言，而非学术话语。总体上说，中国的教会大学是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而存在的，并非像某些偏激人士所称的承担了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对于教会大学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著名的教会史专家章开沅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 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和较深的层次。我们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作用。
>
> 迄至 1949 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
> 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

---

① 李圣华：《岭南大学的宗教活动》，载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 年内部发行，第 89 页。

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本土化进程的加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教育功能日益增强，而且不断加强与社会联系并为社会服务。它不仅通过自己培养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等，在社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①

## 第二节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燕京大学

### 一、创办缘由及过程

教会大学创办的初衷是为了培养有知识、有地位的中国基督徒，以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教会大学基本上是以培养宣教人员为己任。尽管如此，以西方教育为蓝本的教会大学相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而言，依然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创办于1919年的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一所私立综合大学，它和创办于1879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当时在华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

自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也加速在中国扩张开来。“对外扩展的需要与救世主开化落后民族的思想相结合，使美国的海外传教运动，在20世纪初期达到一个新高潮。”②但是，当初西方传教士初来乍到，中国人民族情感的反应是抵触的，冷漠的。19世纪末，发生了维新变法运动，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中国大地掀起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学的热潮，国人对西人传教和创办学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而在中国沿海及内地发达省份先后出现了山东齐鲁、浙江之江、江苏金陵、东吴等一批教会大学。位于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也出现若干基督教学校，如北京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通州华北协和大学(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

① 章开沅：《总序》，载谢必震：《福建协和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②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lege)等。汇文大学的前身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刘海澜(H. H. Lowry)博士于1871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后更名为"怀里书院"。1888年又增设大学部,名为"汇文书院(Peking Academy)"。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前身系美国传教士理事会(The American Board)蔡平牧师(L. D. Chapin)于1867年设立的通州潞河书院。[①] 这两所学校于1916年酝酿合并,但因校名争执不决。1919年,出身在中国杭州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s)传教士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②]被任命为两校合并后的新校校长,最后确定以"燕京大学"为正式校名,是为燕京大学成立之始。[③] 次年,又并入华

---

① Kwang-Ching. Liu.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6. p. 45.

②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教育家。1876年6月生于杭州。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出任校长后,司徒雷登为燕大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四处募捐,为燕大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1941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8月8日,《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发表,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1962年9月,在华盛顿病故。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完成了他的生前遗愿。司徒雷登曾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著名学者、爱国民主战士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077页。)燕大的学生对司徒雷登评价不凡。1936年,当司徒雷登60岁生日到来之际,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师的冰心在《燕大友声》上撰文,对校长的懿德嘉行给予高度评价:"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燕大友声》第二卷,第九期,1936年6月24日。)

③ 史家对燕大的创办年份意见不一。高时良认为:1919年由协和大学及汇文大学合并而成;(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魏思特(Philip West)则以1916年两校董事会宣布改组为创校之始。(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第一辑,香港豪威印刷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页。)顾长声也持这一观点:燕京大学成立于1916年,是五个基督教差会,即美国的长老会、美以美会、美以美妇女会、公理会和英国的伦敦会所合办。……1916年在纽约和北京分别成立"托事部"和"董事会",因此一般都以这一年为创校年份。(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北协和女子大学(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omen)[①]和华北协和神学院。燕大成立后,在司徒雷登校长的领导下,发展迅速,"在20年代初仍名不见经传,却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几乎与清华、北大齐名的著名院校",[②]为国家培育了大批高质量的各类人才和中西贯通的学者,它的功绩在流逝的岁月和人民的历史中是不可泯灭的,如同在燕大校歌中所说: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 二、外语教学及管理特色

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和知识界都很重视英语,燕京大学因出色的英语教学而闻名遐迩。[③] 西洋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和国文、历史、社会、新闻[④]、医护预科等系科一样,是燕大学科建设和发展最为突出的系,创办于1923年。燕大西语系负责英语专业教学和全校的公共英语教学。创办燕大的目的是"希望培养西方语言文字方面的人才,加强燕大学生与国际交流的语言能力"。[⑤] 根据《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西语系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初创时期(Pioneering Stage,1923—1927)、发展时期(Developing Period,1928—1937)、孤岛时期(The Isolated Island,1937—1941)、成都时期(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engdu,1942—1945)和北平复校时期(Rehabilitation to Beiping,1945—1952)。初创时期,一切都处在缺乏经验的摸索阶段。建系第一年,分为英语系、欧语系和希腊语系三个系。1927

① 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1864年创办,初名贝满女塾(Bridgman Academy),创办者为裨治文夫人(Mrs. Eliza J. Bridgman)。女塾位于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后改办贝满女中。

② 田正平、刘保兄:《消极应对与主动调适——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发展方针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6. p. 91.

④ 燕大新闻系是亚洲第一家实力雄厚的新闻系。该系创办于1924年,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合作更是提高了它的实力与知名度。(参见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81.)

⑤ 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年三个系实现合并，统称西语系，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步多马(T. E. Breece,1881—1971)担任系主任。自1926年燕大从北京城东南角的盔甲厂搬迁到海淀燕园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十四年的时间里，西语系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这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师资队伍不断壮大；课程体系日趋完备，尤其是文学课程不断得到充实；作为全校公共课基础课的大学一年级英语的教学得到快速发展。七七事变，日军占据华北。国立院校，多已相继南迁。燕大"以外国教会之关系"，[①]仍留原地开课。沦陷区的青年纷纷负笈前来，学校规模急剧扩大，学生质量日见提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被迫关门。尽管学校于次年10月在成都复校，但已伤元气，师资紧缺，西语系降格为英语系。抗战胜利后不久，燕大在北平复校，开始走上正轨。柯安喜(A. Cochran)担任系主任，教学上开始了美国结构语言学派的理论与实践教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燕京大学西语系从1923年建系到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西语系，经过前后近三十年时间的发展和实践，在英语教学方面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1) 根据学生的入学英文基础，按程度分班，实行针对性强的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大一英语分四到五个班次，教材虽相同，但教学方式、教学进度及要求均按照该班学生实际水平及接受能力分别制定。燕大学生录取后按不同的水平，进行英语课的分班：有上大一英语的；有一入学就上大二英语的；成绩突出的还可以免修基础英语；也有的不够燕大英语水平的，先上补习班英语，然后再上大一、大二英语，这就等于要学三年英语。在入学之初，先要花一个月时间进行发音训练，然后再用直接授课法上课。在燕京，如果英语不过关，是无法继续学习下去的，因为许多课是用英语讲授的。这样分班，因材施教，不搞一锅熬，对学习好的，差的，对教师备课都是有利的，但不管怎样，必须达到燕京毕业生水平才能毕业。如果说以上作法是强化听说训练，那么，英语作文及课外阅读则属于提高读写的措施。不论任何系的学生，在学英语时，都要按规定的材料(pocket-book)定期(一月、二周、一周)读完一本，进行检测。当然对西语系的要求就更严格了。[②]

(2) 教学方法上，采用启发式教学(heuristic method)，讲授和练习相结合，以提高英语能力为目的，重在提高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例

① 陈礼颂、程曦：《学府记闻·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2页。

② 王佩玉：《燕京·光彩》，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页。

如，在大一的“听说”课上，教师“在训练学生听力的同时，给学生大量用口语的机会；在鼓励学生多说的同时，强调发音及语调的准确性，这就使学生每堂课都有收获”。[①]

（3）把课堂教学与教学研究结合起来。燕大教师在切实把握好课堂教学质量的同时，还鼓励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自己编写练习和教材。例如，课堂上的“听说”训练需要大量练习题，西语系教师就自己编写燕大学生专用的教材。1945年，柯安喜根据“结构语言学派”的理论，为了加强听说练习的效果，总结归纳了学生经常出现的发音及口语的错误编写成三册《英语语法和练习》，为燕大的基础英语课提供了高效实用的教材。

（4）重视文学学习。民国时代，不管是教会大学，还是国立大学，一般都很重视文学课程的学习，因而培养出了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优秀外语人才，如林语堂、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燕大也不例外，其西语系为训练“读写”能力选用的课本都是高层次的西方文学名著，包括诗歌、戏剧、小说各种文体，荷马史诗、弥尔顿的《失乐园》、莎士比亚戏剧、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德》、狄更斯的《双城记》等。“这种把语言学习和文学史学习结合起来的做法既可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又可培育学生的文学修养，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学生的英语才有可能日后达到一个高品位、高层次的水平。”[②]

（5）重视课外阅读。燕大基本上采用美国大学的教学方法，“英语课除课本外，指定课外阅读书籍，通常为英语世界名著，每周阅读一册，让学生自己安排阅读时间”，每周还安排“进行小的测验（Quiz），考核阅读情况”。[③]试题不多，主要是按题用英语写出主要内容、中心思想、人物分析，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此举能够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能力及提高阅读速度，这种训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快速阅读大量参考书时的困难。

（6）教学与育人相结合。燕大教师关心爱护学生，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和魅力，言传身教，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塑造自身完美的人格。以下燕大学子王佩

---

①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3 页。

②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4 页。

③ 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5 页。

玉的回忆委实让我们深思！

> 英语课作业，教师不只把批语写在纸上，还有当面指正，难忘一次面批作业至今还常重现当时情景：一个下午，明亮的窗下，教师坐在书桌前，她让走进来的我坐在她身旁，……她铺开我的作业，笑着说：
>
> “词、语、文法还可以，气势也流畅，不过，阐述论点还需慎重。你认为人性善。至于性善、性恶，全世界正在辩论，尚无结论啊！”
>
> “啊？……”这下子我觉得自己的思路激烈地震动开来：“……‘人之初，性本善’，是从小受孔孟之道的影响！荀子却讲过‘性本恶’啊！至于全世界的有关论点是什么？是怎样阐述的？”
>
> ……
>
> “还要注意……”教师亲切的语音又响了：“纸张，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有不同的折叠法，得考虑读者的便利。……作业么，一般折叠就可以。如果是信件，最好是……”她拿起一张纸，横向折成二分之一，又纵向折了个三分之一，左右合拢，然后，又作为收信人打开信纸，一边动作着，一边说：“这样方便吧？”我非常感兴趣地笑着。她又笑着说：“如果你是个编辑常看稿件上的字，就会欢迎作者们选用绿色格纸，因为绿色养眼啊！”多少年来，我一直遵照她的教导折叠信纸。每当选购稿纸，我总优先选绿色的。至于“性善”、“性恶”，迄今尚无定论。事实告诉人们：“重在教育”！①

(7)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燕大校风的特点之一是“自由民主、轻松活泼”，课外社交活动之多令其他国立院校学生羡慕，而这些活动又往往是学习运用英语的好机会。全校共有上百个团契(fellowship)，集会时或读圣经、或唱赞美诗、或作祷告，大都用英语。团契成员举行晚会或郊游等活动中，英语是交流时通用的语言。重大节日的合唱演出，歌词全是英文原文。排练时，歌队指挥也用英文讲解指导。其他如各种球类比赛、滑冰、舞蹈表演、班际校际的运动会，也多用英文的裁判、比赛规则等专业词汇。②

西语系除了承担本系的专业课外还要承担全校低年级的英语公共课。在司徒雷登的影响下，西语系非常重视低年级的公共英语课程，全系教师不论资历、职称，每人每年都要担任一两个班的基础英语课，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形成了燕大特色的一整套基础英语教学体系。可以说燕大的公共

---

① 王佩玉：《燕京·光彩》，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3 页。

②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7 页。

英语教学是十分成功的。

燕京大学的管理层很清楚，要想在社会立足，必须要有过硬的质量，质量出自管理。因此，西语系除了加强课堂教学、第二课堂活动等常规管理外，还体现在严格考试管理方面。首先，把好学生入学质量关。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非同一般，考试要求高，试题较难，藉以希望较全面地了解学生的英文水平。例如，20 年代的招生简章规定投考者宜具下列四项，方为合格：

A. 通晓英语、谈话清楚；

B. 诵读普通英文课本没有困难；

C. 善用文法，尤宜谙熟动词；

D. 能作明白清晰的英文作文。①

就试题内容来看，题目是相当难的，要求很高，强调综合素质和能力。如 40 年代的试题"除全面检查学生智力和知识面的智力测验外，加入用英文听写部分。1946 年在北京复校时的考题是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文，但不附原文。1947 年由外籍教师当场提问，学生须在限定时间内用笔速答"。② 王佩玉在《燕京・光彩》中记述："英语试题，要求较高，尤其是'看图作文'，不仅考察英语书写水平，还考察视觉、审美水平。'智力测验'更是其他学校入学考试所没有的科目！"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英美文学翻译家梅绍武（1928—2005）回忆 1947 年报考燕大时的情景："事先已听说燕大西语系相当难考，据说有一年的英语考题只有一道：'试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文'，而且不附中文原文，不少考生为此吃了鸭蛋。我幸好没遇到那样的偏题，拿到的是一厚本像如今'托福'之类的考题，许多试题还需一边听主考老师提问，一边在考卷上速答，每题都有时间限制，听不懂那位美籍老师的发问便会一筹莫展。我多亏在中学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侥幸录取了。"④

除了题目难，要求高，燕大的入学考试也很重视国文的修养。中科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良师益友常相伴》中记载："后来我投考燕京大学，参加经过中学报送的特别考试，只考中文和英文。中文试卷正是谢

---

①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1—92 页。

②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2 页。

③ 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1 页。

④ 梅绍武：《回忆学习外语所走过的道路》，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3—314 页。

冰心老师命题的，要求写文言文和白话文各一篇，文言文的题目是'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白话文的题目是'雪夜'。不过到那时我还是一直不认识谢老师。"①

燕京招收新生，除在各大城市公开进行外，还有几个重点中学，如北平的贝满、天津的耀华等校的高材生中选录。燕大招生极为严格，秉公办事，宁缺毋滥。一位燕大学子的回忆，可见一斑：

> 从智力，从基础知识全面考核录取新生，把关严格，有一个突出的实例：一位女同学爱好声乐，考了几次燕京都没考中，校方准她入校借读一年。借读期间，她多次在校内举行独唱音乐会，有时还到北平市内开音乐会，校内外听众反映良好，她的父亲是位基督教牧师，燕京是教会学校。因此，许多人猜想：她可能会转为正式生，可是一年到期，再没有见她的踪影！严格照章办事，重才而不照顾人际关系，这确实值得办学者深思啊！②

但是，即便如此严格，燕大仍"不缺乏申请者。新生录取比例为12∶1"。而且，许多名人更是乐于将子女送到燕大就学，如晚清政治家曾国藩的17个曾(外)孙(女)、梁启超的5个(外)孙(女)以及民国名门子女都在燕大就读，③足见当时社会对燕大的认可。

其次，在教学质量评价方面，要求严格，注重过程管理。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燕大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和评分制度。各门课程的评分标准最初为六级：优秀(2分)、良好(1.5分)、中等(1分)、及格(0.5分)、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0分)、不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0.5分)。按规定，本科学生只有修满148学分的功课，并获得148以上的分数才可毕业，也就是说，平均每门课的成绩至少要在中等以上。④ 燕大的考试分学年考试和课堂考试。"全校各系学生第一年英文不及格者即遭淘汰"。⑤ 为了保证学生的英语水平，西语系学生必须一年级期末参加甄别考试，"一年级英语成绩必须达到

① 侯仁之：《良师益友常相伴》，载陈原等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23页。

② 王佩玉：《燕京·光彩》，载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

③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6, p. 91.

④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⑤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10分制的7分才能进入二年级继续西语系的学习,这就确保了学生有较高的英语水平"。[①] 课堂上的考试形式有小测验、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外加随时的口试和定时上交的读书报告。王佩玉回忆:"入学不久,我就听说: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不及格的,就得'挨刷',思想压力很大。期中考试后,确实有些新同学不见了!'淘汰制'何只是针对新生啊!无论新老同学,都是课堂上全神听课、答问、记笔记,课下忙于预习、复习。图书馆里,阅览参考资料者白天多,晚上更多。宿舍里,尽管准时熄灯,而坚持继续学习'开夜车'者不少!"[②]

## 三、外语教育经验

燕京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仍名不见经传,但经过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燕大人几十年的奋斗,不仅成为国内16所教会大学中最突出的代表,而且和著名国立大学相比,也有其突出特色,这主要得益于燕大在办学过程中采取了与大多数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有所不同的发展路向,积累了至今仍熠熠生辉的英语教育经验:

### (一)重视国文学习

判断一个中国人英文水平之高低,不能不衡量他的汉语水平。评价他以英文为手段或工具所建树的事业,更不能排除国学基础对他的成就的关系和影响。因此,燕大在本科生的教学中重视中国本土文化(the indigenous Chinese culture)和舶来的西方文化(the imported Western culture)的教学,[③]即在关注英语教学的同时,十分重视中国文史基本课程,因为"燕大学生都被指望要具备双语能力"[④],聘请国内驰名的文人、学者、汉语专家担任必修课"大一国文"的教师。例如,燕大聘请的周作人,是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开设了文学和写作课程。学校规定,学生毕业前,必须选修12个学分的中文课程(中国文学8学分,中国历史4学分)。也正是由于燕大的中国化,重视国文学习,学生才能在各系的学术领域里有更高的水平和广阔的视野。我国不少知名翻译家、外交家、新闻工

① 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② 王佩玉:《燕京·光彩》,载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页。

③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81.

④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6. p. 91.

作者、英文教授、外文编审，并非毕业于西语系而是其他各个学系。如历史系的龚维航(龚澎)、新闻系的萧乾、哲学系的高名凯等人是燕大优秀学生中的代表。龚维航(1914—1970)在抗战时期就担任周恩来的翻译，参加1960年日内瓦会议以及其他不少重大国际会议，在我国外交史上写下浓重一笔。萧乾(1910—1965)，集作家、记者和文学翻译家于一身，先后翻译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英国作家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被称为"最难懂的巨著"——爱尔兰小说家乔尹斯的《尤里西斯》。他还因为翻译易卡生的《培尔·金特》而被授予挪威国家勋章。语言学家高名凯(1911—1965)，曾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表作有《普通语言学教程》、《语言论》、《语法理论》等。毕业于新闻系的周明均于1942年修建中印公路期间，在中方驻印度训练中心负责中英文对译及中美双方联络官的工作，并用三年时间独自编写一部英汉军事词典。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董秋斯(1899—1969)于1926年毕业于哲学系，曾担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他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战争与和平》出版多次，影响很大。经济系毕业的凌青，是著名外交家，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并四次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韩素英(1917—)于1933年至1935年就读于燕大医预系。她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作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迄今为止已用中、英、法等多种语言发表作品三十余部。她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85年以来，她在国内先后设立了"韩素英中国西方科学交流基金会"，"韩素英陆文星促进中印友谊奖"、"彩虹奖"、"中国青年翻译奖"等。①

燕大西语系同样培养了众多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新中国英语教育、科研、翻译等领域的骨干力量，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赵萝蕤(1912—1998)，1932年毕业于燕大西语系，先后担任燕大西语系主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把英国诗人艾略特(T. S. Eliot)的诗《荒原》(*Waste Land*)译成汉语，是把《荒原》完整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人。她历时十二年将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巨著《草叶集》(*Leaves of Grass*)译成汉语。1991年，她荣获芝加哥大学建校百年首次颁发的"专业成就奖"、1994年获"中美文学交流奖"等。② 焦菊隐(1905—1975)，中国导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者之一。1924年中学毕业后保送至燕京大学。在国内第一次

---

① 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② 详见梅绍武：《赵罗蕤先生的学术成就》，载燕京研究院：《燕京学报》，1999年11月新七期，第187—198页。

把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等职。宋淇(1919—1996)，笔名林以亮，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曾专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宋淇一生著译极富，有《昨日今日》、《更上一层楼》、《林以亮诗话》、《林以亮论翻译》、《文学与翻译》等。周汝昌(1918—)，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红学家之一，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黄宗江(1921—)于1938年夏天考入燕大外文系，大学期间组织了"燕京剧社"。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剧作家，他写的《柯棣华》、《秋瑾》等都拍成了电影。

1944年在成都招考盟军译员时，成都华西坝①地区的各大学均有人报名应征，但录取的21人全是燕大学生。二次大战期间，中国驻英、美、法、印度等国的特派记者，于1954年在朝鲜板门店中美举行谈判时的译员也全是燕大毕业生。② 由于他们英文熟练，燕京的毕业生常常在中国新闻单位的驻外机构里获得要职或成为西方新闻单位驻中国的记者。"二战期间，中国政府派往伦敦、巴黎、纽约、华盛顿、旧金山和新德里的新闻机构负责人均是燕大毕业生。"③司徒雷登也说："有一段时期，中国新闻社派往世界各大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我系的毕业生。"④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具备坚实的中文基础和深厚的英语功底能为我中华祖国及其人民作出突出贡献。⑤

（二）创设双语教学环境

针对学校西籍教师较多的特点，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作出规定，在课堂

---

① 抗战爆发后，济南、南京等地的高校如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著名高校纷纷迁到成都的华西坝地区，继续进行教学。

②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0页。

③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81.

④ [美]约翰·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⑤ 当今的外语教学前景不容乐观，不论学生的外语功底，还是汉语功底，都令人堪忧。外语院系的学生"仅以说几句外语为满足，既没有扎实的中外语功底，又缺乏合理的知识结构，更谈不上有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科研能力"。(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长期以来语文教学受忽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据浙江省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2006年度调研报告汇总》(未刊稿)，省内本科院校的外语院系"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我们本族语的语言与文化教学。……与汉语有关的仅为两门课：汉语写作和中国文化。所开设的学校也仅为4所和2所，学分各为2分"。另据2010年1月25日《钱江晚报》报道，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等6所高校自主招生不考语文。上述种种现象，让人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能够培养出能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合格人才！人们也没有理由不为学生的未来感到担忧！

教学中，除了必需的课程，如汉语言文学等，全校各系均采用中英文并用的课堂双语教学法。这对于西语系的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为了使学生适应英语和汉语的双语环境，他更是身体力行。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中说："我还想改进英语教学……我们的学生确实是生活在讲两种语言的环境中。他们一入学就应听懂无论是用哪种语言讲授的大学课程，教师们也可以随便使用哪种语言讲或两种语言都用。……我向学生讲话是用汉语讲，还是用英语讲，也往往在台上临时改变主意。这就是说学生们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①]因此，燕大办学伊始，不像某些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那样，独以外文为教学中心，而是以学校彻底中国化为办学宗旨。作为教会大学，英语是其看家之本，所以，燕大也一直在努力营造英语学习的氛围，"学生从入学注册那天开始，就在学习、生活诸方面广泛接触英文。比如办理注册手续、选修课程、计算学分、分辨教学楼的名称等，都必须懂得英文。此外，大如校歌校训，小如图书馆的布告及催书单、大陆银行的取款条、在教室门上油漆的木牌也都是英文或中英文兼用"。[②] 但是，燕大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既重视英语学习氛围的营造，也重视国文学习，创设了中英文并用的双语学习环境，让学生"生活在讲两种语言的环境中"。"宿舍会客室及教学楼的休息室里每天都摆出当日报纸，其中总有一份英文报纸 *Peking Chronicle*；由我校新闻系师生每周出版的《燕京新闻》，也是六版为中文，四版为英文。……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学生随时随地都有活学活用英语的机会，耳濡目染的结果必然使学生有了灵活运用英语的能力，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实施双语教学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③]经过司徒雷登的努力，学校整体英语水平大幅提高，教师（除个别外）基本都能运用双语教学；学生也能较好地适应课堂教学语言的切换。

（三）实施通才教育

在司徒雷登的重视下，燕大的课程设置体现出独到之处：学生入学以系为单位，除了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外，还必须选相近的一些专业课程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同时为了防止学生的偏科倾向，学校还特别规定：学社会科学的学生必须选修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入门课程各一门。在此

① ［美］约翰·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2—63 页。

②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1 页。

③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1 页。

基础上，还可自愿选读社会科学以外的别门学科的高级课程。同样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生也可以循序渐进，作类似的相关选择。汉语、英语等为全校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学习的课程。这种做法，既可以使学生扩大知识面，能够更广博地学习，做到融会贯通；也能够使其在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有多方面知识、技能人才的要求。因此，学校规定，新生进校第一年主要是开设基础课程，一年后根据自身所学的成绩、学习兴趣与爱好和将来择业的需要选择专业。以新闻系为例，它规定："凡欲选读该系学生，必须有大学本科一年以上之程度。其主修学生，必须读该系课程 32 学分，同时需有一副修学科，此项学科至少修足 20 学分。副修学科得随各生任意选定，惟比较以社会学科及语言文字为宜。""凡学生修习 168 学分内，已修满该学系学分 44 分以上，及另一副修学科者，该大学除照章颁发给毕业证书外，将再给予职业证书，来年或可颁发新闻学学士学位。"[1]这样，把专业和职业选择联系在一起，体现了燕大面向市场的意识。

表 5—4　燕大各学院毕业生应修课程

| 文学院 | 学　分 | 理学院 | 学　分 | 法学院 | 学　分 |
|---|---|---|---|---|---|
| 国文 | 6 | 国文 | 8 | 国文 | 6 |
| 英文 | 8 | 英文 | 16 | 英文 | 8 |
| 体育 | 6 | 体育 | 6 | 体育 | 6 |
| 教育、哲学或心理学 | 6 | 数学 | 6 | 政治、经济或社会 | 12 |
| 历史 | 6 | 物理 | 101～102 | | |
| 理化、生物或地质 | 6 | 化学 | 101～102 | 哲学或心理 | 6 |
| 政、经或社会 | 6 | 生物 | 101～102 | 理化生物（任选两门） | 12 |
| 地质 | 6 | | | | |
| 史、哲、心理或教育 | 6 | | | | |
| 主修课程 | 32～68 | 主修课程 | 35～50 | 主修课程 | 48～68 |
| 副修课程 | 16～24 | 副修课程 | 12～24 | 副修课程 | 16～24 |
| 选修及必修课 | 50～6 | 选修及必修课 | 38～8 | 选修及必修课 | 34～6 |

① 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4—155 页。

续 表

| 文学院 | 学 分 | 理学院 | 学 分 | 法学院 | 学 分 |
|---|---|---|---|---|---|
| 总计 | 142 | 总计 | 142 | 总计 | 142 |

资料来源:《燕京大学档案》YJ40014卷,转引自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四) 高质量与负责敬业的中外教师团队

燕京大学的教师构成以外籍教师为主,最初的教师几乎全是美国来的传教士,以后逐步增加了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中国教师。为了加强西语系的教学力量,外籍教师"比例一直占2/3强"。[①] 即便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如火如荼的1926年,大批外籍教师撤离中国本土,但燕大105名全职教师中,仍有约三分之一的外籍教师在坚守教学岗位,37人拥有博士学位。[②]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教师都很负责、敬业,孜孜不息地做好教学工作。包贵思(Miss Grace Boynton)、步多马、谢迪克(Harold Shadick)、柯安喜等都是在20年代就在燕大工作,把一生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燕大西语系。他们充满爱心,体贴照顾学生,"有一年,同学们发现包贵思和柯安喜上课不站在讲台前,而总站在一位同学的座位旁边讲课,都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这位同学听力不好,远离了就会听不清"。[③]

步多马,曾担任西语系主任,讲授大二英语、莎士比亚戏剧等,在教学中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和蔼可亲。他讲课生动而幽默,不只教书,更关心学生的生活,常请学生到家中便餐、个别谈话,帮助学生解决学习或生活问题。

曾任西语系主任的谢迪克主要讲授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戏剧及英国史等。他讲课语言生动,内容充实,声音洪亮,特别是他那纯正的英国口音,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燕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在当时北平高校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谢迪克功不可没。

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包贵思是燕大创办时唯一的专职教师,教授文学课程,包括18世纪和20世纪的诗歌、小说等,是研究艾略特(T. S. Eliot)的专家。在她的指导下,谢婉莹(冰心)毕业后去威尔斯利进修;赵萝

① 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②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80.

③ 燕大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蕤成为美国文学专家，后来成为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杨刚成为《大公报》主编。

燕大西语系著名的中国籍教师有吴宓、赵萝蕤、俞大絪、周国屏、吴兴华、林汉达等。

表 5—5　　1936 年燕京大学西语系师资情况

| | |
|---|---|
| 教授 | 包贵思(Miss Boynton Grace M.)，步多马(Breece Thomas E.)，吴路义(Wolferz Louis E.)，柯安喜女士(Cochran Anne)，施美士兼职教授(E. K. Smith) |
| 副教授 | 谢迪克(Shadick Harold E.)，桑美德(Speer Margaret B.) |
| 讲师 | 刘兆惠(Lorhr George R.)，舒思德(Schuster Carl)，米德(Mead Lawrence M.)，施纳福(Speshneff A. N.)，谢迪克夫人义务讲师(Mrs Shadick H. E.) |
| 助教 | 毕蔼德(Beal Edwin)，苏约翰(Subilia Jean-Daniel) |
| 行政 | 周国屏助理，石彬书记 |

资料来源：燕京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年，第 89—100 页。引自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4 页。

## 第三节　“东方的哈佛”——圣约翰大学

### 一、圣约翰大学的演变轨迹

“学堂约翰最驰名，多出成材毕业生。咸慕西师精教育，领凭赴职可知程。”①这首竹枝词中的“学堂约翰”是指美国圣公会(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在上海创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曾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的圣约翰大学，这是“近代以来外国差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② 圣约翰大学从 1879 年创设，到 1952 年开始的全国性院系调整中被裁撤，持续 73 年，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 草创时期(1879—1905)

从 1879 年到 1905 年，是圣约翰大学的草创期，也可以说是从书院到大学的转制期。其前身是圣约翰书院(St. John’s College)，这是 1879 年合并圣公会分别于 1865 年、1866 年设立在上海的培雅(Baird Hall)、度恩(Duane Hall)两书院而成，具有美国式学院的雏形，主持者为美国圣公会上海

---

① 顾柄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3 页。

② 田正平：《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文史哲》，2007 年第 3 期。

主教施约瑟(Bishop Samuel Schevschewsky)。[①] 施主教“有意于创设一教会大学,为高等学术机关,同时并为研究神学之中心,俾四方来学之士,能以所习,普及全国”。[②] 遂于是年“以银六千五百两购地九十亩于沪西梵王渡,建筑两层楼之中国式斋舍一所,住宅四所”,[③]作为教室及宿舍,招生约七十余人,以中国牧师颜永京(Yen Youngkiung)[④]协助施主教筹建书院,并主持校务工作达8年,是为该校发轫之始。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用国语和上海方言授课,乃“是时英文之应用极少,学者仅资洋商之翻译;故各科均用中国言语教授,初用普通国语,继以学生大半来自苏省,改用本地方言”。[⑤]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推进,上海等通商城市进一步开放,“当时社会上,感觉英文可以经商,青年子弟,颇愿习此”。圣约翰书院为适应当时上海社会要求于1881年10月添设英文部,“始授英语。……校中自授英语,来学者渐多”。[⑥] 这一步骤和后来关于用英语教学的决定“在该校历史上是一件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教会大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⑦] 1886年11月,来自美国圣公会的卜舫济牧师(F. L. Hawks Pott, 1864—1947)来到上海,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他的到来,在圣约翰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⑧]圣约翰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成为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88年,卜舫济出任校长,时间长达52年,对圣约翰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1891年圣约翰成立大学部,

---

① 施约瑟主教为俄国籍犹太人,生长于美国,1859年来中国,先在北京学习汉语,而后在华北从事翻译与布道工作,有十三年之久。他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办一个美国式的高等学校,因而积极从事创办圣约翰书院。1879年合并培雅、度恩两书院,即是他的主张。

② 卜舫济:《圣约翰大学沿革略》,载《教育季刊》一卷二期(1925年)。

③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④ 颜永京(1838—1898),上海人,1848年入文惠廉创办的男塾读书,1859年由教会送往美国留学,获名誉硕士学位。1862年回国,担任上海英领署翻译。1878年底,圣公会派颜永京赴上海协助施约瑟创设圣约翰书院,并担任学监。颜氏毕生热衷西学,曾翻译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肄业要览》(*Education*)及美国学者海文的《心灵学》(*Mental Philosophy*)。他被公认为近代第一个介绍西方心理学的中国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享有盛名。1898年6月,颜永京病逝于美国。卜舫济对他评价极高:“颜氏在建立圣约翰书院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募资购地,兴建校舍都应归功于他。他还主持学校达八年之久,把英语教学引入课程出于他的建议,他在各方面都出了力,为现在这个学校奠定了基础。”

⑤ 卜舫济:《圣约翰大学沿革略》,《教育季刊》第一卷二期(1925年)。

⑥ 卜舫济:《圣约翰大学沿革略》,《教育季刊》第一卷二期(1925年)。

⑦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第62页。

⑧ 颜惠庆著:《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回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页。

增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此举标志着圣约翰已基本具备现代大学的雏形。1899年学校形成文理科(Arts and Sciences)、医科(Medicine)、神学科(Theology)及预科的教学格局，为沪上唯一的高等学府，招收16名大学生。[①] 1905年，学校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注册立案，成为正式的大学。大学设文、理、医、神四个学院，各学院毕业生“得授予美国大学毕业同等之学位”。[②]

(二) 鼎盛时期(1905—1925)

从1905年到1925年，是圣约翰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圣约翰在卜舫济的卓越领导下，体制日臻完善，办学实力日见增强。1907年，圣约翰大学授予4位约大学生文学士学位，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圣约翰学生质量高，[③]毕业后到美国研究生院学习基本没有困难。在某些领域，约大毕业生无须经过考试便可进入耶鲁大学、宾州大学学习。1907—1908年间，有30名约大毕业生在美国学习，10名在英国学习。[④] 1911年学校将文理科分为文科和理科两个独立的学科，率先实行学分制和学衔制。1913年，圣约翰添设大学院，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形成预科、本科、大学院三级教学模式。同时，圣约翰开始改革教学模式，实施院系制下的分科教学。学校经过多年的办学积累，声誉日隆，成了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综合性教会大学之一，这里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和梦想。入读者大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而且拥有很浓厚的教会背景。

(三) 挫折、磨难和覆亡时期(1925—1952)

从1925年至1952年，是圣约翰大学的挫折、磨难和覆亡时期。期间经

---

①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30.

② 卜舫济：《圣约翰大学沿革略》，载《教育季刊》一卷二期(1925年)。

③ 当时圣约翰大学声名远播，以至于社会上把英文水平高的人错当作是圣约翰毕业生，被称为“清末怪杰”的大师辜鸿铭把民国著名外语教育家周越然当作圣约翰毕业生即是一例。周越然在《编译之味》一文中写道：“当时苏之英专，颇有模范学校之名……辜鸿铭君亦常常亲临。辜君第一次来参观时，余适授《鲁滨生飘流记》。不待余课毕，辜君口衔雪茄而发英语命令词曰：‘停止，请停止！……你为什么要教这书？’余曰：‘因为他讲冒险进取的故事呀。’辜曰：‘但这本书只讲一个人的冒险进取，最好选一本讲许多人冒险进取的书。’余曰：‘我的智识有限，找不到那种书。请辜先生介绍一本罢。’……辜曰：‘也好，也好，你就教这本《飘流记》罢。……我再问你：你是不是圣约翰出身？你的英文倒还不错。’余答曰：‘惭愧得很，我连约翰的大门都没有见过呀！’”(周越然：《六十回忆》，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58页。)

④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p. 49—50.

历了“国旗事件”[①]、“立案”风波[②]以及战乱，遏制了圣约翰的发展势头。抗战期间，仍在原址上课，未曾内迁。抗战胜利后，学校董事会改组，聘著名物理学家涂羽卿(1895—1975)为校长，积极办理立案手续，1947 年由教育部批准立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教会学校进行撤并、改造。1952 年，圣约翰大学的相关系科在院系调整被合并到其他高校，结束了其在华 73 年的办学历史，成了历史的陈迹。

## 二、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学特色：着力推进“英语运动”

教会大学为了在中国扎根，扩大影响，通常都很重视英语教学。在这一点上，圣约翰大学是先行者，也是矢志不渝的力行者。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并实施地道的英语教学的学校。

圣约翰大学立校之初，就十分重视英语教育。但是，“那个时代的书院，英语和科学的水平都不甚高。实际上，孩子们并不喜欢新的课程。不少学生接受微薄的补贴，才勉强学习英语。总之，读完了四年的英语和数学，就要到海关或电报局谋事，很少有人愿意继续留下来学习。”[③]1888 年卜舫济上任之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英语教学改革。他认为，英语作为传播新教育之利器，是将现代教育介绍到中国的

---

①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圣约翰学生群情激奋，于 6 月 3 日在大礼堂集会抗议，“要求学校下半旗向租借地内遭到军警枪杀的死难学生致哀”，遭到校长卜舫济的干涉，把升在旗杆上的中国国旗扯下，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学生及员工相率离校，于 8 月另组光华大学(Kwang Hwa University)，这就是所谓的“国旗事件”。这一事件是圣约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潮，也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座分水岭。(参见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 131.)

② 晚清时期，政府对外人在中国设学一直采取放任态度。1906 年学部通过的《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中，明确规定：“外人在各地设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停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无庸立案。”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展开，独立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的教会学校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强烈的质疑，在一片“收回教育权”的呼声中，北京政府教育部于 1925 年 11 月 16 日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示认可办法》，其中规定了外人设学须向教育行政官厅请示认可、学校校长必须为中国人、不得以传布宗教、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等六项规定，要求所有教会学校都必须按照上述办法办理立案。但是，卜舫济等人以向政府立案将妨碍学校的宗教和学术自由为由，采取抵制态度，拒不向中国政府立案。1931 年，在政府“没有注册的学校，在新学年开始时不允许再行招生”的高压下，卜舫济被迫于同年递交立案申请。由于种种原因，圣约翰的申请直到 1947 年才获准立案。

③ 颜惠庆著：《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回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8 页。

关键。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希腊文学被输入到欧洲，日本复兴的重要原因则是它采用英语作为媒介输入西方思想，现在中国文明已经达到顶点，正开始衰落和死亡，如欲复苏，必须输入西方文明，而要达到此目的，以汉语作为媒介显然不行，因为不能用旧瓶装新酒。不掌握西方语言，就不可能掌握西方思想。英语是教学的媒介，现代科学、数学、欧洲史、经济学、逻辑学等新型学科都要用英语的教科书。英语教学的重要性还在于："一、华人学习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二、学习英文，可以铲除华人排外之成见；三、华人学习英文，可以增进东西之间的接触，占据商界重要位置；四、华人学习英文，可以明了基督教事业和教义；五、华人学习英文，至少在通商口岸已势在必行，教会学校应捷足先登。"[①]

基于这种认识，卜舫济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改革计划，他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便是采取各种手段，将英语列为各科之首，强化英语教学，这就是所谓的"英语运动"。

（一）聘用优秀英文教员

圣约翰大学拥有一流的教师群体，其教师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在华传教士，如创始人施约瑟主教、校长卜舫济、英文文学兼哲学教授小文惠廉（William Boone Jr.）、学监兼自然哲学教授颜永京等；二是招聘外籍教师及海外留学人员，如英籍教师顾斐德、加拿大籍教师文幼章（James G. Endicott）、留美的葛胜芳等；三是面向社会招聘的人员，如在 1872 年"中国派往留美之学生，悉行归国。政界中无可位置"[②]以及其他留学归国未找到职业的人员，颜惠庆就是其中之一。颜氏不仅教学水平高，而且还是出色的学者。[③] 这样来源渠道多样化的高素质教师群体，决定了圣约翰大学英语教学的不同凡响。卜舫济、顾斐德等人既是管理者，又是全盘英语化教学的

① 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第一辑，香港豪威印刷出版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 110 页。

②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15 页。

③ 颜惠庆在《自传》中对其学术成就有记载："我们采用纳托尔的《英语大辞典》做范本，……最后编撰成《英华大辞典》，分为两卷，共计 3000 余页。现在它问世已有 30 多年了，……它依然是同类词典中部头最大、词汇最丰富的一部。在上翻译课时，由于找不到适当的教科书，惟有从各种书报中选取长短合适的文章或段落，以供学生在一小时的课上用作英汉互译的素材。这些文章段落须依难易程度适当分级，题材要广泛，能涵盖各个学科。经过两年多的教学，我积累了足够的原始材料汇集成册，题名为《华英翻译捷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乎意料，这本教科书颇受欢迎，售出了数千册，……30 余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依然畅晓。"（颜惠庆著：《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回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54—55 页。）

躬行实践者。刚到圣约翰书院的卜舫济就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教学效果很好。顾斐德口才出众，擅长用浅显的英语教授普通的科学原理。他来到学校之后，即承担起所有与自然科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全部用英语传授，“教授法之引人入胜，学生方面，无不众口一词。有人谓之学校之实力，不在房产设备，而在教师。顾教授对于学生之影响极大，真其人也”。再如，“英文部中新教员，有葛胜芳君，系在美国读书有年。一八八三年，又聘有施女士，渠对于教授，极有经验，实为华教授英文中之老前辈。为人又极热心，今日占据要职之老同学中，类能道及之云”。她们都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人。葛胜芳和圣约翰大学一起度过了创校之初最为关键的10年。而施女士“自美至，尽力于此者凡八载，以英语授中国学生，女士盖其中最早之一人”。[①] 早年毕业于广方言馆、后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同样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圣约翰大学，我是第一个与外籍教师享有同等权利和待遇的中国人……就连我的美国同事，都认为在英语语法和语言结构方面，我比他们还要精通。”[②]除了颜惠庆，圣约翰英语名师还有黄嘉德（1908—1992）、浦化人（1887—1994）、瞿同庆（1882—1969）、王文显（1886—1955）、文幼章（1898—1993）等人。

（二）实行主系辅修制度，完善学生知识结构

1937届文学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丁光训在《追忆母校生活》中说：“圣约翰大学是主张 Liberal education 的，这种自主教育模式鼓励学生尽可能发挥自己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同时尊重别人的观点和选择，20世纪后期在欧美大学日渐盛行。”[③]圣约翰大学在改进学生知识结构，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方面，实行了新的选修制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行主系辅修制度，二是预修与必修制度相结合。主系辅修制度的内涵是该校学生在以某一系科为主要学习领域的同时，必须按照学校管理规定，同时选修其他相关系科的相关课程。预修与必修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一定学科的课程作为学习某一学科或某一类学科的预习课程，同时将另一些课程规定为一定年级或学院的必修课程。前者着眼于拓宽学生的学科知识，后者则主要考虑知识的专业化程度和知识之间的必要铺垫。[④]

---

① 卜舫济：《圣约翰大学沿革略》，《教育季刊》第一卷二期（1925年）。

② 颜惠庆著：《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回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页。

③ 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④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表 5—6　圣约翰大学英文学系及国文学系的主系辅修制度(1934 与 1937 学年)

| 主系(1934 学年) | 辅系学程(1934 学年) | 主系(1937 学年) | 辅系学程(1937 学年) |
| --- | --- | --- | --- |
| 国文学 | 1. 英文学;2. 教育学 | 国文学 | 1. 英文学;2. 教育学 |
| 英文学 | 1. 国文;2. 教育;3. 法文;4. 德文;5. 史学;6. 新闻学;7. 哲学 | 英文学 | 1. 国文;2. 教育;3. 法文;4. 德文;5. 史学;6. 新闻学;7. 哲学 |

资料来源: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4 页。

从所列情况看,英文学系辅修的课程比国文系要多,客观上有助于英文系学生在校期间可能习得更为广泛的多学科知识。其中国文知识有助于打下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基,法文与德文知识有助于扩大与国际交往的多语种能力,历史学和哲学知识有助于训练历史眼光和哲学头脑,教育学之教育原理和学习心理,即使将来并非以教育为业者,也有助于提高当下的学习质量,新闻学所特有的思维与写作的敏捷训练,对于增进学习与工作效率极有助益。

以国文学科为主系的辅修学生需要借助于英文学课程和教育学课程的学习,获得了解国际社会的能力和机会,以及对于教育问题的学理理解,而不是只是局限于传统国学的故纸堆中。

圣约翰大学英文学系的课程也相当完备,从课程设置来看,包含了技能训练、作品选读、文学史、文学理论、专题研究等课程。

表 5—7　英文学系的课程设置(1934 和 1937 学年)

| 1934 学年学程 | 1937 学年学程 |
| --- | --- |
| 一年级英文、欧洲古典文学、英文读音、英文散文、近代英诗选、英国文学史、现代戏剧、英文戏剧之进展、文学批评、美国文学史、演讲术、高级作文、莎士比亚研究、米尔顿研究、现代小说。 | 一年级英文、欧洲古典文学、英文基本练习、20 世纪散文、散文选(19、20 世纪散文精选)、当代英诗选、英国文学史、戏剧概论、现代戏剧、英文戏剧之进展、小说作法、英文读音、文学批评、美国文学史、演讲术、高级作文、莎士比亚研究、米尔顿研究。 |

资料来源: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2 页。

### (三) 努力营造全盘英语化氛围

#### 1. 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为了使英语成为圣约翰大学的教学语言,卜舫济采取全盘美国化的英

语训练方法。具体做法是,除国文外,所有课本一律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进行教学。如当时备馆(预科)分为四个年级,课程安排为半日英语(每周二十三小时),半日国文(每周二十三个半小时)。课余间同学之间的交流必须用英文,同时必须学习西方的礼仪和习俗。[①] 显然,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在。正如传教士狄考文所说:"要建立一所学校,必须有吸引力。中国人是讲实际的,没有看得见的利益,他们是不会送子女入教会学校的。"[②]狄氏说的很对,中国老百姓是完全按照世故常识的原则行事的。唯一合适而有益的吸引力是对教育本身的要求。要使这一吸引力产生效力,教育必须面向一生事业的成功,面向易得的职业,面向学生家长和朋友称心的职业。用英语教学,让学生接受西方科学知识的训练,在英语的商业价值逐步凸现,在已成为中西文化交融前沿的上海的各大洋行找到如意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吸引力所在。这一点,卜舫济是心知肚明的。

1890 年以后,毕业于英国皇家学院的顾斐德(F. C. Cooper)来到学校,担任科学系主任,学校所有科学课程开始用英语讲授。顾斐德是卜舫济的"英语运动"的不遗余力的践行者。1896 年,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郭斐蔚(F. R. Graves)向圣公会布道部提交备忘录,规定圣约翰医学院、神学院全部采用英语教学。此后,学校除国文课程外,一律用英文课本,以英语授课。通过考试筛选,提高入学门槛,[③]也是圣约翰大学改革的主要举措之一。如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邹韬奋(1895—1944)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入学的。他在南洋公学念完上院(大学部)工科二年级后,考入圣约翰文科三年级,主攻西洋文学、辅修教育。他在《经历》中,回忆起当初投考圣约翰的情景:

> 和我同时投考约翰的还有一位南洋同学,……幸而我自己平时对于文科有关系的书籍已无意中看得不少。在那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转

---

①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 页。

② 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1890),载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 页。

③ 夏丏尊在《我的中学生时代》中回忆:"据说上海最有名的是梵王渡(即现在的圣约翰大学),如果在那里毕业,包定有饭吃。父母也觉得科举即将全废,长此下去究不是事,于是就叫我到上海去读外国书(即现在的所谓进学校)。当时读外国书的地方并不多,外国人立的只有梵王渡、震旦与中西书院,中国人立的只有南洋公学。我是去读外国书的,当然要进外国人的学校。震旦是读法文的,梵王渡据说程度较高,要读过几年英文才能进去,中西书院(即现在东吴大学的前身)入学比较容易些,我于是就进中西书院。"(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与学习》,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 文科，不过因为自己喜欢看，所以便常常看看，不料在这个紧急备考的时候，居然有一点用处。例如要考英文文学名著，在一二十种中选考四种，这就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速成的……我觉得要研究英文，在上海似乎也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每天夜里，我们两人都开着“夜车”，预备考试的功课到两三点钟，疲顿得不堪言状……因为我们所投考的学科不同，所以两人还是分开来考的，各人都分别到各个有关系的教授房间里去应试。提心吊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结果居然两人都被录取了。①

关于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学，当年来华的传教士多有肯定。早在1892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在《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撰文盛赞：圣约翰书院是最早意识到除汉语外用英语教学的必要性的学校。算术、几何、作文、英语语法、地理、簿记、博物学、生理学、世界通史等课程都用英语传授，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结果是喜人的，“学生也表现出他们已开始领会并了解自然界的重大问题。他们从西方教育中发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所在，这些东西最渊博的中国知识多无法解答。通过出版英文杂志，我们看到学生已领会了这些问题。他们的文章表明播下的种子已经生根”。②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于1912年考入圣约翰大学，他对圣约翰的描绘，足见时人对英文学习的热衷程度。他说：“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③

2. 重视英文阅读

民国时期的外语教学一般都很重视阅读。大凡外语教学质量好的学校，无一例外地视阅读为外语学习之根本。公立学校如清华，私立如复旦，教会立如圣约翰等均有很丰富的藏书。1911年在圣约翰大学肄业的教育家陈鹤琴的回忆，虽是说明当时学生对国文的忽视，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圣约翰学生对英文阅读的痴迷。“上国文课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不是预备西文功课，就是看小说。……卜校长有时要来视察的，学生一看见卜

① 邹韬奋：《经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②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③ 《圣约翰大学》，载谢泳、智效民等著：《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

校长来了，连忙把西文书、小说书放进抽屉里，假惺惺地把国文书掀开来，当做阅读的样子。"[1]

根据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统计资料来看，明显地反映出该校对英语阅读的偏重。在1915至1923年间，图书馆共借出书刊70，726册，其中英文书刊为53,224册，中文书刊仅17,502册；在30年代，这种重视英文的倾向更变本加厉，以1911至1939年图书馆所借出之265,394册书刊为例，其中英文书刊为229,363册，占总流通量之86%，中文书刊为36,031册，仅占14%。[2]

这便是圣约翰大学为人所称道的地方。借助阅读，使学生常年浸淫于西方文化中，阅读给予学生的，不仅在于熟练的语言技巧，借助英语把中国学生引入西方世界所开拓的广大知识领域，更是对西方文明、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

3. 积极开展以英语为特色的第二课堂活动

(1) 创办英文刊物。圣约翰的刊物以英文见长，而且主要由学生主办，但缺乏有影响的中文和科技刊物，反映了圣约翰重视英文教育的特点。圣约翰大学在读学生朱葆元等人于1889年3月创办了圣约翰大学历史上第一本学生自办的英文月刊——《约翰声》(*St. John's Echo*)，内容有小说、诗歌、散文、政论等。[3] 通过为《约翰声》撰稿，学生的写作能力大为提高。有学生回忆："《约翰声》撰述稿件，则搜枯肠，亦费时日，学生往来于图书馆，翻阅书籍，无孔不入，某次某生奉命作一文，论门户开放与势力范围圈，该生真于门户上，大做其功夫，真可笑之甚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圣约翰学生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1921年9月，圣约翰新闻系学生创办《约翰周刊》(*St. John's Dial*)，这是我国第一份由大学生自办的英文周刊，主要为新闻系学生实习之用。该刊出版后不及三年印数即已"几达一千"。[4] 该刊一直持续到1949年4月。圣约翰还模仿英美大学，定期出版

---

① 陈鹤琴：《我的半生》，载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② 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第一辑，香港豪威印刷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0页。

③ 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学生英文刊物，初创时为半年刊，后改为双月刊。其发刊词中称："此刊物，系中国青年初次用外国语印行之刊物，希望此种刊物，能增进东西之情感。"卜舫济在《圣约翰大学沿革略》曾提及："1889年，为奖进学生练习英文起见，创办定期刊物一种，两月一出版，迄今垂三十六年，现改为季刊，为中国学校刊物之权舆。"(《教育季刊》一卷二期(1925年)。

④ 《约翰英文周刊》，载*Johannean*(1924)，引自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年刊。1904年出版《龙旗》(*Dragon Flag*)。但该刊仅出版两期。从1915年起圣约翰出版了《约翰年刊》(*Johannean*,初期曾称《约翰季刊》)。该刊由毕业班学生自行编辑和筹款出版,内容有教员和毕业班学生照片,介绍校园活动的文字以及文艺作品,“为约翰学校生活之一写真”。[①]《约翰年刊》一直持续到1951年。

(2) 举办英文辩论赛等各种活动。

举办英语辩论会等活动是圣约翰学生学习、锻炼英语的另一途径。1898年起,圣约翰成立文学辩论会,由本校教授及社会名流充当裁判。辩论题目从时事政治到历史事件等,范围极广。学生练习演说,往往“先撰稿,后背诵,夜以继日,预备功课,不如是之勤也。其功效之大,可想见矣”。[②] 文场争逐,辛苦备尝,也令学生之英文日进。另外,还通过设立各种奖项来推进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如1919年的平时奖励,就有如下奖项:中文演说、英文论、中英文翻译、社会学论、英文小说、神道学论、英文辩驳、华文论说、华文辩驳、优等学生、中英文论等。

(3) 创办跨学科或全校性的组织。英文协会、读书联谊会、梵王渡科学会、国事研究会、兰心文学会等。这些组织中不少持续数十年之久,高低年级薪火相传,遂成为学校传统之一部。

但是,圣约翰大学竭力营造全盘英语化氛围的努力,对于外语学习确实是极有必要的。这一做法,客观上也会产生全盘西化、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果,“国语”大受冷落,[③]本土文化受到鄙视,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学生崇洋媚外的思想和奴隶心理。所培养的学生缺少对中华传统与文化价值的认同。1929年11月22日出版的《约翰周刊》如是说:“圣约翰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地道英语。本校因此而远近闻名,令人羡慕;圣约翰学生也因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学生甚至发展到对中文书刊不屑一顾的地步。在本校,中文演讲往往令人生厌,中文告

---

① *Johannean*(1925),孟宪承序。引自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②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233页。

③ 圣约翰大学在早期阶段对中国语言文字是重视的,还曾经反对教授英语。只是到了后来,英语的商业价值日显,国人中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包括圣约翰在内的教会学校为了在中国扎根,开始变换策略,迎合公众,“不久(在圣约翰)英语被当做一门必要的课程,而且被置于极显著的地位”。(参见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123.)因此,英语在中国受宠,不是由教会大学或中国社会单方面说了算的,这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示也常常无人注意。在谈话时，学生们认为他们用英语更加轻松自如，即便用中文交谈，如果不夹杂几句英文，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①]林语堂说过，他"在圣约翰的时候，对古犹太国约书亚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已非常熟悉，但却没有听过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②]

总而言之，圣约翰大学英语教学独树一帜，名闻遐迩，教学质量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圣约翰大学学生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当年许多洋务部门如海关、电报局、洋行以及外交部门也因此而对圣约翰的学生另眼相看，以至于社会上竟有所谓"圣约翰英语"之称。英语教育是卜舫济引入现代教育的一个步骤。在卜氏眼里，要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英语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武器，只有掌握这一武器才能真正了解西方自然科学的精髓所在。事实证明，他多年倡导并坚持的英语教学不仅对圣约翰早期的发展意义深远，在整个中国教会大学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此后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成为潮流和趋势，被越来越多的教会大学所采纳。这是卜舫济推行的"英语运动"所作的贡献。

## 三、圣约翰大学的成就

民国著名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曾断言："中国今日大学校有几所乎？如圣约翰大学者，绝无仅有也。"[③]在1926年《圣公会报》的一篇文章中，圣约翰前国文教员钱基博写道：圣约翰卜校长"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遵。四方之来学者咸能率教以有成。高第弟子多折冲外交，知名当世者；其次一技一能，亦以有造于邦家；散而之海外者，东自美国横斐律宾南洋各岛以西渐欧罗巴大邦，莫不有圣约翰大学学生之踪迹焉"。[④]

正是通过这些多管齐下的得力举措，圣约翰大学在52年的办学历史中取得了非凡成绩。特别是它成功的英语教学，更是为社会以及莘莘学子们所称颂。

邹韬奋对圣约翰大学实施地道的英语教学和负责敬业的教师都给予了肯定和感恩：

---

①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2页。

② 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第一辑，香港豪威印刷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1页。

③ 蔚青：《卜先生掌校二十五周年会记盛》，见 *The St. John's Echo*（中文部分）(February1914)，第14页。

④ 钱基博：《圣约翰大学校校长卜先生传》，第23页。引自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 我在约翰(即圣约翰大学)虽然仅有两年,但也得到很多的益处,尤其是快读的能力。像麦克纳尔先生,他最注重课外参考书的阅读,他所指定的参考书很多,而且要调阅我们的笔记,非读得快,很难交卷,所以我们用在图书馆里的时间不少。约翰在最初受人诟病的是造成了不少买办,或做外人爪牙的翻译,但是我以为学会了英文来做研究学问的工具,却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论,对于这个工具的熟练,我不得不感谢我的母校——约翰大学……所以我这两年的光阴并不觉得是虚掷的。①

一位圣约翰的老校友深情地回忆道:"其实,圣约翰的英语教学并不如外界所宣扬的那般传奇,在校内,英语不流利的也大有人在。然而,凡经过学校训练和熏陶,走出校园的学子们基本都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②正是因为圣约翰大学极富特色的英语教学,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毕业生的流向也日趋广泛,遍布于政界、商界、医务界、教育界等重要领域。在73年的风雨中,圣约翰大学培养了数千学生。"1910年,通过在上海举行的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考试,共录取了31名考生,其中26名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③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服务于各个行业的圣约翰大学学生"记录之优良",胜过任何一所教会大学。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教师蓝姆荪(Herbert D. Lamson)专门就《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33年版的英文《中国名人录》(第四版)作过统计分析,发现在其所收录960人中,有620人有过在本国学校就读的经历,其中201人曾经在教会学校接受过教育,这一比例为32.5%,而这当中,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就有61人,居所有教会与非教会学校之冠。相比之下,有所谓留美预备学校之称的清华大学只有44人入选,位列次席。④

即便后来因为圣约翰拒绝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而给自身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但也没有产生毁灭性的影响。由于没有立案,其毕业生的学历得不到政府的承认,至少在理论上,他们获取公职(official service)的路径已被阻断。但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其自身过硬的条件,特别是精

---

① 邹韬奋:《经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②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③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97.

④ 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通英语，而能得到聘用，医学院的毕业生甚至还获得行医资格。①

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重大影响，作出了贡献。知名的校友包括了外交界的颜惠庆、施肇基、伍廷芳、唐绍仪、顾维钧、王正廷；文学界的林语堂、张爱玲；政界的宋子文、荣毅仁、严家淦、鲁平；实业界的宋子安、刘鸿生；新闻界的邹韬奋；建筑界的贝聿铭；教育界的陶行知、陈鹤琴、马约翰；医学界的颜福庆、刁信德、牛惠霖、牛惠生、陆佩中；科技界的吴纫之、徐凤石、蒋锡夔。其中教育界最多，担任著名的清华学校校长的就有颜惠庆、唐国安、周诒春、赵国才、严鹤龄、曹云祥。再如"1914 年清华学校的 7 名西文部华籍教员中，就有 5 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们是 Chang Ki—zur、桂质廷、李广诚、陆锦文、潘文炳"。②

## 四、圣约翰大学成功的原因

首先，圣约翰大学拥有一支业务精湛、严谨敬业的管理团队。这支团队，在管理上，不仅懂行，在教学上，也是能手。圣约翰大学的管理体制多承继美国的教育传统，如它将西方早已实行的制度——考试名誉制、选课制、学分制、导师制、助学金及学费贷款等，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引进到中国。它还通过规章化、制度化的刚性管理，倡导和培育一种健康、文明、向上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习惯，营造了十分有利于学习的氛围。圣约翰大学在管理上别具一格，不徇私情。以下一个事例甚至在今天也极具借鉴价值：1908 年 8 月 17 日，盛宣怀致函张叔和说，自己的堂弟盛麟怀在上海南洋公学商务学堂肄业，因仰慕圣约翰大学教法最善，想转入圣约翰就读，拜托张叔和出面请卜舫济准其补考。张叔和致书卜舫济，并附上盛宣怀原函，请他帮忙。卜舫济当即回信，予以拒绝。信中说："手书并盛宫保原函一件均悉一切，惟敝学堂定章及招考新生期外无补考之例，如盛君愿到敝校肄业，可于年终招考时前来投考。"③这个团队的核心，就是校

①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 85.

②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37 页。

③ 《卜舫济校长致张叔和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转引自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 页。

长卜舫济。[①]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中回忆道："卜校长惨淡经营，苦心孤诣数十年如一日，把梵王渡一个小学校变为一个国内著名的大学，五十余年来，桃李满中国。现今在外交界、政界、商界、学界服务的不知有多少。卜校长之有贡献于新中国者非常宏大。卜校长不仅介绍西洋文化而且特别注重在人格教育，宣扬圣道。礼拜日讲道，总是他老人家自己讲的，苦口婆心，劝人从善，仁爱牺牲，以身作则。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我们做中国人的，岂不应该更加如此吗？"[②]

其次，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参见本节相关内容）。

再次，从考试制度上狠下功夫，希冀通过考试的指挥棒作用，来促进学风的改进和教学质量的提高。1917 年开始，圣约翰大学作出了一项特别规定：文理两科学生除例行的严格的学业考试外，还必须参加在上级或高级时举行的特邀名人监试的特别英文口试和笔试，并且必须取得"优美之课绩"，否则不给学位。这一人为抬高学位授予的门槛的举措，旨在促使学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提高实际应用能力上来，从而增强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此举一则透露出圣约翰大学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对于英文素养的特别关注和着眼于提高学位含金量的努力，二则传达出圣约翰大学试图将毕业标准和学位标准相区别的管理理念：毕业不等于即可获得学位。再者，圣约翰大学理想中学位标准的英文素养不仅单纯指向书面能力，还包括口语能力，是阅读、写作和会话与听力的综合素养的有机统一。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中国学生历来比较注重书面能力而相对轻视口语能力。因而，外语学习中就会更关注读写能力之训练，相对忽视听说能力之培养。圣约翰大学提出将外语口试和笔试成绩予以综合考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纠正中国人在外语学习方面容易出现的偏向，从而较快适应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

---

① 民国政府总理的颜惠庆给予卜舫济很高的评价："纽约卜舫济牧师的到来，在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当时，父亲（按：圣约翰书院学监颜永京）年事已高，想从学监的位置上解脱出来，重操牧师旧业。于是，风华正茂的单身汉卜舫济接替了他的职位。充满了热情和精力的卜舫济，从此开始了他毕生致力的工作，要把圣约翰书院办成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除了进出学校和教堂、授课或布道外，每到星期六晚上，他轮流邀请各班学生到其家中，款待之余，还教给他们各种美国室内游戏的玩法。总之，他对学生活动充满了兴趣；也因此种态度，不仅与青年人相处得无拘无束，还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感情。学生总是殷切企盼着参加这类愉快的聚会。卜舫济甚至留起了辫子，穿上长袍马褂，到内地城市生活了一年，以掌握中国语言，并了解中国的风俗民情。"（颜惠庆著：《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回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3 页。）

② 陈鹤琴：《我的半生》，载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8 页。

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对于国际交往能力的迫切需求。从理论上看，这种语言素养观比较正确、科学地反映和揭示了语言本来具有的交际功能，因而也具有语言教育学方面的积极意义。

最后，圣约翰大学环境优越，地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的上海。“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英语的商业价值，因为会讲英语的中国人能在西方人或中国人的商行里得到高额薪金的职位”，[1]因而人们渴望学习英语。它的经久不衰的“英语热”和“西学热”，越来越吸引着有志青年。而圣约翰大学以英语教学著名，“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林语堂语），自然成了有志向学的青年向往的圣殿。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邹韬奋、林语堂、施肇基、顾维钧等人。这是圣约翰能够招收到卓尔不凡的学生主要原因之一。

## 第四节　规模宏大、修理整齐、教育良善——岭南大学

### 一、创办过程

开展学校教育历来是各差会传教工作的重要辅助手段，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西方文化在中国本土的传播。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生和推动，实际肇端于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南洋、澳门、广州所开办的学校，将欧美的西方教育模式和理念引进中国，以致在教程上将西方的英语、史地、数学、物理、生物等学科开始传播于中国。岭南大学是一所由美国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在中国广州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该校历史远溯于光绪十年（1884），基督教广东长老会（the Canton Presbyterian Mission）传教士香便文（Rev. B. C. Henry D. D.）倡议开办学校，迄至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中被撤销，岭大经过 68 年的奋斗历程，由高等预科发展成为大学、中学、小学以至幼儿园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学制订定大学四年，中学四年，小学七年”。[2] 岭大从创办到被撤并，可分为四个时期：

①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2 页。

② 《华人筹议接受岭南大学》，《民国日报》，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念四日。

（一）试办时期（1884—1897）

1884年，在广州传教的香便文[①]认为广州地点重要，“欲以高等教育传播基督教道，以振兴中国”，[②]乘回国之便向长老会海外传道委员会（The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③]提议设一高等学校于广州。怀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博士（Rev. Andrew P. Happer，1818—1894）。[④]

美国长老会广东布道团（the Canton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认为时机已成熟，便于1884年授权即将回美国休假的香便文争取获得长老会的许可，在广东设立一所基督教大学，并开始筹集资金。

此时，关于大学校址的问题，各方人士意见不一。粤绅李宏彰等400多人签名请愿，要求将校址设于广州。他们希望“这所学校能提供英语、科学与技术教育，毕业生可以进入商界、外交界或其他政府职位”。[⑤] 在哈巴安德的努力下，设在纽约的长老会董事局，考虑到学生今后的出路，同意向纽约州立大学申请立案，确定以英语教学为主，按照纽约大学的课程进行授课，毕业后学生准许领取纽约大学的毕业证书。

1888年1月，哈巴安德携着从美国捐得的美金82,000元回到广州，专心创办他理想中的大学。是年3月28日，学校于沙基金利埠（今广州六二

---

① 香便文（1850—1901），美北长老会传教士，1873年由美北长老会派遣到中国，在广州传教。1884—1895年任岭南学堂第二任监督（校长）。他的儿子香雅各（James M. Henry）于1924—1927年担任岭南大学最后一任外籍校长。

② 钟荣光：《岭南大学》，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③ 又译“长老会传道万国总会”。美北长老会是一支较早来华传教的基督新教组织，其在华南的活动遍及粤、桂、琼和港澳地区，活动内容涉及到宗教、医疗、教育、慈善与文字出版等事业。到19世纪末，美北长老会共有百余位传教士踏足华南大地，成为当时在华南开展传教事业规模最大的教会组织之一。关于美北长老会及其在华活动的相关情况，参见D. 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p. 379—394.

④ 哈巴安德，是鸦片战争后较早进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受过良好的教育，分别毕业于杰斐逊学院、西部神学院和宾州大学医学院。他于1844年来到澳门，在马礼逊学校从事教学工作。1847年开始在广州开展活动，直到1891年因健康原因才返回美国，在华期间停留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美部会传教士明恩博（Arthur H. Smith）说：“哈巴博士把生命中50多年的时间给了广东，留下了广东基督教大学这座丰碑。”（Arthur H. Smith：*China and American Today*. New York：Fleming H. Revell Company，p. 226.）他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颇有影响的一个人物。相关研究参见汤开建、颜小华：《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在华活动述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⑤ 陈国钦、袁征：《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三路)正式开学,取名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院务由哈巴安德负责,学校以"本诸基督精神实施最高标准之教育"为标榜。这是外国人在广州开办高等学府的开始,也是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的前身。学校的中英文课程主要由哈巴安德夫妇承担。由于哈巴安德夫妇先后生病,他们被迫于1890年8月20日关闭了学校。哈巴安德辞去了校长这一职务。

1893年3月,香便文被任命为格致书院的校长。次年学校在原长老会办的培英学校(the Pui Ying School)内正式开学。学校由3个部组成,小学部(the Primary Department)学制2年,共有41名学生;中学部(the Intermediate Department)学制3年,学生42名;大学部(the Higher Department)学制4年,学生22名,学校共有学生105名。[①] 1894年"在纽约省大学部注册,准许将来办至大学,得有发给学位之权"。[②]

(二) 重新创立时期(1898—1904)

1898年,纽约董事局任命传教士尹士嘉(O. F. Wisner D. D.)为格致书院监督(即校长)。次年尹士嘉在广州城内四牌楼福音堂内开校,[③]仍称格致书院。1899年,应尹士嘉之邀,举人钟荣光(1866—1942)[④]担任国文总教习,并协办校务。尹士嘉主持校务至1907年,其间校址几经变迁。1899年学校迁至广州花地萃香园,确定了学校与教会的关系:学校不代表或不属于任何教会,董事会作为私人团体,不受教会直接支配。这是岭大与其他教会大学的不同之处。未几,因义和团起事,又迁至澳门,学校更名为岭

---

① 参见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pp. 60—61.

② 钟荣光:《岭南大学》,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③ 格致书院一度与培英合办,后来因与培英办学方针不一致,培英主张以中文为主办中等学校,格致方面要以英文为主办高等学校,因此决定分办。(参见《岭南大学大事简记》,载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年内部发行,第224页。)按岭南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的说法,格致书院是一所英文学校。(参见钟荣光:《岭南大学》,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④ 钟荣光,广东中山市人,著名教育家,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894年中举人,后人兴中会,创办《博闻报》、《可报》等报刊宣传革命,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899年受聘为格致书院国文总教习。后出任岭南学堂教务长、副校长等职,1928年岭南大学收归国人自办,任第一校长。1942年在香港病逝。时任广州市长的孙科称:"钟先生才智过人,资格最深,办学成绩斐然!但只名闻于乡,不闻于国,殆亦只求集中,不事他骛之故。"关于钟荣光,另参阅陈序经:《有关岭大与钟荣光的几点回忆》,《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年内部发行,第30—51页。

南学堂(Ling Nam Hok Tong)。[1] 1903年在广州河南康乐村附近购得空地200多亩,搭盖板屋作临时校舍,将英文名称改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04年,岭南学堂迁返广州河南康乐村,学生增至近百人。岭南学堂成为广东基督教教育之最高学府。

(三)建校康乐时期(1904—1927)

1907年尹士嘉回国,由晏文士(Charles. K. Edmunds)继任监督,仍由钟荣光协理校务。钟荣光热心教育,为岭南募捐得款120多万,借以建筑校舍,增加设备,扩大班额,开办大学预科(后改为附中),设附属小学和华侨学堂。正是在这一年,学校迎来了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民国元年(1912)学堂更名为岭南学校,1916年改办为岭南文理科大学,次年学生增至600多人。1918年,学校成为岭南大学,"大学分文科、理科、医学、化学、农学等,实地试验尤以农学成绩为最佳"。[2] 经副监督(副校长)钟荣光的努力,省政府拨款30余万元,购买仪器设备及岭大附近山地为校舍,校园扩充至1700余亩,"地方更形足用","海外华侨子弟返国求学者日众"。[3] 1923年,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香雅各(Rev. J. Henry)[4]继任监督一职。

此时不独校舍校地增加,学务扩充,图书仪器、标本之设备也日渐完善,"计历年所搜集者,中籍共有一万九千余册,西籍约四万六千余卷。其中最难得者为美国家博物院及华盛顿干力奇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之丛书及各国学者讨论中国之书目一集,本国古版书籍甚多,

---

① 澳门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学校在那里租了一排房子,作为教室和宿舍,校舍周围有非常充足的活动场地。时任校长的尹士嘉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有广阔的田野、小山和海滩,可供我们休憩和研究大自然,也为教师们打网球,学生搞康乐活动提供了合适的场所。"(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 32.)

② 《华人筹议接受岭南大学》,《民国日报》,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念四日。

③ 李熙斌:《私立岭南大学史略》,《私立岭南大学建校康乐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第5页。

④ 香雅各,1880年12月出生于中国广州。其父亲是岭南大学的创校元老香便文。香雅各于1901年毕业于俄亥俄洲的伍斯特学院(the College of Wooster)。1909年和新婚妻子回到广州,在长老会传教站从事长达十年的神学教学工作。后来到岭大工作,一直到岭大消亡。他先后岭大执行秘书、副校长、校长、教务长等职务。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一样,他是在中国出生的第二代传教士教育家,对教会教育极为精通。(Edward J. M. Rhoads. *Lingnan'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Shakee Incident* (1925). Kwang-Ching Liu.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6. p. 196.)

植物标本藏有万数千种”。[1]

（四）接回自办时期(1927—1952)

1927年是开岭南大学新纪元的年份，是年国人接回自办。学校改名“私立岭南大学”。学校董事会推举钟荣光为校长，李应林为副校长，香雅各为顾问。3月11日校董会向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呈请立案。岭大是由中国人接回自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

接回自办之后，最重要之举“首为组织之改善及学务之扩充”。于是，岭大将文理科大学改为文理学院，农科大学改为农学院，将蚕丝一系扩充为蚕丝学院。1928年，重新成立商学院。这一时期，在中外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学校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1937年，学校由一所具有试验性质的小型四年制学院发展成为一所能够开出众多不同的课程，并赢得越来越多支持的正规大学。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岭大被迫撤离康乐园，借用香港大学校舍开课。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岭大再次停课，迁往内地韶关，于次年9月7日正式复课。1945年抗战胜利后，岭大回到康乐校园。到1947年底，在限制招生的情况下，学校在校生人数仍达到1,058人。1952年，作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岭南大学被拆解、合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 二、学生与教师

（一）学生的招选

与早期教会学校多为贫民子弟的情形不同，岭大的学生多为士绅子弟。同样的，跟早期教会学校学生不经考试即可入学的做法不同的是，[2]岭大学生主要是通过考试的方式录取的。主要是因为在19世纪末期，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发生了外语（主要是英语）学习热。[3]1888年，格致书院开张时，有80名报名者前来参加考试，最终录取了30名。第一名录取的学生是陈少白(Chan Shiu-paak)，他与孙中山结为兄弟，一同倡设兴中会。所有被录取的学生年龄都超过了15岁，并且在中国学

---

[1] 李熙斌：《私立岭南大学史略》，《私立岭南大学建校康乐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第8页。

[2] 参见张美平：《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1页。

[3] 参见季压西、陈伟民：《晚清英语学习热》、《外语学习：皇上臣子朝廷内外》，载《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三)——从“同文三馆”起步》，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330、467—529页。

校接受了6年至12年的教育。[1] 由他们组成格致书院的第一届学生。第二年学校招收第二班学生时竟有100多人报名，最后学校只招收了其中的68人，包括两名举人及一名海军将领子弟。此外，还有从海外归来的华侨。

为了保证生源质量，岭大一直坚持入学必须经过考试，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压力导致报考人数减少的不利情形下，岭大也没有因此降低入学标准，强调入学者必须是公立或已立案的高级中学毕业生。

直到1916年晏文士校长才下决心创办一个完整的大学部(Collegiage Department)。这时中学部(the Secondary School)有381名学生。大学部只有23名学生——新生12人；二年级学生10人；三年级学生1人，没有四年级学生。小学部(the Elementary School)有学生154人。1917年录取大学新生48人，是上一年的一倍多，[2]但人数一直在上升，1920—1921年度，录取新生一百多人，到1936—1937增加到近600人。[3]

由于资料阙如，我们无法知道早期岭大入学考试的科目等相关信息。我们找到了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932—1933)度"章程"规定的考试科目及其各学科的入学程度要求等信息，兹列如下。

**考试科目：**

三民主义

物理学

国文

历史地理

英文

智力测验

数学

考试三民主义全用中文，历史地理本国部分用中文，外国部分用英文。数学与物理学则中英文并用。

---

①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 15.

②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 65.

③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p. 99.

**各学科的入学程度要求**

党义：孙总理演讲之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

国文：曾习国文约十二年

本国历史地理：曾习本国普通历史及地理

英文：1. 对于英文造句、作文与英文文法，须合葛理佩著《英文津逮》卷四或相当程度

2. 曾精读高中英文读本二三百页

3. 能以英文为课室听讲讨论之媒介

数学：曾习算术、初级代数、中等代数及平面几何

西洋史：曾习下列三者之二

1. 泰西各国专史，如英国史、美国史

2. 上古及中古史

3. 现代史至一八七十年止

物理学：曾习物理学一年，且须有实习室之相当训练，报名时须缴实习笔记

其他学科：须具新制高中毕业程度①

（二）师资队伍

1888 年格致书院创办后，跟当时的教会和官办学堂一样，面临的同样是师资紧缺的问题。书院监督哈巴安德除了主持学校的行政管理以外，还和妻子承担英语课程的教学任务。另外一位教师是曾在檀香山（Honolulu）任教三年的中国人，在学校教中国经典。② 1894 年格致书院重新开张时，师资情况没有很大改观，仅有 6 名教师，其中中国教师 4 名，美国教师 2 名，即那夏礼博士（Dr. H. V. Noyes）和博格斯牧师（Rev. J. J. Boggs）。

民国以降，基督教事业在中国蓬勃开展，教会学校的师资情况较晚清时期改善了很多。

在西方，受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前来中国，在教会学校任教，他们大多拥有学士以上学位。此时，也有不少归国留学生在教会学校谋到了教职。但晏文士校长认识到目前取得的进步仅仅是开始，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必须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以便提供更优质的课程。此时最薄弱的系是生物系和英语系。1917—1918 年，托事会派来了

① 《南大一览・学则》，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度章程第四十五卷，第 65 页，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②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 16.

两位生物学家，分别是来自明尼苏达大学农学系的霍华德(Charles W. Howard)和匹兹堡大学讲师凯驰(James F. Karcher)。英文系教师米切尔博士(Dr. Julia Mitchell)的任期到1917年为止。她的继任者是里格斯小姐(Margaret Riggs)。随着罗什博士(Dr. Lillie Loshe)和格里斯博士(Dr. John C. Griggs)的加盟，英文系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1923年，美长老会派遣俄亥俄州参议员的儿子斯宾塞博士(Dr. Selden P. Spencer)来到岭大任英文系助理教授。[①] 1925年，33人的教师队伍中，有22人是西方人，11人是中国人。[②] 岭大师资构成的特点是外国人占的比例高，这说明西方色彩明显。岭大英文系后来改称西洋文学系，其师资力量是很强的。1934年，100%的教师具有美国的教育背景。拥有硕博士学位的教师占62.5%。岭大教师这样的教育背景及学历构成，哪怕放在今天的高校英文系里，也是很理想的。

以下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岭大西洋文学系教师的基本情况：

表5—8　岭大西洋文学系教师基本情况一览

| 姓　名 | 职务 | 职称 | 毕业学校及学位 |
|---|---|---|---|
| 基来度(P. A. Grieder) | 系主任 | 教授 | 美国都宾大学文学士，爱欧华大学文学硕士 |
| 龚约翰夫人(Mrs. J. S. Kunkle) | | 散任教授 | 美国司密斯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 |
| 李宝荣 | | 副教授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拉克利扶大学文学硕士 |
| 古路得安女士(R. McCullongh) | | 讲师 | 美国的堡大学文学士，拉克利扶大学文学硕士 |
| 石福(J. B. Shackford) | | 讲师 | 美国西北大学理学士及文学硕士 |
| 何文(B. L. Hormann) | | 讲师 | 美国夏威尔大学文学士 |
| 畸理(E. J. Kelley) | | 讲师 | 美国斯丹福的爱心文学士，法国格兰奴布大学肄业 |
| 吕敏慧女士(H. Luben) | | 讲师 | 美国西省师范大学文学士 |

资料来源：《南大一览 教职员名表 文理学院教员名表》，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布告类第五十三号，第一七页，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①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p. 65—66.)

② Edward J. M. Rhoads. *Lingnan'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Shakee Incident* (1925). Kwang-Ching Liu.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6. p. 185.

## 三、外语教学特点

毫无疑问，教会学校的长处在于其外语教学。在近代中国，能够学到正规外语的场所，除了官办的同文馆等洋务学堂外，公认的就是教会学校，而后者较前者具有更多的办学优势。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岭南大学的外语（主要是英语）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

### （一）重视英语教学

尽管当时民众对英语的接受能力极为有限，从传教角度考虑它也有不利的一面，一些传教士也曾提出反对意见，但哈巴安德始终坚持英文教学是其计划中的不可或缺的特色。他说："掌握了中国官话和英文，毕业生将成为世界公民（With Mandarin and English the graduates will be citizens of the world）。"①用现代术语来描绘，可以说哈巴安德具有"全球性视野（think globally）"和"地域性关怀（act locally）"。虽不说当时他说这话到底有多大影响，但如果从今天联合国所使用的五种官方语言来考虑，这两种语言都包括在内，真可谓远见卓识。哈巴安德在教学过程中，非常强调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一方面，他自身不断加强中国官话与广东方言的学习，以便于开展教会工作。另一方面，他在教学上一直推崇英文教学。在他举办的所有各类学校中，他总是以英语作为基本的教学语言，并要求学生能熟练地掌握并运用这门工具。此外，学生必须掌握中国官话，作为英语的必要补充，课堂教学一般以英语和中国官话交叉进行。②

### （二）重视英语教学研究和方法的创新

1905 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会"第五届年会上，来自广州岭南学校的英文教授黄念美（Olin. D. Wannamaker）③发表了《教授一年级学生英语》（*Teaching English to First Year Students*）一文，详细介绍了 1903 年创办的岭南学校（前身为格致书院）正在采用的一种新英语教学方法。他认为，学生学习英语首先必须养成用英语思考的习惯。初学英语的

---

①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 8.;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p. 124.

② 汤开建、颜小华：《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在华活动述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③ 黄念美（Olin D. Wannamaker），毕业于著名的私立大学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他于 1902 年来到岭南学堂，被分配在英文系担任英文教学工作。

学生或英语词汇量还非常有限的学生对英语生词的掌握主要是通过具体实物、图画的展示，动作的表演，表达思想的外部姿势和面部表情等来获得。他提倡要充分发挥学生用眼、用耳、用声音的能力。而培养这三方面的能力，就要求学生在学习教师精心挑选出来的那些日常接触的分类实物英文单词时，如 pen（钢笔）、pencil（铅笔）、ball-pen（圆珠笔）、brush（毛笔）等为一类，用他们的眼睛观察和听力判断，将所看到的实物及所表示的单词和所听到的单词的发音，三者对上号，并不断跟着重复朗读。同时，教师教授单词时，将这些单词放在不断重复的句子中，让学生操练，在加深他们对这些生词印象的同时，更主要的是让他们大脑中有正确的英语句型的概念和表达事物的正确方式。如，“I am picking up a book”（“我正在捡起一本书”），教师可以边说这个句子边表演，然后把书放在地上，让学生来捡，然后说 “You are picking up a book”（“你正在捡起一本书”）。有了这样的句型，句中的主语、谓语和宾语可以不断更换，以教会学生在语篇中掌握单词的意思，同时了解不同句型和意义的表达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单词和句子的练习，教师可以把单词和句子编排在故事中，让学生通过编排和朗读故事来学习英语。[①]

（三）注重全英语环境的营造

在澳门办学期间，学堂在教学方面进行了创新，其中之一便是开创全新的英语教学模式。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经常说一些校长尹士嘉所说的“杂种英语”（mongrel English），因为这些学生在记词和词组时，只是用所谓的中文对等词来代替这些英文词语。当教师发现这一情况时，他们便绞尽脑汁地从一开始就让学生学会使用英文短语，培养他们用英语进行思维。教学中让学生接近常见的物体，然后教他们如何描述这些物体。这种方法为学生正确造句提供了必要的训练机会，使日后的阅读和写作变得更加容易，更具吸引力。

为了营造更为真实的英语学习氛围，学校按照学生的投票结果定下如下规则：上午 9:15 至下午 2:30 期间只能说英语。一旦学生和教师在这一时间段被发现说汉语，就要向当事人作检查，并且要记录在案。体育比赛中，要是选手说汉语，就要给对方队加上一分。难怪尹士嘉说：“我们的学生在使用地道的英语方面进步神速，好评如潮。这使我们非常

① 季压西、陈伟明：《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三）——从“同文三馆”起步》，学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04 页。

惊讶。"①

教会学校从开设英语课程一开始，就积极营造全英语的氛围，有意识拿英语来当"香饵"，利用英语学习作为一种主要手段来吸引富家或官宦子弟前来就读，从而将宗教信仰、西方文化和近代知识灌输给中国的青年学子。岭南大学也是如此。1917年传教士周忠信(J. Tayler)在重庆举办的"中华基督教教育年会"上所作的《我们英语教学目的》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他说："不到十年前，英语学习乃是吸引中国学生的香饵。如果学生到我们学校念英文，他们也不得不念其他科目，这些科目在不知不觉中变为比英语更为重要。教给学生宗教的知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英语不过是宗教药丸的糖衣而已。……我们传教士的一种任务，就是通过传播英语知识来帮助促进世界和平，因英语似乎肯定地会变成国际交际的媒介。"②

曾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③总结出这种全盘英语化教学上的特点：(1) 用英语教授英文的书，除了中国国文和中国历史，大多数的课程都是用英语讲授美国书。岭南附小从五年级开始就学英语，所有岭南的学生，即使各种学科的成绩都很差，但英语总有点根底。(2) 岭南的课程和美国有联系，在岭南大学毕业的可以到美国进研究院，岭南附中毕业的可以到美国考大学，也就是把岭南变成中国的美国学校。(3) 在学术研究方面，美国人对于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拿出一点钱来。比如燕京大学的燕京哈佛研究所，美国人是出了一点钱的；陈受颐在岭南所做的研究工作也得到哈佛燕京研究学会的合作。④

以下是杨重光的回忆。该回忆虽然刻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但还是反映了许多实际情况：

> 岭大的美国化色彩很浓。不仅岭南监督是美国人，文、理、农学院的院长是美国人，附设中学校长是美国人，连图书馆长、训育、会计、校址校舍等负责人，都是美国人。所有的课程、教学、会议记录及各种文

---

①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 34.

②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4页。

③ 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广东文昌(现属海南省)人。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学士，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博士，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解放后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广州暨南大学校长等职务。"文革"中遭受迫害。

④ 陈序经：《有关岭大与钟荣光的几点回忆》，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年内部发行，第40页。

件，都用英文或以英文为主。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才有很小的变动。……美帝分子在严格管理的借口下，对学生实行美国式军事管理（仿照美国有些中学实施“军事管理方法”），设立专门管理学生的监学，设立陆军团的组织，军事管理和训练完全用英语。

……

岭大创办之初，就以教授英语为主。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岭大图书馆的藏书有过统计，外文书籍五万七千种，中文书籍只有四千三百种，中外文期刊二千一百八十七种、报纸一百七十四种，其中外文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外文中又以英文为主。……除了通过英语教学、英文图书的影响外，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定例禁止学生用华语谈话，否则要受罚金。美籍教师负责侦查，偶然讲一两句中国语，也会受到处罚。……美帝分子还有一门“公民”的功课，一九二三年前，这门功课采用的课本是美国出版的《我的祖国》（*My Country*），这本书是给美国儿童、美国公民读的，岭大却以它来教育中国的青少年，用心何在，不言而喻。直到大革命时期，群众觉悟提高，才不得不改编一本《新中国》（*New China*）来代替。但是，这本书还是用英文写，英文讲授，是以美国的《我的祖国》为蓝本编写，实质上还是用美国精神来教中国的青少年。至于其他功课的课本，除了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地理，其他如外国历史、地理、理科、数学、宗教等，都尽量采用美国出版的课本和参考书。像中国地理课本，却采用美国人冯世安（C. G. Fuson）用英文编写的《中国地理》（*The Geography of China*）。至于科学仪器、实验教具等等，都是美国货品。收回教育权后，岭大向中国政府立案，虽然有些教师上课不是完全用英语讲课，兼用祖国语言，但课本讲义仍无改变，还是采用英文原本，完全使用英语教学的人数还不少。按照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规定，不得用外国语及外国课本，但是，岭大对此是阳奉阴违，国民党政府也听之任之。[①]

### 三、成就及影响

从 1888 年 3 月创办起到 1952 年被撤销，岭南大学走过了整整六十四个年头。学校从当初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型书院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具

① 杨重光：《美帝控制岭南大学六十年》，载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64 年内部发行，第 12—24 页。

影响力的教会大学之一。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对岭南大学新生的演讲中说岭大的"规模宏大、修理整齐、教育良善";"在广东可以说是第一,就是在中国西南各省,也可算是独一无二"。① 特别是著名学者陈序经从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大校长,到1952年夏岭大被取消,仅两三年的时间,岭南大学从广东最好的学校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一些院系(如医学院)已达到国内一流或最佳水平,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而广州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

岭大六十四年的办学生涯中,培养了职业革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杰出人物,其著名毕业生有: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1869—1934);被称为"革命先烈七十二烈士的第一人"史坚如(1879—1900);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1901—1972)、廖承志(1908—1983);音乐教育家冼星海(1905—1945);社会活动家陈香梅(1925—);翻译家、诗人梁宗岱(1903—1983);武侠小说的开创者梁羽生(1922—2009)以及曾呈奎(1909—2005)等近20名的两院院士。

岭南大学的教育质量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印证:

1901年,钱树芬、陈廷甲、丁远显等三位学生完成了预科学业。钱树芬、陈廷甲先后来到美国求学,前者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在民国的省级立法机构中服务;后者成为西点军校第一位中国毕业生。②

1904年春,清政府在广州举行的选拔40位赴海外公费留学的竞争性考试中,来自岭南的Wong Ka-luen在500人参加的考试中获得第九名的好成绩,并荣获奖学金。在以后的几年里,有不少岭南学子获得海外留学奖学金,仅1912年,就有27名毕业于岭南的学生在美学习。③ 1910年,在广州举行的有260人报名的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奖学金考试中,6个奖学金名额中有5个,5个候补者名额中有3个名额为岭南学子所获得。④

1928年1月17—19日,中华基督教高等教育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等16所教会大学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组织了专门的委员会根据各校的入学程度、

① 《大元帅对岭南学生欢迎会演说词》,《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1日、3日。

② 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永昌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9页。

③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 42.

④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97.

毕业标准、教师资格、校舍条件、课程编制、图书馆及实验室等情况，对学校的办学进行评定，按水平高低分甲、乙、丙三类。其中被评为甲类者只有2所，岭大是其中之一，余下的7所被分别评为乙类和丙类，另外7所学校不及格。①

在妇女地位不受重视的年代，岭大开风气之先，较早地实施男女同校(co-education)，培养出被称为“千百年来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的杰出女诗人、著名文献学家冼玉清(1895—1965)。她“在岭大攻读文学及教育学本科课程，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中学文史教师，1927年起任大学教师讲授骈文、文学概论，还能以英语讲授‘二十四史’”。②

岭南大学的成就及影响还可以从中外社会名流的评价得到进一步的印证：③

> 中国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要特别感谢热情的美国人民，他们为我们的学生建立了许多大专院校。目前，这样的院校正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你们创办的广东基督教大学(按：即岭南大学，下同)是其中的一所。
>
> 全中国人民对这所大学的良好名声已非常熟悉。迄今为止，已有许多学生已经在这所大学接受了教育。这所大学水准很高，其学生已非常成功地通过了其他学习机构的入学考试，即是明证。
>
> ——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1916年10月4日)
>
>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我能真正证明广东基督教大学在教育和磨练年轻人良好的精神面貌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她已经培养了一些积极从事公共服务的优秀学生，并取得了成效。他们在促进中美两国人民进行更为密切的联系中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
> ——北京政府外交部长、前驻美公使伍廷芳(1917年4月7日)
>
> 我第一次与岭南大学的接触是在1940年我成为在纽约托事会成员的时候。这些年来，我了解到我们公司在广东的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与岭大频繁接触，一直对岭大很尊重。我最后一次去广州是在共

① 《中华基督教高等教育会议本校程度列入甲类》，载《南大青年》，1928年2月18日。引自陈国钦、袁征：《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② 陈国钦、袁征：《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③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p. 169—174.

产党接管政权前的1948年12月。我们在岭大校园里度过了最有趣味的一天。花园、校舍及设备等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我们与校长和陈夫人以及中美教职员共进午餐。毫无疑问,一切都在表明这在当时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大学,一群能干的、具有献身精神人们正在做着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真空石油公司(Standard Vacuum Oil Co.)前总裁 Mr. Philo W. Parker(1961年)

广东基督教大学……除了给中国人提供基督宗教的一般原理外,还给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需要的东西……(1)(它提供了)学习这个东方国家第二语言(即英语)的机会。(2)它已觉得特别有必要教授年轻人应用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将使他们能够从事工程方面的职业,从事开发这个帝国富饶的自然资源。(3)它谋求形成,并且已经形成对西方人更好的信任感,而不是怀疑。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数学教授大卫·尤金·史密斯(Dr. David Eugene Smith)

# 第六章

## 中华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

晚清洋务“新政”时期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及外语、军事、技艺、医务等专门学堂，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设天津中西学堂，其“头等学堂”是中国新式大学的雏形。三年后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光绪三十年(1904)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高等教育纳入学制体系并实际实施，迄至宣统元年(1909)，已有三所公立大学(即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两所私立大学(即中国公学、复旦公学)。

民国肇建，百端更新。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①进行了重大改革，自1912年10月起，陆续颁布《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大学规程》、《大学组织法》等一系列法令、法规。之后，又相继颁布实施了“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等。这些法令和学制除了在宏观方面对高等教育做出规定外，还在微观层面上对外国语等学科作了专门规定，将外国语、国文、数学定为各专业必学的共同必修课，而且外国语的课时数往往是最高的。这些举措促进了外国语学科的发展。根据付克(1986)的统计，全国解放前夕，全国外语专业点约62个，外语教师约有919人，占当时全国高校专任教师16,900人的5.4%；专学外语的大学生约7,000人，约占当时全国大学生

---

① 民国高等教育的特点是公、私立两种不同的办学格局并存。公立大学为政府办学，有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含独立学院)两种类型。私立大学按办学主体不同，分为中国民间的私人办学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前者如1905年由马相伯出资创办的复旦公学(1917年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后者如卜舫济牧师(F. L. Hawks Pott)任校长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本章主要探讨由政府主导的大学教育。

116,500人的6%左右。[①] 从人数来看,民国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其外语教育的一个特点是,外语专业毕业生主要来自综合性大学,并非是外国语学院。整个民国时期只办过不到10所外国语专门学校,办学时间都很短,而且不论办学条件,还是教育质量都难以与综合性大学比肩。因此,培养外语专业人才主要还是依靠综合性大学。从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地缘因素来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这些综合性大学享有举办外语专业的优势。民国时期各大学的英文系(或外国文学系)的共同特点是:强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采用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相结合的方式,注重英美文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的阅读和欣赏能力。虽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英语专业有其不足之处,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外文系的教育是成功的,不仅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外语人才,同时也为当今的外语专业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启示。[②]

20世纪2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大学都为各系、各专业大一、大二学生开设英文课,通称为大一英文和大二英文(相当于新中国大学里的公共英语或大学英语课)。其目的是在中学英语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阅读和翻译能力,为日后就业或出国留学创造条件。就学习动机而言,大多数学生学习外语的目的在于阅读英语国家语言文学作品或专业原版书籍,对于听说训练不甚重视。打算日后出国留学或到涉外企事业单位如银行、邮局、铁路、海关、洋行就业的学生则比较重视听说训练。由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实行精英教育,外语师资力量普遍较强,特别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高校外文系更是如此。生源质量也很高,外语学习的动机极为强烈,因而民国时期的外语教学质量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李良佑等人(1988)在《中国英语教学史》中对民国外语教学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英语教学有可能得到畸形的发展。在旧中国,英语可谓是一门得天独厚之学科,在高等教育尤其如此。各类院校、系科学生对英语学习一般都很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为了应付日常学习,许多课程的教材、参考书,乃至教师讲课,用的都是英文,不得不花上一番功夫。二是出于今后就业或出洋留学之需要。总之,就英文这门学科而言,无论是专业英语还是大学普通(现称公共)英语,教学质量一般并不低下。"[③]

---

①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② 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③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 第一节　中华民国的大学外语教学概况

### 一、民国成立前的学制与课程

#### （一）大学外语教育[1]的萌芽

清同治元年(1862)设京师同文馆于北京，以培养能胜任对外交涉的翻译人才和外交官员，“期于晓畅翻译，通澈中外事理，以备舌人之选”。[2] 至于学习内容，“初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3] 于当年开设英文馆，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中招收10名学生肄习英文，聘请英人传教士包尔腾为教习。翌年4月，同文馆扩充门类，又开设法文、俄文两馆。同年又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目的全同而课程微异。同治五年(1866)，京师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光绪二年(1876)，总教习丁韪良制定了“八年课程计划”，除开设认字写字、讲解浅书、翻译公文、练习译书等英文课程外，增设了各国地图、各国史略、数理启蒙、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等。学堂已由一所纯粹的翻译学校向既习外文又学实用科学的综合性学校过渡。此类学堂，论其性质，乃非正式大学外语教育，然追溯其源，实为先河。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在湖北设立自强学堂，开设英、日等五门外语，除造就翻译人才外，还注意技术人才与海陆军人才的养成。二十一年(1895)，盛宣怀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种，头等即外国之大学堂，开展英语语言文字教育，用英语教授自然科学课程。翌年，盛宣怀又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分上、中、下三院，上院相当于大学，也称头等学堂，以英文教授西学。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丧师辱国，列强群起，攘夺权利，国势益岌岌”，[4]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学习外国，实行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必须从废科举、办学校开始。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筹办京师大学堂，订定章程及课程。京师大学堂的外语教学涵盖了预备、速成二科。预备科分政科和艺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大学堂后又增设译学馆、进士馆及医学实业馆。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主攻外国语言文

---

① 本研究中的大学外语教育，包括外语专业教育和作为非外语专业的普通外语教育。

② 马挺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第1页。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22页。

④ 赵尔巽等：《清史稿·选举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24—3127页。

字。创办大学堂之用意是“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①，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此乃我国新型正规大学之肇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

（二）近代中国学制系统的建立

1. 高等学堂的学制与课程设置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学制之厘定，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管学大臣张百熙之《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清政府颁布了《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等相关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学堂之设，“使学生于中学卒业后欲入大学分科者，先于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再行送入大学肄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国家名义制订的全国性学制系统。“壬寅学制”尽管由于各种因素，未能在全国实行，但它具有首创之功。

高等学堂分政艺两科。政科和艺科的外国文课程内容如下：

第一年 讲读、文法、翻译、作文

第二年 同上学年

第三年 同上学年②

1904 年 1 月 13 日，《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颁布。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奏定高等学堂章程》（简称“章程”）规定：“设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豫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每日功课六点钟，三年毕业。”“章程”将高等学堂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科为豫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治之；第二类学科为豫备入格致科大学、工科大学、农科大学者治之；第三类学科为豫备入医科大学者治之。”③在课程设置上，它跟“壬寅学制”明显不同的是，这三类学科中设置了外国语、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等所有学生必须通习的课程。各类学科的外语周课时和学习内容见下表：④

①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载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上海书局石印，光绪辛丑年，第 271—273 页。

② 《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载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39—543 页。

③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67—568 页。

④ 说明：三类学科中的周课时数一栏中各有两个数字。第一、二类学科以英语为主，第一位数字是英语的周课时，第二位是德语或法语；第三类学科以德语为主，第一位是德语，第二位是英语或法语。资料来源：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569—575 页。

表 6—1　　各类学科外语周课时和学习内容

| 学　科 | 周课时数 | | | 学习内容 |
|---|---|---|---|---|
| | 第一年 | 第二年 | 第三年 | |
| 第一类学科 | 9/9 | 9/9 | 8/8 | 讲读、文法、翻译、作文 |
| 第二类学科 | 8/8 | 7/7 | 4/4 | 讲读、文法、翻译、作文 |
| 第三类学科 | 13/3 | 13/3 | 9/3 | 讲读、文法、翻译、作文 |

资料来源：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69—575 页。

"章程"的三类学科中都把外国语作为"主课"，所占比重甚高，不管是哪一类学科，都必须同时开设两门外国语课程。在第一、二类学科中，英语为主，"外国语于英语外，听其选德语或法语习之"。第三类学科中，德语为主，拉丁语亦为必修的"主课"，"外国语于德语外，选英语或法语习之"。①

2. 大学堂的学制与课程设置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高等学堂之后，设立大学堂，"令高等学堂毕业者入焉；……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②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各分科大学"均以三年为限；惟政法科及医科中之医学门以四年为限"。大学堂分八科（系）：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和商科大学。各科大学又分设若干门（专业），八科共计 46 门。其中文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③ 英国文学门科目及周课时数如下：

表 6—2　　英国文学门科目及周课时数

| 主　　课 | 第一年每星期钟点 | 第二年每星期钟点 | 第三年每星期钟点 |
|---|---|---|---|
| 英语英文 | 9 | 9 | 9 |
| 补助课 | | | |
| 英国近世文学史 | 3 | 2 | 2 |
| 英国史 | 2 | 2 | 1 |
| 腊丁语（拉丁语） | 3 | 3 | 2 |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68 页。

②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70 页。

③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88 页。

续 表

| 主　　课 | 第一年每星期钟点 | 第二年每星期钟点 | 第三年每星期钟点 |
|---|---|---|---|
| 声音学 | 2 | 3 | 2 |
| 教育学 | 2 | 2 | 3 |
| 中国文学 | 3 | 3 | 5 |
| 合计 | 24 | 24 | 24 |

第三年末毕业时，呈出毕业课艺及自著论说。

资料来源：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97 页。

以上各科目外，应以中国史、外国古代文学史、辩学、心理学、公益学、人种及人类学、希腊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法语、德语、俄语、日本语等为随意科目（按：相当于现在的选修课）。

课程的设置者已经考虑到了英语作为工具性课程的局限性，所以在开出每周 24 节的专业课外，还考虑让学生选学“随意科目”，以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这样的做法，颇前瞻意识，对于学生今后进行职业选择是有助益的。

3. 优级师范学堂的学制与课程设置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发轫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设立的南洋公学师范院，“视西国师范学校肄习师范教育管理学校之法”。[①] 但这仅仅是一所学校的实验性措施。“壬寅学制”规定了师范教育系统，但尚未成为独立系统。直到“癸卯学制”颁布，师范教育才成为一个独立系统。[②]《奏定学堂章程》将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和优级两级。

根据《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设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招收对象是“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及普通中学毕业生”。“每日功课六点钟，三年毕业”。分为四类：

第一类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

第二类系以地理、历史为主，

第三类系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

第四类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

每一类的周总学时数为 36 课时，外国语周课时数因学科类别的不同

---

① 盛宣怀：《奏陈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载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15 页。

② 季压西、陈伟民：《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三）——从“同文三馆”起步》，学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64 页。

而不同，详见下表：

表 6—3　外国语周课时数及学习内容

| 学　科 | 周课时数(英语) | | | 学习内容 |
|---|---|---|---|---|
| | 第一年 | 第二年 | 第三年 | |
| 第一类学科 | 12 | 8 | 8 | 讲读、文法、作文、文学史、英文学 |
| 第二类学科 | 4 | 2 | | 讲读、作文、文学史 |
| 第三类学科 | 3 | | | 讲读 |
| 第四类学科 | 3 | | | 讲读 |

资料来源：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90—698 页。

第一类学科的外国语课程除了开设英语外，还开设第二外国语（德语或法语）。第二外国语第一年不开设，第二年每周四课时，内容为“讲读、文法、作文”；第三年每周 3 课时，内容为“德文学或法文学”。①

## 二、民国成立后的学制与课程

中华民国成立伊始，民国政府教育部从 1912 年 9 月 3 日起，到次年 8 月间，陆续颁布了包括《学校系统令》在内的各种法令，构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学制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

同癸卯学制一样，“壬子·癸丑学制”从横向考察，整个国家教育仍分为三个大系统：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从纵向分析，整个学校系统分为三等五段——初等教育（初等小学校四年、高等小学校三年）、中等教育（中学校四年）和高等教育（预科三年、本科三或四年）。其中，规范大学办学的指令性文件是 1912 年 10 月 24 日颁布的《大学令》（部令十七号），规定大学的宗旨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七科”；同时在学生的入学资格、修业年限等方面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大学设预科，其学生入学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大学各科学生入学资格，须在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大学各科之修业年限三年或四年，预科三年，大学院不设年限”。②

1913 年 1 月 12 日，教育部又颁布了《大学规程令》（部令第一号）。《大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90—698 页。

② 《教育杂志》第 4 卷，第 10 号。

学规程令》(以下称《规程》)规定：大学依大学令第二条之规定，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 7 科，而这 7 科又分哲学门、文学门等 39 门。其中大学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 4 门，大学理科等其他 6 科共 35 门。7 科共计 163 个科目。文学门分为国文学、梵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意大利文学和言语学八类。《规程》没有对授课学年及周课时数作出具体规定，但就各门系开设之具体课程，作了详尽安排。就《规程》所规定的各学类之科目来看，比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订的，清政府于 1904 年 1 月颁行全国的《奏定学堂章程》稍为详细。与《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规定的英国文学门的七种科目[①]相比，此次增加四种，新开设了文学概论、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等课程，应该说，这样的课程设置，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一大步。英文学门的十一种科目如下：

(1) 英国文学；(2) 英国文学史；(3) 英国史；(4) 文学概论；(5) 中国文学史；(6) 希腊文学史；(7) 罗马文学史；(8) 近世欧洲文学史；(9) 言语学概论；(10) 哲学概论；(11) 美学概论。[②]

1912 年 10 月，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次月，公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这两项法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专门学校之种类为法政、外国语等十类学校。专门学校下设预科，上设研究科，修业年限预科一年，本科三年，研究科一到二年。[③]《规程》对这些专门学校的教育宗旨、师资配备、课程设置等都做了详尽规定。

1913 年 2 月，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将高等师范学校分为"预科、本科和研究科"。规定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研究科一年或二年，专修科二或三年，选科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其中英文部的课程是："英语及英文学、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言语学。"[④]是年 3 月，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每学年分三个学期开课，其中，本科英语部的主干课程是"英语及英文学"，第一、第二学年每周 14 课时，第三学年每周 13 课时。"英语及英文学"教学内容为：

第一学年：讲法　文法　作文　会话

① 这七种科目是：英语英文、英国近世文学史、英国史、腊丁语(按：拉丁语)、声音学、教育学、中国文学。参见[清]张百熙撰：《张百熙集》，岳麓书社 2008 年版，第 216—217 页。

② 《教育杂志》第 5 卷，第 1 号。

③ 《教育杂志》第 4 卷，第 10 号。

④ 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民国八年(1919)五月，第 230—234 页。

第二学年：讲读 作文

第三学年：讲读 作文 文学史①

高等教育是一国最高层次的人才基地，有关培养目标的设计，学科设置的比例，经费投资的分配，招生数量的确定，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民国初年，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虽然制定了较完整的学制系统，但由于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滞后，中国学制正处于转型期，高等教育先天不足，发展缓慢。截至1916年，全国只有国立大学1所(北京大学)、省立大学2所(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国立专门学校4所(全在北京)，省立专门学校22所。还有若干所私立大学，主要在北京、上海、武昌等地。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同样发展缓慢，尽管在民初教育部着手制定课程标准，但是总体看还是过于简略，亟需完善和提高。

民国初期，政府对专门学校内容进行调整，由清末高等实业学堂、法政学堂、译学馆改为专门学校。入学资格与大学相同，门类有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商船、美术、音乐、外国语等。本科三年，预科一年，均须学习外国语。教育部公布的《外国语专门学校规程》规定英语专业必须设置十门课程：英语、国文、言语学、历史、地理、教育学、法学通论、经济学、国际法、世界语。师范教育分中师和高师，外国语是必修课。实业教育则视学科的不同，有的必须学习外国语，有的为加修课。与此同时，近代的私立大学开始在民国初期出现，到1925年全国的私立大学发展到27所，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这些大学普遍地重视外语教育，它们的英语教育具有自身的特色，如南开大学的英文系，不仅重视传统的文学教育还重视实用性课程的学习。②

除了国立、省立及私立大学外，当时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最有影响的要数西方教会在中国本土开设的教会大学了。教会大学以其富有特色的课程设置、良好的教育质量、优良的外语教学环境获得了国人的青睐，左右了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关于教会大学的外语教育，详见本书相关章节。

民初由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完善，先天不足，以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科一枝独秀的局面。据统计，1916年8月—1917年7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所，其中法政科高达32所，占49.2%。③民初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畸形状况，不能不引起政府的注意。1917年9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718—719页。

② 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

③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大学令》，对1912年10月公布的《大学令》稍作变动，放宽理工科类的办学限制，促进了理工科类高等教育的发展。此外，还将原大学本科之修业年限三年或四年改为四年，预科由三年改为二年。①

1917年蔡元培率先启动在北京大学进行改革，如将原本年限不一、要求各异的预科，各与相关本科挂钩，预科定为二年，本科定为四年，使之相互衔接。大学内部废"门"，建"系"，全校分作十三个系，系设主任。改"学年制"为"选课制"，"学时制"为"学分制"，以顺应教育对象的特性，发挥学生的潜能。北大的学制改革提案，经教育部核准之后下发，北高师、法政专门、高工、高农、俄文专修等学校相继仿行。随着学制改革在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不断深入，"壬子·癸丑学制"已处于非改不可的境地。1921年10月，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广州举行，会议以广东省提案为依据，参酌其余九省提案，形成了1921年学制系统草案，史称"辛酉学制"。在"高等教育段说明"中，规定"大学学生至少须习两种外国文"。1922年9月，以"辛酉学制"为蓝本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学制会议上获得通过。11月1日，《学校系统改革案》由黎元洪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名义颁行全国，标志着新学制（亦称"壬戌学制"，"六、三、三、四"学制）的诞生。1922年新学制采用美式"六、三、三、四"学制，规定"大学校用选科制"，②于是各大学自行设计课程。

据1923年出版的《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指南》一书介绍，当时部分大学英文系的课程大致如下：

国立北京大学英文学系：

英文选、英国文学史、英文作文、演说、英文辞论、英国史、美国史、欧洲古代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世界史

私立南开学校（大学部）英文部：

论文写作、英国文学选读、与教员单独谈话以及讨论已经教员修改之论文、高等英文、英美文学

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文部：

教育学科、国文、二外、英文（语音学、会话）、文法、闳辩术、作文、应用文、翻译、修辞、时事研究、英国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英美文学史、英文学、新闻学、莎士比亚、英文教授法、西洋文化概况、教育英文、公民学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663页。

②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私立上海大同学院：

1）英语文法初步、文学读本、文学、地理、小说、论文、修辞学、文学选读、文章论、史学

2）国学、数理、二外[①]

1924年颁布《国立大学条例》，共二十条，其中第十七条规定："国立大学校各科、系及大学院各设教授会，规划课程及其进行事宜。"《条例》附则又指令"私立大学应参照本条例办理"。这实际上是正式授权各校、各系可自行安排课程，制定符合本校（系）实际的人才培养目标。民国时期有不少大学都开设外国文学系或英国文学系，由于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的管制相对宽松，较少采用刚性的管理模式，因而外语教育发展较快，形成了外语教育发展的畸形局面。各校（系）课程设置、人才培养规格、课时及学分等方面均有很大的自主权。以下是中央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的人才培养目标及选课指导书，便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外语教学情况。

中央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的人才培养目标：

（1）注重外国文基本及实际之训练，以增进阅读写作介绍及翻译之能力；

（2）讲授外国文学之标准作品，以提高欣赏及批评之程度，并吸收其优美文艺思想以资观摩；

（3）研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发独立进展之精神，并培养为中国民族宣达意志之人才。

外国文学系采用学分制，四年内"至少修毕一百三十二学分方能毕业"。各年级开设的课程见表6—4。

表6—4　　中央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选课指导书(1935年)

| 年级 | 必选修 | 科　目 | 年限 | 学分 | 周课时 | 备　注 |
|---|---|---|---|---|---|---|
| 一年级（共32学分） | 必修（29学分） | 英国文学史 | 1 | 4 | 3 | |
| | | 英文名著选 | 1 | 6 | 3 | |
| | | 英语会话 | 1 | 4 | 3 | |
| | | 英文作文A | 1 | 4 | 3 | |
| | | 法文A | 1 | 6 | 3 | 任习一种，但选定后须连修三年中国文学系 |
| | | 德文A | 1 | 6 | 3 | |
| | | 中国文学史纲要 | 5 | 3 | | |

①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页。

续 表

| 年级 | 必选修 | 科　目 | 年 限 | 学 分 | 周课时 | 备　注 |
|---|---|---|---|---|---|---|
| 一年级（共32学分） | 选修（3学分） | 日文 A | 1 | 6 | 3 | |
| | | 西洋哲学史 | 1 | 6 | 3 | 哲学系 |
| | | 伦理学 | 半 | 3 | 3 | 哲学系 |
| | | 政治学 | 1 | 6 | 3 | 政治学系 |
| | | 经济学 | 1 | 6 | 3 | 政治学系 |
| | | 普通社会学 | 1 | 6 | 3 | 社会学系 |
| 二年级（共32学分） | 必修（24学分） | 近代英美诗选 | 1 | 4 | 3 | |
| | | 近代英美散文选 | 1 | 4 | 3 | |
| | | 英文作文 B | 1 | 4 | 3 | |
| | | 法文 B | 1 | 6 | 3 | 继续第一学年所选之语种 |
| | | 德文 B | 1 | 6 | 3 | 继续第一学年所选之语种 |
| | | 中国文化史 | 1 | 6 | 3 | |
| | 选修（8学分） | 日文 B | 1 | 6 | 3 | |
| | | 英语演说与辩论 | 1 | 6 | 3 | |
| | | 19 世纪英国文学 | 1 | 6 | 3 | |
| | | 美国文学史 | 半 | 3 | 3 | |
| | | 近代欧美小说 | 1 | 6 | 3 | |
| | | 近代欧美戏剧 | 1 | 6 | 3 | |
| | | 小学纲要 | 1 | 5 | 3 | 中国文学系 |
| | | 诗学类课目 | 1 | 4—6 | 3 | 中国文学系 |
| | | 美学 | 半 | 2 | 2 | 哲学系 |
| | | 人生之形成 | 半 | 2 | 2 | 哲学系 |
| | | 艺术学 | 半 | 2 | 2 | 哲学系 |
| 三年级（共34学分） | 必修（17学分） | 欧洲文学史(上) | 1 | 5 | 3 | |
| | | 莎士比亚 | 1 | 4 | 3 | |
| | | 英文作文 C | 1 | 4 | 3 | |
| | | 法文或德文 C | 1 | 4 | 3 | 继续前两学年所学语种 |

续　表

| 年级 | 必选修 | 科　　目 | 年限 | 学分 | 周课时 | 备　　注 |
| --- | --- | --- | --- | --- | --- | --- |
| 三年级（共34学分） | 选修（17学分） | 17世纪英国文学 | 1 | 6 | 3 | |
| | | 18世纪英国文学 | 1 | 6 | 3 | |
| | | 欧美文学与民族思想 | 半 | 3 | 3 | |
| | | 近代欧美文学与社会思潮 | 1 | 6 | 3 | |
| | | 日文C | 1 | 4 | 3 | |
| | | 词类课目 | | 2—6 | 3 | 中国文学系 |
| | | 歌德之人生思想及其浮士德 | 半 | 2 | 3 | 哲学系 |
| | | 西洋文化史 | 1 | 6 | 3 | 史学系 |
| 四年级（共34学分） | 必修（16学分） | 欧洲文学史（下） | 1 | 5 | 3 | |
| | | 英国文字源流 | 半 | 3 | 3 | |
| | | 欧美文学批评 | 1 | 4 | 3 | |
| | | 英文作文D | 1 | 4 | 3 | |
| | 选修（18学分） | 拉丁文A | 1 | 6 | 3 | |
| | | 法文名著选 | 1 | 6 | 3 | |
| | | 德文名著选 | 1 | 6 | 3 | |
| | | 文艺复兴时代文学 | 1 | 6 | 3 | |
| | | 欧美文学专家研究 | 另定 | 另定 | 另定 | |
| | | 词曲史 | 1 | 4 | 3 | 中国文学系 |
| | | 英美现代哲学 | 半 | 3 | 3 | 哲学系 |
| | | 法国现代哲学 | 半 | 3 | 3 | 哲学系 |
| | | 德国现代哲学 | 半 | 3 | 3 | 哲学系 |

资料来源：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4页。

“中央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选课指导书”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课程设置完备。从必修课来看，四年中学生要研修20余门课程。这些课程涵盖了文学史与作品选读、写作、会话、中国文学史、演说与辩论、文学批评、第二外语、中国文化史等培养文学方面人才的必修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开设了当时不少大学外文系没有开设的会话课，这是很可取的。

第二，重视文学素养的养成。民国时期外文系以培养具有阅读与文学欣赏能力的文学人才为旨归。不仅从必修课中体现这一导向，而且在所开设的35门选修课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有关文学的课程占了一半。尽管当下对民国时期重视文学的课程设置颇有微词，但笔者认为，学习语言应该重视文学语言的学习，要想打好语言基础，唯一的途径是通过阅读学好文学语言。通过对大量的口述史料的研究，外语水平真正称得上是过硬的，都是经历了大量的文学阅读的训练。季羡林、杨宪益、朱生豪、吴宓、朱光潜、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吕叔湘、王佐良、曹禺、许国璋等外语界英才都是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严格的文学训练才成为众人景仰的文学大家的，这些人的外语学习经验有必要好好研究。

第三，选修课多，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根据选修课多的特色，学生可以在其他系选修契合本人志趣、爱好和特长的人文学科。语言跟文学的结合，便于学生在掌握语言文化知识的同时，扩大知识面，也有利于他们在某一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领域中获取某种专业知识。这种做法与单一语言教学体系相比，确实有利于培养他们对工作的适应能力。

以下是1930年国立中山大学英吉利语言文学系的主要课程介绍，同样说明了该校的课程设置也是以文学为主。

**英吉利语言文学系①**

英国文学史：研究英国文学之演进及特质。每周三小时。

戏剧文学：王尔德天才特出，萧伯纳尤长讽刺，今之所授，即取此二家。每周三小时。

米尔敦：选授米尔敦的小诗及 Paradise Lost. Paradise Regained. 并研究米尔敦的的心灵以冀了解其作品之特性。每周三小时。

文艺批评：研究文艺批评原理及英国重要批评家之作品。每周三小时。

现代戏剧：叙述戏剧之发展研究其现代及将来之趋向并讨论现代重要戏剧家之作品。每周三小时。

莎士比亚喜剧：以有系统的方法讨论莎士比亚喜剧尤注意其分类与时代。每周三小时。

诗学导论：叙述英国诗歌之起源及变迁，并引起学者对于诗歌之鉴赏与作诗之兴趣。每周三小时。

伊利沙白朝文学：研究莎士比亚以前及同时作家，论其与莎士比亚戏

① 资料来源：《国立中山大学文科概览》(1930)，中山大学校史文献馆藏。

剧异同之点。每周三小时。

莎士比亚悲剧：研究若邈与玫孄。每周三小时。

散文选：选授散文名著，就学术思想及修辞，研究其内容及构造。每周三小时。

作文及修辞：使学者能了解欣赏及创作略具艺术性之作品内容，解释作文要点及名人作品，每周或两周作文一次，交讲师修改，指明错点修辞及较复杂之语法，亦时有练习。每周三小时。

法文：介绍法国文艺、思想、文化。每周四小时。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是年10月，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并颁布《大学组织条例》，在江苏、浙江两省先后试行。此为我国大学教育制度之一大变更。次年，取消中华民国大学院，恢复教育部。自实施“壬戌学制”以来，全国公私立大学数量猛增，由1922年的19所，增加到1928年的74所。大学骤增，难免良莠不齐。为克服“壬戌学制”中的一些流弊，1929年7—8月，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大学规程》。两年后又颁布了《专科学校规程》。按上述法规，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大学、独立学院与专科学校三种，高等学校之规模日趋完备。抗战发生以后，日寇对我高等教育机构，摧残甚烈，滥施轰炸，且肆意杀戮。而广大师生员工，不甘屈辱，纷纷内迁。虽颠沛流离，而弦歌不绝。高等教育在连年战乱之中，数量仍不断增加。

1938年9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课程会议，研究制订文、理、法学院的共同必修科目表。出席文学院课程会议的人员有：顾毓秀、张道藩、罗家伦、朱光潜、楼光来、伍蠡甫、贺麟、陈源等人。文学院各系科目草案由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朱光潜(外国文学系)、冯友兰(哲学系)、朱希祖(历史学系)负责起草。陈源、张士一负责审查外国文学系的科目草案，最后由楼光来负责草案的修订工作。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文、理、法三分院共同必修课目表》，并由教育部颁发，要求各院校从该年新生入学时执行。下列共同必修课表从相关文献中摘录。

表6—5　　文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

(1938年9月20日颁行)

| 科目 | 规定学分 | 第一学年 | | 第二学年 | | 备注 |
|---|---|---|---|---|---|---|
| | | 上 | 下 | 上 | 下 | |
| 国文 | 6 | 3 | 3 | | | 每两周须作文一次 |

续 表

| 科　　目 | 规定学分 | 第一学年 | | 第二学年 | | 备　注 |
|---|---|---|---|---|---|---|
| | | 上 | 下 | 上 | 下 | |
| 外国文 | 6—8 | 3—4 | 3—4 | | | 每两周须作文一次 |
| 中国通史(注重文化之发展) | 6 | 3 | 3 | | | |
| 西洋通史(注重文化之发展) | 6 | | | 3 | 3 | |
| 伦理学 | 4 | 2 | 2 | | | |
| 哲学概论、科学概论 | 6 | | | 3 | 3 | 任选一种 |
| 数、理、化、生物、生理、地质 | 6—8 | 3—4 | 3—4 | | | 任选一种 |
| 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 | 12 | 3 | 3 | 3 | 3 | |
| 合　　计 | 52—56 | 17—19 | 17—19 | 9 | 9 | |

表 6—6　　外国文学系、英文组必修科目表

| 科　目 | 规定学分 | 第二学年 | | 第三学年 | | 第四学年 | | 备　注 |
|---|---|---|---|---|---|---|---|---|
| | | 上 | 下 | 上 | 下 | 上 | 下 | |
| 英文散文选读及作文 | 12 | 3 | 3 | 2 | 2 | 1 | 1 | 第二、三学年每两周作文一次，第四学年每周一次 |
| 英国文学史 | 6 | 3 | 3 | | | | | 略读各时期代表作品 |
| 英诗选读 | 6 | 3 | 3 | | | | | 以作品为据讲解诗歌体裁、格律及其沿革变迁 |
| 英语语音学 | 3 | 1.5 | 1.5 | | | | | 每周上课二小时，注重正音练习 |
| 小说选读 | 6 | | | 3 | 3 | | | 着重作品，兼及原理与历史 |
| 戏剧选读 | 4 | | | 2 | 2 | | | 着重作品，兼及原理与历史 |
| 分期英国文学研究(一)或(二) | 6 | | | 3 | 3 | | | 可选择某一世纪为一期，得随宜酌定，隔年轮开 |
| 欧洲名著选读(古代或近代) | 6 | | | | | 1.5 | 1.5 | 古代包括希腊史诗及新旧约等，近代包括但丁、塞万提斯、莫里哀、卢梭、歌德等作家，隔年轮开 |
| 英国文学名家选读 | 6 | | | | | 3 | 3 | 以全学年或一学期研究一人为原则，例如莎士比亚至少精选悲剧、喜剧 2—3 种 |

续表

| 科目 | 规定学分 | 第二学年 | | 第三学年 | | 第四学年 | | 备注 |
|---|---|---|---|---|---|---|---|---|
| | | 上 | 下 | 上 | 下 | 上 | 下 | |
| 翻译 | 3 | | | | | 1.5 | 1.5 | |
| 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 | 2—4 | | | | | | | |
| 总计 | 60—62 | 10.5 | 10.5 | 10 | 10 | 9.5<br>10.5 | 9.5<br>10.5 | |

附注：(一) 外国语文系以英文为主者适用此表，其以法文或德文为主，其必修课程须与英文组标准大致相同。

(二) 分期英国文学研究与欧洲名著选读两科，设置年级可随年对调。

(三) 隔年轮开之学科，学生已必修一科，可选修另一种。

表 6—7　外国语文系英语组选修科目表

| 科目 | 规定学分 | 设置学年及学期 | 备注 |
|---|---|---|---|
| 第二外国语 | 18 | 第二、三、四学年 | 选此科者连修三年 |
| 他系科目 1—2 种 | 6 | 第二、四学年 | |
| 分期英国文学研究(一)或(二) | 6 | 第二、四学年 | 两科均隔年轮开，已选一种为必修者另一种可选修 |
| 文学批评 | 4 | 第二、四学年 | 兼重历史与原理，须选读重要作品 |
| 欧洲名著选读(古代或近代) | 6 | 第二、四学年 | |
| 法、意、德、俄、美等国文学 | 4—6 | 第二、四学年 | |
| 现代英美文学 | 4—6 | 第二、四学年 | |
| 专家研究 | 4—6 | 第二、四学年 | 精读代表作品并研究其生平及思想作风渊源与影响等 |
| 比较文学 | 4 | 第二、四学年 | |
| 文学概论 | 3—4 | 第二、四学年 | |
| 辩论与演说 | 2 | 第二、四学年 | 着重实习 |
| 应用英文 | 3 | 第二、四学年 | 包含信件、公文、商用文、报章文等 |
| 英文教学法 | 3 | 第二、四学年 | |

附注：(一) 除第二外国语必自第二学年起始外，第二学年不设选修课。

(二) 第三、四学年每年所开选修科目须在三种以上，每种均可由三、四年级合选。

表 6—8　　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

| 科目 | 规定学分 | 第一学年 | | 第二学年 | | 备　注 |
|---|---|---|---|---|---|---|
| | | 上 | 下 | 上 | 下 | |
| 国　文 | 6 | 3 | 3 | | | 每两周须作文一次 |
| 外国文 | 6—8 | 3—4 | 3—4 | | | 每两周须作文一次 |
| 中国通史(注重文化之发展) | 6 | 3 | 3 | | | 必要时得在第二年开设 |
| (其他科目略) | | | | | | |
| 合计 | 45—54 | 16—19 | | 7—8 | | 7—8 |

资料来源：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3—246 页。

是时由教育部公布的《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其中规定：国文、外语为基本工具科目，举行严格考试；国文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和作通顺文章，外国语须能阅读所习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上述标准不得毕业。①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的高教事业遭到的极大破坏。抗战胜利以后，教育部对国立专科以上学校进行重新布局，以避免集中于少数大都市。在校舍修建，添购设备，员工安置等方面着力较多。但战后经济枯竭，又值内战，高等教育停滞不前。

1948 年 12 月，教育部又对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颁布了大学文、理、法、医、农、工、商、师范八类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和分系必修科目表等。在其《施行要点》的第八点中规定："各校得对一年级新生举行国文及第一外国文考试，其成绩优异确实超过大学一年级程度者，得予以分别免修，学分减半"。这是国民政府已临近崩溃前夕颁布的最后一个大学英文系科目表。

表 6—9　　修订文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1848 年)

| 科　目 | 规定学分 | 第一学年 | | 第二学年 | |
|---|---|---|---|---|---|
| | | 上 | 下 | 上 | 下 |
| 国　文 | 8 | 4 | 4 | | |
| 外国文 | 8 | 4 | 4 | | |

①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09 页。

续　表

| 科　　目 | 规定学分 | 第一学年 | | 第二学年 | |
|---|---|---|---|---|---|
| | | 上 | 下 | 上 | 下 |
| 中国通史 | 3—6 | 3 | 0—3 | | |
| 西洋通史(任选一种) | | | | | |
| (其他课程略) | | | | | |
| 合　计 | 38—46 | 14—15 | 11—15 | 8 | 5—8 |

与1938年9月颁布之《文学院共同必修科目》比较，国文从6学分增至8学分，外国文把6—8学分明确定为8学分；而总分则从52—56学分减至38—46学分。

**表6—10　　修订文学院外国文学系必修科目表(1948年)**

| 科　　目 | 规定学分 | 第一学年 | | 第二学年 | | 第三学年 | | 第四学年 | | 第五学年 | |
|---|---|---|---|---|---|---|---|---|---|---|---|
| | | 上 | 下 | 上 | 下 | 上 | 下 | 上 | 下 | 上 | 下 |
| 英文散文选 | 10 | | | 2 | 2 | 2 | 2 | 2 | | | |
| 英国语音学 | 4 | | | 2 | 2 | | | | | | |
| 英语文学史 | 6 | | | 3 | 3 | | | | | | |
| 小说选读 | 4 | | | 2 | 2 | | | | | | |
| 英语选读 | 6 | | | | | 3 | 3 | | | | |
| 西洋文学名著选读 | 10 | | | | | 3 | 3 | 2 | 2 | | |
| 戏剧选读 | | | | | | | | 2 | 2 | | |
| 中国文学史 | 6 | | | 3 | 3 | | | | | | |
| 西洋哲学史 | 6 | | | 3 | 3 | | | | | | |
| 共　计 | 56 | | | 15 | 15 | 8 | 8 | 6 | 4 | | |

注：英文散文选，包括翻译与写作

资料来源：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246页。

## 三、外语教学与管理

国人学习外语的历史极为悠久。早在约三千年前的周朝就有从事外事翻译的"象胥"一职。国人何时学习英文，无相关史料记载。根据Bob Adamson(2004)，早在17世纪初期，第一批说英语的人，即"大门口的外邦

人(strangers at the gate)"来到了中国华南地区。18世纪晚期,在广州和澳门出现了各种变体的"混杂英语"(pidgin English)。[①] 而说这些"混杂英语"的是那些主要靠在中外商人之间谋求营生的通事。在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1856—1860)之前,在中国正式的教育机构里接触英语的机会是极为罕见的。只有在少量的教会学校里才能接触到英语。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部分中国人才在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和福州船政学堂(1867)等第一批中国官办学堂以及教会学校里接受外国语和西方自然科学教育。从此以后,英语的重要性渐渐地为国人所熟知。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英语热,其中包括光绪皇帝带头学习英语,因为英语被洋务运动倡导者和改革者视为进行近代化努力所必不可少的工具。进入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扩张以及民国政府决策者的重视,英语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英语的官方地位由低向高转变,尽管在2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针对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英语教学受到冲击,总体而言英语的地位并不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执行亲美政策,半殖民地色彩浓厚,英语更是成为一枝独秀。

表6—11　中国的英语语言的历史角色和地位

| 时期 | | 角色和地位 | 英语语言教育 |
|---|---|---|---|
| 晚清时期 | 1759—1860 | 仅允许被轻视的买办(以混杂语的形式)说英语;被看作是"蛮夷"的语言;官方地位低 | 买办在私下里学习 |
| | 1861—1911 | 技术转移:英语作为接触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工具;有助于发展中国的外交;通向通商口岸获得赚钱职业的捷径;后来成为上海的时尚;官方地位中 | 出现在为促进科学知识转移而建立的各类学堂的课程表上;后来(1903年以后)出现在中等和高等学堂的课程表上 |
| 民国时期(1911—1949) | 1911—1923 | 知识革命:英语作为探寻西方哲学和其他思想的工具;国外学习的机会;官方地位高 | 出现在中等和高等学堂的课程表上 |
| | 1924—1949 | 英语作为与西方在外交、军事和知识方面进行互动的工具;来自担心有害的文化转移的民族主义学者和政治家的抵制;官方地位中/高 | 出现在中等和高等学堂的课程表上 |

资料来源:Bob Adamson. *China's English: 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

① Bob Adamson. *China's English: 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Series editor's preface.

1912年至1949年的近四十年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内忧外患、连年征战的环境中，生灵涂炭，得不到休养生息，遑论对教育的重视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极。政府重视不够，对教育的干涉少，倒是有利于教育的发展。过度管制反而会扼杀教育发展的因子，引起教育的大倒退。建国后教育发展的大起大落即是明显的例子，50年代前期开始的外语教育大折腾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更是应该记取的。虽然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存在一定问题，如黄健中所说，“过去之高等教育，重量不重质，崇文不崇实，设备空虚，程度低浅，遂使造求之人才，不能与国家社会之需要相适应”①，但是，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质量是历史上最好的。民国的医学教育、科技教育和人文社科教育中的许多领域一直到今天恐怕都难以超过。在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从晚清开始，一直到民国时代，英语教育更是得到畸形发展，英语是一门得天独厚之学科，成了一门“显学”。各类院校，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含教会大学)，对英语教学都非常重视。不仅开设英语专业课程，而且在非英语专业课程中普遍以英文授课，如成立于1905年，著名的私立学校复旦公学(1917年改为私立复旦大学)“非常重视外语教学。《复旦公学章程》中明文规定：除本国历史、地理等课，其他学科均采用外国课本，运用外语教学”。② 从英语这门学科而言，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大学普通外语(现在称公外或大学外语)，“教学质量一般并不低下”。③ 大学或学院大多设立外国语文学系(或英文系)。下列是拥有外国文学系(英文系)的国立、省立及私立(含教会立)的大学及独立学院，取材自《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截至1931年底。

表6—12　国立大学及学院的外(英)文系一览表

| 校　名 | 系　名 | 系主任 | 校　名 | 系　名 | 系主任 |
|---|---|---|---|---|---|
| 山东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梁实秋 | 中山大学 | 英吉利语言文学系 | 刘奇峰 |
| 中央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楼光来 | 四川大学 | 英文学系 | 刘　奎 |
| 北平大学 | 英文系 | 杨宗翰 | 北平师范大学 | 英文学系 | 罗　昌 |
| 北京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温源宁 | 武汉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陈　源 |
| 浙江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 清华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王文显 |
| 暨南大学 | 外国语言学系 | 洪　深 | | | |

① 黄健中：《十年之高等教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抗战十年前之中国》。

②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③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资料来源：吴相湘 刘绍唐主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民国六十年十月台北影印初版，第349—463页。

表6—13 省立大学及学院的外(英)文系一览表

| 校 名 | 系 名 | 系主任 | 校 名 | 系 名 | 系主任 |
|---|---|---|---|---|---|
| 山西大学 | 英文学系 | 朱启寰 | 东北大学 | 外国文学系英文组 | 凌达杨 |
| 安徽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朱 湘 | 河南大学 | 英文系 | 熊正瑾 |
| 河北女子师范学校 | 英文学系 | 李雯野 | | | |

资料来源：同上。

表6—14 私立大学及学院的外(英)文系一览表

| 校 名 | 系 名 | 系主任 | 校 名 | 系 名 | 系主任 |
|---|---|---|---|---|---|
| 大同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胡 卓 | 武昌中华大学 | 外国语文学系 | |
| 光华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柏兰莱 | 金陵大学 | 英文系 | 章文新 |
| 大夏大学 | 英文系 | 孙夫人 | 武昌华中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
| 南开大学 | 英文学系 | 陈 逵 | 厦门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罗文柏 |
| 辅仁大学 | 英文学系 | | 复旦大学 | 外国文学系 | 余楠秋 |
| 沪江大学 | 英文语言文学系 | | 岭南大学 | 西洋语言文学系 | 基来度 |
| 齐鲁大学 | 外国语文学系 | 罗天乐 | 燕京大学 | 英文学系 | 步多马(T. E. Breece) |
| 之江文理学院 | 英文学系 | 队克勋 | 民国学院 | 英国文学系 | 凌善安 |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 英文文学系 | 柯海丽 | 中国学院 | 西洋文学系 | |
| 持志学院 | 英文系 | 丁文彪 | 福建协和学院 | 外国文学系 | 沙善德 |
| 中国公学 | 外国语文系 | 谢子尧 | | | |

资料来源：同上。

民国时期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英语教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培养出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为新中国的英语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厚实的根基。不管是国立(省立)大学，还是私立(含教会立)大学，教学条件和教学方法各有千秋，但都具有共性的特征，值得传承和发扬光大。民国时期外语教学与管理方面要讨论的内容很多，以下着重讨论外语教学特色。

第一，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不管是专业课教学，还是非专业课教学，

基本上都用全英文授课，使学生处在全盘英语化的氛围中，这在私立大学（含教会大学）及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的表现尤为明显。季羡林在《悼许国璋先生》一文中说，他在清华大学"虽云专修德语，实际上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来进行"。[①] 1936 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我国著名英语教育家、语言学家许国璋（1915—1994）教授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学英语时，哪有这么合适的课本。上数学课，老师用英语讲，课本是英语的。上化学课，老师又用英语讲，课本又是英语的。一开始，也不懂。可是也怪，听着听着就懂了。化学也学了，英语也会了。"[②]把英文作为工具，通过英文学习专业课程，学习专业课程反过来促进英语的进一步提高。教师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无异于形成了有利于外语学习的环境。而作为个体的人，是受环境影响的。环境有时对人的语言发展会起正效应，促进语言能力的发展。有时环境则会起负效应的作用，限制人的语言能力的发展。"教师在某种程度在扮演一个环境学家，虽不能扩大学生的智力潜力，却能帮助他们开发潜力。"[③]

第二，重视语言基本功的训练。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大学，无一例外地十分重视基本功训练，尤其是注重书面阅读。但是，学校的课程表上基本找不到当今大学课程表中的"写作"、"阅读"、"听力"、"口语"等技能训练的课程。如国立清华大学开的课程，除了大量的文学课外，仅开了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大三英文、大四英文课（非英语专业只有大一英文和大二英文），最多也是在 1937 年《文学院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见到水天同开的实用英语课《英语捷径》。清华外文系的教学方法是以知识作为学习的目标和动力，以语言基本功的训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胡明扬所说的"大剂量的阅读"，[④]以促进语言技巧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如上文论课时，清华外文系要求"凡文学批评上重要之典籍，均使学生诵读，而于教室中讨论之"。[⑤] 而且，从语言学习规律来说，"大剂量的阅读"本身就是训练学生听、说、写、译基本功的前提条件。道理很简单，外语学习的根本问题就是词汇问题。不进行"大剂量的阅读"，词汇的瓶颈无法突破，听、说、写、译的技能

① 《季羡林全集》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7 页。
② 刘润清：《许国璋教授与英语教学》，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③ 朱纯：《外语教育心理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6 页。
④ 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3 页。
⑤ 《清华周刊·文学院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第 315 页。

就无从谈起,[①]写和译这两项最能体现外语能力的实质性技能更是如水中捞月一般。民国时期,各个类型的大学重视阅读训练已成常态。例如,"燕京大学毕业生刘荣恩和南开大学毕业的曹鸿昭是私立南开大学大一英文课程的任课老师。他们教学认真而严谨,每周要求学生阅读英语材料,如世界书局出版的《十九世纪法国短篇小说选》(英译本)和《十九世纪俄国短篇小说选》(英译本),并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故事情节梗概或对人物性格分析的作文。这种阅读与写作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妥善处理了英语教学中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平衡关系"。再如,"清华大学外文系倡导学生阅读大量的文学经典著作。通常在上某一门课程的第一堂课程时,教师就已经帮学生制定与该门课程相关的经典作品阅读计划,提供经典作品阅读书目。吴宓在开设文学与人生课程的时候,提供的中英文书目达150种"。[②]

听、说、读、写、译五项技能中,"听"、"读"属于输入技能,"说"、"写"、"译"属于输出技能,即外语表达(production of speech)技能。外语表达技能是外语教学的终极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进行大量的"可理解的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输入越多,表达越熟练。[③] 民国时期既重视输入("大剂量的阅读"),也重视输出(大量的写作和翻译)。1935年南开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柳无忌带领全系师生创办《人生与文学》月刊。作者大多为南开英文系师生,常常刊登英文系的学生翻译、文学研究、评论

---

① 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谈"大剂量的阅读"的重要性:1985年我到美国三个月,碰到不少国内出去的留学生。英语系毕业的,生活口语没太大问题,听英语课也没问题,可是听哲学课、历史课就有困难,因为在国内学的词汇不够用……美国大学一星期给研究生指定的参考书就有两三百页,根本读不了,甚至读不懂,读不下去,而在国内下了大工夫的口语课一点也帮不了他的忙。……我在加利福尼亚碰到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已经两年了,听专业课还有困难,没办法,只得带个录音机去听课,回到宿舍再反复听。至于要他们写,那就更没门了。可是三四十年代正规大学的非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一般都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英文参考书,只是口语不好,发音不标准,但是他们出国留学,一开始口头交际有困难,几个月以后就什么都会说,尽管发音改不了,不过外国人能听懂就可以了。听课更没有问题,他们一般词汇量比较大,所以听课没有困难……把学习重点放在书面语上符合我们这样的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人学习外语的目的。学习书面语不需要特殊的语言环境,容易见效。朱生豪是中文系毕业生。应该承认那个时代大学英语公共课的教学质量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这当然是以牺牲口语教学为代价的,不过这比以牺牲书面语教学为代价的现在这种教学模式恐怕更符合中国人学外语的目的。至于那个年代英语系毕业生的英语水平那就更不用说了。(胡明扬:《外语学习和教学往事谈》,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② 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第106页。

③ Vivian Cook.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 p. 57.

以及文学创作的佳作，使一些有志于英语文学研究的人才初露其文学评论和欣赏的才能。柳无忌还出任《益世报·文学周刊》主编，在他的鼓励下，英文系学生的译作及散文在该杂志上发表，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由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部作品：李田意著的《哈代评传》，曹鸿昭译的《维纳斯与亚当尼》（莎士比亚的长篇叙事诗）以及巩思文译的《无穷尽的日子》（美国戏剧家奥尼尔撰）。[①] 民国时期的外语教学，正是较好地处理好输入与输出的关系，一般毕业生的外语水平都相当高。而且那个时代一般不太讲教学法，不像后来讲这个法那个法的。教师水平有高有低、教学方法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重视阅读和写作。这是那一代人留给我们的精神价值。“学习任何语言不能以口语或会话为主，而应该有一个文字基础，在这基础上能看懂各种以文字表达的信息。有了坚实的阅读基础，在有利的语言环境中，听说是可以迎刃而解的。”[②]再说，“书面阅读材料的静止状态则能使读者通过反复阅读来锁定需要的目标，并且在必要时还可从容地求助于词典”，[③]这更有利于语言材料的吸收。

第三，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民国时期，非英语专业使用原版英文教材还是比较普遍的。使用原版外文教材，其好处不言而喻：一是借助教师上课学习专业知识和术语，英语语言成为一种工具。二是通过专业学习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英语语言水平，从而实现英语与专业的互动。当然，用原版教材对教师和学生的外语水平要求比较高。但是，如果学生努力刻苦，能够突破词汇瓶颈的话，使用原版教材的正效应是不容置疑的。著名翻译家何兆

---

① 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3 页。

② 李观仪：《我的英语学习和教学》，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 页。民国时期重视阅读和写作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建国后，迄至 60 年代初期。北京大学教授陶洁回忆：“尽管我们没有专门的听说训练，但我记得，三四年级时，马寅初校长接待外宾，偶尔让学生参加，去的人也都能跟外宾交谈，并不都是‘哑巴’或‘聋子’。……没有英语广播或英语电影，更没有跟英美人士日常聊天谈问题的可能性，我们拥有的唯一条件就是大量阅读和写作。北大图书馆的很多英语文学作品，包括原著和简写本，是我们阅读材料的大宝库。作文课和自己的英语日记是运用英语的最好机会。60 年代初，在日内瓦会议上给周总理当过翻译的周珏良先生来系里给大家讲他的翻译经历时，特别强调要通过文学学语言。……70 年代末，我有机会去美国学习，发现我的听说能力并不差。大概有了读写的底子，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口语是可以逼出来的。同样，这读写的底子帮助我在 70 年代末把两篇用美国南方黑人英语写的小说翻译成中文。我的经验说明，在外语学习中，读和写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是最重要的支柱，是掌握外语的关键。”（陶洁：《学习英语的点滴回忆》，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7—178 页。）

③ 董亚芬：《我国英语教学应始终以读写为本》，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 页。

武从上大学时用的基本上都是英文原版教材。以下是他在《上学记》中的回忆片段：

> 上了初中，我们用的一本英文教科书是师大附中编的《中学英文选》，语言非常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多我都能背诵，比如 Franklin 的 *Poor Richard's Almanac* 中的格言，还有 Washington Irving 的 *Rip van Winkle*。到了大学，理科不用说了，百分之百都是美国教本，法科也是，比如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统统都是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教本，至于文科，那要看学什么专业，比如中国史，只能用中文的，可是要学世界史，包括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就都是美国的本子了。再如，学中国古典哲学的得有很好的古文基础，可是学西方哲学的，比如康德、黑格尔的，只要能看英文本就行了。①

第四，师资质量稳定。民国时期可称得上是外语界群星璀璨的时代。许多老师都具有国内名牌高校（包括教会学校）和国外接受教育的背景。30 年代初，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即已阐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办学至理。在他的任内（1931—1948）积极延聘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并造就了大批人才，其中不乏外语界英才。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前的英语界精英基本上都集中于此了。这个时代曾在清华、联大外文系执教的英文名家就有吴宓、陈福田、叶公超、陈嘉、钱钟书、潘家洵、柳无忌、袁家骅、陈嘉、杨周翰、赵诏熊、胡毅、卞之琳、王佐良、李赋宁、温德（Robert Winter）、燕卜荪（William Empson）等人。这些人的水平大都很高。何兆武回忆说：“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满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钱钟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候似乎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②

除此之外，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以及抗战

---

①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26—27 页。

②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119 页。

前与结束后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名校也集中了一批英语界名家，如梅光迪、楼光来、张士一、范存忠、郭斌龢、张君川、谢文通、佘坤珊、梁实秋、俞大絪、朱光潜、赵诏熊、周煦良等。当时大学还有个有利条件，即教授可以自由流动，这样各校均有机会聘请到这些名师。以著名语言学家章振邦在 1940 年代初期就读的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来说，“当时教授阵容整齐，教学要求严格，淘汰率高。我记得当时我班入学时约 20 人，毕业时只有 12 人。任教的老师中费监照、戴镏龄、钱歌川教散文；方重、谢文炳教英国文学史；朱光潜教英诗和翻译；陈源教英国小说；袁昌英、罗念荪教近代戏剧和希腊戏剧；方重、孙家琇教莎士比亚等等”。[①] 再以中央大学为例，“以外文系英文教授而论，其实力之雄厚，实凌驾联大而上之。他们在英美读书的学校，不是哈佛（楼光来、范存忠、孙晋三、丁乃通），就是耶鲁（柳无忌、陈嘉），有牛津（俞大缜、俞大絪、杨宪益），也有剑桥（初大告）。”[②]这样的教师群体可谓一时之选。而且，他们负责，敬业，忘情于教学中。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的语言学家赵世开回忆说，“到了大学以后，吴宓先生教过我英诗。他教英诗节律 iambics 时，用手杖击地显示节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戴镏龄教过我散文。他讲课时闭上眼睛沉醉在散文的意境中的情景也让我终身难忘。”[③]

民国时期的外籍教师水平高、很敬业。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是西南联大最杰出的教授之一。赵毅衡在《燕卜荪：与中国共命运》中记述：“三年级必修的莎士比亚课连书本都没有，燕卜荪上课，凭记忆在黑板上默写了整出《麦克白》，一时传为佳话。据巫宁坤回忆，是整部《哈姆雷特》。据赵瑞蕻先生回忆，燕卜荪背出来的是‘整段整段《奥赛罗》’，英诗课还得背出乔叟和斯宾塞。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长沙临大时期，燕卜荪上课，的确只能凭记忆。赵瑞蕻先生说战事倥偬之中，上燕卜荪的课，让人恍然觉得如身临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学子只能靠儒生整部背诵经书。”[④]

民国时期师资的另一个特点是，老师除了上课水平高，自身就是作家、诗人、翻译家。南开大学的罗皑岚是一位成名很早、中学时代就发表小说

---

① 章振邦：《也谈我国外语教改问题》，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 页。

② 柳无忌：《梁宗岱在南开》，《柳无忌散文选——古稀依旧》，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24 页。

③ 赵世开：《学习外语的漫长道路》，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1 页。

④ 赵毅衡：《燕卜荪：与中国共命运》，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 70 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3—124 页。

的青年作家。他是柳无忌在清华的同学，也是清华文学社最有成就的成员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来南开任教，讲授“英美小说史”和“英美散文选读”——由作家讲小说、散文，用学生的话来说：“真是太棒了！”当时他的长篇小说《苦果》正在天津《大公报》连载，因而闻名华北文坛。法国文学家、诗人梁宗岱讲授“西洋诗歌”——由诗人讲诗歌，已使得学生们十分兴奋，何况梁宗岱还曾与清华教授罗念生合编过《大公报》的“诗刊”呢。[①] 初大告译有《道德经》，及第一部唐宋词选的英文本。[②] 杨宪益、梁实秋、朱光潜、吕叔湘、陈源、钱钟书等人的贡献更不用说了。

## 第二节 外国语专门学校

外国语专门学校[③]历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兴办这类学校的高潮。第一次是 19 世纪 60—90 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洋务运动的兴起，北京、上海、广州、湖北等地相继开办了同文馆，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序幕。第二个高潮是在民国初期，在湖北、奉天、四川等地兴办了一批外国语专门学校。第三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50—60 年代，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大连、西安等地相继成立了一批外国语学院。从这三个时期的办学情况看，每当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社会急需外语专门人才时，外国语专门学校也就应运而生。例如，两次鸦片战争中，“当清廷在危亡时刻要与‘洋人’谈判，连一个懂外语的中国译员都找不出来，这只能是加重了丧权辱国的处境”，[④]清政府被迫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外国语学堂，以培养“晓畅翻译，通澈中外事理”的“译人”。[⑤]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其他各类大学的兴办，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相对缓和时，外语学校或停办或归并，或发展成综合性大学。1912 年元月，中华

---

① 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1 页。

② 柳无忌：《梁宗岱在南开》，《柳无忌散文选——古稀依旧》，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24 页。

③ 本节主要根据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第 211—215 页的相关内容加以补充修改而成。

④ 李亚舒：《序言》，载张美平：《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⑤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载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光绪辛丑，上海书局石印，第 271 页。

民国成立后，取消了清末学制中高等学堂的建制，改为专门学校。同年 10 月 22 日，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确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①《专门学校令》将专门学校分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十类专门学校。是年 12 月 15 日教育部公布《外国语专门学校规程》，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宗旨：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养成外国语专门人才为宗旨。

二、修业年限：预科一年，本科三年，研究科一年以上。

三、语种：所开语种分为五科：（一）英语学科，（二）法语学科，（三）德语学科，（四）俄语学科，（五）日本语学科。

四、科目（课程）：需学习十门科目，其中英语学科之科目：（一）英语，（二）国文，（三）言语学，（四）历史，（五）地理，（六）教育学，（七）法学通论，（八）经济学，（九）国际法，（十）世界语。

五、各学科由校长酌量设置，呈报教育总长认可。各科目授业时间，由校长订定，呈报教育总长。

六、外国语专门学校之学科，除前列五科外，得应时势之需要，增设他种语学科。

七、凡公立、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除遵照专门学校令及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外，概依本规程办理。②

《专门学校令》公布以后，各省纷纷成立各类（或改校名为）专门学校，但以后逐年减少。特别是 1922 年新的大学学制颁布后，不少专门学校改办成大学。1913 年至 1925 年间，全国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开设情况如下：

表 6—15　　外国语专门学校概况表

| 校名 | 现有生数 | 毕业生数 | 开办年月 | 说明 |
| --- | --- | --- | --- | --- |
| 湖北外国语专门学校 | 235 | 83 | 1912 年 8 月③ | 曾设英、德、法、俄、日语。 |

① 《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十号，第 33 页。

② 《教育新法令》第 39—43 页。载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71 页。

③ 李良佑等人的《中国英语教学史》记载的时间是 1914 年 11 月。根据《1914 年 8 月 3 日教育部咨湖北巡按使省立外国语学校请改为外国语专门学校，本年八月升入本科应准照办》云：“准咨陈开据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饶汉秘详称，窃属校于民国元年八月开办，以养成外国语学人才为本旨，故所定课程夹在中等、专门之间。”作者采用 1912 年 8 月之说。（参见《教育公报・公牍》第四册，载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第 758 页。）

续 表

| 校 名 | 现有生数 | 毕业生数 | 开办年月 | 说 明 |
| --- | --- | --- | --- | --- |
| 奉天外国语专门学校 | 129 | | 1916年4月 | 原为前清奉天法政学堂，1912年改为法政专门学校（1915年立案并被正式认可）。1916年法政学校停办，改称外国语专门学校。 |
| 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 | 150 | | 1912年3月 | 曾设英、德、法语。 |
| 福建外国语专门学校 | | | 1920年 | 曾设英、德、法、俄、日语、研究科，1925年停办。 |
| 外交部俄文专修馆 | 154 | 69 | 1912年 | 初为东省铁路俄文学堂，开办于1899年，1912年学校改属外交部，用现名。1921年改为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10月并入北平大学，易名为俄文法政学院。1932年改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

资料来源：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0页。

关于各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外语教学情况，已无完整之资料可稽查。据1916年出版的《教育公报》，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1915年的学生数如下：

表6—16 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学生数(1915)

| 科 别 | 班 次 | 学 生 |
| --- | --- | --- |
| 英文本科 | 1 | 10 |
| 德文本科 | 1 | 14 |
| 法文本科 | 1 | 18 |
| 英文预科 | 1 | 41 |

资料来源：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根据同一材料，湖北外国语专门学校该年共有德、英学生合计235名。

1920年，教育部核准开办福建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养成外国语专门人才为宗旨”。入学资格为中学毕业生，学制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设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五个学科。课程安排如下：

表 6—17　　预科课程表

| 科目 | 外文 | 国文 | 史地 | 理化 | 数学 | 博物 |
|---|---|---|---|---|---|---|
| 时数 | 14 | 6 | 2 | 3 | 6 | 2 |

备考：除国文外均以原文为主。

资料来源：同上。

表 6—18　　本科课程表

| 科目 | | 外文 | 国文 | 言语学 | 历史 | 地理 | 教育学 | 法学通论 | 经济法 | 国际法 | 世界语 | 总计 |
|---|---|---|---|---|---|---|---|---|---|---|---|---|
| 时数 | 一年级 | 24 | 4 | | 2 | 2 | | | | | | 32 |
| | 二年级 | 18 | 4 | 1 | 2 | 2 | | 2 | 2 | | 3 | 34 |
| | 三年级 | 19 | 4 | 2 | | | 3 | | | 3 | 3 | 34 |

备考：言语学以下各科均以原文为主。

资料来源：同上，第 214 页。

清末民初，教会学校在中国已成一枝独秀。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在教学质量方面，特别是英语教学质量极其过硬，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是其中的标杆，渴望学习英语的学子想方设法往教会学校挤。这时候的国内公私立学校的英语教学质量也有很大提升，特别是清华学校（1928 年后称"清华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等办学水平很高。因此，至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随着大学、中等外语教学的加强，外国语专门学校已趋"萧条"，不被人们注意。根据 1923 年出版的《专门以上学校指南》一书介绍，当时三所公立外国语学校的情况如下：

1. 福建外国语专门学校

专业开设：预科、本科：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本语；研究科。

课程设置（本科）：英语（或法、德、俄、日语）、国文、言语学、历史、法学通论、经济学、国际法、世界语。

2. 湖北外国语专门学校

专业开设：预科、正科(英、法、德、俄、日任习其一)。

课程设置(本科)：外国语、国文、言语学、地理(外国)、历史(外国)教育学、法学通论、经济学、国际法、世界语。

3. 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

专业开设：英、德、法语，均设预、本科。

课程设置(本科)：[英语科]英语、国文、言语学、教育学、修辞学、国际法、古典学、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英文学史、第二外国语、世界语。

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还创办了两所外国语专科学校：

1. 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1940年中国基本英语学会[①]与省教育厅合作，在昆明创办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该校原系云南省为培养初中英语教师而设，招收高中毕业生，修业年限三年，水天同(1909—1988)[②]任校长兼教员，吴富恒任教务长。从一些史料来看，该校的质量相当不错的。1948年仲春，英国驻华大使斯蒂文森(Stevenson)由南京来昆看望，他看望的日程第一项就是观察英专。他在一年级大教室对英专师生发表演讲，其中援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茅屋出公卿"赞誉英专。在其存在九年的时间里(1939—1948)，该校"为云南省培养了360多名合格的中学英语教师，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云南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外语教育家"。[③] 而且，其中一些人响应政府号召，从军成了翻译，这些翻译人员大多参加了著名的驼峰航线运输，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水天同在《我与外语学习》一文中有所介绍：

> 在昆明，中国基本英语学会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了一所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办学的目的是为云南省培养中学英语师资。英专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三年，由我担任校长。我的后台是我的老师，先是吴可读，后是温德。我在这两位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又得到了许多中外友人的帮助，如闻一多、凌达杨等。虽然在那些年月办学确实艰

---

① 即"中国正字学会"，是由清华大学教授瑞恰慈(英籍)、吴可读(英籍)等创建的，会员有温德(美籍)、翟孟生(英籍)、水天同、赵诏熊、吴富恒等，宗旨是商榷和推广基础英语。

② 水天同，兰州市人，著名教育家、学者、知名莎学专家和翻译学家，精通英、法、德、日、意大利、拉丁等语言。1923年进清华学堂读书，1929年秋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9年起任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校长。解放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他著(译)作有：《培根论说文集》、《英语语法要点》、《王子出游记》、《英语简史》、《汉英词典》等，其中《培根论说文集》汉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再版再印近二十次之多，并被选入了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中，是英汉翻译的典范之作。

③ 张正东：《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难，但终于把英专办下来了。到1948年校舍也有了，学生也多了，省方也终于把我校经费列入预算。学校可谓前途光明。然而1948年的云南，阶级斗争尖锐化了，我的思乡之念与马齿日增，终于在那年秋季辞职返故乡。①

2. 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该校于1942年3月开始筹办，校址原定在云南大理，后因缅甸境内战事告急，东迁至昆明附近的呈贡，10月正式开学，校长为王文萱。1945年7月迁至重庆，以新开市前南洋研究所为临时校址。是年冬，迁至南京，1946年11月在南京紫竹林寺开学。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停办。该校曾设八个东方语科：印度语科（主要是印地语）、缅甸语科、越南语科、暹罗语科、马来语科、韩语科、菲律宾语科（主要是泰加洛语）、阿拉伯语科。学制三年。

该校与一般大学的外文系或英文系不同，其课程设置与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结合较紧。共同必修课有：东方语文（八种之中只学一种，计34学分）、第二外国语（英、法、日、俄、西班牙、荷兰等语种中任选一种）、中国通史（4学分）、中国地理（4学分）、政治学（6学分）、社会学（4学分）、民族学（4学分）、经济学（4学分）、法学通论（4学分）、语音学（4学分）、公民（2学分）、体育（12学分）、国文（4学分）、印度地理（4学分）、印度史（6学分）、南洋地理（6学分）、东洋史（6学分）、中南半岛史（4学分）、东洋地理（4学分）、回教诸地理（4学分）、回教史（4学分）、比较语音学及比较语法学。②

除共同必修课外，高年级还分成侨务、新闻、教育和国际贸易四个组，学习专修课程。各组课程如下：

表6—19　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专修课程表

| 新闻组 | | 国际贸易组 | | 侨务组 | | 教育组 | |
|---|---|---|---|---|---|---|---|
| 课程 | 学分 | 课程 | 学分 | 课程 | 学分 | 课程 | 学分 |
| 新闻编辑 | 4 | 会计学 | 6 | 华侨问题概况 | 2 | 教育概论 | 6 |
| 新闻学概论 | 6 | 统计学 | 6 | 西人东渐史 | 4 | 哲学概论 | 4 |
| 新闻采访 | 4 | 货币银行学 | 4 | 国际形势 | 4 | 教育史 | 4 |
| 国际形势 | 4 | 商法 | 4 | 国际关系 | 2 | 历史散文诗词选读 | 4 |

① 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②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续　表

| 新闻组 | | 国际贸易组 | | 侨务组 | | 教育组 | |
|---|---|---|---|---|---|---|---|
| 课程 | 学分 | 课程 | 学分 | 课程 | 学分 | 课程 | 学分 |
| 社论作法 | 4 | 工商管理学 | 4 | 中国外交史 | 4 | 各种文体研究及写作 | 4 |
| 新闻文学 | 4 | 国际贸易学 | 3 | 华侨移殖史 | 4 | 小学教育 | 3 |
| 报业管理 | 4 | 国际汇兑 | 3 | 各国移民政策 | 4 | 中学教育 | 3 |
| 社会调查 | 2 | 亚洲各国经济概况 | 4 | 亚洲中国政治史 | 2 | 教育行政 | 4 |
| 国际公法 | 3 | | | 西洋外交史 | 4 | 华侨教育 | 2 |
| 国际私法 | 3 | 经济地理 | 4 | 社会调查 | 2 | 专题研究 | |
| 专题研究 | | 专题研究 | | 侨务行政 | 2 | | |
| | | | | 国际公法 | 3 | | |
| | | | | 国际私法 | 3 | | |
| | | | | 专题研究 | | | |

资料来源：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6 页。

总之，在民国时期，跟教会大学和国内的公、私立大学的外文系（英文系）比较起来，无论是在教学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以及社会的认可度等方面，这些外国语专门学校都不可能与前者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当然，这些专门学校在外语教学方面的探索是很有价值的，如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在高年级将课程分成侨务、新闻等四个组的做法，是按照社会或国家需求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近六十年后，中国高校外语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所谓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其做法无非是专业技能课，加上一些必修或选修的专业知识课和选修的相关专业知识课。[①] 从这一点看，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外语教学改革的探索极其可贵。可以说，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① 参见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 页。

## 第三节　自由独立，兼容并蓄——国立北京大学

### 一、沿革述略

鸦片战争后，国人鉴于外侮日甚，群议兴学，同治元年(1862)设同文馆于京师，是为京师有学堂之始。而大学之创设，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甲午战争中，中国再次惨败，朝野竞言自强。次年，康有为创设强学会，讲学而外，兼以议政，不久被劾封禁，于是改为官书局，命孙家鼐(1827—1909)为督办，即管学大臣。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主张变法图强，兴办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33—1907)以"时事多艰，需才孔亟"为由，请设"京师大学"。[①] 光绪帝听取了总理衙门的意见，即命孙家鼐筹划在京师设立新式大学堂事宜。[②]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由军机处及总理衙门上奏《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呈请开办并奏准。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进京，学生星散，校舍封闭，藏书丧失殆尽，大学堂因此而停顿。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奏拨户部存放华俄道胜银行共五百万两之利息三十五万两充作经费。[③] 翌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暂时不设专门，"先设高等学堂，为大学之预备"，其课程分政艺二科。于预备科外设速成科，分仕学及师范两馆，"其京外各学堂亦皆直隶于大学"。[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拟订《奏定大学堂章程》，于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令高等学堂毕业者升入，并设通儒院，令大学毕业者升入。大学堂教授各科学之理法，注重实用。通儒院研究各科之精义，注重著述。各分科大学除法政及医科外，学习年限三年，通儒院为五年。[⑤]

宣统元年(1909)改预科为京师高等学堂，重订分科制。京师大学堂改为经科、文科等七科共计 14 门(系)。其中，文科分中文和外国文二门。

---

①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载陈学洵：《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5 页。

② 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8 页。

③ 罗惇融：《京师大学堂成立记》，载陈学洵：《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56 页。

④ 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3 页。

⑤ 参见[清]张百熙撰：《张百熙集》，岳麓书社 2008 年版，第 195—196 页。

民国元年(1912),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设文、理、法、商、医、农、共七科共三十九门,修业年限三年。预科分三部,年限亦为三年。严复(1854—1921)"以总监督继任校长"。1916年12月,蔡元培(1868—1940)担任校长。1918年,设立国文、英文、哲学等14个学系。1931年将文学院的英文、法文、德文和东方文四学系合并为外国语言文学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北京大学迁往长沙,次年春再迁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8月,西南联大解散,该校复员北平,恢复北京大学。

## 二、外语教学概览

北京大学英语教育的源头可以溯及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这是我国历史最长的英语教育基地,但它的发展是和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有直接的关系。蔡元培是"一位曾获得旧科举制的最高学位,同时也受过一些西方教育的学者",①于1917年到北大就职视事,也就是"从1917年开始,北大的英语学科有了新的局面"。②

### (一)师资队伍建设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两大举措使英语教学及学科建设受益匪浅:一是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从而使北大英语系形成了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二是广泛搜罗海内外高学才俊,为北大英语学科建设夯下扎实的基础。蔡元培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③因此,蔡元培在聘任教员方面,不拘一格,网络众家,以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为用人标准,不拘思想、派别,不问年龄、资格。蔡元培"把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卓越的年轻学者吸收到他的大学里,其中有当时就很著名的胡适博士"。④ 蔡氏认为,胡适"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因此,胡适回国后,即被请到北大任教授。他一方面与沈尹默、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

---

① [美]约翰·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②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③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④ [美]约翰·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一方面整理英文系”。1917年，即胡适进北大的第一年，就担任了英国文学门的四门主干课程：英文课、英文修辞学、英诗和欧洲文学名著。1918年3月，胡适接任英文教授会主任一职。同年9月被任命为北大英文学研究所主任。1922年3月，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胡适对北大英语学科和师资队伍的建设功不可没，蔡元培说“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①]例如，林语堂在国外攻读博士时就得到胡适的帮助，学成后回北大任教。梁实秋到北大任研究所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也是胡适一手操办的。梁氏讲莎士比亚，逐段进行，参照各家注释，颇能深入浅出。除此之外，蔡元培用人上不拘一格，能够打破门户之见，还敢于启用被吴作人称为“北大顶古怪的人物”[②]、“学术上有地位而政治上反动的人物，……当时还有拥护清室的辜鸿铭”。[③] 辜鸿铭(1857—1928)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辜氏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④] 除了林语堂、梁实秋、辜鸿铭等人外，北大其他的英语教员也都是顶级人物，如1925年起在北大任教，后担任西语系主任的温源宁(1899—1984)，毕业于剑桥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史略”、“十九世纪文学”等课程。他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名教授，以英语和写作见长”，[⑤]被著名学者、散文家张中行称为“是位英国化了的‘洋绅士’”。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讲欧洲名著，从史诗、悲

①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②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

③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载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④ 辜鸿铭，名汤生，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是中国近现代一位博通汉学，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号称“清末怪杰”。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等9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人倡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清史稿》云：“辜汤生，字鸿铭，同安人，幼学于英国，为博士。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国学术，穷四子、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之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张之洞、周馥奇其才，历委办议约、濬浦等事。旋为外务部员外郎，晋郎中，擢左丞。”(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49页。)

⑤ 张晓唯：《旧时的大学和学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剧一路讲到歌德的《浮士德》。他不是空讲，而是讲作品，用的是英译本，用英语讲授。他能在众说纷纭的混乱现象中，抓得住最本质的东西。他善与人交往，其寓所就是一个文学沙龙。教戏剧的是潘家洵(1896—1989)，尽管没有留过学，但讲英语娓娓动听。他翻译过易卜生的作品，也翻译过王尔德(Oscar Wilde)的剧本 *Lady Windermere's Fan*(少奶奶的扇子)，在讲授这部作品时，能把人物分析得活灵活现，使学生体会到这个剧本的感人至深。当时胡适十分提倡传记文学，英语系教该课的是蒯淑萍。她在牛津大学学的是历史，英语讲得十分流利。她的讲课不局限这些作家，而是旁及英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使学生获得大量的背景知识，扩充了视野。[①] 这批中西贯通的师资队伍，是北京大学培养出高素质的国家建设人才的根本保证。

（二）课程设置

1915 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的旧教育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教育部也无法制定统一的课程和大纲，各校多自定课程(以后也是如此)。蔡元培掌校后，大力扩充文、理两科，在文科中增设中国史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各门。以下是 1918 年的英国文学门的课程设置。

表 6—20　民国七年(1918)北京大学英国文学门的课程、学时数及教员姓名

| 学年 | 科　目 | 每周时间 | 担任教员 |
|---|---|---|---|
| 第一学年 | 英散文 | 3 | 杨子余 |
| | 英诗 | 1 | 胡适之 |
| | 戏曲 | 2 | 陶孟和 |
| | 英国史 | 3 | 倭　纳 |
| | 中国文学史大纲 | 3 | 朱逖先 |
| | 英文修词学及作文 | 3 | |
| | 外国语 | 6 | |
| | 共计 | 21 | |

①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0—131 页。

续　表

| 学年 | 科　目 | 每周时间 | 担任教员 |
|---|---|---|---|
| 第二学年 | 英散文 | 3 | 威尔逊 |
| | 英诗 | 3 | 辜汤生 |
| | 戏曲 | 3 | 威尔逊 |
| | 英国史（续前学年） | 3 | 王启常 |
| | 英文修词学及作文 | 3 | 扬子余 |
| | 外国语 | 6 | |
| | 共计 | 21 | |
| 第三学年 | 英散文 | 3 | 威尔逊 |
| | 英诗 | 3 | 辜汤生 |
| | 戏曲 | 3 | 威尔逊 |
| | 英国史（续前学年） | 3 | 王启常（二年级合班） |
| | 欧洲文学史（英译史） | 3 | 胡适之 |
| | 拉丁文 | 6 | 梅里慈 |
| | 共计 | 21 | |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分册，民国七年一月五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影印。

从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这时的课程特点是文学课程具有压倒性地位，是完全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第二个特点是没有安排选修课，全是必修课。课程设置的范围相当狭窄，除了语言文学领域里的相关课程外，其他相关专业知识课程不多，造成学生就业面偏窄。这与北大的培养目标很有关系。《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记载的北大的培养目标是“以造成学术专家为目的”。[①] 1919 年，北大废门改系，全校共设立数学、中文、法律、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 14 个系。以下是 1929—1930 年度英文系的课程：

表 6—21　　国立北京大学英文系课程设置情况（1929—1930 年度）

| 年级 | 科目名称 | 每周时数 | 单位 | 教授或讲师名称 |
|---|---|---|---|---|
| 第一年级 | 散文 | 4 | 3 | 郭汝熙 |
| | 诗 | 3 | 2 | 毕　莲 |
| | 英文作文 | 2 | 1 | 郭汝熙 |

① 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年影印版，第 16 页。

续 表

| 年级 | 科目名称 | 每周时数 | 单位 | 教授或讲师名称 |
|---|---|---|---|---|
| 第一年级 | 翻译 | 2 | 2 | 张则之 |
| | 拉丁文 | 2 | 2 | 罗 昌 |
| | 莎士比亚 | 1 | 1 | 温源宁 |
| | 戏剧 | 2 | 2 | 沈步洲 |
| | 文学概论(见国文系) | 3 | 3 | |
| | 初级法文或初级德文 | 4 | 4 | 常浩德、莱孙 |
| | 合计 | 23 | 20 | |
| 第二年级 | 散文 | 2 | 1 | 陈福田 |
| | 诗 | 2 | 1 | 陈福田 |
| | 英文作文 | 2 | 1 | 陈 逵 |
| | 翻译 | 1 | 1 | 吴 宓 |
| | 拉丁文 | 2 | 2 | 罗 昌 |
| | 莎士比亚 | 2 | 1 | 杨宗翰 |
| | 戏剧 | 2 | 1 | 叶崇智 |
| | 西洋文学 | 3 | 3 | 翟孟生 |
| | 古代文学 | 2 | 2 | 吴 宓 |
| | 音节学 | 1 | 1 | 毕 莲 |
| | 西文宗教史 | 2 | 2 | 杨宗翰 |
| | 中国文学史概要(见国文系) | 3 | 3 | 朱希祖 |
| | 中级法文或中级德文 | 3 | 3 | |
| | 合计 | 27 | 22 | |
| 第三年级 | 小说(三、四年合) | 2 | 2 | 芮卡慈 |
| | 文学批评(三、四年合) | 2 | 2 | 芮卡慈 |
| | 英文作文 | 2 | 1 | 陈 逵 |
| | 翻译(三、四年合) | 1 | 1 | 吴 宓 |
| | 拉丁文(二、三、四年合) | 2 | 2 | 罗 昌 |
| | 伊丽莎白时代文学 | 2 | 2 | 王文显 |
| | 戏剧(三、四年合) | 2 | 2 | 王文显 |
| | 中古代文学 | 1 | 1 | 温源宁 |
| | 复兴时代文学 | 2 | 2 | 温 德 |
| | 合计 | 16 | 15 | |

续　表

| 年级 | 科目名称 | 每周时数 | 单位 | 教授或讲师名称 |
|---|---|---|---|---|
| 第四年级 | 小说(三、四年合) | 2 | 2 | 芮卡慈 |
| | 文学批评(三、四年合) | 2 | 2 | 芮卡慈 |
| | 英文作文 | 2 | 1 | 陈　逵 |
| | 翻译(三、四年合) | 1 | 1 | 吴　宓 |
| | 拉丁文(二、三、四年合) | 2 | 2 | 罗　昌 |
| | 十八世纪文学 | 2 | 2 | 翟孟生 |
| | 十九世纪文学 | 2 | 2 | 温源宁 |
| | 今代文学 | 2 | 2 | 叶崇智 |
| | 合计 | 15 | 14 | |

资料来源：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2—124 页。

可以看出，从 1918 年开始，北京大学英文系课程设置中体现出来的重视文学的传统一直未变。实际上，民国时期大学英文系(外文系)的课程总基调是文学教育。

(三) 教学管理制度

招生考试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管理制度，各大学都是很重视的，北大也不例外。解放前大学入学考试基本上是各校自行命题，时间也不统一。一个人可以先后报考几个学校。有的学校可以委托外地学校代招几名学生。试卷分文理科，文科一般考国文、英文、数学、史地，理科考国文、英文、数学、理化。有的年份还考三民主义。北京大学外国文(本年只招英文学生)的考试要求为：

★(一) 能直接听讲并笔记；(二) 能以国语与外国语互译；(三) 能作文无文法之谬误。

★ 西洋历史、地理用国文或外国文作答。

★ 外国文之题通常为外国文书报一段译成中文，及《红楼梦》、《水浒传》或《老残游记》等书中一段译成外文。外国文稍有基础者，考试自易。[①]

① 《北平各大学情况》，新晨丛书室，1930 年。引自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57 页。

从上述要求来看，北大的要求是很高的，很注重翻译、写作等实际能力。季羡林回忆道：

入学考试，英文是必须考的，……不以讲英语著名的北大的题目却非常难，作文之外有一篇汉译英，题目是李后主的词：

别后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有的同学连中文原文都不十分了解，更何况译成英文！……各门学科考完之后，忽然宣布要加试英文听写（dictation），这对我们实在是当头一棒。我们在中学没有听过英文。我大概由于单词记得多了一点，只要能听懂几个单词儿，就有办法了。记得老师念的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鸡，只有一个字 suffer，我临阵惊慌，听懂了，但没有写对。其余大概都对了。①

下面是茅盾（1896—1981）回忆当时报考北大预科时的情景，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一些更具体的情况：

这是一九一三年夏。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这年我虚岁十八，实岁十七。

……这时我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报第一类的，只考国文与英文。我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

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与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②

下面是民国十三年（1924）北京大学招收本科新生入学试题。这份试题的题型，与今天偏重客观选择题型的高考英文试题很不一样，全是注重英汉双语功底的主观题型，难度着实不小，不要说让时下习惯了涂黑（或打√）训练的中学生难以下笔，就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也觉得难以招架。当时北大学生的质量之高可见一斑。

---

① 季羡林：《我和外国语言》，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 页。

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1 页。

## 本届本科新生入学试题

## 外 国 文

### ○英 文○

Ⅰ．任译下列两段之一为英文（译两段者只就一段评定分数）：——

(a) 老残到堤上闲步，抬起头来，看那南面山上一条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分辨不清；又有几片白云在那里面，所以分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从背后透过来；那山却不然，山的亮光由月亮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了。然而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东去，越望越远，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来了。

(b) 他用的两手和一个大脑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想出许多办法，造成一点文化。他不但驯服了许多禽，兽，他还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这些法则来驾驭天行，到现在他居然能叫电气给他赶车，以太给他送信了。他的智慧的长进就是他的能力的增加；然而智慧的长进却又使他的胸襟扩大，想象力提高。他也曾拜物拜畜生，也曾怕神怕鬼，但他现在渐渐脱离了这种种幼稚的时期，他现在渐渐明白：空间之大只增加他对于宇宙的美感；时间之长只使他格外明了祖宗创业之艰难。

Ⅱ. Translate ONE of the following two passages into Chinese: ——

(a) Science is, I believe, nothing but trained and organized common sense, differing from the latter only as a veteran may differ from a raw recruit; and its methods differ from those of common sense only so far as the guardsman's cut and thrust differfrom the manner in which a savage wields his club. The primary power is the same in each case, and perhaps the untutored savage has the more brawny arm of the two. The real advantage lies in the point and polish of the swordsman's weapon; in the trained eye quick to spy out the weakness of the adversary in the ready hand prompt of follow it on the instant. But, after all, the sword exercise is only the hewidg (按：原文如此)and poking of the clubman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So, the vast results obtained by science are won by no mystical faculties, by no mental processes other than those which are practiced by every

one of us, in the humblest and meanest affairs of life. A detective policeman discovers a burglar from the marks made by his shoe, by a mental process identical with that by which Cuvier restored the extinct animals of Montmartre from fragments of their bones. (T. H. Huxley)

(b) The most dangerous enemy of truth and freedom amongst us is the compact majority… yes, that is it!

Now you know. The majority neverhas right on its side. Never, I say! That is one of the social lies against which an independent, intelligent man must wage war. Who is it that constitute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n a country? Is it the clever folk or the stupid? I don't think you will dispute the fact that at present the stupid people are in an absolutely overwhelming majority all the world over. But good Lord!... you even never pretend that it is right that the stupid folk should govern the clever ones? (Uproar and cries.) Oh, yes…you can shout me down, I know! But you cannot answer me. The majority has might on its side… unfortunately; but right it has not. I am in the right…I and a few other scatiered (按：原文如此)individuals. The majority is always in the right.

Such men stand, as it were, at the outposis(按：原文如此), so far ahead that the compact majority has not yet been able to come up with them; and there they are fighting for truths that are too newly-born into the world of consciousness to have any considerable member of people on their side as yet. (H. Ibsen)①

（四）重视外语氛围的营造

我们从学校招生对英文的要求即可看出，北京大学对外文是极为重视的。这一指导思想与时任校长的严复以及后来的蔡元培等人办学理念有极大的关联。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早年考入中国最早的海军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学习驾驶。光绪三年(1877)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校长达20年之久，后相继担任了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等学校的校长。民国成立伊始，即被委任为首任北大校长。严复主政期间，对外文教学尤为注重，重视外语氛围的营造。营造外语氛围的方法很多，如以外语开展第二课堂活

① 《北京大学日刊》(第十一分册)，民国十三年八月十六日，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

动、教师以外文上各种课程等。以下史料可见一斑：

当于民国三年组织完备，重行开办，设专科七门，并延聘外国专科教师多人。其预定之学程如下：医学用德文教授；各种工艺学用英、德文教授；法律、商业及哲学用英文教授；农学及他种科学用英、德或法文教授。各省现有之高等学校当改为大学预科，教授英、德、法三国文字，各学生应于三种文字中按其将来预备学习之专科，选习二种文字。①

为纪念校庆三十五周年而编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中的描述可与之互为印证：

自复来校，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所称美。法国教员铎尔孟独心非之，叹为非兴国之徵。众弗顾也。后复去职，流风不泯者犹数年。至蔡元培来，始革之。②

对外文的重视，还体现在北大聘请名师从教，利用英文组织教学。如前所述，北大不拘一格，聘请的都是颇有名气的中外籍教员。这些教员自身的业务水平、责任心和教学态度等堪称一流。1915 年从合肥省立第二中学毕业考入北大预科的杨亮功说：

北大预科功课甚为严谨，其教育目的在作升入大学本科之准备，所以学科方面注重语文训练及基本知识之培养。预科学长徐崇清先生特别偏重英语，他本人就很少说中国话，因此外籍教授颇占势力。有些科目是全用英语讲授，教西洋史及演说学的便是两位英国人。西洋史是用《迈克斯世界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做教本，演说学是选读短篇英文演说。这位教演说的英国人不仅要我们背诵演说词，而且要于背诵时能表演出优良的演说姿势，很像古代希腊文字教师(Grammatist)教文学的方法。另外一位教英文的郭先生上课时也是用英文教学，他用的教本是 *Tales from Shakespeare*。我是刚从内地中学毕业，英文程度很浅，因此感觉有些吃力。③

（五）自由的学习氛围

北大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一种宽松的学习环境。1921 年考入北大的现代诗人、翻译家冯至说：“我在学

① 《记事·大事记》，载《教育杂志》第四卷第 11 号。

②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 页。

③ 杨亮功：《五年大学生活》，载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9—270 页。

德文的同时,也未减弱对中国文学的兴趣。那时北大很自由,我只要有时间就去听中文系的课。"1923年秋,冯至走进鲁迅的课堂,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冯至晚年时回忆说:"我觉得这样中西文学兼着学,确有不少好处,主要是能够开拓眼界,打开思路,不为一隅所囿,可以彼此启发,加深理解。"北大还允许旁听。翻译家曹靖华中学毕业后,因升学无钱,求职无门,1920年进了上海外国语学社。由于交不起学费,作为旁听生到北大红楼听课。北大的旁听经历为曹靖华以后从事介绍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作品打下了扎实基础。①

北京大学自创立时起到国民党败亡中国大陆时止,到底培养了多少外语专业毕业生,目前尚无确切统计数据,估计也很难统计,因为旧中国一直处于战乱当中,很多资料可能被灭失了。下列是自民国六年起至民国十八年止的北大英语专业本科生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个大概。

**表 6—22　　国立北京大学英国文学门(系)本科毕业学生统计表**
**(自民国六年起至民国十八年)**

| 年 份 | 1917 | 1918 | 1919 | 1920 | 1921 | 1922 | 1923 | 总计 |
|---|---|---|---|---|---|---|---|---|
| 人 数 | 17 | 12 | 30 | 18 | 16 | 3 | 17 | 215 |
| 年 份 | 1924 | 1925 | 1926 | 1927 | 1928 | 1929 | | |
| 人 数 | 16 | 31 | 29 | 9 | 8 | 9 | | |

说明:北大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就有英语专业毕业生,但当时没有分门(系)。毕业人数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优级师范科 100 人,宣统元年(1909)优级师范科 203 人,民国五年(1916)文科 17 人。本表是自民国六年(1917)到民国十八年(1929)的明确标明是"英国文学门(系)"毕业生的统计数据。(资料来源:吴相湘、刘绍唐:《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民国十六年卅一周年》,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年影印版,第 44—56 页。)

北大毕业的著名外语毕业生很多,大都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工作,如冯至、李广田(李广田与何其芳、卞之琳合称为"汉园三诗人")、卞之琳、潘家洵、袁家骅、杨周翰等人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

①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1—132 页。

## 第四节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国立清华大学

### 一、沿革述略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根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高等教育》,清华大学分为五个时期:(1) 游美学务处时期;(2) 清华学校时期;(3)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4)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5) 复员后之清华时期。① 本节暂不讨论西南联大时期(下一节将专文讨论)和复员后之清华时期(因时间短,又处于内战时期,教学极不正常),将着重讨论前三个时期学校的历史沿革及清华学校和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英语教学情况(这两个时期是清华英语教学最辉煌的时期)。

(一) 游美学务处时期(1909—1911)

1900 年 6 月,建国仅一百多年的美国,出兵大洋彼岸的东方文明古国,参加英、法等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镇压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翌年 9 月 7 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要按人口(每人一两)向侵略者"赔偿"白银 4 亿 5 千万两,连同"利息"共达 9 亿 8 千多万两,赔款期限为 1902 年至 1940 年。这就是历史上通称的"庚子赔款"。美国从中分得 3 千 2 百多万两,约合 2 千 4 百多万美元,外加年息四分。1904—05 年间,鉴于"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1864—1917),多次向美国政府交涉,要求核减退还"赔款";并一面上书朝廷,"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② 中美两国于 1908 年就使用这笔资金的问题达成协议,③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扣除所谓"实应赔偿"外,剩下的 1078 万 5 千余元从 1909 年起至 1940 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清政府以此作为派遣中

---

①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二》,民国三十七年初版,第 111—112 页。

②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载钟叔河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2 页。

③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p. 42.

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①] 清廷饬外务部与驻京美使商定派遣学生赴美留学办法。宣统二年(1909)外务部与学部会奏设立游美学务处,专司考选"学行优美,资性纯笃"之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6月,游美学务处成立,周自齐为总办,唐国安、范源濂为会办。

1909年8月,学务处按照"自拨还赔款之年起,初四年每年遣派学生约一百名留美游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续派五十名"[②]之规定,于9月4日在学部开考,应试者500人,第一天考经史舆地,第二天考洋文、算学,9月8日发榜,取68名。次日至13日复试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古代史、外国近代史、外国地理,最后"复试取定名单47人"。[③] 梅贻琦、王世杰等榜上有名,他们一行47人于同年10月赴美。

1910年7月,又招考了第二批学生。这次初试的英文题目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中文试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④] 录取了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70名学生,8月赴美,同时还考取备取生143人,入肄业馆训练。

1911年6月,学务处又考选了第三批直接留美者姜立夫、陆懋德等63人,于同年7月赴美。[⑤]

派遣学生留美大获成功,使中断了近30年的留美教育事业得到恢复。梅贻琦、张子高、竺可桢、金岳霖、胡适、吴宓、赵元任等之后成为学界泰斗,近40年里,他们是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

游美学务处除直接选派学生留美外,同时又筹设游美肄业馆,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优送往美国肄业。1909年9月,在北平西郊清华园旧址,建筑肄业馆房舍。肄业馆的办学方针是:"延用美国高等初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肄业馆考选的学生分为"第一格"与"第二格"两种(相当于后来的高等科与中等科)。规定以上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多数帝国主义列强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解放后,代表中国最高科学水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受益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六。(徐建平:《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史实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② 《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载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页。

③ 唐绍明、杨毅:《唐国安:清华首任校长》,《光明日报》,2011年4月20日。

④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⑤ 上述三批留学生名单详见《学府记闻·国立清华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4—34页。

两格学生，“均须身体强壮，性格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始为合格”。[1]

（二）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

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迁入清华园。辛亥革命后，学务处撤销，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清华学堂是游离于中国教育制度系统之外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Training School）。[2]它的学制，“虽然参照《奏定学堂章程》与美国学制，却与民初的中、美两国学制均不相同，而采用相当于美国六年中学和二年初级学院的八年一贯制”[3]，其目的在于使毕业生能直接插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学堂分设“高等、初等两科，各设四年，并于高等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课程办理，庶将来派遣学生分入美国大学或直入大学研究科”。[4] 开学之前，学校招生460人，94人编入中等科，余人高等科。这是清华学堂最早的一批学生。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时总办周自齐因公赴英，以颜惠庆（1877—1950）为代理总办（按：相当于校长）。

学生必须经过甄选、考试，方得以进入学堂学习。考试科目之繁多，考试之难，非今日学生所能想象。“计第一场考3门，第二场至第四场考10门。科目繁多不说，除国文地理本国历史外，余均用英文考试。”[5]1912年，继前三批选送的直接留美生之后，清华学校又遣送高等科毕业生侯德榜等16人赴美留学，这是清华学校遣送留美的第一届毕业生。是年10月，按照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Tsing Hua College），唐国安（1860—1913）任第一任清华学校校长。在他的任期内，建立起清华规模和勤奋学风。[6]

最初留美学生，人数无多。因此，对外设法扩充留美学额，对内增加在校学生数目。留美学额，除由该校高等科学生毕业后全部派送外，1914

---

① 《学部奏咨辑要》（续编），载陈学洵：《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22页。

② 早期的清华，外国人通常称它为“赔款学校”（Indemnity College），也有国人称它为“国耻纪念碑”，这是因为清华最初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办起来的。（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载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③ 黄龙先、雷国鼎编著：《各国教育制度》，正中书局1960年版，转引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页。

④ 学部：《奏请核准将游美肄业馆定名为清华学堂折》，宣统二年十一月，载陈学洵：《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736页。

⑤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

⑥ 关于唐国安，参见唐绍明、杨毅：《唐国安：清华首任校长》，《光明日报》，2011年4月20日。

年起，每隔一年选派女生十名。1916 年以后，每年又添派专科生十名，均由公开考试决定。此外，又有津贴生，凡在美国大学本科二年级肄业之自费生，均可申请。同时，在校学生亦逐年增加，中等、高等两科最多时共达 660 余人。

1921 年，留美学生有 460 余人，两年后又增至 470 余人。欧战之后，美国财政紧张，留美费用骤增，退款数目遂感不敷支出，于是采取收缩政策，专科生及女生均暂行停招。对于在校生，亦实行减招，以维持预算均衡。加之国内舆论对于留学政策指责颇多，故决定将留美学生名额逐渐减少，每年至多以五十名为限，而以撙节之款，自办一完全永久之大学。同年，清华学制由四四制改为三三二制，即中等科三年，高等科三年，初级大学（Junior College）二年。翌年，又改为四三一制。同时分别于 1921 年和 1924 年停招中等科和高等科学生。1925 年，中等科结束，开办大学部和研究院国学门，招收第一届大学部和研究院新生，乃立下大学之基础。①

（三）国立清华大学时期（1928—1937）

1925 年 5 月，清华学校招收新制大学普通科一年级学生 132 人。大学部"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②办学定位开始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全的综合大学过渡。1926 年，学校进行改革，规定"大学部本科修业期至少四年，学生毕业后给予学士学位"，把大学部改成四年一贯制的正规大学。同时决定提早设系，共设立西洋文学系、国文学系等 11 个系，奠定了清华大学的初步基础。

1928 年，随着北洋政府的覆灭，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了北平，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1897—1969）任校长。罗家伦上任后，开始了改革，裁并学系，添聘教授。翌年 6 月，教育部呈准行政院颁布了《国立清华大学规程》，规定清华大学本科为文、理、法三院，共设外国语文学系、中国文学系等十五个学系。同时，为继续研究高深学术起见，设立研究院。各学系分别筹设研究部，同年夏季开始招生。从 1928 年成立到 1937 年抗

① 1922 年 4 月发生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非基督教运动"，矛头直指在华教会大学，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仍处于依附美国的状况，因而成为当时社会舆论抨击的对象。当时主流的看法是，国内高等教育已渐发达，培养大学本科生"无需求诸外国"；派青年学生出国，"不谙国情，且易丧失国性"；清华留美办法太不经济，太不公平等，纷纷要求清华自办大学，并在全国大学毕业生中公开考选留美学生。社会舆论的指责，促成了清华学校的改革。1925 年 5 月，经外交部批准，大学部成立。1926 年，学校将大学部改成四年制大学，设立十七个系，规定大学部本科修业期至少四年，学生毕业后给予学士学位。自此，开始形成清华大学的初步基础。

②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第 49 页。

战开始前的 10 年，清华开始了历史上辉煌时期。

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清华大学和国内其他大学一样，被迫内迁，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办学生涯。清华、北大、南开三所著名高校先是西迁长沙，在岳麓山下合并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学校决定西迁昆明，于 1938 年 4 月 2 日，奉命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1946 年西南联大解散，3 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1938 年至 1946 年为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从 1946 年起止 1949 年全国解放，为复员后之清华时期。

## 二、外语教学及其特色

在清华学校时期，其教育目标定位与当时一般的公立学校不同，与教会学校也不相同。创办清华学校的目的是培养留美预备生，所以学生在八年的预备期间里，不只是作好功课上的准备，而且要熟习美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政治的情形，作好多方面的出洋准备。同时，建立学校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①

由于清华学校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造就"中国未来的领袖"，因此，它的办学方针是一切仿效美国，被称为"洋化最深的学校，洋教习、洋课本、说洋文"。② 清华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法、第二课堂活动等几乎都照搬美国的一套。在学校范围内通行的语言文字，英语取代了汉语；除了少数几门国学课程是用汉语讲授以外，其余课程全部用英语讲授。学校行政的会议、布告、印行的级刊与年刊、校长及中外名人在校的讲演、学生自己的演讲会和辩论会、戏剧歌舞的演出，等等，大半也是用英文。其他方面，如行政组织、制度，乃至建筑物的设计等都照搬美国的做法。一切以美国学校为标准，从清华园的外貌到人们的内心，无不渗透着美国化的影响。英国哲学家罗素 1920 年参观清华以后说："清华学校恰像是一个由美国移植过来的大学校。"

就语言学习而论，这种全盘英语化的、近乎目的语的环境（native-speaking environment）是十分有利于英语学习的。学生自然是满意和充满感激的。潘光旦（1899—1967）是中国现代最为杰出的社会学家和优生学家之一，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他于 1913 年由江苏省政府咨送清华

①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6 页。

②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1 页。

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获理学硕士学位。他在《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写道：

> 中等科的课程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都集中在上午。正课是读本，每周时数最多，附课是文法、作文、默写、拼音，各有各的教师，每周各占两小时。每晚还有两小时的集体而有教师值班辅导的所谓自修。合起来，一天总有五六个小时专搞英文。……这四年的训练是很好的，扎实、细致、准确、全面，同学们的感受虽各有不同，每一个人对英语的读、听、说、写，基本上都掌握到了；再加上四年高等科的文学选读和语法修辞等课，和其他课程中的英语的运用，又把所掌握到的巩固了下来，并且更趋成熟。清华不设专门的会话课，因为没有必要，反正一切用英语教学的课上，师生交谈是不容许说汉话的，美国教师上课，固然只能如此，中国教师上课也必须如此。此外，中等科的课程里，数学、世界地理、图画、音乐等，也是用英文书，说英语；教图画、音乐的是两个美国老小姐。最近有机会参加《辞海》的编写工作，对许多外国地名，还不陌生，还能拼写不误，说明当年世界地理一课程还是替我打下了些底子。①

1916年入清华学校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资深教授方重（1902—1992），也为我们具体描述了这种全盘英语化的语言学习氛围：

> 当年清华园内的外语气氛确实十分浓厚。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同外语打交道，许多教材是英文的，许多课程用英语讲授。教师上课讲英语，同学之间不但很自然地用英语交谈，并且经常抽出时间去教室里练习拼写生词，互相纠正发音……至于全校师生集会，则除唱校歌外，还常有英语辩论或演讲的竞赛。外国教师很多，他们西式平房住宅就叫"外国地"。师生来往密切，不分彼此。甚至校医处的大夫也是外国人；学生去看病时，更免不了用英语交谈。我们的早操，有很多年是由著名的马约翰先生（John Ma）用英语发口令带领着做的。②

全盘英语化氛围还体现在清华学校有大量的英文图书资料。根据 *The China Year Book*（1921—1926）的统计，1925—1926年间，清华图书馆拥有

①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载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年版，第74—75页。

② 方重：《求学时代漫笔》，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第21—22页。

英文藏书 29,000 册，这一数字超过了同期的除私立复旦大学外所有其他的国立大学和以外语教学著称的教会大学。[①] 有了这样的氛围，学生的外语学习兴趣就有展现的平台。

由于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就学生而言，英语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课。庄泽宣等人于 1924 年对高等科一至三级学生，作了一次学科兴趣调查分析。在学校所开的 17 门课程中，英语高居榜首。[②] 再从清华图书馆出借统计中，西文图书数量超过中文，可以看出当时西文(英语)的受重视程度。

表 6—23　清华图书馆出借统计

| 年份 | 西文 | 中文 | 合计 | 年份 | 西文 | 中文 | 合计 |
|---|---|---|---|---|---|---|---|
| 1914 | 397 | 476 | 873 | 1918 | 5,569 | 6,209 | 11,778 |
| 1915 | 1,912 | 1,408 | 3,320 | 1919 | 4,128 | 3,901 | 8,029 |
| 1916 | 4,078 | 2,432 | 6,510 | 1920 | 7,224 | 4,412 | 11,736 |
| 1917 | 4,337 | 4,705 | 9,042 | 1921 | 2,122 | 519 | 2,641 |

资料来源：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21 页。

从纯粹的语言学习角度而论，全盘英语化氛围，是孟子所说的外语学习的"庄岳之地"，有利于身处闭塞环境中的青年学子接触先进的西方文明，是英语学习者的洞天福地。况且，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一切课程设置都服从于留学，突出西方的教育方法，实乃情理之事。但这一情形也遭质疑。闻一多上学时，就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清华当时的重西学轻国学之风予以批评，呼吁"振兴国学"，认为"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③]

清华学校的课程，分为西学部课程和国学部课程两种。国学部课程有国文、中国史地等。西学部课程，在中等科，主要是英语训练。"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显然的要加强英语教

① 以下是各大学拥有的英文藏书量：北京大学，2,600 册；岭南大学，19,000 册；南京大学，14,121 册；东南大学，4,921 册；中山大学，3,498 册；复旦大学，45,500 册；燕京大学，12,024 册，圣约翰大学，17,000 册；苏州大学，6,000 册；南开大学，8,900 册；金陵大学 4,828 册。(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16 页。)

② 详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86 页。

③ 罗先友：《我所发现的清华精神》，《光明日报》，2011 年 6 月 23 日。

学，使学生多得听说英语的机会。”①高等科的西学部课程，特别是三、四年级的课程，主要是学习美国大学的若干基础课程，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经济、美国史、英文文学、西方文化（后改称现代文化）和第二外国语等。

清华为了培养合格的留美预备生，教师对学生的要求甚为严格。八年的学习，使学生养成了刻苦钻研的学风。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梅贻宝（1900—1997）在《清华与我》中回忆道：

> 老师督课很严，学生不敢怠惰。中等科课室即是自修室，每人指定一座。晚八时至十时为规定自修时间，随时点名查号。高等科比较自由些，但已养成用功习惯。熄灯后仍有人点蜡烛苦读，名曰“开夜车”；清早又有人到荷花池边去高声朗诵。我结婚后，内子发现我在梦里用英文背诵莎士比亚、圣经、华盛顿、林肯诸名篇，抑扬顿挫，一字不误，甚觉稀奇。我说这都是我们清华科班里练出来的功夫。②

为了督促学生努力学习，当时的考试甚多：一是口试，几乎天天举行。许多教员一上堂便提问，检查学生是否预习了功课。二是笔试，不定期举行。在一堂课开讲前或快要下课的时候，教员便出其不意地发下纸张，出个题目，限学生在十分钟内交卷。三为月考，例在必行。

清华的考试也极为严格。1916 年以前，考试的计分与国内其他学校无异，采用百分制，六十分合格。1917 年改为七十分合格。总平均不及格要留级。清华的淘汰率极高，达到 32%。③

清华学校的中外教师形成了严格、敬业、负责的教学作风。大多数中国教师都有留学海外的教育背景或者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教学水平也很高。著名学者梁实秋于民国四年（1915）考入外交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译有《莎士比亚全集》等。他在《忆清华》中深情地回忆他六十多前的恩师：

> 王文显先生，他作教务长相当久，后为清华大学英语系主任，……在英国受教育，成为十足的英国绅士。他的英语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说话乃是一大享受。

---

① 梁实秋：《清华八年》，载《学府记闻·国立清华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 年版，第 251 页。

② 梅贻宝：《清华与我》，载《学府记闻·国立清华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 年版，第 282—283 页。

③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载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6—157 页。

巢堃霖先生是我的英文老师，他也是受过英国传统教育的学者，英语流利而有风趣。我记得他讲解一首勃朗宁的小诗《法军营中轶事》，连读带做，有声有色。我在班上发问答问，时常故作刁难，先生不以为忤。

在中等科教过我英文的有马国骥、林玉堂、孟宪成诸先生。马先生说英语夹杂上海土话，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林先生长我五六岁，圣约翰毕业后即来清华任教，先生后改名为语堂，当时先生对于胡适白话诗甚为倾倒，尝于英文课中在黑板上大书"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然后朗诵，击节称赞。

孟先生是林先生的同学，后来成为教育学家。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记得孟先生教我们读《汤伯朗就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这是一部文学杰作，写英国勒格贝公共学校的学生生活，先生讲解精详，其中若干情况至今不能忘。

教我英文的美籍教师有好几位，我最怀念的是贝德女士(Miss Baeder)，她教我们作文，注重草拟大纲的方法。题目之下分若干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节，每节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句子。有了大纲，然后再敷演成为一篇文字。这方法其实是训练思想，使不枝不蔓层次井然，用在国文上也同样有效。她又教我们议会法，一面教我们说英语，一面教我们集会议事的规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权初步)，于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什么动议、附议、秩序问题，等等，终身受用。大抵外籍教师教我们英语，使用各种教材教法，诸如辩论、集会、表演、游戏之类，而不专门致力于写、读、背。是于实际使用英语中学习英语。①

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后，在办学方向上，仍然承袭了清华学校时期美国化的传统，按照美国大学的式样来建设清华大学。因此，这一时期清华的教育方针、学制、课程、教材、教法、第二课堂活动，乃至系馆建筑等方面，大都以美国著名的大学为蓝本。② 教育方针是美国的"通才教育"，也叫"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时任教务长的梅贻琦(1889—1962)记述了清华的学制和课程设置原则：

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自然

① 梁实秋：《忆清华》，载载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117页。

②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第115页。

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们，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连贯的，吾人虽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连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学生第二年以后，得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于专门之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取严格的限制，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习他系之科目，盖求学固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①

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成立于1926年，是最早成立的学系之一，当时称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称现名，系主任先后由王文显、吴宓、陈福田担任。

外文系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结合学校规定，并参照了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欧洲文学系的方案，由著名学者吴宓(1894—1978)拟定。吴宓将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目标规定为培养“博雅之士”，②希望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所谓“博雅”，又解释为“熟读西洋文学之名著”，“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培养学生的办法，一方面规定学生必须选修“属于全体之研究”的“各时代之文学史”，“以求一贯之博通”；另一方面则“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③ 吴宓又将这一目标具体化，即“(1) 养成外交人才；(2) 造就编译人才；(3) 造就外国语文教师；(4) 代办国内国外文化学术机关委托交换介绍及调查通讯之事。”关于培养途径，吴宓作出说明：“关于(1)者，本系可与历史政治等各系计划合作，而请求外交部指导赞助。关于(2)者，除本系之基本训练外，应授学生以编辑翻译之技术，且加练习。又须常与国内外出版界及编辑机关接洽，以备咨求。关于(3)者，为本系之主要事业，不待更加详说。关于(4)者，国内固已有此种专立之机关，本校不思越俎，更非争骛，仅可以已有之资力，尽其绵薄之责任而已。”④根据这一目标，该系的课程设置显示出“精”、“博”之特色：

① 《清华周刊》第426期，转引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9页。

② 根据文学院的《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的课程总则，外文系课程之目的是“为使学生得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国内所需要之精通外国语文人才；(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315页。)

③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4页。

④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4页。

(1) 文理兼修。外文系大一的总学分是30或38分,除国文占6学分和英文占8学分外,中国通史或西洋史(择一)占8学分,逻辑、高等数学或微积分(择一)占6学分或8学分,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择一)占8学分。外文系把学习知识作为学习外文的基础和动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但有利于外文学习,而且具有广博的文化背景知识。

(2) 语言与文学并重,中国语文与外国语文并重。吴宓和闻一多都主张外文系学生要学中文系课程,中文系学生要学外文系课程,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共同培养通晓中、西文化的通才。① 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类。语言课先后开出英、法文等八种外语课程。学生一般是以英语作为主修,其他则作为第二外国语,主修者须选读四年,第二外国语至少须选读两年,如果学生的主修外语程度较好,还可以选第三外国语。文学课程则按照一般美国大学的办法,分为文学史和文学体裁两类,按纵横两方面同时讲授。文学史课程先后设西洋文学史,使学生了解西洋文学的全貌,然后将欧洲文学分为五个时期,逐段讲授,即:"一、古代希腊、罗马;二、中世纪;三、文艺复兴;四、十八世纪;五、十九世纪;然后再念一门《现代文学》。文学体裁课程则分小说——《西洋小说》;诗歌——《英国浪漫诗人》;戏剧——《戏剧概论》、《莎士比亚》;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等类。"②正是在语言与文学并重的思想指导下,清华学生打下了扎实的语言文学功底,在艰难困苦的动荡条件下,涌现出一大批高精尖的各类专门人才。如外文系学生万家宝(曹禺)研究西方戏剧,创作了《雷雨》、《日出》、《原野》等,钱钟书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很精深,写出《管锥篇》、《宋诗研究》以及讽刺小说《围成》等。

表6—24　　外国语文系分年课程表(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

| 年　份 | 课　　程 | 总学分 |
|---|---|---|
| 第一年 | 国文(6)、第一年英文(8)、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择一,8) | 36或38 |
| 第二年 | 第二年英文(6)、第二外国语(任择一种,8)、西洋哲学史(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一,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 | 36 |

① 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3页。
②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4页。

续 表

| 年 份 | 课 程 | 总学分 |
| --- | --- | --- |
| 第三年 | 第三年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一) 古代希腊罗马(4);(二) 中世纪(至但丁止,4);(三) 文艺复兴时代(至十七世纪末止,4)、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概要(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 | 32 |
| 第四年 | 第四年英文、德法文(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四) 十八世纪(4)、(五) 十九世纪(4)、现代西洋文学:(一) 诗;(二) 戏剧;(三) 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 24 |
| 选修学程 | 第一二年拉丁文(8)、第一年希腊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高等英文作文(4)、英国文学书选读(4)、英语捷径(4)、其他研究课程(6) | |

说明:(1) 凡志愿将来入本系学生,在第一年级时,宜旁听或选习第一年第二外国语;(2) 除上列必修课程外,学生须选习至少四学分以足学校规定之一三二学分,才力胜任者更可多选;(3) 自由选修之学程,或在本系或在他系之课程中选修均可;(4) 三四年级学生,经主任允许,可选习研究所课程一种或二种;(5) 凡第二外国语课程,非修业二年不给学分。(6) 上列本系之必、选修学程,凡他系学生程度相当者,均可选修。①

从 1928 年成立到 1937 年抗战爆发前的 10 年,当是清华大学发展历史上辉煌的十年。"1928 年至 1937 年,是令人兴奋的 10 年,清华以快速步伐向前推进,欣欣向荣。"这 10 年间究竟造就了多少学生? 根据苏云峰(2001)的研究,从 1929 至 1938 年,毕业 10 届共 1520 人,每年平均毕业人数仅 152 人。从当时清华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来看,这一数字应该说是非常少的。实际上,清华在学业上要求之严格是出名的,学生的毕业率非常低,"约为每年平均招生录取人数的一半。换言之,考取清华大学固非容易,毕业亦甚困难,有 50%的人因不用功读书或其他原因离开学校"。② 从各院系看,文学院以外文系之毕业生最多,总数为 158 人,分布如下:

表 6—25 外文系历年毕业生人数(1929—1938)

| 级 别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毕业人数 | 3 | 4 | 7 | 11 | 27 | 18 | 16 | 38 | 16 | 18 | 158 |

数据来源: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52 页。

① 根据《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改编,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6—318 页。

②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51 页。

英语教育家李赋宁(1917—2004)于1935年进入清华外文系,1941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从他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一些清华大学英语教学的情况:

1935年我入清华外文系。外文系的师资队伍在国内可能是最好的之一。……清华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先要学习共同的基础课。我的"大一国文"分在B组,朱自清先生教读本,……我的"大一英语"课分在工学院入学英语成绩最好的一组。读本由陈福田先生讲授,作文由朱木祥先生批改。陈先生的教法不是逐字逐句讲解,而是讲课文的大意。另外,他讲一些与课文无关的常识,例如火警、棒球规则等。他让学生预先准备讲一个五分钟的英语小故事。

我在清华大一上的"西洋史"对我读西方文学大有帮助。授课教师为刘崇鋐先生,他在哈佛大学研究"西洋史",对西方文学也有研究。……刘先生每周都要指定课外阅读的参考书。不是一般使用的美国大一历史课本 Hayes, Moon&Wayland, *The World History*,而是有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例如,耶鲁大学俄国历史教授 Rostoffzeff 写的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书中提出一个观点,说罗马帝国的衰亡,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原因外,还有"心理因素"(a psychological factor)。我当时18岁,对这个解释十分好奇。刘先生把我们这些孩子当成年人看待,激发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能力。他这种教学法是很难得的。

……

我无形中也受了他的影响,对中世纪欧洲文学特别爱好。他的教学法是要求学生自制卡片,上面择要写上重要作者的生卒年代、主要作品的出版年代和情节梗概。他定期与学生个别会谈,检查学生自学的成绩。

贺麟先生教我们"西洋哲学史"……我们从这门课得到意外的收获,就是贺先生指定了柏拉图的《对话录》(英译本 Jowett, *Plato's Dialogues*),并要求我们用英文写读书报告。我初次接触到柏拉图的崇高思想和优美的散文,感到极大的乐趣,我的英文写作能力在不知不觉中也得到了提高。①

著名外语教育家王佐良教授在《想起清华种种》中的回忆,也专门提

① 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9页。

到清华名师的风采："说起清华人，我怀念我的老师们。大学一年级，俞平伯、余冠英两先生教我国文，一位教读本，一位教作文，都亲切而严格，有一次余先生指出我把爬山虎写成紫荆的错误，但又要我多写几篇给他看。二年级，贺麟老师教我西洋哲学史，见了我长达百页的英文读书报告不仅不皱眉，反而在班上表扬我；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我读了不少古希腊哲学家著作的英译，真有发现新星球似的喜悦。温德老师在工字厅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打开许多画册让我们传阅，幽默地然而严格地区分画的优劣。"①

外文系除了培养本系学生外，还承担全校性的公共外语选修课，有大一英文，第二外国语、专为蒙藏学生开设的"英语捷径"和专供愿意练习英文写作的学生选修的"高等英文作文"。学校对公共外语同样非常重视，各系都有较高要求。有若干系，如化学、心理、经济、政治等系规定必须学习两年英文。在学习第二年英文的同时，或在第三年，学习第二外国语。外文的学分，包括大一英文的学分在内，为 24 至 30 学分，占总学分的 18.1 至 22.7%。② 对于课堂教学，除了作出刚性的制度规定外，以英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教师在课堂讲授时或者全部用英语，或者杂以较多的英文语句；教师用教本或指定的参考书，绝大多数采用英文本；要求学生作习题、写实验报告、回答问题，考试（中文、哲学、历史等系除外）等，也都是用英语。对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而言，这些做法无疑是非常好的训练措施，对于当下日益浮躁的大学英语教学不无借鉴价值。清华学生在社会上竞争力强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大一英文一般由有经验的教师担任。教学内容分读本和作文两类。读本采用本系自编的《大学第一年英文读本》。这本书的内容大部分是文学作品。读本的讲授一般着重课文结构的分析，字句的用法，成语的选择等等。作文则注重修辞方面的基本训练，特别注意消除文法上的普通错误。

由于当时学生入学时一般英文水平都比较高，再经过大一英文一年内比较严格的训练，学生在大学二年级以后便能用英文阅读专业书籍和一般书籍，写作没有普通文法错误的简易英文，可以把英文作为学习专业知识的工具来运用，进而开始学习第二外国语。

① 《人民日报》，1991 年 4 月 24 日。

②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23 页。

### 三、成就及影响

《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1988)收录了季羡林等30位中国外语界泰斗的外语学习的回忆文章。这30位著名学者中,在清华大学(含清华学校时期)就读过的就有9位,占其中的27%。代表性的人物有季羡林、王佐良、许国璋、柳无忌、李赋宁、吴景荣等。这一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华大学(学校)对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贡献。

他们那一辈读书人,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①、消泯畛域的雄心,即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历代清华人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了心中的理想,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清华大学(含清华学校时期)培养了大量出色的各种类型的人才,其质量之高,在当时的中国罕有其匹。"解放以后,中国科学院1959年公布的270多名学部委员中,清华人就有56名,占五分之一;1910年至1948年历届毕业的校友中,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的就有80多人。"②

清华大学也培养了大量出色的努力为国家服务的英语人才。这批人中有许多是学贯中西的语言文学领域的卓越的学者和外语教育界的大师,赵元任、闻一多(曾任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钱钟书、曹禺、梁实秋、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赋宁、吴景荣、王岷源、刘世沐等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人也是新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为新中国的英语教学与研究,英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第五节　学术重镇、人才摇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一、成立缘由及经过

1937年7月,七七事变起,日本军阀蓄意摧毁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机关,

① "两造"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诉讼的双方,原告和被告。《明史·叶向高传》:"今两造具在,一讯即情得。"二是指双方。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所以以前革命家只有本党居主位,敌党居宾位,两造相持,决个胜负罢了。"这里是指中西(文化)。

② 方重:《求学时代漫笔》,载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相继侵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悍然用重炮和飞机轰击南开大学,使之毁于战火。国民政府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合并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1886—1964)、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889—1962)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1876—1951)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常委会主席原定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但蒋、张两人另有职务,且一直在陪都重庆,常委会一直由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学校于是年 11 月 1 日开学上课。学生主要由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新招收的新生和部分外校借读生所组成。

随着上海和南京的沦陷,长沙临时大学配合"长期抗战"的国策。1938 年 1 月,经国民政府批准,学校决定西迁昆明,4 月 2 日,奉命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5 月 4 日在昆明开学上课。除了三校原有的文、理、法商、工四个学院外,联大又增设了师范学院。联大共计五个学院,二十六个学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经过近九年的艰苦办学,取得了辉煌业绩。抗战胜利后,1946 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1949 年全国解放,各校为人民政府接管。

## 二、外语教学特色:偏向于研究型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

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简称外文系)由北京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和南开大学英文系合并组成。它的培养目标"未明确提出过。抗战前清华外文系曾以培养'博雅之士'作为本系的任务,要求学生'熟读西洋文学之名著','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但从实际情况看,原南开大学英文系的 3 项任务:"(一) 承担全校大一英语教学工作,(二) 培养需要运用英文的高级职员,(三) 培养翻译人才和文学研究人才。其中的(二)、(三)两项也可看作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的培养目标。"[①]代理外文系主任吴宓主张外文系的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为满足,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的精神,接受西方思想潮流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外文系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与他的思想感染也有关系。而文学是人学,最能体现西方文化的精髓。文学的教学,也必然会涉及那些文本背后的西方文化背景,这对奠定学生的西方文化根柢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西南联大外文系继承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外文系重视文学的做法。总体而言,联大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是偏向于研究型人才培

①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3 页。

养目标的。由于抗战时期的特殊条件，联大外文系做了一些调整和增减。外文系的课程除承担全校的大一英语（读本和作文）、全校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外，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重视文学是联大外文系课程设置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二个特点是选修课门类繁多。外文系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二类，其中选修课程总数达60余门。这些选修课根据教师的专长和当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而开设，为开拓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知识创造了条件，体现了西南联大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第三个特点是全面、系统。选修课程包括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和作品研究、文学理论、第二、三外国语及外语教学法等。这些课程以及必修课程的开设体现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术水平和培养研究人才的宗旨。应该说，联大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的。然而，从现在眼光看，这一课程设置似有不足，主要体现在语言理论课以及与社会接触的课程很少。外文系学生必修的文法学院一、二年级共同必修课程占40%，本系专业必修课程占60%。由于必修课程学分较多，外文系学生的功课一般比较紧张。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课程设置如下：①

> 外文系一年级学生所修课程全部是文法学院一年级共同必修课（38学分），外文系二年级学生除必修文法学院二年级共同必修课（16学分）外，还要必修外文专业必修课4门：英国散文及作文（一）（6）、英国诗（4）、欧洲文学史（8）、第二外国语（一）（6），加上文法学院二年级共同必修课共40学分（按：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是该课程的学分数）。
>
> 外文系三年级专业必修课：英国散文及作文（二）（4）、西洋小说（4或6）、西洋戏剧（4或6）、英语语音学（4）、欧洲文学名著选（一）（6）、第二外国语（二）（6），共28或32学分。
>
> 外文系四年级专业必修课：英国散文及作文（三）（2）、莎士比亚（4）、翻译（4）、欧洲文学名著选（二）（6）、第二外国语（三）（4）、印欧语系语言学概要（4）、毕业论文（2），共计26学分。
>
> （一）必修课程
>
> 1. 英国散文及作文（一）、（二）、（三）（共14学分）
>
> 外文系二、三、四年级所必修，均分A、B两组进行，由两位教师分教，其（一）为6学分，其（二）、（三）各为4学分。

① 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7页。

2. 第二外国语(共 18 学分)

外文系除英语外，还为本系和全校各系开设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第二、第三外语。文、法学院学生多选修第一年法文和第二年法文，理科学生多选修第一年德文和第二年德文。一般多能达到阅读专业书刊的程度。外文系学生一般必须修满三年法语或德语，要求除能阅读专业书刊外，还能阅读文学作品。

3. 欧洲文学名著选读(一)、(二)(共 12 学分)

外文系三、四年级学生必修着重讲授欧洲文学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包括圣经文学、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但丁、莫里哀、卢骚、歌德等。

4. 欧洲文学史(8 学分)

外文系二年级学生必修，是外文系学生最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1937—1938 学年开设时称为西方文学概要，次年起改称欧洲文学史。

5. 英国诗(或称英诗选读、英诗、英文诗)(4—6 学分)

二年级必修。

6. 西洋小说(4—6 学分)

三年级必修。

7. 西洋戏剧(1937—1938 学年称英国戏剧)(4—6 学分)

三年级必修。

8. 英语语音学(3—4 学分)

二、三年级学生必修。

9. 莎士比亚(也称莎士比亚研究)(4—6 学分)

三、四年级学生必修。

10. 翻译(2—4 学分)

四年级学生必修。1938—1939 学年称英汉对译。1942—1943 学年以后改称翻译。

11. 印欧语系语言学概要(4 学分)

四年级学生必修。

此外，1944—1945 学年张绍桂为师范学院英语学系学生开设英语演说及会话(6 学分)，也曾作为外文系三、四年级学生必修课。

(二) 选修课程

1. 国别文学史

英国文学史(6 学分)；法国文学史(4 学分)；法国近代文艺思潮史(4 学分)；德国文学史(4 学分)

2. 断代文学史

欧洲古代文学(4 学分);欧洲中古文学史(4 学分);文艺复兴时代文学(4 学分);伊丽莎白时期文学(4 学分);18 世纪英国文学(2—4 学分);19 世纪英国文学(4 学分);现代英国文学(4 学分)

3. 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

英国诗史(4 学分);法国诗史(4 学分);法国诗(4 学分);19 世纪法国诗(4 学分);德国抒情诗(4 学分);现代英诗(2—6 学分);维多利亚诗(4 学分);短篇小说(4 学分);现代小说(2—4 学分);法国戏剧史(4 学分);现代戏剧(2—4 学分);维多利亚散文(4 学分)

4. 作家和作品研究

查叟(Chaucer,通译作乔叟)(4 学分);班琼生和屈莱登(Ben Johnson and Dryden)(4 学分);米尔敦(Milton)(4 学分);浪漫主义诗人(4 学分);19 世纪英国诗人(4 学分);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2—4 学分);拉辛(Racine)(4 学分);雨果(Hugo)(4 学分);歌德(Goethe)(4 学分);浮士德研究(4 学分);浮士德与苏黎支(4 学分);尼采(Nietzsche)(4 学分)

5. 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4 学分);文学批评(4 学分);人文主义研究(4 学分);中西诗之比较(4 学分);文学与人生(4 学分);小说艺术(The Art of the Novel)(1 学分)

6. 语言理论

古英语(Old English)(4 学分);英语史(4 学分);Wittgenstein 的语言批评(4 学分);语言的逻辑研究(4 学分);语言与哲学(4 学分);英文文法修辞(4 学分);法国语言史(4 学分);法国语音学(4 学分);法国文法修辞(4 学分)

7. 外语及其他

俄语会话班(4 学分);英语教学法(4 学分);梵文(4 学分);拉丁文(4 学分);希腊文(4 学分);图书馆与目录学(4 学分)

选修课程共计 60 门。

除了开设上述以文学特色的专业课程以外,联大外文系还按照学校的要求,重视通识课程的学习。通识课程的设置,可以为学生奠定文、理贯通的知识基础,避免张道一所说的"'普通常识'欠缺"的问题。同时,选修与旁听制度的推行,对形成学生的通贯性知识基础,也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联大明确规定：人文科学的学生必须选一门自然科学的课；理工科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的课。外文系学生，在专业课之外，必须选一门自然科学的课和两门社会科学的课。[①] 以下是一位从 1943 年秋季考入联大外文系学生的回忆：

> 我初到联大注册入学后，便去教务处寻找外文系一年级的功课表，问来问去才知道并没有这样一张固定的功课表，而是学分制。课程有必修、选修之分，哪门课多少学分，一学期要读多少学分，读满多少学分才能毕业，有规定。……规定必须遵守，但听什么课，听那位教师的课，学生有相当大的自由。
>
> "选修"课当然可以自选，有的"必修"课竟然也可自选。同一门课常常会有不止一位老师分别开出，学生就有了选择的余地。例如，大一国文是全校学生的共同必修课，分成若干组，两位老师为一组，读哪一组，学生自选……
>
> "选修"课却又还有"必选"的规定。我读外文系，不但要选两门社会科学课，还必须选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社会科学课，我选了吴泽霖先生的"社会学"和王赣愚先生的"政治学"……自然科学课，我选了苏良赫先生的"地质学"，至今我还记得各种石头的形成和石头硬度分级、光泽分类等等。这些课程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②]

## 三、西南联大的外语教育经验

### （一）拥有一批教学水平高的中西贯通的大师级教师

梅贻琦校长在《复员后之清华（上）》报告上说："教师皆系当代权威，学子受益匪浅。在校诸教师皆以治学谨严，蜚声士林。"[③]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后来西南联大理学院的许多课程，像姜立夫先生讲微积分，周培源先生讲力学，都是直接用英文讲。[④]外文系教授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中西兼通的学者，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

---

① 张道一：《西南联大，我深深的怀念您！》，载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0 页。

② 王景山：《西南联大生活杂忆》，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 70 周年纪念文集》，第 422 页。

③ 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载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68 页。

④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116 页。

以及对本国国情较深入的了解，如卞之琳、吴宓、钱钟书等人。卞之琳(1910—2000)既是我国最杰出的莎士比亚研究学者和翻译家之一，又是中国现代杰出诗人，他的哲理诗《断章》[①]是1930年代现代派的名篇，被选入大学中文系的教材。联大教授授课风格各异，但一般都反对照本宣科，而重视讲授自己研究所长。如吴宓教授，他所讲授的最精彩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诗。讲课时，他自己完全融入于作品之中，他的课极富感染力。他备课极为认真，每讲授一次欧洲文学史，总要尽力重读他已十分熟悉的从荷马史诗，直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原著。这类课程对于学生富于启发性，他恐怕是较早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进行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②] 钱钟书不仅是解放后《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重要译者之一，而且写成博大精深的巨著《管锥编》及讽刺小说《围城》，后者被著名学者夏志清称为“将来定与《儒林外史》和《镜花缘》等古典名著同垂不朽”。[③] 以下史料叙述了这两位联大名师的风采：

◆ 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

我还选修了吴宓先生讲授的“古代文学”。内容为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学。这是一门经典课程，对研究西方文学最为重要。吴先生凭记忆讲授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人名、地名、年代、故事情节、人物性格、作品的意义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等，都讲得十分熟练、有趣。从吴先生的讲课我认识到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最好不要看讲稿，而是全神贯注地面向学生，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受到作品的魅力，并对学生起潜移默化的作用。[④]

◆ 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

他(按：指钱钟书)总是笑眯眯的，闪动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既严肃又幽默……他讲解生动活泼，妙语连珠；又旁征博引——谈到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某篇文章，某一句时，为了穷源溯流，他便毫无疑难地写出几种外语来——把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等的文学状况、现象和思潮讲得有声有色，

---

① 《断章》全诗如下：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短短几个字，卞之琳教授的新诗，写尽人生哲理。他将刹那间的感觉升腾为深邃的慧思，表达了一种相对、平衡的观念，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闻一多教授认为卞氏的诗是“旷世之作”。

②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③ 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6)，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④ 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5页。

真是引人入胜。他很少提问同学，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仿佛一股不尽的智慧灵泉从他的嘴里奔流出来。①

在西南联大，还有这样一批外籍教师。他们怀着对中国的热爱，忘我地工作，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才华。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教学极端认真，风趣幽默，深得莘莘学子们所爱戴。来自美国的温德教授（Robert Winter）和来自英国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是其中的佼佼者。下面是联大学子的回忆：

◆ 彭国涛：《回忆温德教授》

他上课的时候，不仅教室内座无虚席，就连教室两边的窗前都站满了人，室内大多数是外文系学生，室外大多数是非外文系学生，有些甚至是校外慕名来听课的……他给我们讲米尔顿长诗，他用假声装作魔鬼撒旦反对上帝的权威，发出要求自由的呼喊。我们都被他那惟妙惟肖的表情和清脆悦耳的嗓音所感动。这首长约一万行的长诗有些段落，他不是照本朗读而是在背诵，在歌唱，在疾呼。②

◆ 许国璋：《是的，这样神为之驰的场面确实存在过》

我永远不会忘记，1937 年秋和 1938 年春，在南岳和蒙自他（按：指燕卜荪）同我们一起研读过的那些伟大诗篇。读着美妙的诗篇，诗人燕卜荪替代了先生燕卜荪，随着朗读升华为背诵，词句犹如从诗魔口中不断地涌出，大家停下了手中的笔记，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诗泉，这时，学生、先生共同沉醉于莎翁精神之中。是的，这样神为之驰的场面确实存在过。③

**表 6—26　　西南联大外文系英语教授名录**

| 姓　名 | 教育背景 | 教学特色（业务水平） | 学术成就 |
|---|---|---|---|
| 叶公超（1904—1981） | 广东番禺人，1925 年毕业于美国麻省 Amherst 学院；次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 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授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语音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活泼。 | 任外文系教授会主席、系主任；与徐志摩、胡适等人编辑《新月》月刊。 |

① 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8 页。

② 彭国涛：《回忆温德教授》，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 70 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2 页。

③ 《许国璋文集》2，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501—502 页。

续　表

| 姓　名 | 教育背景 | 教学特色（业务水平） | 学术成就 |
| --- | --- | --- | --- |
| 柳无忌（1907—2002） | 江苏吴江人，清华学校毕业赴美深造，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 严谨、充实、认真、清楚。 | 代理外文系主任；著有《孔子的生平及时代》、《苏曼殊评传》、《中国戏剧史》等、散文集《古稀话旧录》。 |
| 陈福田（1895—1951） | 广东人，檀香山华侨，夏威夷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 | 英语口语流畅、自然，讲课内容较浅显。 | 任外文系主任；著有《大学一年级英文课本》。 |
| 吴宓（1894—1978） | 陕西泾阳人，哈佛大学学士、硕士。 | 不需要看讲义就能准确、熟练地叙述历史事实，恰如其分地评论各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教学极为认真负责，条理清楚，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 学者、诗人、批评家，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位杰出先驱。著有《吴宓诗集》，主编《学衡》杂志和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 |
| 莫泮芹（1903—） | 广东台山人，美国哥伦比亚哲学博士。 | | 1943—1944学年代理外文系主任。 |
| 潘家洵（1896—1990） | 江苏吴县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 | 语音纯正，机智生动，用词讲究。 | 译有易卜生、萧伯纳戏剧多种，著有《易卜生研究》。 |
| 袁家骅（1903—1980） | 江苏沙洲人，1937年考取英庚款留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 | | 参与确定僮族标准语，为僮族人民创造了文字。合译有布龙菲尔德《语言论》一书。 |
| 陈嘉（1907—1986） | 浙江杭州人，美哈佛大学硕士，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 讲课生动活泼，对学生要求严格。 | 对莎士比亚的创造理论和艺术特色有较深研究。著有《英国文学史》三卷，主编《英国文学作品选》等。 |
| 钱钟书（1910—1998） | 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庚款留学，牛津大学硕士。 | 学识渊博，通晓欧洲多种语言，讲课注重思潮源流和演变，引证原文，说服力强。 | 著有《谈艺录》、《管锥篇》、《宋诗选注》、《七缀集》、小说《围城》等。 |

续 表

| 姓　名 | 教育背景 | 教学特色(业务水平) | 学术成就 |
| --- | --- | --- | --- |
| 赵诏熊(1905—) | 江苏常州人,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哈佛大学硕士。 | 讲课精细、生动。 | 著有《莎士比亚及其艺术》、《萧伯纳》等篇。 |
| 胡毅(1904—) | 湖南长沙人,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芝加哥大学博士。 | 解放后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3卷英译工作。英语语音纯正,讲课明白清楚。 | 著有《斯宾塞教育论》。 |
| 卞之琳(1910—2000) | 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 | | 我国最杰出的莎士比亚研究学者和翻译家之一,译有纪德、詹姆士、衣修武德的小说和莎氏的《哈姆雷特》。 |
| 温德(Robert Winter) | 美国人,芝加哥大学硕士。 | 讲授英诗、莎士比亚等课,语音纯正,用词典雅,讲课深入浅出,明晰、自然,生动活泼,富于戏剧性,教学效果极佳。 | |
| 白英(Robert Payne) | 英国籍,肄业于巴黎大学文学院。 | 教授英国诗史、现代英诗。 | 编辑出版了英译唐诗集,名为 *The White Pony*(可译作《小白驹》)。 |
| 燕卜荪(William Empson) | 英国人,剑桥大学硕士。 | 讲课精辟深刻,批改作业仔细认真,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 诗作有《诗歌》,论著有《歧义的七种类型》等。 |

资料来源:根据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16页改编。

(二)课程设置以文学为主(参阅本节相关内容)

(三)重视基础课教学

西南联大非常重视基础课的教学,承担基础课教学任务的基本上是那些学识渊博、在学术上有相当造诣且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名教授。虽无明文规定,但这似乎是联大的“习惯法”,每个院系都按这样的规则来操作的。对此,受其惠泽的联大学子常常津津乐道:“联大课程安排有一个特点,越是各院系的共同必修课越是由著名学者教授,到一线主讲。体育课在当前一些高校里可能不是那么起眼,可是当年的联大却是非常重视的,由清华

资深老教授马约翰主持。给我们上大一体育课的是抗战前篮球国手之一的牟作云先生。不过我记得马约翰先生也教过我们，那时他已是耳顺之年，鹤发童颜，西装便服，身手矫健，神采奕奕，讲解垒球(baseball)打法，用语全是英文，Pitcher(投球手)、Catcher(接球手)、Firstbase(一垒)、Secondbase(二垒)……此类术语都是那时学会的。"①

再如，大一英文(相当于今天的一年级大学英语)由陈福田、莫泮芹、叶公超、柳无忌、潘家洵、钱钟书、黄国聪、陈嘉、谢文通、黄炯华、胡毅等一流教授讲授，几乎是精通英文的教授都上大一英文。经过一年读、写、听的训练，"学生多能借助字典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教科书和参考书，能用英文写出合格的实验报告，也能听懂外籍教师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如英国人白英给工学院学生开出的'造船工程')"。②

(四) 重视文学阅读，实施全英文授课

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英语专业教学，是偏向于研究型人才培养的，重视文学阅读，课程是以阅读文学作品为主，与现在的偏向基本技能训练的教学③是大不相同的。作为非专业的"大一英文"教学，也很重视阅读。学校"大一英文"的教学以《大一读本》为教材。该教材以短篇的现代散文作品为主，篇目包括毛姆的《苦工》、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兰姆的《论烤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爱·伦坡的《一个凶手的自白》、欧文的《孤儿寡母》等。无论是专业，还是非专业课程，联大没有开设现在通行的口语、听力等课。但是，"学生的听力和口语都得到相当的训练。这是因为：外文系教师的课，不论哪一门，一律用外语直接讲授。别的系的教师(包括工学院)，也有一些教授是用外语直接讲授的，至少也会在讲授中夹杂许多外语。我选定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是和经济系的学生一起上。陈先生自始至终一直用英语讲授，指定的参考书是英文原著，考试时也要求用英语答卷。联大教授中99%留洋欧美，他们的外语口语语音纯正，给学生作了很好的示范"。④ 大量的阅读和全英文的授课，给学生创造了习得自然语言

①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3页。

②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③ 根据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英语教学大纲》，听说读写译五项专业技能课程占总课时的65%左右。(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教学大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④ 张道一：《西南联大，我深深的怀念您！》，载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页。

的环境。解放前的学校，不论是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国立大学，还是像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基本上都没有开设当今大学（甚至中小学）都普遍开设的口语、听力之类的课程，却无一例外地都很重视阅读和全英文授课等语言学习环境的营造，因而，这些学校的英语教学质量都很好，学生的口头交际能力并不差。西南联大等学校的做法，正是抓住了语言学习的本质。国学大师季羡林强调：学习口语，必须尽快进入原文，要看书。① 这里，季老已经道出了阅读跟学习口语的关系。当代著名的外语教育家董亚芬坚持"英语教学应始终以读写为本"，她用事实及自身经历说明了阅读的重要性。② 董亚芬是通过阅读经典作品的改写本入门的。她读的那些简易读物虽然很浅显，但故事性强，语句地道、流畅，很容易激起学习者的阅读冲动。因为这是在轻轻松松的状态中吸取语言营养，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语言能力。那时她在中学阶段未专门上过听说课，但由于接受了严格的阅读训练，进入大学后面对绝大多数真正用英语讲授的课程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听课的困难。③

（五）开放自由的教学与学术氛围

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邹承鲁院士说："当年的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对各种学派的教授兼容并包，贯彻百家争鸣的办学方针。"④在联大开放的学术自由之风影响下，实行教学自由。对此，汪曾祺这样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何兆武也说过："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⑤外文系陈福田教授开的是"西洋小说史"，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这与标准的"西洋小说史"内容相距甚远。更为人称道的是，陈福田对战局非常关注，上课的时候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

① 鄢秀：《季羡林先生谈语言学习》，《外语界》，2002年第4期。

② 关于阅读重要性，我们老一辈外语教育家、翻译家，如季羡林、葛传椝、许国璋等都有大量的论述，相关内容请参阅《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第一辑、第二辑）中的文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2005年版。

③ 参见董亚芬：《英语教学应始终以读写为本》，载束定芳主编：《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2005年版，第35—36页。

④ 周棉：《西南联大的校园氛围与闻一多精神之养成》，《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⑤ 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克的小说，而是首先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再讲正题。再如，政治学教授张奚若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应该介绍整个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他不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下学期讲 T. H. Green、F. H. Bradley 和 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仅仅是19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不足以包括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可张奚若就是这么讲。① 如此的教学自由，教师当然可以"合法"地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放到课堂教学中，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

### 四、西南联大的历史贡献

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具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组成联大以后，汇聚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高校师资阵容。三校"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在极度简陋和艰苦的环境中精诚团结，弦歌不辍，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办学的近9年的时间里，毕业学生8000多人，均学有成就，大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栋梁之才，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 （一）为国家培育出了各个领域如群星灿烂般的知名专家、学者

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其成材率之高，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与之相颉颃。这一点，从几组典型的数据中即可看出。迄今为止，共有6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联大学子杨振宁、李政道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9位科学家中，联大毕业生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截至1993年，我国共遴选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545名，其中，联大毕业生为78名，占总数的七分之一。② 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名获得者中，"联大毕业生有6人"，③占近四分之一。

再来看联大外文系的情况。根据北京大学等校编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西南联大（含长沙临大、师范学院英语系）存在的近9年的时间里，共培养英语专业学生1400余人（见下表）。这些毕业生中，绝大多数都

---

① 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18页。

② 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③ 周棉：《西南联大的校园氛围与闻一多精神之养成》，《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已成为国内外大学外文系教授、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或翻译家，有些也从事新闻出版、外事、中小学教育或文艺创作等，他们在教书育人及沟通中西方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如北京大学的李赋宁、杨周翰、许渊冲、杜秉正，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景荣、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刘承沛、王岷源、刘世沐，国际关系学院的巫宁坤、索天章，南开大学的查良铮，外交学院的王般，天津外国语学院的金隄，湖南师大的刘重德，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袁可嘉，商务印书馆的党凤德，新华社的杜运燮、赵全章，《中国科学》杂志的牛其新，《英语世界》杂志的沈师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雨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姜桂侬（曾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等等。这些人无一不是新中国外语界令人震撼的领军人物。此外，还有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授、系主任的许芥煜，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授的吴讷孙等海外知名华人学者。

表 6—27　　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在校学生人数统计（英语专业）

| | 年份 | 1937 | 1938 | 1939 | 1940 | 1941 | 1942 | 1943 | 1944 | 1945 | 总计 |
|---|---|---|---|---|---|---|---|---|---|---|---|
| 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 | 人数 | 99 | 44 | 140 | 135 | 183 | 176 | 151 | 169 | 219 | 1316 |
| 师范学院英语系 | 人数 | | | 33 | 26 | 13 | 13 | 7 | 3 | | 95 |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 页。

### （二）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许多联大学子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的日子里，西南联大多次响应政府号召，掀起了从军热潮。其中，“第二次从军热潮是应征到军中为美国来华参战人员担任翻译。1941 年 9 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 1 年，共征调 70 余人，约半数为联大学生。1943 年 10 月教育部又下令，征调包括联大等几所大学的所有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翻译员，此次联大应征的四年级学生和其他年级志愿者应征的学生共 400 余人”。[①] 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在《我心中的西南联大》中回忆：“1943

① 李曦沐：《西南联大——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 70 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 页。

年，中国也派远征军出国到缅甸与美英联军共同作战。中国军队需要大量翻译到美英军中当译员(上尉军衔)，时值寒假(只差半年毕业)，西南联大号召全校四年级男生都去当翻译，体检合格后先培训一个月，即上岗。可见西南联大学生英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理、法、工各科学生都能胜任，有的翻译官后来立了功。"[①]为了适应给美军输送"翻译官"的任务，联大曾开办过为期三个月的"译员培训班"。班中教官多为联大教授，学员也以联大学生居大多数，外文系有不少学生前往应征。

除了担任盟军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抗战时期，有许多联大学生为国捐躯，其中就有外文系学生黄维、缪弘、朱晦吾、吴若冲等人。[②]

① 任继愈：《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载《光明日报》，2007 年 11 月 3 日。

②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 页。

# 参考文献

**英文部分**

A. P. R. Howatt.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Arthur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n Today*.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7

Bob Adamson. *China's English: 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Charles Hodge Corbett. *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63.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H. G. Widdowson.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Jack C. Richards & Theodore S. Rodger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Jeremy Harmer. *How to Teach English*.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Brook Street,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td. , 1971

Knig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Kwang-Ching. Liu.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6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Lanham, Md. , & Lodon, 1996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6

Robert Gardner £ Wallace Lambert.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ss. : Newbury House, 1972

Robert Morrison & William Miln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

Rod Elli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Patsy M. Lightbown £ Nina Spada. *How Languages Are Learned*.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T. 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Vivian Cook.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

William Purviance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1909

肖辉: *A Critique of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V. No. 9, 1836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1832

**中文部分**

[明]林尧俞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清]张百熙:《张百熙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

《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章程》,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三月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

冯桂芬:《显志堂稿》,光绪二年校邠庐刊

贾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台湾文海出版社

马挺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

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光绪辛丑,上海书局石印

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卷二,思補楼藏版,1930年刻本

王韬:《瀛壖杂志》(卷三),光绪元年十月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印刷,1913年

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仲夏,古微堂聚珍版

吴馨等:《上海县续志》,上海南园志局,1928年版

徐建寅:《欧游杂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

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宗棠)全集·奏稿》卷二十

姚莹:《康輶纪行》第十二卷,1867年刻本

佚名:《广方言馆全案》,光绪年间印行,铅印本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张焘:《津门杂记》卷中,游艺山庄藏版,光绪十年刊本

张之洞:《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十八,1920年铅印本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政》(上),1957年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四册·奏稿四,光绪丁酉冬月,湘阴左氏校刊

蔡芹香:《中国学制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

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1932年版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初版

陆殿扬:《革新的外国语学习法》,世界书局1933年版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印刷,1913年

吴相湘、刘绍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年影印版

吴相湘、刘绍唐:《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民国十六年卅一周年》,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 1971 年影印版

杨承芳:《英语学习法》,开明书店 1948 年版

张沛霖、钟子岩:《英语教学》,开明书店 1949 年版

周越然:《六十回忆》,太平书局 1944 年版

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

《六年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1941 年教育部颁行,商务印书馆出版

陆殿扬:《排除外国语直接教学法的误会》,《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四号

《教育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1940 年)

《教育季刊》一卷二期(1925 年)

《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26 年)

《燕大友声》第二卷,第九期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私立岭南大学建校康乐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教与学》1936 年 2 月号

《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一、二号

《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十、十一号

《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七号

《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八号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中华教育界》(复刊)第二卷第十一期(1948 年 11 月号)

《中学生》1934 年 6 月号

《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六卷第二十三期,民国二十四年(1935)

《私立岭南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出版,私立岭南大学印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北京大学日刊》(第十一分册),民国十三年八月十六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影印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

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美]约翰·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

《学府记闻·国立清华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 年版

《学府记闻·国立清华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 年版

《学府记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 年版

《学府记闻·燕京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1 年版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南开校史研究丛书》(第二辑),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冰心:《冰心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

陈国钦、袁征:《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陈雪芬:《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陈原等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董宝良、但昭彬、陈晴:《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付克:《中国外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与学习》,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顾柄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版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

出版社 2005 年版

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杭州市教委:《杭州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胡适:《胡适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黄美真、石源华、张云:《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季羡林:《季羡林全集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年版

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金忠明、李若驰、王冠主编:《中国民办教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李传松:《新中国外语教育史》,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李良佑、刘犁:《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永昌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版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13,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柳无忌:《柳无忌散文选——古稀依旧》,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

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束定芳:《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版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永裕印刷厂1976年版

王铭玉、贾梁豫:《外语教学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

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6),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第一辑),香港豪威印刷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萧超然、沙健孙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谢长法:《中国中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谢泳、智效民等:《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97—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许国璋:《许国璋文集》2,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颜惠庆著:《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回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尹文娟:《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于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张传燧:《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张美平:《晚清外语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张晓唯:《旧时的大学和学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

张正东:《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章兼中:《外语教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朱纯:《外语教育心理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邹韬奋:《经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

曹靖华:《自叙经历》,《新文化史料》1998年第1期

曹慕尧:《延安抗大俄文队:中国两所大学的发源地》,《党史纵横》2002年第7期

查启森、赵纪元:《文华公书林纪事本末》,《图书情报知识》,2008年第5期

陈忠:《文华书院——清末民初西方文化传入武汉的窗口》,《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4期

郝淑霞:《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俄语教育概观》,《中国俄语教学》,2006年第3期

胡小君:《浅论民国时期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3期

柯六六:《柯庆施就读上海外国语学社前后》,《江淮文史》,2008年第6期

廖承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培养外语人才——在全国外语教育坐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教育》,1878年第10期

刘润清:《许国璋教授与英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罗立胜、石晓佳:《语法翻译教学法的历史回顾、现状及展望》,《外语教学》,2004年第1期

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语编辑室:《建国以前的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2年第一辑

汤开建、颜小华:《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在华活动述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田正平、刘保兄:《消极应对与主动调适——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发展方针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鄢秀:《季羡林先生谈语言学习》,《外语界》,2002年第4期

张美平:《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江南制造局的翻译及其影响》,《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

张美平:《教习译写番字,事虽轻而干系重——明代四夷馆翻译教学述略》,《中国科技翻译》,2011年第2期

张美平:《略论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学特色》,《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张美平:《马礼逊经典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张美平:《语法翻译法的存在价值及其创新运用》,《广西社会科学》,

2007年第10期

张运君:《京师大学堂和近代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周棉:《西南联大的校园氛围与闻一多精神之养成》,《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燕京研究院:《燕京学报》,1999年11月新七期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2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1964年内部发行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45辑),1985年内部发行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工作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国家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 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国家教育委员会:《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端木凡义:《国民政府时期重庆私立中学发展探析》,西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沈晴:《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